

评论卷

董广安 纪元 ◎主编

中国高级记者

ZHONGGUO
GAOJIJIZHE
CHENGMINGZUO
TOUSHI

成名作 透视

河南人民出版社

ZHONGGUO
GAOJIJIZHE
CHENGMINGZUO
TOUSHI

中国新闻从业者的必读教材 当代新闻巨匠的未传之秘

ISBN 7-215-05199-4



9 787215 051997 >

ISBN7-215-05199-4

定价：49.00 元

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 成名作

董广安 纪元 ©主编

透视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董广安,纪元主编.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4
ISBN 7-215-05199-4

I. 中… II. ①董…②纪… III. ①评论—新闻写作
②评论—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G2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0726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5723341)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29

字数 324 千字 印数 1—5 000 册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9.00 元

前言

新闻记者,过去和现在,都是令人羡慕的职业。做一个搏击时代潮头的新闻记者,多少年来都是许许多多青少年——不论中学生还是大学生心中的梦。而高级记者,则是有幸进入新闻圈里几乎所有从业者梦寐以求的目标。

20多年来,改革潮洗刷河山,神州大地沧桑巨变。支持、反映、欢呼这一变革的新闻界骄子们,以犀利的目光,灵动的大脑和智慧的笔触,打造出一篇篇传世力作,凝铸了一幕幕经典的历史时刻,成为时代变革的宝鉴。这些作品,又帮助他们自己登堂入室,圆了高级记者的神圣加冕梦。

人们当然还要探究:是哪些作品帮助了这一批批成功的寻梦者蛇蜕龙变?何方水土是这些作品的背景渊源?还有,这些新闻界的翘楚们如何化平凡为神奇,把人们司空见惯的素材,打造成一鸣惊人的杰作?

本丛书的使命就是把上述谜底和盘破解。

破解的工作,由一篇篇经典佳作的写作者完成:从新闻背景材料的发现,到如何撷取、如何立意、如何谋篇布局、如何选择突破点,直到作品发表后的社会反响,其中

全部奥秘，对读者倾囊相授。

这对于矢志于新闻工作的莘莘学子们，尤其在全国各类高校攻读新闻专业的大学生们，不啻是一套可以自读自悟的宝典；对于活跃在新闻第一线数十万新闻界的编辑、记者们，无疑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借鉴；对于各级宣传部门，尤其是从事新闻报道的专职报道人员和广大通讯员，则无疑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示范。

从灿若繁星的新闻佳作中选择成名人物的“成名”之作，我们是颇费斟酌的。踌躇再三，我们决定把作品的选择框定在改革开放以来这一时段，而重点则放在近10年。这10年，历史最为光辉灿烂。而得风气之先的新闻作品，也尤为抢眼，更何况，这些作品洋溢着浓厚的时代气息，与读者相拥相伴。阅读这些作品及其背后的故事，可以与时代共着脉搏，与改革同着命运，仿佛电影的回放镜头，让你重新领略改革时代风云人物的迷人风采，再睹并不久远的伟大事件，激励你更加自信地阔步向前。

我们锁定并实施透视的近200篇作品，按通常体例分为消息卷、评论卷、通讯卷（上、下册）。这些作品大都是拿过全国大奖的精品佳作，其中相当一些必定是传世经典，不论是思想内涵还是写作技巧，均可跨时空留传。在这些作者中，既有巨匠大师级人物，更有众多后起之秀，他们中已有不少因业绩卓异而走上了领导岗位，却仍笔耕不辍，战斗在一线。这些人中，有的供职于中央新闻单位，有的供职于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单位，有的在基层的市、县，其工作用“日理万机”形容亦不为过。但他们认可并赞同我们这项工作的意义，拨冗著文，将难传之秘，奉献给读者，这让我们着实感动。

由于作者众多,风格也就五彩缤纷。在以采写回眸的形式破解谜底的“透视”操作中,有的按约稿信所示,从新闻背景到写作过程到社会反响逐项道来;有的则将上述诸项融为一体;还有个别作者则寄来有关评介、资料,这些评介、资料均能恰切表现作者的心思,也能起到破解奥秘的作用,我们也认可照录。

需要说明的是,此书定名为《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无疑此中作者应是高级记者(编辑)。有人可能会问,其中也有少数是主任记者、记者,为什么?我们回答,现实生活情况复杂,由于种种原因,有的作者是因故暂时未评高级职称,有的则是写下佳作后另换他岗,但其作品社会影响很好,我们实在无法割爱,不可不选入,算是本书一个例外。

由于时间仓促和为一时无法克服的因素所限,还有很多经典佳作未及编入,这是遗憾,只有留待以后修订时完善了。

还要说明一点,由于作者众多,且件件都是精品,故而在排序上,使我们分外作难:是按收到稿件先后,还是按稿件发表时间为序,抑或按内容类别为序?斟酌再三,还是采用最简单的办法:按姓氏笔画排序。于是乎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鉴于我们学识所限,此书不当之处当在意料之中,敬请方家指正,也请读者多提宝贵意见。

编 者

2002年12月16日

目 录

马世琨

洋人不兴厚礼 2

王义堂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 8

王文沪

明明白白这颗心 19

王利亚

把感情变过来 24

邓书扬

警惕加重农民负担新动向 31

石 云

劝君且慢豪华 42

卢少华

发展是就业之本 46

史 敏

少应酬、多办事 60

冯 越

一个人真能承包 100 个厂吗? 68

另一种溃堤 73

永志强	
平均数字的后面	80
朱元胜	
官倒,权钱结合的怪胎	85
不治“倒官”难禁“倒”	87
朱世良	
当官要讲“知民度”	93
朱承修	
且看李登辉怎样表演	100
刘振林	
且说“一把赢把把输”	110
米博华	
祖国万岁	118
孙官生	
打好扶贫攻坚战	127
孙德宏	
房地产一级市场亟待整治	150
李长虹	
谱写奥运史上最壮丽的篇章	158
李景平	
我们以什么形象进入 21 世纪	170
丢掉坛坛罐罐	173
走出黑色思维	176
积重也得返	179
杨文镒	
怎让沉渣又泛起	192

杨诚勇	
黄河大桥贪污案引出的问号	199
是“振兴会”，还是“催眠会”	205
吴建平	
龙生九子各尽才	212
宋森芳	
“对策”也可当镜子	221
汪言海	
粮农呼唤保护价	228
张 琮	
这种“电视明星”当不得	235
张德修	
中国农民五十年	242
陈修成	
车站、码头问事处直通电话何时装？	254
做好外商投资的向导	256
新设一个对外开放“专业”	258
开发老城区要考虑配套	260
要有武汉的“麦当劳”	262
该考虑高层停车场了	264
商场要再上一个档次	266
不能太“苕”也不能太“精”	268
多搞几条霓虹灯一条街	270
要有丰富多彩的夜生活	272
武汉要打楚天牌、华中牌	274
企盼最新的《武汉电话号码簿》	276
让路牌等城市标记更多更醒目	278



吹南风	280
陈新民	
要敢于负责	287
林冠群	
为什么有人敢伸手要官	294
周显东 周保工	
艾滋病离我们还有多远?	302
赵介岐	
“优二兴三”岂能丢二弃三	313
胡占凡	
扫除形式主义	322
姚达添	
是“维护人权”,还是推行强权?	331
徐民和	
中国学者重新思考传统文化	341
黄元才	
旗帜鲜明地同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 活动作斗争	355
盛明富	
人命关天的大事	364
走出认识上的误区	366
解决深层次的问题	368
强化工会的监督职能	371
提高自我保护的能力	374
龚 雯	
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 一件大事	381

彭 俐	
不被看好 人生一宝	390
程友民	
新闻要关注贫困	398
储瑞耕	
就同“大款”交朋友事向领导干部	
进一言	405
谢 宏	
评改革开放二十年	413
詹国枢	
少数企业“死”不了,多数企业“活”不好	
.....	427
鲍佳音	
必须追究“买主”的刑事责任	438
潘益大	
学各地之长 创上海之新	447

马世琨

1940年11月12日生,山东高密人。1964年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67年研究生毕业于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1967年8月分到人民日报社国际部。其间,20世纪70年代初曾任人民日报社常驻南亚记者,80年代初任常驻东部和南部非洲记者,90年代末任驻美国常驻记者。曾多次随团和率团出国访问,出席各种国际会议,去过五大洲56个国家。1986年3月至1999年8月,先后任人民日报社国际部副主任、主任、高级记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时不时有感而发,写点儿随笔、札记之类的小文章。由于自己长期从事国际报道,有更多机会接触外国人、外国事,因而写东西多以洋人、洋事为例,借题发挥,生发开去,以期有所借鉴或有所警示。

洋人不兴厚礼

因工作关系，我去过许多国家，礼物自然也收到不少。有时看着这些来自异国的小摆设，不由得要发点感慨。国人送礼之风日盛，几成祸患，倒真该学学洋人不兴送厚礼的风习。

澳大利亚是我最早访问的发达国家，在那里，我传统的送礼观念受到很大冲击，因此至今难忘。十几天中，我们接触了从部长到农场主等各阶层人士数十人，每人收到4件礼品：海外新闻局送的是一本澳大利亚画册和一个笔记本，当时拥有十几亿澳元资金的全澳羊毛公司送了一条印有该公司标志的领带、一枚绵羊造型的黄铜徽章。我同一位在这里工作的中国同志谈起受礼的情况，他感叹道：“‘礼轻情义重’这句中国成语，在澳大利亚倒名副其实。”

岂止是澳大利亚，别的国家也差不多。我收到的礼品多半是领带、圆珠笔、产品模型和别的什么小玩意儿。有的礼品也算有些来头，但同样不起眼。譬如，孟加拉国总统送的是一对黄麻做的茶杯垫，秘鲁副总统送的是一组泥捏的印第安人头像，维也纳市长送的是嵌在玻璃球

中的该市市徽,波音公司的礼物是一架灰颜色的铁皮波音飞机模型。不管礼品大小,送礼时都很郑重其事,我们也入乡随俗地当面打开包装,说些感谢主人美意和礼物精美之类的话,主人则满意地笑着。在这种时候,我不止一次地想到,在外国人头脑中大概压根儿就没有“礼薄,送不出手”这根弦。

在国人心目中,日本人爱送重礼,但我两次访日后发现,情况并非如此,或者说已起了变化。主人所赠的礼品中,最像样的也不过是瓷盘、镜框、小闹钟等,显然谈不上有多大含金量。有一件事给人印象很深,我访问北海道时的日本陪同在访华时特意前来看我,饭后握别,他当着众人双手送我一个大信封,我请在场懂日文的同事看看信里写了些什么,原来里面只有4个信封、8张信纸。一位同事戏言,“日本人见面时不是喜欢说‘多多关照’吗,这大概是要你‘多多写信’”。

在许多国家,不兴送重礼已相沿成习。礼薄决不会被理解为送礼者小气和小看对方;相反,送礼过重反倒被认为小瞧人家,带有功利目的或贿赂之意,总之是花钱买没趣,招麻烦。看来,“礼轻情义重”,至理名言,中外同理,这或许是送礼的要义。

其实,洋人送礼是很有讲究的,并非不假思索,信手拈来。这讲究之一是,礼品要符合送礼者和受礼者的身份。从上面谈及的礼品上不难看出这一点。这里不妨举一个与之相反的例子。一次,我陪丹麦新闻代表团访问青岛一家很有名的食品厂。山东人实在,殷勤招待一番之后,还送给每位客人该厂产的各类饼干七八包,满满一大塑料袋。结果是,这些礼物被客人或悄悄送给了翻译,

或干脆留在房间里。这里，主人犯了送礼不看对象的大忌：忘了客人是来自万里之遥的北欧，忘了丹麦是曲奇饼干的故乡。

讲究之二是礼物要有纪念意义。一件好的礼品不论是取自于一位名人、一座建筑、一处胜迹，还是一个掌故、一种动植物，无不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点，最能体现民族文化的内涵。客人在我客厅里欣赏高不盈尺的埃菲尔铁塔，巴掌大的孔朵拉小船，雪白的绒质驼羊，形态生动的木雕犀牛，大概会马上想到巴黎、威尼斯、拉丁美洲和黑非洲。不难想像，这些礼品会荡起收藏者怎样的记忆的涟漪。“礼品应是记忆的物化。”我想，不管是礼品的赠送者还是制作者，都应该记住这句话。

（《人民日报》1996年2月13日）

采写回眸

对写作《洋人不兴厚礼》的回忆

这篇小文写于6年之前，如今我已记不清它因何事而起，但可以肯定的是，群众对当时社会上愈演愈烈的送

礼风气的强烈不满一定引起了我的共鸣。我觉得,国人送重礼既有功利方面的因素,也有观念方面的原因。本文所针对的当然是后者。就我所知,那时一些出国代表团,特别是有相当级别又去发达国家的代表团,常常为挑选礼品发愁,惟恐礼品价值不高,档次不够,送出去人家不喜欢,丢了中国人的脸。这主要是对外国国情缺乏了解,或许对自己也缺乏几分自信。因此,我写这篇小文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告诉国人,洋人一般比咱们有钱,但人家不兴送厚礼。我们要借鉴、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这送礼之道应也在其列。

动笔之前,我考虑最多的是三方面问题。一是选材。我到过几十个国家,接受的礼品少说也数以百计,在一篇字数限定1300字的短文中,不可能像开礼品单似的列举很多,只能拣最具代表意义的说。如何取舍主要照顾以下几点:地域性——五大洲都点到;送礼者的代表性——上至总统,下至陪同,政治、企业、文化等各界力求涵盖;礼品特色——品种、质地、形状、颜色尽可能不同,给人以花样繁多的感觉。顾及上述方方面面,无非是想说明,不送厚礼是全球性的风习,有特色的礼品效果好,影响长久,以便使议论更具说服力。

二是文章如何开头。是具体从一个送礼情景入手还是通过一番概括性的文字直接点题?想来想去,选择了后者。因为我想,有着“去过许多国家,礼品自然也收到不少”这种经历的人,对礼品和送礼之道发点议论,读者还是会感兴趣的,开门见山地点出主题不至于显得突兀,在反感送礼之风日隆的读者中更容易引起共鸣。

三是行文方式。本文采取夹叙夹议和有虚有实的写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法。文中既有送礼的根本要义、送礼的诸多讲究和“礼品应是记忆的物化”这样的提炼，力求给读者知识和启迪；同时又尽量穿插场景描绘和直接引语，以便多一些现场感、亲切感和可读性。

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社内外反映不错。当晚，在报社举行的一个涉外招待会上，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邵华泽同志特地走过来，对我说：“你今天的文章很好，我早就想写，苦于没时间，你说出了我要说的话。”本文被评为《人民日报》1996年度一等奖和精品提名奖。一篇并非重大题材的小文章得到这么高的奖次，在《人民日报》是不多见的。

要讲写作心得，可谈一点：小文章难写，更需要在意构思、谋篇布局和遣词造句方面下工夫。这样，短文章也可以长寿。时隔数年，这篇时过境迁的小文还能让人读下去，令我欣慰，也让我更明白这番道理。



王义堂

1953年8月8日生于关公故里山西省临猗县
平生为人,以关公为榜样,但又不能完全做到关公的
“忠义仁勇”;作文,以马克思为楷模,俯首膝下又时
时想站在他的肩上;做人,努力去和别人不一样,但
至今也未形成独特而丰富完美的个性。

十年动乱中,因说了林彪的坏话,被开除学籍、
团籍;1982年1月,大学毕业时因不会看人脸色,被
发配到山西一山区小县。我不服,私自闯入山西日
报社,被郭全盛、王士元等前辈错爱,一干14年。其
间风风雨雨,既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也多次被省劳
动竞赛委员会记一等功,并被评为省劳动模范,作品
蝉联山西最高新闻奖。1995年,幸运之神降临,调
入人民日报社,作品多次获中国新闻奖。现任评论
部副主任。

缺点是轻信,总把人想得很好,屡屡吃亏又很难
改变。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

社 论

江泽民同志关于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重要论述，具有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指导意义。“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世纪交替的历史高度，着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继承历史，立足现实，前瞻未来所作出的精辟论断；是深入总结我们党近八十年历史经验、深入思考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紧密联系我们党面临的形势任务和现实状况作出的科学结论；是对党的性质、宗旨和历史任务的新概括，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对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新要求。这一重要论述，从根本上进一步回答了在充满希望和挑战的21世纪，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是解决党的建

设两大历史性课题,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战斗力和创造力的行动指南。

江泽民同志指出,“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这一重要思想,深刻揭示了“三个代表”的丰富思想内涵和巨大的现实作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长和壮大,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克服困难、战胜强敌,夺取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中国先进文化、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战胜各种风险,经受各种考验,不断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夺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始终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根本原因也在于坚持了“三个代表”。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发生的一些挫折和失误,其根本原因也在于不同程度地背离了“三个代表”。在迈向新世纪的征途上,我们党要解决好诸多复杂的矛盾和困难,经受住新的考验和锻炼,把我们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就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进一步提高执政水平,进一步巩固执政基础。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带领人民不断前进。

“三个代表”集中体现了党的根本性质,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文化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作用;创造历史的是人民,人民推动着历史的发展。在当代中国,三者有机地统一于党领导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三个代表”的论述,高层建瓴,总览全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既是党的建设的重大理论课题,更是抓紧推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进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的实践课题。认真学习“三个代表”，身体力行“三个代表”，当前最重要的就是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要把“三个代表”的要求，落实到坚定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去。从“三个代表”的高度，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是完全正确的，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我们要始终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我们现在面临的和可能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很多，而且往往错综复杂、相互交织，但归根到底，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新的历史条件下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与调整完善生产关系，根据经济基础的发展自觉改革和调整上层建筑中不相适应的部分。这就要求全党同志在贯彻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时，在从事的各项事业中，看看我们所采取的措施，符合不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符合的就毫不动摇地坚持，不完全符合需要调整补充的积极调整补充，不符合的勇于实事求是地纠正，以利于我们准确把握发展趋势，跟上时代步伐，充分体现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时代精神。

要把“三个代表”的要求，落实到党的各项工作中去。我们开展工作，观察和处理问题，都要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无论是党的领导机关还是党的基层组织，无论是企业党组织还是农村党组织，无论是经济工作、科技教育工作，还是思想文化工作等，都应当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探索新途径。每一个党的组织，每一个党员尤其是党的各级领导

干部,都应当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坚定的信心,高昂的热情,勤奋的工作,旺盛的斗志,科学的态度,在各自的岗位上创造新的业绩。

要把“三个代表”的要求,落实到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中去。我们党正处在整体性的新老交替的关键时期,必须不失时机地抓紧对青年干部的培养,特别是要选拔好跨世纪担当重任的一批接班人。要真正把培养使用好各类人才作为党和人民事业兴旺发达的大事来看待、来落实。要下定决心,加大力度,促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化,把党管干部的原则同改进管理干部的方法结合好,努力形成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健康成长的机制和一整套办法。

要把“三个代表”的要求,落实到从严治党中去。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一定要坚持不懈抓下去,要不断探索和建立一些真正管用的监督制度和机制。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坚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在经济发展、生活状况和工作条件不断改善的情况下,必须继续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在社会生活方式日趋多样化的情况下,必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党的各级组织对党员干部要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来加强党的建设,既是一项紧迫的现实任务,也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要贯穿于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关键是广大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当好“代表”。“代表”是方

向,是楷模,是希望,是力量。全党同志一定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深入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励精图治,开拓创新,努力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加朝气蓬勃,更加坚强有力,把我们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更加兴旺发达。

(《人民日报》2000年5月22日)

采写回眸

写作絮语

当了多年学生,最怕答卷——并非不会答,而是很不愿意让人牵着鼻子走。丛书编委会约稿,又得当一回学生,照题答卷。不同的是,这次倒有点心甘情愿:我的作品居然能上大学的教材?是沾沾自喜,还是小人得志?也许都有点。还是应付考试的老办法——先拣软的捏,挑容易的答,回答一下《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以下简称《纲领》)见报后的反映。

《纲领》一文见报的头天晚上,中央电视台就摘播

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天早上广播,见报后人民出版社出了个小册子,即以此文命名。人民日报社当月将它评为“一等好新闻”,年终将它评为精品。后又申报了中国新闻奖,被评为一等奖。发奖会上,我作为获奖作者的代表,作了个简短的发言。这个发言,也是对这篇作品获奖的背景的说明,同时真实地表达了我对这篇作品获奖的思想认识,更重要的是凑凑字数,偷个懒。全文转录如下:

各位评委、各位领导和新闻界的朋友们:

刚才,有朋友问我:“此刻,你是什么心情?”我和获奖的朋友们如实地告诉大家:对我们——本届中国新闻奖的获得者来说,此刻,是一个令人心情激动的时刻,是一个让人内心不安的时刻,更是一个催人奋发的时刻。

自己诚实的、辛勤的劳动,得到社会的公认,让我们心情激动。

可能还有许多比我们的作品更优秀的作品,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入选,使我们心情不安。

“9·11”事件给世界许多地方的经济、政治蒙上了阴影,我们国家却是“风景这边独好”,我国新闻工作前程似锦,令我们精神振奋,催我们奋发向上。

因此,我想说三句话:

一是感谢。感谢单位的领导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岗位,给了我们写出获奖作品的机会。我曾经在一家省报工作过14年,那时,我起草的社论叫省报社

论；今天，我起草的社论叫《人民日报》社论；明天，我如果回到市里工作，起草的社论只能叫市报社论。谁都明白，《人民日报》社论比省报社论、市报社论获奖的机会多得多。而在我们的同龄人中，在我们的同行中，比我们更努力、更有献身精神的人成千上万。可是，机遇只能给少数人。作为幸运者，我们感谢给我们机遇的领导，我们应百倍珍惜这种机遇。我们也十分感谢评委们对我们作品的厚爱。

二是自责。中国新闻奖，这是我国新闻作品的最高奖。作品，是不是最优秀的、质量最高的，我们不敢大声说一声“是”。作者的人品呢？不知其他的作者怎样想，反正我自己认为，这方面的差距更大些。我写的，我做到多少？我倡导大家做的，我实践了多少？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活中五光十色的诱惑，我曾有过彷徨；面对一些朋友一二百字的稿子署上名字，得到多样经济的、政治的实惠，而我们大块大块的评论员文章、社论，甚至七八千字的任仲平文章，也署不上名字，我也曾有过几分委屈。今天，面对奖杯，能不自责吗？好在，我还健康地活着，还有很多的机会去弥补，还有不短的时间去努力。

三是奋发。我们这一代新闻工作者，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候。党领导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我们提供了空前广阔的用武之地，我们有条件奋发向上。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伟大的、需要不断创新的事业，需要我们奋发向上。我们的作品，远没有也永远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但尽善尽美却是我们矢志不渝的追求；我们做人，远没有

也永远达不到高尚纯粹,但高尚纯粹是我们热切向往的理想境界,我们必须奋发向上;高扬主旋律,打好主动仗,是党和人民对新闻工作者的要求,是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作为获奖作者,我们需要带头奋发,我们需要带头努力,我们需要天天向上。

谢谢大家!

谈到作品的写作过程,如何立意、谋篇、布局,如何取舍材料,如何提炼主题,如何选择切入点等,对我来说,是一件难事。实话实说,写文章,特别是写社论这种“指点江山”的文章,要是下笔之前,将这些东西都考虑成熟,是不可能的。一是时间不允许,新闻评论时间要求往往很急,不可能让我们慢条斯理去“按图索骥”;二是果真按这些要求去做,必然大大束缚我们的思想,很难有所创新,有所突破。而没有创新和突破的文章,是没有存在的价值的,何来好与不好之说?我写的另外一些文章,也曾被好心的同志从上述方面进行分析。我读了那些分析的文字之后,常常感到吃惊:我并没有这样想,也没有这样做啊!

世界上的事情本来就是这样,先有了文章,才有了写文章的理论;先有了各种各样的文体,才有了关于文体的理论。因此,我的感觉是,文章的写法掌握得再多,也是难以写出好文章的。关键是要实践。这种实践,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学习。学习哲学。哲学本来是个如花似玉、人见人爱的少女。硬是让一些不入流的“哲学家”以“教

材”、“简明读本”之类的东西弄成了干干巴巴、面目可憎的骷髅。因此，一定要读马、恩、列、斯、毛、邓的原著，一定要读国内外当代著名哲学家的原著（高清海先生的原著，我一直在读）。先贤们的智慧，会将我们领上一个新的思想高地，使我们“一览众山小”。也就是站在这样的高地上，我们才能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刻内涵和实践意义。学习中央文件。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既是对工作的指导，也是对实际生活的概括；既有解决问题的工作方法，也有思考问题的思想方法。主管《人民日报》评论的副总编和总编、社长，对中央的各种文件，用大家的话来说“熟极了”。他们出题目，改文章，总能高出一筹，既能准确地传达贯彻中央的精神，又能有所创新。

二是深入。深入生活。“功夫在诗外”。写好评论的功夫不在办公室里，而在办公室之外。“游遍名山大川而后壮文气。”文章，特别是评论文章，承担的是“指点江山”的责任，倘若不对“江山”了然在胸，如何“指点”？我自己有个真切的感觉，在山西日报社工作时，全省的118个县、区，有100个以上，我都去过，其中深入采访的是少数，大多数是走马观花。但观和不观大不一样。跑遍了山西的山山水水之后，我感到山西就在自己的眼皮底下，下笔的时候犹如站在高山之巅看河山，可以十分自信地评说，激情满怀地赞颂。而到报社之初，写起评论来就是底气不足，不知道一句活说出去是深还是浅。两年之后，我将全国一些有代表性的省份都跑了跑（有的是利用采访的机会，有的是自费），逐步又有了几分自信。深入群众。我们的文章说到底是为群众做的。和人民群

众有血肉联系的人,才能写出人民群众需要的文章。深入群众,不是以上面来的人的面目、以知识分子的面目出现在群众中。那样,群众只会对你敬而远之。而是将自己真正融入群众中,不仅知道群众的疾苦,而且熟悉群众的语言,特别是要熟悉群众的一些“粗俗”的话。在群众中间,不能是文质彬彬的书生,而是和他们一样“土”,群众才能和你成为朋友,你才能深入矿层深处,采到优质矿。

一看字数统计,已达到要求,就此打住。



王文沪

1945 年生于青海贵德县农家。大学毕业后自愿去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自治州，长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在人与自然的严峻对立中获得了艺术感悟，对西部农村、草原和厂矿生活均有真切体验，尤其痴迷于表现游牧民族的艰辛与浪漫。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文学创作，有短篇小说集《枪手》出版。90 年代以后致力于散文写作，同时也为报纸撰写言论。现为青海日报社高级编辑、副总编辑，中国作协会员。

明明白白这颗心

人生修练到这种境界，殊非易事。

在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利益冲突日趋尖锐化的今天，克己奉公这句话，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做得彻底更难。

而史怀明却做到了。奉公，他做到了“有十分力不出九分九”；克己，他做到了“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他做得从容、彻底、决绝。不掺水分，不图赏识，不留退路。在普遍的人生态度潮水般向一种时髦涌去的时候，他像个沉着自信的朝圣者，向着人生的高境界一意孤行；在参与人数惊人之广的腐败筵席旁，他像个冷峻的过客，杯羹不取。

对于一切稍稍有违共产党人崇高宗旨的获取，他的态度永远是一个大写的“不”！

他就这样守护着良心，守护着真理，并且永不妥协。

在这个时代里，完全不受良心谴责的有两种人。一种是早已失去良心的人，一种是史怀明这样纯粹的人。另一种人最为广大，心态也最为复杂。面对利益的强大

诱惑和利益分配关系中的弊端，迷惘和不平常常困扰着他们，干扰着他们。他们不愿或是没有勇气像史怀明那样，将为公为私的原则实践得纯粹化、彻底化；但也不愿或是不敢像第一类人那样彻底地背叛原则、抛弃良心。因此，当利益和原则之间的冲突一次次逼问灵魂的表态时，他们的心不得不在反复的权衡、两难的选择和对结果的预测中备受煎熬。于是，此一时和彼一时，同一个人会表现出迥异的两重人格；或者，由于料得到的凶险后果，他们会拒绝诱惑，堂而皇之地坚持一回原则；或者，由于可以不负任何责任而让原则作出让步。在前一种情况下，他们会深信自己是有良心的人；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会像安慰小孩儿一样安慰自己的良心：“比起那些社会的蛀虫，我算很不错了。”

而对史怀明来说，这样的权衡、盘算和两难并不存在。做人的信条早已铸就，一切都变得简洁、明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没有心理重负的人，是活得真正潇洒的人。

史怀明的可敬还在于，他并不满足于做一个洁身自好的人。他敢于冒世风之大不韪，公开推行自己的原则。他并非一言九鼎的人物，他只不过是一个管锅炉的人，人微言轻，他有理由对社会风气的好坏不负任何责任。但他居然正经八百地劝说别人不要搞公款吃喝，否则国家利益会受损。当他以拳拳之心宣讲这一番本应由另一种身份的人宣讲的大道理时，他肯定不在乎别人在心里会对他肃然起敬还是嗤之以鼻；他肯定也不去考虑一个管锅炉的人的话语对公款吃喝的狂澜会产生多大的遏制力。赤子之心是无畏之心，他真有点像蒲松龄先生说的，

不怕“秋萤之火，魑魅争光；野马之尘，魍魉见笑”了。

我们的社会多一些史怀明这样具有高度自律精神的人，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但值得深思的现象是：任何历史条件下，都曾有高度自律的人。而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少数人的高度自律并不能成为社会进步的基础。社会的进步既需要少数人的高度自律精神做旗帜，更需要完善而强大的运行机制对那些缺乏自律精神的多数人作制约。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一千次地赞美史怀明的精神。只是，史怀明精神的实践者中，应该多一些对社会风气负有更多责任、具有更大影响的人，而不仅是一位管锅炉的人。

（《青海日报》1997年1月9日）

采写回眸

这篇评论的由来

这是为报纸推出的先进典型配发的言论，旨在对典型的价值内涵、个性特征进行深入分析，并进而对这一典型与时代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作品完全摒弃了报纸言

论常见的写作理念，诸如将先进人物纳入预先设置好的一些通用的标准，如党性、觉悟、奋斗精神和自律精神等，而是着眼于这一典型与众不同的最本质的内核——一个普通人对于人生高境界的孜孜追求，从而使读者感悟到这样一个道理：伟大的品格很可能就根植在渺小人物之中。

作品还通过对典型人物价值意义的分析，对长期以来把典型人物作为教育后进的重要手段的传统理念提出了质疑和否定。这是闪烁在作品中的另一个思想亮点。

这篇作品完全脱去了报纸新闻言论常见的八股气，无一句套话、空话和时髦词语。行文凝练、简洁、典雅而又不失生动，表现了得济于古典文学营养的个性化话语的魅力。

本文发表后对于新闻界的传统写作理念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很久没有读到这样的报纸言论了，写法不一样，让人耳目一新！”这是作者听到最多的评价。

作品获青海省1997年度全省好新闻一等奖，获同年全国好新闻三等奖。

王利亚

出生于 1957 年 11 月。曾下乡当知青,又有十多年基层工作经历,对农村有特别的了解,对农民有深厚的情感。在湖南日报社从事多年农村报道,担任农村部副主任、主任,曾两次获中国新闻奖,多次获全国党报好新闻奖。现任湖南日报社副总编。

把感情变过来

——一说减轻农民负担

减轻农民负担问题,从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开始到现在,已经喊了十多年,但是负担不仅没有减下去,而且越来越重,农民群众很有意见。

负担屡禁不止,一个根本问题是对农民的感情问题。情感不变过来,负担减不下去。

把感情变过来,最重要的就是设身处地替农民想一想。想什么呢?想一想农民的实际收入。去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1 700多元,比城市居民少1 000多元,全省还有300多万农村人口在贫困线上,年收入在900元以下。很多地方确实有一批农民富裕起来了,但是就广大农民而言,还仅仅是解决了温饱问题。再想一想农民的负担有多重。现在一般的地方一亩田每年要负担100多元,有的地方更多,一个小孩儿上学要负担几百元。农民一年干到头,除掉负担,能装进口袋里的钱就很少了。还要想一想农民的承受能力。现在的负担,不仅是年复一年,有增无减,而且又乱又多,五花八门,无孔不入,没完没了。农民对此满腹怨气。

我们还要换个位置想一想,假如我们是一个普通农民,这样又多又重的负担压在我们身上,我们会怎么想,是不是承受得了。又假如承载着沉重负担的是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兄弟姐妹,我们感情上能不能接受,有没有怨气。

在这两方面想一想以后,我们才会更加体贴农民。农民挣几个钱不容易。现在,农业生产条件并不好,农民增加一点现金收入要付出很多代价。我们的干部尊口一开,动不动就是人平几元、十几元、几十元,要知道这都是农民的辛苦钱、汗水钱啊!

现在,尽管已经进入现代文明时代,但是我们吃的穿的仍然是农民兄弟给我们提供的,农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成千上万农民长年累月辛勤劳动,用生命和血汗抗御自然灾害,换来丰硕果实,为我们提供丰富的食品,提供多种生产原料,农民兄弟像一块基石,支撑着共和国的大厦,哺育着千百万生灵。他们默默地奉献着,而我们有些人却不顾农民的利益,任意加重他们的负担,这从道理上、感情上都是讲不过去的。

人的行动很多时候是由感情支配的。将心比心,才会心心相通。感情变过来了,办事情、想问题,才会为农民着想,替农民打算。因此,我们抓减轻农民负担,必须着眼于建立一种新型的感情关系。这正如江泽民总书记语重心长所指出的:“历史上有的封建王朝为缓解社会矛盾,发展生产,还懂得对农民实行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政策。我们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更应该为农民着想,绝不应该做加重农民负担的事情。”

“加重负担,我心不忍;负担沉重,我心不安。”我们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 (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 (评论卷)

真诚地把这两句话送给各级干部和部门领导。我们一定要用一种朴质的情感、对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来对待农民,对待其不合理的负担问题。

(《湖南日报》1997年3月9日)

采写回眸

《把感情变过来》写作介绍

农民负担,一直以来是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困扰着各级政府,影响着党群干群关系,因此,减轻农民负担成了农业、农村工作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各级政府和广大农村干部为此所作的努力不少,但效果并不理想,而且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各种深层次矛盾日益暴露,农民负担问题非但没有减下来,反而变得愈来愈严重。

我在湖南农村采访发现,农民已是不堪重负。少数地方每亩田的负担为100多元,农民种出几乎没有收益可言,有的甚至是亏本的。有的农民兄弟还跟记者算开了账:1亩田,农药、化肥成本要200多元,加上100多元的工费,还要摊上100多元的负担,总成本四五百元。如

果收成好略有赚的,一般年景保本,遇上有自然灾害的歉收年连本也无法收回。

一方面,现在老百姓对负担问题怨声载道,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也都看到了农民负担问题的严重性,特别是从中央到地方对此更是高度重视,江泽民同志还就此作出过重要指示。另一方面,农民负担越来越重,就是减不下来。《把感情变过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作的。

1996年至1997年,农民负担问题反映十分强烈,各级政府想了不少办法去解决,甚至可以说是绞尽脑汁。领导的重视程度也是空前的。过去抓农业主要是主管的副省长,由于负担问题农民意见大,省委书记、省长亲自挂帅抓。声势上也是少见的,除了大会小会讲、文件公告铺天盖地地发,各级各部门都派出工作组到基层去宣讲指导。抓减轻农民负担的力度,超过了其他任何工作,但是难以奏效,甚或呈加剧的趋势。一些地方,农民服毒自杀,集体上访,甚至用炸药炸基层政府等因农民负担问题引发的事件时有发生。

记者去了湘南、湘北,与许多农民就此进行座谈。农民们普遍反映,现在的负担实在太重了,种的地收费,养的猪收费,栽的果收费,连建个畜舍也要收费。确实,乱七八糟的收费是加重农民负担最主要的根源。农民们最不满意的是,这些基层干部,下村少,办实事更少,平时少见上门,到年终收费就来了。有的骂他们是“鬼子进村了”。从采访调查的情况看,农民对负担沉重不满,而最不满的又是基层干部与他们的关系。

作为一张党报,在农民负担这样重大的问题上,到底如何体现,如何为农民说话,引起社会的关注,收到好的

效果,作者从新闻和工作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比较。农民负担问题,是个老话题,报纸作过大量的报道,有各种会议的政策措施要求,有各地的动态,有群众的批评意见,还有典型推介。言论方面每年也配合典型、会议发过不少。那么,在农民反映最强烈、需要政府工作力度最大的时候,如何报道负担问题呢?作者感到,一个重大题材而又是工作老话题的宣传要引起人们的关注,必须抓住两条,一是视角要新,二是反映问题要深。如果没有全新的视角,没让读者觉得“忽如一夜春风来”;如果没有深刻的阐述,没让读者感到一针见血,入木三分,那么像农民负担这样的老问题,一般喊喊,引不起读者的兴趣。于是,作者在设想这个报道时,力求立意要新,写作方式要新,以全新的感觉反映一个陈旧的话题。

文章的写作紧紧扣住“对农民的感情”这个中心,在谋篇布局上,开篇便直接进入主题,阐述问题时,并列用了三个替农民想一想,对农民的经济状况进行了高度概括;然后又采取类比的写作方法,急转笔锋,用三个“假如”,换个位置替农民想一想,使文章进入高潮;紧接着的后几段,跳出农民本身,写农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共和国的基石,以情动人,以理导人,层层递进,无懈可击。

这篇作品见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评价,这篇作品非常有针对性,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农民负担严重最根本性的原因。许多农民兄弟称赞说,文章为他们说了话,为他们抵制负担撑了腰。文章更为决策提供了借鉴。省委、省政府对此高度关注,近年湖南在减轻农民负担问题上,改变了过去的做法,把重点放在转变干部作风上,每年派出10万干部下基层办

实事,从感情上把干群关系变过来,把农民的负担实实在在地减下来。这篇作品被评为湖南省好新闻一等奖,亦获中国新闻奖二等奖,后来被华中工学院新闻系选为教材。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邓书扬

邓书扬，男，1964年9月出生，现任安徽省亳州市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

邓书扬先后从事过医疗、计生工作，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新闻写作。1995年前在乡镇当业余通讯员，每年发稿70篇以上。1995年任涡阳县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后，平均每年发稿150篇以上。邓书扬不仅能熟练掌握各类常用新闻体裁的写作要领，还能胜任办公公文、报告文学和杂文、小品文的写作。截至目前，总计发稿1200余篇，近百万字，作品先后荣获全国晚报新闻评比二等奖、全省经济好新闻二等奖、安徽人民广播电台征文一等奖、《安徽日报》和省计生委联合征文一等奖、安徽省党报总编联谊会改革会议好新闻评比一等奖等30多种奖项。2001年其新闻言论《警惕加重农民负担新动向》在获安徽新闻奖一等奖后，又荣获第十一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警惕加重农民负担新动向

年末岁尾,又到了各种收费和摊派的高峰期、多发期。为此,笔者调查、走访了一些乡村。总体上感到由于各级党政干部对农民负担问题警惕性较高,广大农民的民主意识、法制观念明显增强,早些年常见的一些部门利用午秋两季粮食征购时增项加码、硬性摊派行为很少见了,比起前几年农民负担大为减轻。但是这次调查也发现,农民负担问题并没有风平浪静,有关部门认为,加重农民负担的行为出现了三种新的转移动向。

一是增项加码行为由农业税费向行业税费转移。近年实行的“农民负担监督卡”制度,使得农民应该缴多少粮,交什么钱,一清二楚。所以,一些部门便改变方式方法,以有关“政策”、“法规”为挡箭牌,直接分配任务,让村组干部代征,或亲自上道征收。有关资料表明,现在农民常见的收费项目就有二三十项,而且收费标准不一。如在农村电网改造中,农民安一个新电表需交校表费、安装费、电盒费共66元,有的交到100元,更多的则达120元。按政策规定,农民建房只需交“建房证”工本费5元,而有关管理部门则要农民交50元,除此之外,还要拿

出宅基地使用费 170 元到 180 元,就连当年没有建房的村民也要交“宅基地证年审费”5 元。政策还规定,有序输出的民工,每人交纳“劳务输出跟踪服务费”49 元,而有的地方不仅乘机提高收费标准,还扩大收费范围,甚至往行政村硬性摊派。还有一些税费在一些地方出现被平均摊派或多头收取现象,如农用车收费,在这个镇收 220 元,在那个镇收 240 元,在另一个镇干脆每个农机户收 400 元。有的地方就更有意思了,只要农机户交了税费不开票,就可少交钱。

二是摊派对象由大人向孩子转移。政府明文规定,农村中、小学学杂费、水电费分别为 55 元和 31 元,预收代支费分别为 39 元至 66 元和 136 元至 143 元。可很多学校对预收代支费与自愿交费区分不清,把学生校服费、保险费等属于自愿交纳的费用与杂费、课本费同时收取,一票开出。有的教育主管部门额外为保险公司代收学生保险费,强行要求学生订阅各种报刊,还以服务为名为学生代办作业本、AB 卷、墨水等,其项目不下十几种。至于平时收取试卷费、资料费就难以计数了。有的学校新生入学费用高出应交费用最高档的 146.46%。

三是“摊派”行为由乡镇向村组转移。近两年,由于党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精神的广泛深入贯彻落实贯彻,乡镇干部普遍能把农民负担问题作为政治问题认真对待。但是,在村组一级干部中,由于文化素养、认识水平、思想品质等方面的因素,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上级的三令五申置若罔闻。有的则是打着办“好事”的名义派粮收款,如以铺路、建校、修敬老院为名。更多的村组干部则打着“首长工程”的幌子,为关系单位、关系户推销种子包衣

剂、秸秆速腐剂、麦种豆种玉米种子、菜苗树苗,等等。据调查,有的村1998年一年代办这类项目多达12项,人均支出9.7元。

加重农民负担影响大局,影响稳定,更影响经济发展。基层干群普遍认为要在坚持依法治理,实施“一票否决权”的同时,制定具体的操作规程。如以县为单位,对农业税费以外的各种收费项目进行清理审核,依法提出标准项目和数额后,由政府发布方可执行;还可以仿照“农民负担监督卡”的形式,把各种收费项目和标准,按负担对象,统一填写制卡发放;严格要求村干部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事,凡在农民承担的法定税费之外兴办收费事项,一律要经过群众“举手”表决。

(《安徽日报》2000年1月3日)

附:

抓深出新好时评

——评获奖评论《警惕加重农民负担新动向》

周胜林

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老问题长期不能得到解决,媒体也做过不少文章,怎么办?问题不解决,当然还得写。这是社会责任感使然,媒体责无旁贷。问题是文章怎么去做?如果重炒冷饭,受众肯定不欢迎;如果来一些一般性号召、动员或批评,也无济于事。其实,关键在于文章

能否抓深、出新、出彩。如果做得好,受众照样能感到耳目一新,实际工作者也会感到真正抓到了实处,评论的战斗作用和影响力就能得到较好的发挥。

农民负担加重的问题,讲过多年了,再做文章自然有困难。《安徽日报》2000年1月3日发表的经济时评——《警惕加重农民负担新动向》却能一举夺得第十一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不能不引人注目。其主要特点就在于“深”和“新”两个字。

新和深是互相依存的。老题目要不停留在原有论述的材料、观点和水平上,需有新意。新意从何而来?依靠对问题挖掘、剖析的深入。深到一个没有触及的层次,新意也就顿出。《安徽日报》刊登的这篇评论,重点就放在过去还没有发现和触及的“新动向”上。这是现实生活发展变化中刚刚冒出来、亟须引起注意和加以解决的新问题。“农民负担”,大而言之是老题目;“农民负担新动向”,小而言之就是新问题、新题目。作者在年末岁尾农村各种收费和摊派的高峰期,及时反映基层工作中的新动向、新情况、新问题,即加重农民负担的行为出现了三种新的转移动向:一是增项加码行为由农业税费向行业税费转移;二是摊派对象由大人向孩子转移;三是摊派行为由乡镇向村组转移。这三点,是评论作者站在实际工作的高度、站在群众生活的前沿抓到的“活鱼”,提法新鲜,立论有据,一下子把老问题写新了,写深了,写活了。

这篇评论之所以成功,根本原因在于作者和编者注重调查研究。现在有一些评论工作者不太重视调查研究,认为评论员只是发发议论,而记者则要靠事实说话,两者不一样。殊不知评论的选题、论点、论据以至于论证

方法,都应从调查研究中获得启示和灵感。著名评论家邓拓主张:“对一个问题没有研究清楚就不能写文章,这不仅是政治责任心的问题,同时也是思想作风的问题。如果对情况不了解,就要去调查研究,把它弄清;如果把握不大就应该继续进行研究,直到把问题弄清为止。”(见1958年第8期《新闻战线》杂志:《新闻工作者红专的道路》)邓拓《燕山夜话》中还有一篇《变三不知为三知》,对实际工作中一问三不知的情况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三不知”即对事情的始、中、终三者皆不能知。他要求人们对于客观事物进行历史的、现实的、全面的调查研究,变三不知为三知,并对三者作连贯起来的思考,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写文章也是这样。你要写农民负担这个问题,就得认真调查加重农民负担有什么表现?严重到什么程度?其原因何在?还得随着事物的发展作追踪调查,不断调查,才能真正发现新情况、新问题,并提出解决新问题的办法。这就叫弄清来龙去脉,发现症结所在,抓出新意、深意。《安徽日报》这篇评论的编辑有长期的采编工作经历,建立了较广泛的新闻信息网络,在农村税费改革的前夕,翻阅大量各地信息时,从一篇短信息中发现了这一重大题材,立即与这一问题较为严重的涡阳县有关部门联系并约定了稿件。作者更是长期在农村基层工作,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所以,言而有据,论必中肯,不虚不浮,实实在在,说服力强;在众多媒体中,抢先一步点出新问题,开了第一腔,颇有前瞻性、指导性。

《安徽日报》刊发的这篇评论,不仅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而且着眼于解决问题。评论的最后一段,以“基层干部普遍认为”的口吻提出:要制订具体的操作规程,把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各种收费项目和标准,按负担对象,统一填写制卡发放;严格要求干部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事,凡在农民承担的法定税费之外兴办收费事项,一律要经过群众“举手”表决。上述问题和建议,显然具有普遍意义,从而为国家制定农村税费改革方案及相关决策提供了重要信息和参考意见,为广大农民说出了心里话,使报纸在党的领导和基层群众之间起到了很好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警惕加重农民负担新动向》一文论点鲜明,论据充分;思路清晰,逻辑严密;文字凝练有力,没有假、大、空话。在论述当前农民负担方面存在的问题时,对多年来党政机关努力减轻农民负担所做的工作作了应有的肯定。文章既不割断历史,又立足当前,面向未来,体现了作者胸有全局,唯物辩证地看问题,避免了片面性,确保了正确的舆论导向。文章发表后,得到了社会各界特别是农村干部和广大农民的好评,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并由此接到大量反映基层情况的来稿来电。编辑部又编发了《这里农民缘何减收》、《关注另一种卖粮难》等一系列稿件,形成了较强的舆论攻势和新闻冲击力。《安徽日报》处理重大题材和重要问题,不作“一锤子买卖”,而是充分发挥新闻宣传的集束效应、规模效应和持续效应,对其他媒体都不无启示。

《中国新闻获奖作品评析》

采写回眸

获奖的偶然与必然

2001年8月,在第11届中国新闻奖评选中,我的一篇言论《警惕加重农民负担新动向》获一等奖。消息传来,许多人向我道喜祝贺。在溢美之声盈耳时,我想的更多的则是“什么因素使这篇稿子在获得‘安徽新闻奖’一等奖后又中此大奖”?思考来思考去,我感到有这样一些偶然因素和必然因素。

先分析分析偶然因素。目前中国新闻奖已评了11次,每次评出一等奖二三十篇,作者百十人,至今总计也就是千把人而已。据统计,全国有新闻工作者75万人左右,我想我是绝对没有这个实力去与那么多的职业编辑记者竞争的。此其一。其二,这篇反映农民负担的稿子是在税费改革试点的第一年(2000年)之初发表的,很应时。其三,要感谢《安徽日报》编辑和省记协的同志,他们“惟优是举”,无私推荐。

那么,必然因素呢?就是我这十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写作。打个比喻,就像渔夫天天打鱼一样,虽然可能连续

空网,但由于风雨无阻,终于逮着一条大鱼。

当然,逮“活鱼”光靠勤奋还不行,还要研究“鱼情”、“水情”,练就一身“逮鱼”的功夫。套到新闻写作上来说,就是要持之以恒地树立职业责任心,锻炼职业敏感性。

我们的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作为新闻工作者就是党和人民之间的联络员,既要为党服务,又要为人民服务。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帮忙不添乱,鼓劲不泄气,是我们的责任;坚持群众观点,为老百姓鼓与呼,替人民大众解急难,也是我们的责任。如果我们一年写100篇稿子,99篇都是披露性的,揭丑性的,是不对的;而如果100篇都是唱赞歌的,我觉得也不协调,因为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问题还不少,我们有责任帮助群众向党和政府反映问题。我从新闻写作的第一年开始,就紧紧围绕党和政府工作搞报道,可以说,每年发稿95%以上都是正面的,都受到了当地领导和群众的一致认可。同时,我也不回避问题,有针对性地写一些问题性报道。1989年,我在涡阳县陈大乡工作时就写了一篇批评一个乡干部贪污公款的稿子;1991年我在义门区工作时,又写了一篇打击地痞街霸的稿子;到涡阳县委宣传部后,先后写过乡村干部加重农民负担的稿子和治理“三乱”、打击路霸的稿子。写这种稿子是要顶住一定压力、冒着一定风险的。靠什么顶,就是靠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感。

获一等奖的这篇稿子,虽不是批评、披露性的稿子,但它属于问题分析性稿子。它是基于人大的一个长篇调查报告写成的。在这个报告里,有不少加重农民负担的例子,有乡村的,有县直的。我看了后,首先是感兴趣,产

生了写作欲；紧接着就感到写这样的稿子是要得罪人的，不管是乡镇的还是县直的，大多脸熟。但是，最终我还是写了。我不能说我的觉悟有多高，但对农民的同情心我还是有的，因为我的祖辈也是农民。所以，不谦虚地说，能下这个决心，很大程度上是受责任感的驱使。

许多新闻前辈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发现新闻比写作新闻还重要。他们说，新闻敏感性是需要活到老修炼到老的。对此我有深刻的体验，觉得“新闻嗅觉”是从事新闻写作应具备的第一本领。在我十多年的新闻写作历程中，有不少这样的经验和教训，往往身边发生了一件事，也感到有点新闻价值，但不是很重要，就掉以轻心，放过去了，而同行却见微知著，抓住某一点，巧立角度，展开报道，结果发表了。看了人家的报道后，真是既懊悔又佩服。侥幸的是，在经历了许多类似教训后，逐渐摸索出点经验来。1996年涡阳县推行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特别是机井的拍卖，成效明显。当时全国性的产权制度改革刚刚兴起，涡阳算是先行一步。我意识到了这一点，便写了一篇消息，接连被《中国水利报》、《安徽日报》、安徽人民广播电台、《阜阳日报》、《颍州晚报》等多家新闻媒体在显著位置和黄金时段采用，并被评为当年全国晚报好新闻二等奖。1997年涡阳县委把组织、宣传、统战三个部门的会议放在一起开，虽然有关部门感到这样不“来劲”，但节约经费、节约时间是明显而实在的，效果也不差。当时省内外不少媒体还在举办改革会议新闻竞赛。我感到这是一个好线索，提笔写了一篇《三会放在一块开，节约资金又实在（肩题）；涡阳县组织宣传统战年会合并效果好（主题）》的消息，被《阜阳日报》头版采

用,并获得全省党报总编联谊会改革会议新闻竞赛一等奖。

再说这篇获全国大奖的稿子。我看了原始材料后,之所以感兴趣,有写作欲,关键是我了解当时的大气候。农民负担问题是多年来解而不决的问题,虽然经过党中央、国务院屡次治理,特别是1998年中纪委13号文件规定了8条严肃的纪律,情况有所缓解,但并非风平浪静,可以说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涡阳县人大的这个调查报告正印证了这一问题。同时,人大调查时处在1999年年底,2000年中央就要在我省搞税费改革试点了,整理一篇当前农村税费负担情况的文章出来,上级需要,农民企盼,可以说顺时应势。就是基于这种新闻敏感性,我在走访一些乡镇和县直单位及其干部,重新了解到大量第一手材料,心中有底后,从人大1万多字的报告中抽取精华,二者糅合,相辅相成,完成了一篇2000字的新闻言论。

石 云

石云——实名唐开云,1936年出生,原籍湖南武冈县。195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即从事新闻工作,先后任湖北日报社记者14年,黄石日报社综合编辑室副主任10年,主任编辑。1985年调黄石市人大常委会工作,先后担任研究室、办公室主任、副秘书长。1996年退休。

基于社会责任感,作者对歪风邪气、腐败现象疾恶如仇,常撰文予以抨击,有多件作品获湖北省和全国好新闻奖。

由于对新闻评论有所研究,退休后至今,被黄石日报社返聘专职从事评论的编辑和写作。

作者现任湖北省黄石市老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

劝君且慢豪华

伫立窗前，但见五颜六色、明晃锃亮的小车不时从眼前掠过，不禁思绪绵绵。

小车速度之快，乘坐之舒适，远非公共汽车可比，至于自行车，则更是望尘莫及。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今天，谁不想以小车代步，节约时间、提高工作效率呢？然而，办什么事总得量力而为、讲究点规矩才行，随心所欲往往会把好事办成坏事。据说，今年以来，我市新增加的200多辆小车，几乎都是机关、团体和事业单位购置的，半年时间增加这么多小车，是否都那么合理合法？现实的情况是，有钱的争着买，没有钱的借钱买。有的人是坐在大“上海”，望着小“丰田”；有了小“丰田”，还想买“皇冠”；“皇冠”不过瘾，还要乘“豪华”，不惜巨资，互相攀比。还有的人，你要他改善生产条件，兴办事业，他就喊资金这困难那困难，一说买小车，便慷慨解囊，或东借西求，“积极性”可谓高矣！今年上半年我市行政支出大幅度增加，与“小车热”的兴起是大有关系的。

在这里，还要向那些“财神爷”进一言，请把钱柜管

紧一点,不论是谁批来条子,你都不要松手,人民把钱交到你手里,如果你“财神爷”也不按财经制度办事,到时怎样向人民交账?

(《黄石日报》1985年7月25日)

采写回眸

与人为善 以理服人

——我的写作体会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领导干部丢掉了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追求享受之风日盛,广大群众对此极为反感。1985年7月,在黄石市人大常委会的一次会议上,委员们对一些机关、团体、事业单位互相攀比,竞相购置高级小轿车的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笔者参加了这次会议,深为委员们的仗义执言所感动,于是提笔为文,写下了这篇小言论。

面对如此不正之风,笔者心中虽有怨愤之情,但考虑到这毕竟是人民内部矛盾,应与人为善,以理服人,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因此在写作时以具体事实为依据,抓

住它造成的影响和危害性进行分析,始终以“劝”为主旨,不使用尖刻、过激的指责语言。为了增强文章的可读性,笔者注重文字的修饰,如批评互相攀比的现象时,借用小车品牌,采取排比句的形式:“有的人是坐在大‘上海’,望着小‘丰田’;有了小‘丰田’,还想买‘皇冠’;‘皇冠’不过瘾,还要乘‘豪华’,不惜巨资,互相攀比。”这样既形象生动,又切中要害,使一些人贪图享受的心态跃然纸上。

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位离休老干部当面对笔者说:“你这篇文章写的及时,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黄石市委、市政府在此后不久,对违规购置高级小轿车的问题进行了处理。

1986年年初,这篇小言论由黄石日报社推荐,参加湖北省1985年度好新闻评选,获一等奖;后又参加全国好新闻评选,获二等奖。

1985年全国好新闻评选时,权威人士对这篇言论作了点评,指出:“作者较好地掌握了小言论的特点,篇幅短小,文字简练,言简意赅,事实典型准确,论理深刻明了,堪称一篇好言论。”

1985年10月,党中央、国务院对党政机关超标准购置高级小车的问题专门发了一个文件,要求令行禁止。可见这一现象当时在全国是带有普遍性的。时至今日,这一问题并未彻底解决,在不少地方,一些领导干部讲排场、比阔气,买豪华车,建豪华别墅,奢靡之风愈演愈烈,足见端正党风仍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卢少华

1956年生,现为青岛日报社理论部主任、高级编辑。1975年至1978年在山东省胶南市文教局工作,1982年毕业于聊城大学政治系并留校任教,1986年调至青岛市委党校科社教研部工作,1992年调到青岛日报社理论部。

自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第一篇论文以来,作为主编、副主编已有各类专著4部出版,与他人合著5部,内容涉及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运、领导学、政治学、行政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方面。1989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权力社会学》,被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高放教授称之为“青年学者的奠基之作”。20多年来,共发表各类论文近百篇,社论、评论、小言论、述评、时评及消息、通讯等100多万字,有近百项作品在省以上单位获奖,其中《发展是就业之本》荣获1999年山东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山东省新闻奖一等奖,中国记协第九届中国新闻奖三等奖。

发展是就业之本

——论用发展的思路看就业

近年来,随着国企改革不断深化,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买方市场的出现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失业问题越来越严峻,已成为目前政府最头疼、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国家计委 1998 年 1 号“短平快”课题得出的结论是:“失业和下岗情况空前严重,已成为当前最为突出的宏观经济问题。”为了大局稳定和加快发展,一些地方政府开始把就业工作列为“一把手”工程和要解决的头号问题。

青岛的失业问题也日趋严重。1998 年是我市国企改革进入全新境界的头一年,失业人员累计近 6 万人,下岗人员总量有 12 万左右,是历年来再就业压力最大的。要实现我市今年就业与再就业工作目标,安置 3 万名失业人员,把城镇失业率控制在 3% 以内;分流安置 6 万名下岗职工,使再就业率达到 50%,不仅需要政府部门及各行各业扎扎实实的工作,更需要我们有一个明确的就业安置思路。

我们不能再走过去那种牺牲效率和发展换取充分就

业的老路子。“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只能带来越来越多的富余人员，加重企业负担。我们不宜用缩短工时的办法增加就业，这并不能增加多少个就业机会，反而会增加企业的劳动成本和负担。我们也不能过分强调劳动者个人择业为主的就业方针，把下岗职工推向社会置之不理，而必须把企业解困和下岗职工安置有机结合起来，走“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人增效、实施再就业工程”之路。但实施再就业工程也只能是应急的权宜之计和治标之策，单凭系统内外调剂余缺和各部门、各单位的“有情安置”，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就业和再就业问题。降低失业率、提高再就业率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经济。

就业问题作为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只有通过发展来解决。经济发展的快慢与失业率的高低有着直接的关系。一般说来，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1%，失业率就降低两个百分点。越是落后的地方，经济越低迷、越低速，失业就越严重。意大利南部是落后地区，没有什么高科技，失业率高达25%，而相对发达的北部却只有5%。我国失业与下岗职工集中区域主要是主导产业单一、大型国有企业集中的基地型城市。由于区域经济主要依托的资源趋近枯竭或主导产业面临缩减，我国东北和中西部一些城市的实际失业率已经超过10%的危机临界点。而得改革开放之先的广东省，经济较发达，就业机会多，从1981年至1996年，全省城镇失业率连续16年保持在2%左右。而珠江三角洲一带失业率仅1%左右。这就足以说明，解决再就业仅仅依靠实施优惠政策，鼓励企业职工提前退养、转岗和自谋职业

等一般性措施不行,其根本途径和治本之策在于通过大力发展经济来不断创造就业机会和扩大就业容量。经济上去了,才能拿出更多的钱来安置下岗职工,才能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

用发展的思路看待就业,首先要摆正发展经济与实施再就业工程的关系。发展经济是治本之道,实施再就业工程是治标之策。二者是互利互补、相辅相成的。要坚持标本兼治,就需要两个轮子一起转,克服“重发展、轻安置”问题;要坚持重在治本,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各种所有制经济和生产自救性质的“自立企业”,进一步拓宽就业渠道,以发展促就业。

用发展的思路看待就业,就必须确保 10%,力争 12% 的经济发展速度。发展速度越高,就业压力就越小,反之则越大。从全国情况看,大体上国内生产总值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提供 80 万个就业岗位;而第三产业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吸纳 130 万人左右就业。从青岛情况看,国民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也可提供约 1 万人的就业岗位。没有较高的发展速度,就难以缓解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

用发展的思路看待就业,就必须牢固树立创业意识、发展意识,靠再创业实现再就业。政府要转变安置思路,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经济发展上,为下岗职工再就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企业也要转变就业思路,不要单纯在“减员增效”上兜圈子,而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创办多种经营、广开就业渠道上,使下岗职工尽可能地消化在企业内部。下岗职工更要转变观念,树立自强自立意识,把主要精力放在自我发展、自主就业上,开辟新的生活道路,

实现新的人生价值。

用发展的思路看待就业,要求我们必须制定以开发劳动力资源为对象的产业政策,把安排就业和发展经济结合起来,在发展经济中时刻关注就业问题。譬如我们要大力发展优质高效农业和农业产业化,大量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减轻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的压力,同时积极鼓励企业和城镇下岗职工进军农业;我们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社区服务业和家政服务业,广开就业门路;我们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劳动密集型的小企业,并使之成为再就业的主渠道;我们还应拓宽劳务出口渠道,鼓励市内企业通过境外合资合作等形式带动劳动力出口,等等。

(《青岛日报》1998年5月9日)

采写回眸

写作背景及写作过程

材料一:1998年年初,山东省委宣传部召开全省党报总编辑和理论评论部负责人会议,要求各市地报在全

省范围内积极开展“全省党报言论竞赛”活动,以活跃党报言论气氛,提高社论评论水平。这就迫使各报不得不更加注重言论质量,树立精品意识,精心策划稿件。

材料二:就业问题关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关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20世纪90年代下半叶,随着国企改革不断深化,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买方市场的出现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失业问题越来越严峻,已成为政府最头疼、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国家计委1998年1号“短平快”课题得出的结论是:“失业和下岗情况空前严重,已成为当前最为突出的宏观经济问题。”为了大局稳定和加快发展,一些地方政府开始把就业工作列为“一把手”工程和要解决的头号问题。

材料三:从青岛的实际情况看,失业问题也日趋严重。1998年是青岛市国企改革进入全新境界的头一年,失业人员累计将达6万人,下岗人员总量有12万左右,是历年来再就业压力最大的。要实现全年就业与再就业工作目标,安置3万名失业人员,把城镇失业率控制在3%以内;分流安置6万名下岗职工,使再就业率达到50%,不仅需要政府部门及各行各业扎扎实实的工作,更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就业安置思路。

材料四:现实生活中,对如何解决就业问题有不同的看法。《青岛日报》评论员认为,我们不能再走过去那种牺牲效率和发展换取充分就业的老路子,也不宜用缩短工时的办法增加就业,因为这并不能增加多少个就业机会,反而会增加企业的劳动成本和负担。同时也不能过分夸大实施再就业工程的作用,因为实施再就业工程只能是应急的权宜之计和治标之策,单凭系统内外调剂余

缺和各部门、各单位的“有情安置”，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就业和再就业问题。更不能过分强调劳动者个人择业为主的就业方针，把下岗职工推向社会置之不理。降低失业率、提高再就业率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经济。

材料五：经济发展的快慢与失业率的高低有着直接的关系。一般说来，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1%，失业率就降低两个百分点。越是落后的地方，经济越低迷、越低速，失业就越严重。意大利南部是落后地区，没有什么高科技，失业率高达25%，而相对发达的北部却只有5%。我国失业与下岗职工集中区域主要是主导产业单一、大型国有企业集中的基地型城市。由于区域经济主要依托的资源趋近枯竭或主导产业面临缩减，我国东北和中西部一些城市的实际失业率已经超过10%的危机临界点。而得改革开放之先的广东省，经济较发达，就业机会多，从1981年至1996年，全省城镇失业率连续16年保持在2%左右。而珠江三角洲一带失业率仅1%左右。这就足以说明，解决再就业仅仅依靠实施优惠政策，鼓励企业职工提前退养、转岗和自谋职业等一般性措施不行，其根本途径和治本之策在于通过大力发展经济来不断创造就业机会和扩大就业容量。经济上去了，才能拿出更多的钱来安置下岗职工，才能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

评论要围绕现实的重大问题选题立意，有针对性地解疑释惑，指点迷津，在求新、求深、求实上下工夫；在写作上要占有大量的材料，用事实说话，而不要泛泛议论。

就业问题，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促进就业，是市场经济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之一。就业工作能否做好，直接关系到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社会稳定等各

个方面。我国人口多,劳动力供大于求,就业压力大,这是一个基本国情。集中力量做好下岗职工再就业工作,广辟门路,千方百计地有效扩大就业,对于我国来说至为关键。我们应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从关心群众疾苦、密切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高度,从维护稳定、促进改革和加快发展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再就业工作的重大意义,把就业工作放在突出位置,作为头等大事切实抓紧抓好。

与就业相关联的问题有许多,如要把再就业优惠政策落到实处,为下岗职工自谋职业、自主创业提供“一站式”服务,使扩大再就业真正成为为民办实事的“民心工程”;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下岗职工再就业;下岗职工和待岗者要自强不息、转变择业观念,克服“等靠要”思想,增强竞争意识和自强意识,走好再就业之路;继续深化劳动制度改革,大力发展公共就业服务、培育和健全就业服务体系;促进失业保险制度及社会保障制度与劳动就业政策的有机结合,通过扩大就业保障治理失业,减轻社会保障体系的压力与负担;改进劳动力市场的宏观管理,健全就业服务网络,建立适合国情与国际经验的就业管理指标体系和失业预警制度,使城市就业不断增长,等等。这些问题都很重要,这些工作也必须做好。但是,为了突出“发展是就业之本”这个主题,在我们撰写“从发展的思路看就业”系列评论时,这些问题大都被舍弃掉了。

在发展问题上,与就业相关的问题也有许多:如积极扩大引进外资的规模,实施把中国建成“世界工厂”的战略;积极实施“走出去”就业战略,努力提高我国劳动力

在国际市场上的就业份额；积极推进农村人口城镇化进程，取消限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不合理政策，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和第二、三产业的转移；大力发展社区服务业和各项公益性事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等等。但为了解决青岛市最为突出的两大问题——个体私营经济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不足的问题，上述相关问题我们也基本舍弃掉了。我们所关注的焦点一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二是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如在目前的经济结构调整中，我们应该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以促进技术进步，但是却不能因此牺牲就业率，放弃或忽视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而是应该真正支持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尽管他们技术低、规模小、效益低，但他们是吸收劳动力的主渠道。同理，我们要搞好青岛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名牌企业，也要解决“点高面低”的问题。要在大力发展中小型企业上狠下工夫，把个体私营经济搞上去，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这组评论的中心思想就是根据青岛的现实，从“治本”的角度解决就业问题。是从发展的思路看就业，而不是从其他的角度。“发展是就业之本”，既是评论的主题，又是评论的切入点。

用发展的思路看就业，首先要搞清楚发展和就业的关系，确立发展是“就业之本”、是就业的最根本途径的观念，为此开局之篇就是《发展是就业之本——一论用发展的思路看就业》。其次还要明确发展的思路，解决发展什么、怎样发展的问题，于是就有了第二篇《节省资本多用劳力——二论用发展的思路看就业》以及第三篇《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三论用发展的思路看就

业》。

“一论”主要解决就业观念问题。一方面要确立发展是就业之本的观念，另一方面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几个关系问题。用发展的思路看就业，首先要摆正发展经济与实施再就业工程的关系。发展经济是治本之道，实施再就业工程是治标之策。二者是互利互补、相辅相成的。要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各种所有制经济和生产自救性质的“自立企业”，进一步拓宽就业渠道，以发展促就业。

用发展的思路看待就业，就必须确保 10%，力争 12% 的经济发展速度。发展速度越高，就业压力就越小，反之则越大。从全国的情况看，大体上国内生产总值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提供 80 万个就业岗位；而第三产业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吸纳 130 万人左右就业。从青岛情况看，国民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也可提供约 1 万人的就业岗位。没有较高的发展速度，就难以缓解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

用发展的思路看待就业，就必须牢固树立创业意识、发展意识，靠再创业实现再就业。政府要转变安置思路，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经济发展上，为下岗职工再就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企业也要转变就业思路，不要单纯在“减员增效”上兜圈子，而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创办多种经营、广开就业渠道上，使下岗职工尽可能地消化在企业内部。下岗职工更要转变观念，树立自强自立意识，把主要精力放在自我发展、自主就业上，开辟新的生活道路，实现新的人生价值。

用发展的思路看待就业，要求我们必须制定以开发

劳动力资源为对象的产业政策,把安排就业和发展经济结合起来,在发展经济中时刻关注就业问题。譬如我们要大力发展优质高效农业和农业产业化,大量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减轻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的压力,同时积极鼓励企业和城镇下岗职工进军农业;我们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社区服务业和家政服务业,广开就业门路;我们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劳动密集型的小企业,并使之成为再就业的主渠道;我们还应拓宽劳务出口渠道,鼓励市内企业通过境外合资合作等形式带动劳动力出口,等等。

“二论”主要解决如何加快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的问题。经济增长通常有两种类型:一是创造就业的经济增长;二是少量和无就业的经济增长。从1980年前后我国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即实现了持续性高速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就业年平均增长率达到3%,体现了创造就业的经济增长模式。但在“八五”期间,由于我们过于注重发展资本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忽视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我国就业年平均增长率降为1.3%,属于“高经济增长、高资本投入、低就业增长”类型。我国是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选择“节省资本、多用劳力”的工业化技术路线,而不是相反。我国发展的最大比较优势就是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相对较弱的则是物质资源和资本资源,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当我们大力提倡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不能无视我国劳动力严重过剩,劳动力综合素质普遍较低这一基本事实。面对这一现实,选择“节省资本,多用劳力”的工业化技术路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程度较高、资本密集程度较低、技术能力适当的产业，同时有选择地发展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产业，不失为一条有效地解决就业问题的途径。那种认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过时了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从青岛市就业情况和产业布局的实际情况来看，首先应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为主的服务业。如饮食业、商业、旅游业、社会服务业等。这些行业人均就业费用低，就业容量大，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相对较低，易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同时，还应大力发展信息业、咨询业、文化服务业、教育服务业、体育服务业等对劳动力要求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此外，也应积极发展律师、会计师、代理等社会中介组织，使青岛第三产业比重偏低的局面逐步得到扭转，以适应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需要。其次，应积极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出口贸易。青岛是我国重要的港口贸易城市之一，外贸依存度很高，与国际经济联系非常密切。因此，大力发展以出口贸易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扩大那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能够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再次，应努力开拓国际劳务市场，有步骤、有组织地促进劳务输出。另外，从青岛的产业组织规模来看，还应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小型企业。在这方面，特别应鼓励发展城镇非国有经济。发展劳动密集型小企业特别是非国有经济的中小企业，既可以减轻政府的投资负担，又能有效地增加就业机会，扩大就业空间，使小企业逐步成为经济部门强大的就业载体。政府应逐步退出竞争性的生产领域，把部分技改资金用于建立小企业贷款基金，通过发放贷款基金来刺激小企业的发展和吸纳劳动力。

“三论”主要解决青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不足的问题。目前,曾经作为就业主渠道的国有企业,其安排就业的功能已大大减弱。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不仅不能吸纳失业人员,而且还要向社会分流大量下岗人员。有关人士预测,今后几年青岛市国有企业在进行改制、改组和改造过程中,还将有10多万职工下岗,这些人的再就业要求会日益增大。因此,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对于缓解青岛的就业压力,保证国有企业改革的顺利进行,促进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青岛市非公有制经济有了长足发展。截至1997年年底,全市个体工商户总数达18万户,从业人员30万余人。私营企业1.6万户,从业人员17万多人。个体私营经济在吸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有关部门统计,1997年,青岛个体私营经济共吸纳安置下岗职工2.8万余人,占全市安置总数的52%。这表明,个体私营经济实际上已经成为青岛拓宽就业门路的新的增长点,成为不可忽视的再就业重要渠道。但与广东、江浙等先进地区相比,青岛个体私营经济无论是数量、规模、效益,还是发展速度和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1978年青岛市的国有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比例大致为7.2:2.8。过低的非公有制经济比重与当前的经济发展现状很不协调。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首先,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积极鼓励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直接进入非国有企业,鼓励个体私营企业优先招用下岗职工,积极鼓励大中专毕业生、复员转业军人进入非国有企业单位,以此推动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其次,各级政府对发展非公有

制经济要在政治上鼓励,政策上扶持,方向上引导,法律上保护,为个体私营经济健康发展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各级政府应为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要鼓励下岗职工自我就业、家庭就业、非正规部门就业。政府或单位应发放小额贷款对自我就业、家庭就业和非正规部门就业予以支持。执法部门要提高执法水平,规范管理行为,切实解决好阻碍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问题,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益,为他们创造一个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社会环境。

作品发表后,得到了对就业问题颇有研究的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专家胡鞍钢博士的好评,也引起了青岛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此后,青岛市委、市政府把加快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纳入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促进了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作品荣获1999年山东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山东省新闻奖一等奖、中国记协第九届中国新闻奖三等奖。

史 敏

1957年生,祖籍山东,现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高级记者、驻厦门记者站站长。

1974年在福建省北部一个山区县“插队落户”当知青,1976年幸运“上调”,翌年进入县报道组,从此与新闻结下难离难舍之缘,其中20余年盯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驻地方记者站岗位上。

理论和专业知识多是通过在职学习和进修获得。1983年经全国广播电视系统考试录取,步入北京广播学院,在新闻系脱产静习两年,将之前已有的新闻实践与书本知识乃至老师的授业解惑,一并融会贯通。再早,曾由组织选送,至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第一期“理论班干部读书班”读马列原著,10个月,脑海里注入了最初的理论养分,从此唯物主义辩证法成为采访写作中的“法器”。为调整知识结构,近些年先后就读了中央党校和厦门大学经济类的本科课程班和研究生课程班。

曾10余次参加全国人大、政协会议和其他大型系列报道的采访。多篇新闻作品在全国获奖,其中广播评论《少应酬、多办事》、广播专题《厦华独自应诉欧盟反倾销》分获第五届、第十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在全国性刊物曾发表业务研究论文《移动收

听与广播的生存发展空间》、《关于广播人际沟通优势的思考》等。

少应酬、多办事

近年，一些领导干部应酬太多，已经成为人民群众担心的问题。应酬，作为人际交往的形式，有些是需要的。问题在于，应酬的范围、规模、频率无度地扩大。领导干部剩下来用于学习和干实事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参加“两会”的许多代表、委员在议论完成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的时候，都提到：眼下领导干部应酬过多的现象应该节制一下。道理很简单：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归根结底是靠各级干部带领群众实打实干出来的，而不是靠空谈、应酬就能实现的。

代表、委员们说，现在的应酬花样很多，比如：请一人吃饭坐陪者有十几人；一个小小的庆典，也要多名领导去剪彩、揭幕、致词、赴宴。今天去拜这一方，明天去拜那一方，今天我应酬你，明天你应酬我，应酬来应酬去，没完没了。

我们正处在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代表、委员们指出：各级领导干部担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应该投入更

多的时间和精力,学习新知识,调查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如果把时间和精力过多地耗费在应酬上,而荒于学习,疏于干实事,就要贻误大局。

应该说,我们绝大多数领导干部能够认清应酬过多的危害,不少同志也为此苦恼,有的干部已经自觉地从应酬中解脱出来,也有些人虽然厌倦应酬,又觉得现实中少了这一套,事情就玩不转,于是听之任之。当然也有极少数人乐此不疲,为的是在应酬中捞取个人的一点好处。

鉴于这些情况,代表、委员们认为:节制应酬要综合治理。第一,要把节制应酬提到反腐倡廉的高度来认识;第二,要对少数只顾应酬、不愿学习、不下实事的干部进行批评教育。还有,就是从制度上立一些硬规矩,禁止不必要的应酬。来自福建的代表何少川举例说,福建省委、省政府今年年初制定了这方面的制度,其中规定,除了省级党代会和人代会,其他各种会议包括部门的会议,只安排分管领导出席,其他领导一律不去陪会;省领导下基层轻车简从,当地领导不许到地界迎送,接待过程也要简化;除国家和省里的重点工程以及重大外商投资项目,其他各类项目的庆典活动,省里领导一概不参加。上述原则,各地市县逐级参照执行。现在福建省各级领导的应酬活动明显减少了。

由此可见,节制应酬只要不像应酬那样来虚的,而是真抓实干,就一定会见实效。

(1994年3月2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采写回眸

轻舟也能负重

——从《少应酬、多办事》浅谈广播评论写作

我把广播评论在此比作轻舟，是由广播评论相对短小精悍的风格特点联想来的，而不是说广播评论分量不重、影响不大。广播因其诉之声音，靠说、靠听，可直接面对各种文化层次的人（即使你是一字不识的文盲）；稍纵即逝，让你无法任意回头（除非录下音来或电台安排重播）；有伴随性，可移动收听、边做事边听，只是这时人们往往处在半收听状态，不一定那么专注。故此，凡广播体裁都要扬长避短。广播评论作为新闻评论的一个支脉，与其他媒介的新闻评论一样，政论性是其主要特征，即文章要高屋建瓴、见微知著、鞭辟入理，但除此，文章还要根据广播特点，注意浅显、短小，语言生动活泼，能一直吸引住人。可见，虽是“轻舟”，却一样要能负重。广播评论写作是件不太容易的事。

既是一种广播体裁，再难广播记者也要学会运用，只是作为常驻地方的记者，平时写评论的机会不多。承蒙

台本部领导关照,抽派我多次进京参加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报道;作为本台的“重头报道”,编辑部授意记者们使用广播评论为重武器。这样我才在编辑的指导下写过几篇。几篇文章在中央广播电台最有影响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出,受到编辑部和社会上的好评,有听众给中央广播电台来信来电肯定,有的还向编辑部索要稿件,其中《让企业大胆地往前走》、《少应酬、多办事》,分别获得过全国宣传人大制度好新闻奖和中国新闻奖。

以《少应酬、多办事》为例,谈谈我在广播评论写作方面的一些做法和体会。

凡评论写作,采写前首先得立论,即总的想写什么、说什么事,阐述什么观点。这个需要评论一番的“话题”,选择上主要是看它的社会性和适时性。它应当是社会普遍或正在关注的、人们普遍或正在关心的;正因为这样,它也是“上头”正想要抓住解决的。这样吃透了“上、下两头”、审时度势提炼出来的“论”才能立起来,才能是个众矢之的的靶子,才能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每年“两会”是“上、下两头”意愿和意志最广泛、最迫切、最近距离的交会,因此最能找到好的立论选题。我采写《少应酬、多办事》的那次“两会”是1994年。当时全国各地的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各级领导干部肩负的任务很重,实际需要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学习新知识、调查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然而一些领导干部却把很多时间、精力花在应酬上,荒于学习、疏于干实事,与中央一再强调的“真抓实干”精神相悖。下面群众为此颇为担心、颇有意见。在“两会”的一些小组会上,我听到代表、委员有此反映,立刻感到这是一个有一定爆炸力的“立论”

选题。从“少应酬”才可能“多办事”这个看似小一些的话题切入，不但利于广播评论短小精悍的写作要求，而且更能具象地、有说明力地阐明“改革开放须要真抓实干”的大主题。事后我这篇作品能产生较广泛的社会影响，关键也在于这个“立论”炮弹不大，但威力不小。

这里还可以说说针对这篇作品后来发生的一个小插曲。那是1996年8月的一天，甘肃兰州一位熟悉我本人的听众突然给我来电话，惊呼“你的作品被人剽窃上了《人民日报》”。我找来《人民日报》一看，果然在7月31日第13版右上角，《读者论坛》栏目那篇《减少应酬、多办实事》，几乎全部照抄了我的《少应酬、多办事》。我给河北省唐海县某农场这位“读者”写了一封信，指出他的错误行为。他不久回信道歉。信中写道：当时他们县下发了《关于减少文山会海、节制应酬的通知》，他作为农场新闻干事，在基层也深感领导干部应酬过多，想借此写个东西，但“写了几次，总觉得不够深”，在翻看书籍时看到我这篇作品（注：不知是哪本书籍），便抄袭后投稿。他大概以为广播作品，播过两年了，没人能记得，孰料还是被印象深刻的听众抓住了。这件事例似乎也能说明，“立论”选好了会有广泛和持久的影响。

有了“以小见大”的立论选题，也就明确了评论的论点，下面就要依此进入具体的采写程序。先是采集材料，要拥有大量的事实和资料；然后，去伪存真、去粗取精，选取那些最能揭示事物本质的论据和论证材料。由于广播评论往往立论切入的角度窄、文章的篇幅短小、道理还要讲得浅显易懂，避免出现“窄题窄论”、“小幅小论”、“浅话浅论”的现象。因此取材写作时要特别用心，要努力

寻求“窄口入宽路”、“小山见森林”、“浅塘出蛟龙”的情节、细节、群众语言等。《少应酬、多办事》这篇述评,列举了应酬的种种花样,分析了应酬为什么减不下来的原因,指出了应酬过多的危害,最后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有的地方已有的成功做法和经验。全篇文章不到1 000字,但材料选取精致,使得论据充分有力、论证透彻有理,其中不乏由小而大、由浅入深最终触及问题实质的句子,比如“如果把时间和精力过多地耗费在应酬上,而荒于学习、疏于干实事,就要贻误大局”,“道理很简单: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归根结底是靠各级干部带领群众实打实干出来的,而不是靠空谈、应酬就能实现的”。总之,短小而不失单薄、浅显而不失透彻,是我在广播评论写作中努力去把握的。

广播评论最终是由播音员播出的(现在应该有记者或编辑直播的评论),文章中语言是贫乏、呆板、拗口、无个性,还是鲜明、生动、流畅、有力度,直接关系到评论播出的效果,因此万万不可忽视。《少应酬、多办事》根据广播特点注意到炼字、炼句、炼话,有一些被编辑和播音员认可的语言,如:“今天去拜这一方,明天去拜那一方,今天我应酬你,明天你应酬我,应酬来应酬去,没完没了”;“也有些人虽然厌倦应酬,又觉得现实中少了这一套,事情就玩不转,于是听之任之。当然也有极少数人乐此不疲,为的是在应酬中捞取个人的一点好处”。

有专家评论《少应酬、多办事》“文章写得短小精悍,逻辑清晰,说理透彻,语言流畅而有力度。特别是态度严正和诚恳,批评的分寸把握得很好”。这是对我的鞭策和鼓励,我深感自己的业务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今

后还要不断地学习和探索下去。在广播评论的写作上也想更多实践,以更能得心应手地使用这个广播体裁中的重武器。

在我写这篇东西的今天,人们可以看到各级领导干部的应酬已经较当年减少了许多,我绝不敢说当年那篇广播评论产生了多大效能,但我敢说在人民群众和媒体的众多呼声和党中央坚定的治理举措中,它汇入在其中过。这或许也就是记者乐此不疲的“成就”所在。



冯 越

1949年生,广东省阳江市人。1982年毕业于鞍山钢铁学院物理专业。同年进入大连日报社工作。1993年晋升为主任编辑,2000年晋升为高级编辑。1988年、1998年分别获得一次中国新闻奖。2000年获“辽宁省十佳记者”称号,2002年8月26日荣膺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

著有新闻作品集《大连的一百张面孔》、科普作品《电脑打字小钥匙》和《电脑上网小钥匙》。

一个人真能承包 100 个厂吗？

石家庄造纸厂厂长马胜利，最近签订合同承包了鞍山造纸厂，这是他承包的第 39 个厂，他一共要承包全国各地的 100 个造纸厂。对此我有一喜一忧。喜的是，中国确实涌现出了有雄心大志的企业家；忧的是，一个人真有能力承包 100 个厂吗？

我的忧虑并非全无根据。中国目前的交通、通讯条件，对这种跨省跨市的承包很不利。马胜利在石家庄，他承包的厂家有一个在贵阳市。一旦有个指令，即使挂长途电话也未必能十分顺利；如果有事要亲自前往，光火车就要换两次，还未必能顺利买到火车票；如果乘飞机，也并非天天有班机。这还只是一个厂，其他的厂更无须去论了。目前正处于新旧两种体制的交接阶段，各个工厂需要厂长亲自去处理的矛盾是相当多的。

再就个人能力而论，我读过关于马胜利承包石家庄造纸厂的报道，那里介绍说，他经常早出晚归，吃住在工厂。可见管理一个厂对他也不是很轻松的。现在要承包 100 个厂，既无闭路电视、卫星传真，又不像哈默那样拥有私人飞机，奔波于 100 个厂之间，何其辛苦！且不说熟

悉100个厂的基本情况,就连记住了100个厂负责人的姓名,也够忙一阵子的了,还能谈得上知人善任?再说,我们承认马胜利在石家庄造纸厂的成绩,也承认他的经验别人可以借鉴,但是决不能承认真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治厂之道,各个工厂都有自己的具体复杂的情况。

把每一个人的成绩都归结于党的领导、群众的支持,这样的话已经被讥讽为“老套子”,现在不大有人说了。但是,把一个人一时一地的胜利完全归功于个人智慧,也不见得正确。改革大潮中显露身手的风流人物受到人民的尊重和赞扬,这是应当的,如果真的在捧场声中以为自己的局部经验也能成百倍地放大,那可就有闹玄了。步鑫生就是因为不太清醒而吃了很多亏。当然,我希望马胜利能够万事如意。但是,如果我们的企业家因为个人不谨慎而自我膨胀,如果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只知捧场而不知提醒,接二连三的失败只会给改革的事业抹黑,动摇人们的改革信心。

(《大连日报》1988年3月1日)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采写回眸

关于《一个人真能承包 100 个厂吗？》

这篇作品发表于 1988 年 3 月 1 日《大连日报》第 2 版，在言论专栏《广议篇》里面。

当时的中国新闻界，特别是评论方面，没有像今天这样活跃，言论比较一律，往往是顺着上面说。当时的背景是，河北省石家庄造纸厂的厂长马胜利，承包了这个工厂，取得了很大成绩，引出来全国舆论界的一片叫好之声。这时，他提出“要承包 100 个厂，组建全国性的造纸集团”，新闻舆论也一致给予正面评价。正巧，这年的 2 月末，他到了辽宁省鞍山市，签字承包了鞍山造纸厂。而我曾在鞍山上过大学，对那里的事格外关注。当时我在报社总编室工作，是第 1 版编辑，每天有一个任务，就是把自己报社好的稿子向辽宁电视台和《人民日报》夜班编辑室送（《人民日报》第 2 版有一个专栏，是各地报纸的新闻摘要，一般发一两句话），方法是打长途电话，用口讲。那时候的长途不是直拨的，得要电话局的 113 接线，费尽周折。另外，有同事要去外地开会，买个火车票

也很麻烦,报社总务科专有一个人办这些事。我想,马胜利跨省市承包,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呢?我原先在工厂里工作过,在报社当编辑也处理过很多工业报道,我直观地感觉到,这样承包,连人头都认不全,情况都不摸底,指挥也会失灵,恐怕是不行的。改革的典型人物如果出了娄子,最后查起来是新闻界乱捧出来了,这可不好看,既给改革抹黑,也影响新闻界的形象!我得把这些话说一说。

我想清楚了之后,写得比较顺,很快就写出了稿子。当时也没有什么别出心裁、与众不同、反向思维之类的想法,反正是心里怎样想了,就怎么写出来了。

稿件由分管第2版的编辑组长李秀皋、编辑王庆春通过,于3月1日发表。

没想到发表之后,在大连市的读者中引起了比较强烈的反响。不少人是通过这篇文章认识了我。隔几天,在本报第2版的《读者·作者·编者》专栏里,发表了农业局干部李春鸣的文章《喜见新闻改革的好势头》,对我的文章给予很高评价,说是“打破了报纸上舆论一致、千篇一律的框子,敢于讲真话,讲实话,敢于讲有风险的话”。

后来这篇稿件被评为大连市好新闻二等奖、辽宁省好新闻奖(不分等)。到1988年年末,《烟台日报》报道了马胜利承包烟台造纸厂失败的消息,在国内影响很大,已经众所周知了,也就验证了我所说的是有一定道理的。1989年5月,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和中国新闻学会在河北省承德市评选全国好新闻奖。后来据与会者说,当时对马胜利承包100个厂提出不同看法的,报给全国新闻奖预选就有两篇,除我之外,另一篇是上海市记协报上来

的徐锦根写的评论。徐锦根当时写评论就很出名,但总不能同一题材的两篇都上。最后平衡,认为我的那篇说理性比较强,不强加于人,有回旋余地,所以就取上了,被评为二等奖。

后来中国记协把这一届的全国好新闻汇集成书,由中国新闻出版出版社出版。对我的这篇文章,编辑加上的点评是:

要有一点唱反调的精神

这篇作品在当时舆论界一股劲儿地赞扬马胜利个人承包 100 个厂时,保持冷静,实事求是地提出相反的看法,分析有理有据。其中提到“把每一个人的成绩都归结于党的领导、群众的支持,这样的话已经被讥讽为‘老套子’,现在不大有人说了。但是把一个人一时一地胜利完全归功于个人智慧,也不见得正确”的观点,很有新意。评论的预见也得到了实践的证明。后来,马胜利向上级汇报时也承认自己“头脑发热”,有 30 个厂失败了。

这篇文章后来被引入到 20 多部新闻类的著作里,成为新闻评论教学中的一个范例。1996 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胡文龙出版了《小言论写作方法系列谈》一书(这是新华出版社的“新闻入门丛书”之一),把这篇文章称之为“论辩式的小言论的典型”,在《小言论精品赏析》这一讲里,用了 7 个页面进行分析和评说。

另一种溃堤

今年夏天长江发大水,我到现场去采访,身临其境,得到的印象特别深刻。我多少年来就在大连生活,城区和郊区没有什么大河,所以我根本想像不到,在长江流过的某些地段,江水要比地面高,大堤随时都有溃决的可能。那种骇人的景象,只要看了一次就忘不了,至今还时时在我的梦里萦绕。但还有一种也是十分骇人的景象,在我原先也是不可想像的,那就是灾区的居民超生相当严重。

还是先从我自己的感受说起吧。在湖南的岳阳市,一对夫妻领着三个孩子招摇过市,这是当地人见怪不怪的日常一景,只是让我们显得有点少见多怪了。在湖北的洪湖市,我到一所高中去采访,顺便问了一下初中、小学的开学情况,在场的高中生都能说得清清楚楚,因为他们家差不多都有三个孩子,弟弟妹妹是否开学了,他们还不了解吗?

我的感受是真是假,可以用最近出现的新闻人物来做个旁证。那个在湖北省嘉鱼县大水中抱住大树9个小时、最后被解放军救了出来的小姑娘江珊,现在她和一个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 (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 (评论卷)

姐姐被安排到北京上学去了,在洪水中她失去了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就是说,原先家里一共5个孩子。那个在电视上两次亮相的湖北省公安县的女考生陈凤,已被某大学录取,然后又免收了学费,她感激地说:“幸亏这么多好心人帮助我!不然我家里还有弟弟、妹妹,真没钱上学了。”她没说清楚家里到底几个孩子,至少也是三个了。那张风靡全国的赈灾照片《母女重逢》,其背景材料是:嘉鱼县妇女段德莲,领着一儿两女(都不到10岁)去躲洪水,失散之后又在此重逢了。9月10日的某报头版头条,用“三兄妹同题金榜”、“两姐妹峰回路转”之类题目,报道了灾区里各方人士资助特困生上学的事,超生之多,生育之密,已经属于不打自招、不知羞耻了。这家报纸的“编者按”热情洋溢地说“这使他们深深地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是这个“大家庭”叫你生这么多孩子吗?你把孩子生出来,当然就有责任让他过上好日子。家里那么多孩子,一口饭要好几个人分,好日子何时能光临到你的头上!相反,你这还耽误了别人的好日子,全国人民的好日子。

计划生育的大道理,自从党中央1980年9月25日发表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公开信之后,这18年里宣传得比打雷还响,各个省市、各个基层政权都设有专业工作人员;国家的宪法、地方的法规还有乡规民约,没有不写这一条的。实行计划生育,现在不单纯是一个道德感召、动员说服的问题,而是中国的基本国策问题。多少年来中国的、外国的经验告诉我们,人类要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人口过快增长是不行的。就拿这次长江水灾来说,如果人口少一些,何必要在上游砍伐那么多的天然林木,何

必要在中游的长江河道里开荒种地、修筑民垸，何必要围湖造田，减少了湖泊减弱水灾的能力？正是人口过多，破坏了人与环境的平衡，人为地加重了自然灾害！过去不懂那么多道理，甚至还以为“人多热气高，干劲大”；现在这些道理已经家喻户晓了，计划生育从理论上、方法上到行政措施上都有了成套的体系，竟然还有人超生成风，这真是愚昧而且顽固不化，害人、害国、害己了。

今年的抗洪抢险已经结束，大河里的水位已经复原，“长江水位居高不下”等词语不再用了。而在这之前去看长江，随时都有溃堤的危险，其场面很是吓人。人们常常把计划生育工作比做“把守住人口增长的大堤”，现在我国的人口也处于“水位居高不下”的状态，也是同样松懈不得！人的生育期是漫长的，人口流动性比过去大多了，工厂、农村过去管理计划生育的办法也都遇到了新问题。对长江大堤要“死看死守”，才能防止溃堤，对于人口增长的大堤不也是一样？如果该管事的人不去管，该自觉的人不自觉，处处管涌，处处渗漏，“超生游击队”上了报纸、电视，名正言顺地成了“超生正规军”，那可就太可怕了！这种溃堤之危害，可要甚于长江的溃堤了。想想这些，各种险境如在梦中萦绕，真叫我不寒而栗！

（《大连日报》1998年9月26日）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采写回眸

《大连日报》把我引上了领奖台

2001 年记者节，在评选“大连市名记者”的时候，提到了我两次获得中国新闻奖的事。回忆起发生在获奖后面的故事，我感到，是《大连日报》给了我一个表演的舞台，也是《大连日报》引我走上了国家级的领奖台。

我第一次获得中国新闻奖是在 1988 年。地方报纸的编辑能得到这样的奖是不容易的，所以有一名外地大学生来信，向我索要剪报时，我感慨地题写了一句话：“一辈子有这一次闪光，也就算是不虚度了。”不料《大连日报》又给我创造了一次获奖的机会。

1998 年夏天，我国南方发生特大水灾，报社打算派记者到南方进行现场采访。这样的任务是轮不到编辑出门的。但我在得知消息后，立即缠上了领导，非要去不可。副总编辑周大新考虑再三，批准让我去。于是我就和摄影记者邢永臣一起，冒着 40℃ 的高温，在长江沿岸的灾区采访，每天发回来一篇报道或一组照片，把抗灾第一线军民的斗争场面传递给《大连日报》的读者。

我来自大连市,在这里,计划生育国策深入人心,“只生一个好”成了市民自然而然的选择。在这种风气的熏陶下,我一看到当地普遍的超生情况,就觉得心里压得喘不过气来。当时有个新闻人物,是武警从长江中救出来的小女孩儿江珊,实际她家一共有五个孩子。在一场大水中淹死了她的母亲和两个弟弟、一个姐姐之后,她的父亲竟然不要剩下的两个女孩儿了,任凭她们被送到福利院,而他打算再婚,再生男孩儿!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听之任之,北京的某个贵族学校为了打出自己的名声,竟然以“献爱心”为名,把江珊和她的姐姐一起带到北京,免费上学,在电视屏幕上大亮了一回相,几乎人人对此叫好!我真想问,这样把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放到了什么位置上?不行,我得说话!

我写稿给《中国青年报》,处理稿件的编辑很表支持,可是过了两天,他很负责任地打来电话,说是稿件不能发了,你另找出路吧。我又邮给了《人民日报》,当时也没能发表(后来发表于10月23日)。后来,我和我们报社的编辑左正红谈起这个话题,但没想在本报发稿(因为大连并不存在严重超生现象)。左正红很敏感地说,你快点写出来吧,《大连日报》适合发!第二天我如约交出了稿件,左正红和仇大川编辑商量,把原来已经排好的稿件换掉,把我的稿件推出去。就这样,我写的言论《另一种溃堤》在9月26日《大连日报》第11版发表了。

以后这篇稿件获得第九届(即1998年度)中国新闻奖的二等奖。在《第九届中国新闻奖作品集》这部书里,专家对作品的评语是:“作者根据自己在抗洪前线采访所见所闻及新闻媒体公布的材料,批评了某些地区严重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的超生现象,宣传了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较早地提出了‘人口过多,破坏了人与环境的平衡,人为地加重了自然灾害’这一观点。作品观点正确,题目生动,紧扣事实,文笔犀利,有较强的说服力。”

在1999年的10月,这篇作品被评定为中国新闻奖作品之后,仅我自己看到的,就有10多种新闻刊物对它进行评点,5本新闻著作将它引为范文。很有趣的是,当年接触到这篇稿件的《中国青年报》编辑,后来调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课,指定他采用的教学课本里,恰恰就有《另一种溃堤》这篇文章。这位编辑给我写信,告诉我这件事,还说:“我给学生们讲了,这篇好文章就是从我的手里漏出去的!”



永志强

1945年8月生,北京人,大专文化,张家口日报社副总编辑、主任编辑。历任河北阳原县委新闻干事、公社党委副书记、党史办主任、张家口日报社总编室主任、副总编辑。1994年后负责创办《张家口晚报》。社会兼职:中国晚报协会常务理事,河北省杂文协会常务理事,张家口市楹联学会名誉主席。主要作品:《平均数字的后面》获1985年全国好新闻二等奖,《私了不算了,了了还未了》等4件作品获中国晚报新闻一等奖,《八千里姻缘》等9件作品获河北省好新闻一等奖。主要论文:《从编辑角度谈提高新闻照片地位》获《新闻战线》1989年征文二等奖;《新闻照片地位的综合考察》刊在《中国记者》1991年第5期;《搞好解放观念的舆论导向》刊在《新闻战线》1992年第9期,获征文鼓励奖;《经营好本报评论员文章》获《新闻战线》征文入选奖;《晚香一缕初惠人》刊在《中华新闻报》1998年5月13日。

平均数字的后面

从各级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看干部的新老交替、年轻化程度；从一个地区的人均收入看人民的生活水平、富裕程度。诸如此类平均数字无疑是必要的，这是我们制定政策和指导工作的前提和依据。

然而，在一些基层单位，这种平均数字的后面掩盖着不少问题。有个县办企业，28岁的大学生当厂长，原来的党支部书记和厂长分别担任副厂长，班子的平均年龄没有超过50岁。可是厂里的大事小事都得由61岁的原任党支部书记说了算，年轻的厂长充当了降低领导班子平均年龄的摆投。在这里，“平均年龄”掩盖了企业领导班子年龄结构的真相。有个130口人的贫困山村，去年人均收入135元，低得可怜，可是真正达到这个水平的户数更少得可怜。因为，村里有个运输专业户，年收入12800多元，他一家平均给每个村民代收人103元。事实上，全村除去他一家的人口和收入外，人均收入不足35元。在这里，全村“人均收入”又掩盖了村民生活水平的真相。

上述两个事例虽不能概括一般，但也确实值得深思。

平均数字后面的问题不容忽视,各级领导应该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张家口日报》1985年12月27日)

采写回眸

平均数字引起的思考

——谈《平均数字的后面》写作经过

评论《平均数字的后面》获奖后,一些同事和通讯员问我怎么想到了这个题目。说起来还有一个“孕育”的过程。

文中提到的某县办企业领导班子的年龄状况,是我在采访中了解到的一个事例。其实,类似情况在现实中不乏其例。让一些年轻的同志进入领导班子,凑个人数,均拉岁数,班子老化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而且,青年干部只起陪衬作用,如同虚设,有劲使不上。单凭平均年龄看不出领导班子年龄结构的最佳配备,并不能说明干部新老交替和班子年轻化的程度,要真正扶持后起之秀,让青年拼搏上阵,必须重视平均年龄背后掩盖的问题。

这就是我提出平均年龄问题的指导思想。

1984年的冬天,《张家口日报》适应形势需要开辟《专业户报喜》专栏,介绍致富的成绩和经验。作为一个驻县记者,我深入到一些村、户搞了点调查。有个31户计113口人的小山村,总收入两万挂零,人均收入180元,其中两个运输专业户计10口人,收入13000多元,人均收入1313元。我认为,这个村山坡广阔,宜林宜牧,应该发挥资源优势发展林果业和畜牧业,这两户是靠原生产队的车辆作价归户后从事运输专业的,不代表本村调整产业结构的趋向,在本村没有推广价值,不适宜报道。可是,这个村按人均收入已摘掉了贫困的帽子,这个假象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少数专业户和大多数农户的收入相差悬殊,如果简单地把人均收入作为村民收入水平的依据,往往掩盖了大多数农户的实际收入水平。

还是这年初冬,县里有关部门各自测算全县人均收入时,民政部门的数据低于脱贫线,农经部的数据又偏高些(统计部门的数据尚未公布)。两个人均收入数之差较大,引起干部群众议论纷纷。联系到我曾作过的调查,对人均收入的问题又有新的认识,由于农户计算经济收入的方法不同,各部门抽样调查时所选各类型农户有别,即使在一个县这样大的范围内,对人均收入的准确程序也需要作具体分析,防止因失误或浮夸损害农民的经济利益。

把平均年龄、平均收入诸如此类的数字联系起来看,我领悟到,尽管平均数字既能说明成绩又能说明存在的问题的程度,但是,这类综合加工得出的数据是数据上人

为的平衡,我们必须从现实中的不平衡这一点出发考虑问题,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拿出相应的措施来。

从考虑平均数字后面的问题到我撰写这篇评论,有一年时间,为什么迟迟不动笔呢?不仅因为考虑不成熟,坦率地说,是有思想顾虑。从宏观上看平均数字不失为上级领导在大范围分析形势、制定政策的依据,中央领导同志指出的“小康水平”也是用平均数据体现的。在平均数字上做文章,弄不好观点偏颇,个人犯错误且不说,见诸报端引起的后果不堪设想。因此,问题长时间在脑海里徘徊着。

通讯《县委书记和乡长对话》(见《人民日报》1965年6月2日),对于人均收入增百元的普遍号召下掩盖的浮夸问题及时地揭出来了。把提出指标的上级比作“敲锣的”,把虚报数字的下级比作“爬竿的”,形象而又尖刻,读后不仅受启发,也给我壮了胆,增强了提出平均数字后面的问题的勇气。由于我调回总编室工作,没有机会再到采访过的村子核实数据,不能动笔。年底,偶然看到报上刊登一个山村的情况与我调查过的村子相类似,可以引用。这时扶贫工作开始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平均数字后面的问题应该及时提出来。于是,这篇言论“十月怀胎”,终于“一朝分娩”了。

朱元胜

196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同年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工作，先后担任文艺部编辑，记者部记者，《市场报》要闻版主编、要闻部主任、总编室主任，写作了杂文、散文、报告文学、消息、通讯、述评、评论等大量新闻作品。1985年7月被评聘为主任编辑（主任记者），1992年1月被评聘为高级编辑（高级记者），还曾被聘任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从1979年《市场报》创刊到1995年专事组织宣传、审看大样止，作者为《市场报》撰写了社论、评论员文章1000多篇。其中，有10篇作品6次获全国好新闻奖和中国新闻奖。

官倒，权钱结合的怪胎

——五谈治治轮番倒卖

查“官倒”，立案难，审查难，查清之后的处理也难。难就难在它是权力与金钱结合的怪胎。

商品紧俏，价格双轨，给倒卖提供了沃土。不少紧俏物资，国家牌价和市场价相差不是几成而是几倍。拿牌价物资按市价倒卖，倒一次，便可腰缠万贯，何况三次五次！谁能拿牌价物资去倒卖呢？无非某些用权谋私的人，用群众的话说，就是“官”们。某些“官”或“官公子”、“官太太”聚集到孔方先生的旗帜下，权与钱至少在三个环节上结合了。其一是批货，叫“官批”。“官批”形式不一而足，有批条子的，有打电话的，有登门索要的，条去货来，声到货到，有的还不留形迹。其二是运销，叫“官运”、“官销”。靠领导的权力和情面，准运证、许可证……办得一应俱全，不法营生便披上了“合法”外衣。更有甚者，动用军车、警车搞倒卖。其三是掩盖，又叫“保护伞”。既然违法就怕见天日，一旦天机泄漏，遭遇查处危机，即以领导身份，或下令，或游说，重把漏洞堵死。

“官倒”难查，但不得不查。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把官员经商视为腐败现象。从我国情况看，“官倒”实在是造成经济秩序混乱的祸首，而且它已同多种违法劣行合流为患。一、倒卖与假冒合流。农民反映，他们用高价买来的化肥、农药，有的竟是冒牌货，造成大片农田失收。毛纺厂反映，“倒爷”们倒卖的羊绒大量掺沙土、铁粉、滑石粉等物，使他们除不胜除。二、倒卖与行贿合流。据了解，天津一个物资部门每年有十多个干部因受贿戴上镣铐。应该指出，他们进班房的代价，是某些倒卖者、受贿者名利双收，过上天堂般的日子。三、倒卖与乱涨价合流，成为物价失控的祸水。目前，不少彩电、冰箱涨价一倍，甚至更高，原因之一就是“倒爷”奇货可居，硬把价格抬上去，造成难以挽回的既成事实。

（《市场报》1988年10月10日）



不治“倒官”难禁“倒”

——三谈治治轮番倒卖

轮番倒卖,危害最大的要数“官倒”。一般倒卖者弄不来的紧俏物资,他们可以搞到;生产部门要进口彩电显像管难上难,他们却拿进口许可证去倒卖;国家控制消费品进口,他们却有批文去进口冷暖风机、冒牌照相机坑害顾客……倒批文、倒许可证、倒提货单,这种无本万利的荒唐营生,往往就是官办公司干出来的。

“官倒”形成,并且神通广大,不外有如下因素在起作用:一是有现任领导作后台。他们平时不出面,关键时刻说句话,要物资有物资,要批文有批文,一旦丑事败露,还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二是有离休干部任要职。他们凭以往的余威和关系,尚能呼风唤雨,有的还轻易得罪不起。三是有“官”们的太子、公主、太太在主持。他们虽然不任要职,说话办事,有时比在任领导还灵验。四是有掌握物资分配权的人在斡旋。这类人职务不高,有的甚至不是官,但县官不如现管,比如,煤炭部东北物资管理局那个高飞,不过是助理会计师,倒卖国家物资却得心应手,7万元暴利转眼中饱私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囊。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要治住“官倒”，不可不治“倒官”。目前有些地方只罚公司，不查“倒官”，恐怕很难获得满意的成效。须知，“倒官”倒时神通广大，逃时手法也高明，这里不妨试举三法。一曰隐身法。你去查处，他隐身幕后，风头一过，他原形毕露，将被罚的钱十倍二十倍地捞回来。二曰跳槽法。甲公司的勾当东窗事发，他跳到乙公司卷土重来。三曰换脸法。A地的地球公司被封，他到B地开宇宙公司，招牌变了，营生依旧。如此种种，只罚他的公司，于他何碍？

（《市场报》1988年8月29日）

采写回眸

击向官员腐败的第一炮

《官倒，权钱结合的怪胎——五谈治治轮番倒卖》、《不治“倒官”难禁“倒”——三谈治治轮番倒卖》是朱元胜为《人民日报》、《市场报》撰写的社论，是系列评论《谈治治轮番倒卖》中影响最大、反响最强烈的两篇，其中

《官倒，权钱结合的怪胎》获 1988 年度全国好新闻一等奖。

1988 年的我国经济，仍然是短缺经济，供求矛盾突出。改革开放以后，市场逐渐放开。到 1988 年，部分商品，如菜、鱼、禽、肉、蛋等日常消费品，市场完全放开，商品日渐丰富；而另一部分商品，如彩电、冰箱等耐用消费品和当时称之为物资的钢材、铝材、化肥等生产资料，市场没有完全放开，商品十分紧俏，价格实行双轨制：计划价和市场价。商品紧俏，价格双轨，为倒卖提供了土壤。某些官员、“官公子”、“官太太”，利用官员手中的权力，组建官办的皮包公司，或在幕前或在幕后，从事“官倒”活动。他们先是倒卖实物，后来干脆倒卖配给紧俏商品、进口紧俏商品的批文、许可证，从中牟取暴利。经他们三倒四倒，使计划价和市场价的差距不是几成而是几倍。比如 51 厘米的彩色电视机，属计划内的凭票供应每台 1 900 元，而市场价竟被倒到四五千元。这一年，彩电、冰箱等耐用消费品开始在普通百姓中普及，群众买一台彩电要比以前多花好几倍的价钱，怨声载道，强烈要求整治“官倒”。生产者也因为生产资料价格被倒得奇高，生产利润仅及倒卖获利的十几分之一，几十分之一，心中愤愤不平，也强烈呼吁整治“官倒”。这一年，“官倒”横行，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经济秩序混乱。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整顿经济秩序，并指出，“官倒”是扰乱经济秩序的罪魁祸首。正是在这个时候，《市场报》抓住这一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热点问题，组织报道，配发了这组系列评论，抨击了“官倒”。

这组评论，问题抓得好，抓得准，抓得及时。它在群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 (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 (评论卷)

众关注热点、中央部署重点的交汇处找题目、找切入口,评论的论述与群众的呼声、中央的声音产生了共鸣、共振。

《人民日报·编采业务》在评介该文时说:“这篇社论的最大特点是:用简洁的语言,为官倒们刻画了一个惟妙惟肖的肖像。”从画像的角度讲,《官倒,权钱结合的怪胎》与《不治“倒官”难禁“倒”》相辅相成,共同勾画了“官倒”们的嘴脸。《不治“倒官”难禁“倒”》从人员构成、倒卖手法上画形:“官倒”形成,并且神通广大,一是有现任领导作后台,二是有离休干部任要职,三是有“官”们的公子、公主、太太在主持,四是有掌握物资分配权的人在斡旋;“倒官”倒时神通广大,逃时手法也高明,一曰隐身法,二曰跳槽法,三曰换脸法。《官倒,权钱结合的怪胎》从本质、要害上画神:某些“官”或“官公子”、“官太太”聚集到孔方先生的旗帜下,用权谋私、权钱结合,是一种腐败现象;“官倒”已同多种违法劣行合流为患,一是倒卖与假冒合流,二是倒卖与行贿合流,三是倒卖与乱涨价合流,是造成经济秩序混乱的祸首。

在风格上,作者坚持了自己写评论的一贯宗旨:贴近群众。这两篇评论夹叙夹议,叙中有论,论中有叙。叙的是群众的身边事,论的是群众的心里话。用百姓熟悉的事讲道理或作比喻,可以省去许多议论的文字,达到言简意赅、以小见大的效果。读者读来,形象、具体,心领神会。正如《人民日报·编采业务》上说的,“官倒”的嘴脸跃然纸上。

《不治“倒官”难禁“倒”》、《官倒,权钱结合的怪胎》刊出,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应。在国内,《人民日报》、

《羊城晚报》等报刊纷纷转载，不少电台予以转播；在国外，英国路透社、法国法新社等专门发出电讯，作了转述和评论。路透社发自北京的电讯《中国对握有党票的商业骗子展开斗争》，把《市场报》社论的刊出，视作中国开展反“官倒”斗争的信号。这两篇评论每刊出一篇，都有许多读者给编辑部来信来电，认为社论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有位读者在来信中说：“倒官们用权谋私，把紧俏商品的价格倒高了好几倍，他们赚的是昧心钱，掏的是老百姓的腰包，你们敢于向这些权势者开炮，在全国报刊中实属难能可贵，据我所知还是第一家。”

直至过了多少年之后，新闻界一些资深人士依然认为，抨击“官倒”的评论抓在点子上，抓住了要害。进入20世纪90年代，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发文，对禁止领导干部及其亲属经商办企业，禁止党政机关、部队及公安等部门经商办企业等，作了明确的规定。这些防患规定出台，足以说明权钱结合的危害，以及国家和社会对防止权钱结合的重视。

随着市场由商品紧缺转为需求不足，“官倒”不再猖獗了。然而，权钱结合，以权谋私却在变着脸儿继续着。20世纪90年代前期房地产热，某些官员或“官公子”、“官太太”便大炒房地产，炒地皮和地皮的批文。90年代中期以来，某些官员及“官太太”干脆直截了当，我为你谋利益，你给我大把钞票。从这演变脉络看，《官倒，权钱结合的怪胎》是改革开放以后，击向官员腐败的第一炮。

朱世良

1939年12月生，辽阳县人。现任辽宁省记者协会主席，高级记者。1959年入辽宁大学中文系，后转入哲学系，于1964年7月毕业。曾在辽宁日报社任记者、编辑、评论部主任，在地方曾任中共灯塔县委副书记、辽阳市委常务副书记，后任辽宁社会科学院院长，1993年5月调回辽宁日报社任总编辑，1995年11月任社长。在任记者、编辑和领导职务期间，经常写一些理论文章和杂文。由于学历、经历的特点，所写的文章往往有的放矢，有理有据，深刻大气，立意新巧，语言幽默，雅俗共赏，深得一些读者的喜爱。在中央和地方报刊、出版社发表的主要文章和著作有：《经济改革对哲学的呼唤》、《力戒表面文章》、《话说“缺德不缺得”》、《当官要讲“知民度”》、《说你长不要笑 说你短不要跳》和《潮声集》、《清风热话》等杂文论文集。

当官要讲“知民度”

时下,讲求知名度的人越发多了起来,这无疑是大好事。所谓知名度,是指某人或某事被社会、公众知道熟悉的程度。知名度不仅有高低之分,更有好坏之别。追求好的较高的知名度(或叫美誉度),是一个国家、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表现。争当名人,争创名牌,精神可贵,行为可赞(那些花钱在冒牌名人录上买一席之地者除外)。这里我要说的是比追求知名度更重要的另一种追求,那就是对人民群众的工作、生活、交往和愿望了解和熟悉的广度、深度和速度。权且叫它“知民度”吧!

为啥要谈起这个“知民度”?第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坚持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不“知民”,谈什么安民、为民。古人说“为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也是讲这个意思。第二,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党的任务十分重大而艰巨,能否继续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我们的成绩有目共睹,可这已成过去,我们的目标十分宏伟,但那是

将来，“在过去和将来的中间，横着现在这个大实在”。现在，各级领导干部责任大，担子重，只有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和基本权利得到有力的保障，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精神得到充分的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得到积极的推广，才能激发他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巨大热情。有的说“领导水平高”，是“能人”、“强人”。我们不否认个人的作用，但没有群众的参与和支持，还有什么“高”什么“能”和“强”，那不成了无源之水，无水之舟，涸辙之鲋（干涸了的车道沟里的鲫鱼）吗？第三，这是我要谈写这个题目的直接动因：必须看到，我们有些干部群众观点在淡漠，同工农基本群众的感情在疏远，对群众缺乏基本的了解，更谈不上知民的广度、深度和速度，不懂得党的群众路线，不会做群众工作，有的甚至损害群众的利益。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群众对于部不是“拥护又喜欢”，而是干群关系紧张，干部和群众心隔心。这种情况虽然不是普遍的，但却是极为有害的。党中央一再号召并带头深入实际，深入基层，甚至走家串户，调查研究，了解下情。我们不少干部已做出了榜样，并总结出一些好经验、新做法，而有些干部陷人文山会海难自拔，呼呼啦啦忙应酬，沉下去认真了解民情的时间很少。说来也怪，现在交通发达，车辆便利，通讯快捷，领导班子人不少，下基层、搞走访、查实情并不难，可“就是抽不开身”。领导干部确实责任重，时间紧，可是为什么有的宴会上扯闲嗑两个小时不嫌长，还要卡拉OK一番，唱过夜半声不绝，“麻”到天亮不觉累；一些大尾巴会砍掉尾巴有何妨，多腾出些时间和老百姓唠唠知心话岂不更好。现在，有些干部把密切联系群众变成了密切联系领

导。和领导自然要密切联系,但“通用件”式的汇报,“全民齐动员,迎接检查团”之类的表面文章、形式主义;信口胡来的数字;不切实际的口号,报喜不报忧的痼疾,有党性、讲务实的“上级领导”谁还看不出弄景,听不出这假味儿来。有些干部即使下到基层,也是车轮转、隔着玻璃看,住宾馆,听汇报,吃宴席,看材料,静不下心去查真情,虚不下心来听真话。也有的干部看近不看远,看富不看贫,看易不看难,听喜不听忧。如此这般,怎能获得很高的“知民度”?不了解实情,听不到真话,不为民,不靠民,不知民的“官”,那还像咱共产党的干部吗!

“衙斋卧听潇潇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封建社会的郑板桥尚且能关心人民的疾苦,我们这些以为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党干部应当更关心群众的生活。时代在变,情况在变,我党的群众路线永远不能变。我们各级干部,都应时时省察自己:肩上的担子挑起来没有?为民之心是否火热?想问题,办事情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真诚为人民服务,永远不脱离群众。

(《南方周末》1996年10月18日)

采写回眸

写作追忆

——本文写作过程

1996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要求全党正确认识和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强调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强调建设物质文明,关键在党,建设精神文明,关键也在党。要求各级领导同志转变作风,深入实际,认真搞好党风和廉政建设。不少领导同志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的发展,转变作风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勇于创新,改革和建设扎实前进。但同时也有不少干部,作风飘浮,工作不扎实,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套话、空话、大话连篇,陷于文山会海、送往迎来不能自拔,忙于创“政绩”,追求知名度,有的被老百姓称为“电视明星”、“酒仙”、“舞星”,“三拍(拍脑门、拍胸脯、拍屁股)干部”,不能查实情、办实事,严重影响改革的深入和事业的发展,群众意见很大。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好的典型和评论加以舆论引导,促进干部作风的转变。

另外,当时在报社内外,提倡人家写一些针对性强,有说服力、感染力的评论,改变空泛、老套的说教。作者力图在这方面带头作出探索和努力。

在确定评论题目时,开始想到《转变作风 刻不容缓》、《联系领导与联系群众》等,这些题目也都可以,但都一般化,不能有力地吸引读者。后来想到知名度与“知民度”,二者不仅谐音,其含义有关联又有针对性,提法新颖又不牵强,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有内容,有写头,于是,就确定了《当官要讲“知民度”》这一标题。

第一段写何谓“知民度”。

由知名度开始,转而写“知民度”。为了吸引人、说服人,文章开始就肯定了追求知名度。为了让读者明晰,又给知名度下了一个定义,并指出知名度有高低之分,好坏之别。紧接着就讲对领导干部来说,应有比追求知名度更重要的追求,那就是追求较高的“知民度”。因为“知民度”这个词儿比较陌生,可能是个创造,于是就给“知民度”下了一个比较全面、严谨而又耐人思索的定义。

第二段写“知民度”为什么更为重要。

这一大段分三层意思来讲:首先,讲知民的重要性,不知民谈不上安民、为民,为民是宗旨,知民是前提,是基础。其次,讲只有了解群众,才能依靠群众。今天,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的任务繁重,情况复杂,责任重大,只有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精神得到充分的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得到积极的推广,才能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稳步前进。文中顺便指出“能人政治”的片面性。再次,现在,有些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严重地影响干群关系,影响改革开放和建设事业的发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展,已到了非改变不可的时候了。文中列举了大量生动形象,真实具体,普遍存在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表现,批评了一些飘浮、短视、片面、敷衍的作风。用事实说话,使读者看到问题的严重性,纠正的必要性、紧迫性。同时,作者也在力求好的文风,言之有物,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提倡知民度,自己也该多了解真情实况,摆出这些表现,使读者看得清,产生共鸣,增强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此外,文章中的语言,还有括号内的注释,也都处处为读者着想,力求简洁明白,增加知识信息含量和阅读兴味。

文章的最后一段,对领导干部提出殷切的希望。

由郑板桥的诗句写起,联想到今天领导干部的责任、共产党人的宗旨,道出文章的主题:时代在变,情况在变,我们党的群众路线永远不能变。

《当官要讲“知民度”》这篇文章,发表在1996年10月18日《辽宁日报·大周末》的头版头题,见报后收到多封读者来信,称赞文章“符合实际,表达民意,有理有据,给人启迪”,有的来信索要这天的报纸,有多家报刊转载。这篇文章还被评为辽宁省新闻作品一等奖,辽宁省领导干部论文一等奖,1996年度全国新闻作品三等奖。

朱承修

江苏省江阴市人。1949年6月毕业于上海中国新闻专科学校,同年7月参加新华社工作,曾任新华社华东总分社、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分社、海防前线分社、总社国内部政治组的记者、编辑,总社国内部政治组组长、国内部总编室副主任、国内部副主任,新华社副总编辑。从事过抗美援朝,解放一江山岛、大陈岛等浙江沿海岛屿、炮击金门以及中印、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等军事报道,多次参与新华社对党的代表大会和“两会”报道的领导工作,并长期分管新华社的港台澳报道。

新华社高级编辑,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84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1993年获韬奋新闻奖。

且看李登辉怎样表演

台湾当局的头号当权人物李登辉，近期在两岸关系问题上言论猖狂，举止怪悖，再度引起岛内外侧目。评论者认为，李登辉的一系列表演表明，他已经在“台独”的深渊里滚得连泥带水，那一身污浊，怕已很难刷干洗净。

请看李登辉是怎样在众目睽睽之下表演的。

近来，李登辉的言行表露出的“台独”倾向，加重了岛内的“台独”气氛。去年他发表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那篇推心置腹的谈话后，面对岛内外对他“台独”意向的强烈质疑，他和他的一些伙计曾不得不出几次表白他“主张统一”。但漏洞尚未补齐，他又到处泄漏真情。例如，他向主张“台独”的民进党人交心时，声言“统一只是说说的，其实我心里想的跟你们一样”，又招呼“台独”骨干分子“不要冲得太快，慢慢来”。这些举动，使岛内报纸都因此而指称他“忽统忽独、疑统疑独”、“反复无常”，结果培养了“台独”势力“旌旗日盛，兵马日壮”，造成了两岸关系的“反复激荡”。

但是，尽管岛内外对李登辉“台独之路”的抨击之声不绝，他这种两面手法却越耍越起劲。4月初他在“国统

会”上发表的讲话中,一面重申台湾与大陆均为中国领土,要促进国家统一,一面却不再提要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而强调两岸为“分裂分治”的“两个互不隶属的政治实体”,实际上将海峡两岸定位为领土和主权割裂、又互不隶属的“一中一台”两个国家,明统而暗独;最近他又声称“台湾是大陆一部分”的说法“无法接受”,意图否定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他又把原来要培养两岸“兄弟情怀”的说法丢在一边,狂妄地称台湾是“老子”,大陆是“儿子”,还声言海峡这边对台湾“一毛钱的税金也没有收过就说台湾是他的,别开玩笑”。按照这个逻辑,中国对同样没有收过一毛钱税的港澳就根本不能恢复行使主权了。李登辉发表的上述歪论,就像去年他开口骂中共是“土匪”一样,实在不值一驳。固然,人们可以对他一些顽童骂架式的语言嗤之以鼻,但却不能不严肃地思考他的居心何在。

李登辉近年热衷于到国际上钻营。他不惜工本地去搞什么“度假外交”、“庆典外交”,力图挤进国际会议,策动要“重返联合国”,还利用这样那样的钓饵与一些国家发展政治关系。据透露,此次他能够赴美搞“校友外交”,花在“游说”美国国会议员等方面的资金有上千万美元。如此不择手段地要挤到国外去,李登辉自己明白说,目的只是为了“突显”台湾的“存在”。换句话说,他就是要费尽心机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把台湾问题国际化。他的这些活动,尽管伴以蛊惑人心的言词蒙骗了一些岛内同胞,但也不乏有人看到它对祖国统一的危险性,看到它对两岸关系造成的不可弥补的损害。还有舆论认为,台湾如果因此面成为某些国家手中的一张牌,那

将使台湾陷入“身不由己”甚至“万劫不复”的境地。应当指出,李登辉确实是在有意地把台湾送到别人手上当成一张牌,而自己则以成为别人的一张牌而沾沾自喜。当然,这种挟外人以自重的行为,向为中华民族所不齿。

李登辉还在着意制造两岸军事对立的紧张气氛。他四出收罗战机、军舰、坦克、导弹,最近一周内三次参加针对海峡对岸的军事演习,并把中国政府为了维护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不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歪曲为要“武力犯台”,一再以此来挑拨台湾同胞与祖国政府的关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今年春节前夕的谈话中重申了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指出:“我们坚持用和平的方式,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统一;同时我们不能承诺根本不使用武力,如果承诺了这一点,只能使和平统一成为不可能,只能导致最终用武力解决问题。”这是“武力保台”而不是“犯台”,是为了和平而不是为了动武。讲不放弃使用武力,是为了实现和平。海峡两岸应当和平地走向统一,而不能允许和平地走向分裂;如果祖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遭到分割,当然就没有和平可言。岛内外有识之士,对此当有明察。

对李登辉先生,考虑到他在岛内的地位,此间对他的出格言行,总是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宽容。但是,要得到别人的尊重,必先自重。能不能带着一身泥水从那个陷得很深的“台独”泥坑里爬上来,就看他自己了。历史的长河将证明,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必将战胜一切分裂祖国的内外反动势力,最终实现自己祖国的完全统一。

(新华社北京1995年6月6日电)

采写回眸

关于《且看李登辉怎样表演》一文的写作

1995—1996年,台湾海峡两岸的关系发生重大逆转。导致这一逆转的关键人物是李登辉。这个台籍政客,1988年11月因一手提拔他的蒋经国突然逝世,由原来几乎悄然无声而一朝岛内大权在握。当时,不仅海峡这边对他了解不多,即使是岛内,也有许多人对他的过去不甚了了。在上台伊始、立足未稳的那一段时间,他掩盖起自己的分裂面目,对两岸关系的处理一度不得不顾忌到时代的潮流,说了一些倾向统一的话,采取了一些有利于两岸交流的措施。但是,随着他接连斗倒国民党内的几股政治势力,他在岛内政治上、在两岸关系上就逐渐张牙舞爪起来。

不言而喻,我党和政府,从李登辉上台的那一天起,对他就一直在观察之中。出于发展两岸关系、实现和平统一祖国的愿望,人们可以看到,我党对他的言行开始时相当宽容。1994年6月,我们曾对他一些出格的举动作了点名批判,但数量有限,分寸之间,也尽量给他留了余

地。

1995年，李登辉在岛内的地位已无可动摇，随之他也肆无忌惮地走上了分裂之路。他一边用各种奇谈怪论来煽动岛内的“台独”思潮，接着又跑到美国去“凸显”台湾在国际上的“存在”；在1996年变更台湾领导人的活动中，他又以这些作为捞取选票的资本，上演了一场闹剧。海内外的中国人，则在这期间开展了一系列反对分裂、反对“台独”的斗争。这一场斗争，从1995年6月6日新华社发表评论开始，以在台湾海峡举行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演习为高潮，以1996年4月27日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阐明斗争的深远意义作了小结。揭开这一场斗争序幕的新华社评论，就是这篇《且看李登辉怎样表演》。

当时我是新华社的副总编辑，港澳台问题报道是我分管的工作之一。台湾问题的复杂性使我不得不每天都要查看大量有关材料，努力掌握住岛内的重要动向，同时密切注意着国际上的一个关键因素——美国的动作。李登辉的越来越猖狂和美国的允许他重返康乃尔大学，都是在向我们发出警告：如果在这样的节骨眼上不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海内外就会认为我们对李登辉的举动无所作为，李登辉也会在这个错误的信号下更加忘乎所以。虽然我们非常不愿意使两岸关系出现紧张局面，但在权衡当时形势之后，我认为再次公开批判李登辉已经刻不容缓，立即根据平时积累的材料写了这篇署名评论作为开端，并布置了一系列的评论文章作为后续报道，决心组织一次揭露、批判李登辉的战役性舆论斗争。

《且看李登辉怎样表演》是一篇政治时事评论。作

为系列评论的第一篇,它针对的是李登辉近期的主要活动,而不是就他某一个问题作深入批判。评论的任务,是从分析李登辉的几个大的问题入手揭他的本质。鉴于李登辉当时很嚣张,文章在气势上要镇住他。因此,评论一开始就以尖锐的语言,指出李登辉近期在两岸关系上“言论猖狂,举止怪悖”。对当时岛内的第一号人物来说,得到对岸这八个字的指责,很煞了点气焰,一时引起岛内媒体很大反应。评论接着为李登辉“定性”：“他已经在‘台独’的深渊里滚得连泥带水,那一身污浊,怕已很难刷干洗净。”这里没有指李登辉就是“台独”,但点到他已经在这个泥坑里陷得很深。这一提法既坚持了我们的原则立场,又给他留了一点余地,总的口气是严厉的。台湾媒体报道新华社发表这一评论时,纷纷引用这几句话,认为“中共”对李登辉的问题怎样看,这是一个信号。

评论文章的灵魂是论点,力量是以理服人。在大家所熟和的问题上提出新的观点,论证透彻而有力,文章才有生命力,才能吸引人。我们党和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一直是“台独”分子、岛内一些政客肆意加以歪曲并煽动分裂意识、对我进行恶意攻击的一个重要问题,即所谓大陆要“武力犯台”。李登辉在那一段时间里,正是用“武力犯台”之说来吓唬、煽动台湾民众的。在一般人的心理上,有人要用武力来“犯”我,当然是令人反感的,因此,所谓“犯台”,有一定欺骗性。过去我们对此所作的释疑,一般都是正面阐述不得不使用武力的几种情况,这当然是正确的、必要的。我经过反复斟酌,考虑用新的、过去没有讲过的语言来反驳,要有新意,要有说服力。在评论倒数第二自然段中,我在点出了

李登辉最近一段的有关活动后,引用江泽民总书记1995年1月30日讲话中的有关段落,“我们坚持用和平的方式,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统一;同时我们不能承诺根本不使用武力,如果承诺了这一点,只能使和平统一成为不可能,只能导致最终用武力解决问题”后,用自己的话作了阐明:“这是‘武力保台’而不是‘犯台’,是为了和平而不是为了动武。讲不放弃使用武力,是为了实现和平”。用“武力保台”来反驳“武力犯台”,只改了一个字,通俗易懂,而且在人们心理的感觉上、在接受的程度上,也可能会比只是重复讲不得不使用武力的几种情况要好些。接着,又针对李登辉等一些人用“两岸和平”来迷惑岛内人民和争取国际舆论,指出“海峡两岸应当和平地走向统一,而不能允许和平地走向分裂;如果祖国的领土主权完整遭到分割,当然就没有和平可言”。这里点出了一个要害问题:两岸和平是大家所期望的,但不能举着和平的旗帜搞分裂。岛内媒体当时转述这篇评论时,普遍引用了“武力保台”以及只能和平地走向统一而不能和平地走向分裂、领土主权遭侵害即没有和平的提法,这些论点以后又被我们其他媒体的评论加以阐发。

评论文章容易板着脸讲话,往往言之有理而不易言之动人。尤其是这种政治性的时评,怎样写得既义正词严又生动可读,有自己的文字特色,这应当是新闻改革的一个内容。例如,要多用群众语言,多用通俗易懂的话,多用成语,甚至要讲究音节的铿锵,要有一种战斗的风格。这篇评论中,“滚得连泥带水”、“顽童骂架式”、“到国际上钻营”、“成为别人的一张牌而沾沾自喜”这样的一些话,为文章带来了一些生动之气,而“刷干洗净”的

用法,作为一个自然段的结尾,念起来要比“洗刷干净”更加有力。同时,这篇评论通篇借鉴了杂文的笔法,对李登辉指指点点,遣词行文放开而不拘泥,尽量使人读来感到理直而气壮。

李登辉是一个典型的政客。他可以用一套冠冕堂皇的话来对付眼前的需要,过一段时间、换一个场合,他就可以讲出完全不同的另一套来。这篇评论抓住他那些前后不一的话,让他自己来揭自己口头上讲“统”,而心里想的却是“独”的面目,又重视引用台湾报纸对他的批判,以增强说服力和客观性。

新华社作为国家通讯社,发表的言论当然要符合党和政府的立场、观点;台湾问题又是一个高度敏感和复杂的问题,就台湾问题发表评论,政治性、政策性、策略性很强,对什么时候就什么问题发表评论和评论的论点、论述,都有严格的要求。另一方面,从事这一报道的记者、编辑,又要有充分的主动精神,平时要注意积累材料,研究问题,思考观点,以便一旦需要时能立即出手。新华社向来要求自己的干部要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随时掌握大量情况,对事物有自己的分析和看法;强调要培养专家型的记者编辑。1995—1996年批判李登辉的舆论斗争中,新华社之所以能迅速发表大量评论,成为新闻单位中批李的主力,是同新华社平时的这些要求分不开的。《且看李登辉怎样表演》只是这次系列评论的开篇而已。

这篇评论当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中央和省市报纸普遍刊登,港澳报纸有不少也全文予以刊登,政治态度与我不同的一些报纸也以新闻形式转述了评论的重要观点。台湾主流媒体则作了详细转述。

以后的事实证明,这篇评论对李登辉所作的政治判断是准确的。评论的论点,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这篇评论获 1995 年度中国新闻奖的二等奖。



刘振林

生于1940年,1960年调入哈尔滨日报社从事新闻工作至今,高级编辑。

在40余年报纸生涯中,搞过工业、财贸、政法、文教等方面的报道,当过一线采访记者,也做过编辑出版工作,多半时间从事新闻评论写作。退休前任《哈尔滨日报》编委委员、理论评论部主任,黑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且说“一把赢把把输”

一位掌有某些实权的工作人员向企业敲竹杠，被厂长顶了回去。情况反映到他所在的那个部门，正赶上纠正行业不正之风，他挨了一顿批评。那位厂长自以为“得胜回朝”，却不料日后在业务活动中处处受到这位工作人员的刁难，弄得企业叫苦不迭。有人对这位厂长说：“你这叫一把赢把把输。”

据说不少企业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一些同企业有着制约关系、领导关系，甚至只是业务往来关系的部门的个别人员，让人既离不开，又惹不起。他们常常借工作、职权之便，向企业提出无理要求，索取好处，你既不好驳回，又不敢揭发，就只能逆来顺受，乖乖照办。这并非“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企业实在是出于无奈。因为我们的规章制度还不够健全、完善；即使有条文规定，弹性也很大，解释权全凭有关人员的一张嘴。那些让人“一把赢把把输”的人，就是在这上面做手脚。比如掌管钱物分配的人，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按条文规定，拨给你有道理，不拨给你也有理由。一旦得罪了这样的人，合理合法的小鞋明着给你穿，你浑身是嘴也说不

清。再如一些监督检查部门的个别人员,根据企业对他的好处大小,可以把有些问题说成是,也可以说成非,可以说成“四两”,也可以说成“半斤”;倘若犯在他手下,在罚款数字上他可以添个零,也可以减个零,这一是一非、一加一减,对企业来说就非同小可。至于你在这个问题上没满足他的要求,他在别的事情上找你的茬儿,更是防不胜防。于是,企业领导人只好把原则暂放一边,“心甘情愿”地受这些人的敲诈勒索;否则就可能“一把赢把把输”。

这些人“一把赢把把输”的人常常打着“照章办事”的幌子。其实,真若按政策、规定办事,一视同仁,企业也没话说。这些人纯粹是钻政策、规定的空子,又让人有苦说不出。这种恶劣行径是典型的以权谋私,毒化着党风和社会风气,对改革和“四化”危害极大,绝不可轻视。只不过由于它的隐蔽性,纠正起来更为困难。但既然它是借业务活动之机出现的,只要领导细心观察,认真抓,还是能够发现的。此外,对有关规章制度应订得严密一些,尽量减少弹性系数,不给心术不正的人可乘之机。对于那些让人“一把赢把把输”的人,一旦发现就该认真查处,切不可从本部门利益出发而护短。否则,隐蔽的行业不正之风将会逐渐由“地下”转向公开化,蔓延成灾。

(《哈尔滨日报》1986年7月20日)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采写回眸

一语破的 切中肯綮

——评论《且说“一把赢把把输”》写作感言

评论《且说“一把赢把把输”》原载于1986年7月20日《哈尔滨日报》第1版《思想论坛》栏中，同年9月14日《人民日报》第1版《每周论坛》予以转载，在社会上引起较为强烈的反响，先后被评为省、市好新闻一等奖，全国好新闻三等奖。

《且说“一把赢把把输”》是当年端正党风，反对行业不正之风一组系列评论中的一篇，在十几篇中是反响较强的一篇。该文见报后，编辑部及作者曾收到许多人的来信来电，有的同志在电话中感慨地说：“好，说得痛快！”企业界反响更为强烈，一位企业的厂长在来信中说：“这篇报道说出了我们憋在心里很久，想说而说不出也不敢说的话，希望党报上能多发些这样的文章，让社会尤其是领导多了解些企业的难处，厂长经理们的苦处……”一时间，“一把赢把把输”成为人们面对不正之风无可奈何的一句口头禅。一位曾任福建某地轻工业局副

局长、后到基层创办企业的同志,给作者寄来厚厚的材料和信。信中说,他从《人民日报》上读到此文后“感慨万千”,曾专程到北京找到报社,几经周折才打听到作者的单位。在给作者寄来的材料和信中,倾诉了他在办企业中不堪忍受“有关部门”的勒卡,曾向上级领导反映,也得到了领导的支持,但却因此带来厄运,不断遭到那些“主管部门”的刁难、打击,乃至受到不公平的处分,尝尽了“一把赢把把输”的苦衷。他在信中恳切地希望作者“为了推进改革,维护国家利益,也为了企业能够更好地发展,应多发些这样的文章,揭露那些让人‘一把赢把把输’的人的卑劣手段……”从信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位在改革中有一番作为、又书生气十足的人。他写信寄材料,并非是要作者为他“申冤”,解决具体问题,完全是因为读了此文而引发共鸣,心中有话,不吐不快。

老实说,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在当年反对不正之风的文章中,并非“上乘之作”,就是在作者撰写、编发的评论中,也算不上“得意”之作,为什么却能引起如此反响呢?

《且说“一把赢把把输”》发表之时,正是我国改革开放蓬勃兴起的年代。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全力推进企业改革,企业界改革的积极性很高。但与此同时,改革也遇到了不小的阻力,其中较为严重的就是来自某些有实权的党政主管部门的不正之风。一些党政主管部门把自己管辖的范围视为“租地”,利用手中握有的权力,千方百计去那里“寻租”,对企业勒、卡、索、要;越是改革力度大、经济效益好的企业,遇到的情况越严重,使得企业苦不堪言。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当年，恰逢哈尔滨市召开党代会，作者要为会议撰写一篇闭幕社论。会议期间，市里党政主要领导邀集一些企业负责人座谈，中心议题就是如何加快企业改革的步伐，企业在改革中有什么难题需要解决。座谈会开得很热烈，上午没谈完，下午又接着座谈。座谈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谈到一种现象，即企业众多“婆婆”的干扰。有些上级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借“工作”之便，敲企业的“竹杠”，吃、拿、索、要，稍不如意便处处设卡，刁难企业，有的简直到了无法无天、不择手段的地步。但记者在听座谈中发现一个奇怪现象，即许多人谈到这类事情时，虽都是愤愤不平，恨得咬牙切齿，但却是只抽象地谈现象，不谈具体事情，更不谈具体部门、具体人。尽管会上市里领导一再追问，是哪个部门、什么人，干了什么事，企业就是不说。据了解，就是会后派专人下去调查，企业仍拒不吐实。这就令人不解了。当时正处在改革高潮，全国上下都在全力支持企业的改革，企业为什么有苦不说呢？后来从一位企业领导的发言中，作者悟出了其中的奥秘：原来这些部门都握有实权，企业既离不了，又躲不开，更惹不起，一旦把事情揭开得罪了他们，今后的日子更难过。原来如此——企业是怕这次“赢”了，以后总“输”。于是作者决定写篇评论，议论议论这种现象。

经过分析，作者感到，这种现象之所以比较普遍存在，原因十分复杂，既有党政风气不正的原因，也不能说没有企业自身的原因，最根本的还在于改革初期政策法规不完善。因此，想要在一篇千儿八百字的评论中把问题说透，是不可能的。于是决定评论的重点放在把问题揭示出来，以期引起全社会尤其是党政领导的重视。标

题就定为《且说“一把赢把把输”》，而冠以“且说”二字，也带有几分无奈之意。

文章以一个实权人物向企业敲竹杠，被顶了回来，并受到所在部门的批评，而企业却因此处处受到这个实权人物的刁难的事例为由头，点出文章的主题——“一把赢把把输”，并展开全文。

文章首先对这类现象的特点作一总的概括：一些与企业有着领导、制约或业务往来关系的党政部门，企业既离不开，又惹不起。因此一些人借职权、工作之便谋私，向企业索取各种好处，企业既不敢不办，又不敢告发，只能逆来顺受，乖乖照办。什么原因呢？文章接着列举了三种主要表现形式（也可以说是部门），说明企业实在是出于无奈。一是掌管钱物分配的部门，在“僧多肉少”的情况下，按照条文规定，拨给你有道理，不给你也有理由，企业一旦得罪了这些人，“合理合法”的小鞋明着给你穿——在没有摆脱计划经济的条件下，这种现象极为普遍，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二是监督检查部门，对企业的有些事情可以说成“是”，也可说成“非”，对问题可以说成“四两”，也可说成“千斤”；若犯在他手下，他可以在执罚单上添个“零”，也可减个“零”。这一是一非、一增一减，对企业非同小可。至于第三种，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你在这件事上没满足他，他以后在别的事情上找你的茬儿，企业防不胜防，为避免“一把赢把把输”，只好逆来顺受，任其敲诈勒索。文章最后在议论这种现象的危害及解决办法时，特意点了句：“这些让人‘一把赢把把输’的人常常打着‘照章办事’的幌子”——言外之意是说，我们的规章制度不健全、不合理，是这种现象得

以存在的关键所在。通观全篇,并没有什么深奥的大道理和空泛的议论,更没有激烈的言辞,只是把这类现象归纳起来,夹叙夹议,略作分析,娓娓道来,披露于报端。

笔者做报纸工作40余年,多半时间从事新闻评论。在经手的评论稿件中,此篇反映比较强烈。新闻(包括评论)不同于文学作品,读者主要不是看其文彩是否华丽、内容是否有趣,而是看是否有新意、有道理。所以,新闻(尤其是评论)只有切准社会的脉搏,才能引起较强的共鸣。正如当年全国好新闻评选委员会在评价作品时指出的,“评论《且说“一把赢把把输”》,运用形象的比喻,揭露不正之风为害之烈,真是一语中的,非常贴切而又通俗易懂”。这篇短文见报后,能引起较强的社会反响,道理可能就在于此。



米博华

河北赵县人,1954年1月生于河北保定。1978年进中国青年报社,当过编辑、记者和评论部副主任、主任。1998年调人民日报社评论部当编辑,后任评论组组长、副主任、主任。高级编辑,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采写过一些新闻报道,但主要是从事社论、评论员文章的写作;业余爱好是写杂文随笔之类的小文章。有些作品获奖,但值得一提的不多,主要是社论《祖国万岁》,获1999年中国新闻奖特别奖;与人合作的香港回归社论和'98抗洪评论,分获1997、1998年度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已出版四本小书:《北京当是不夜城》(1985年)、《跋涉人生》(1992年)、《远眺近观》(1996年)、《寂寞读书人》(2001年)。还写过一些新闻业务方面的专著。

祖国万岁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

在新的一千年就要到来的重要时刻，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50 华诞这一盛大节日。此时此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边疆沿海，到处歌如潮，花如海，普天同庆，举国欢腾。全国各族各界人民为祖国的强大、民族的复兴和光明的前程充满自豪和喜悦。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扬眉吐气，这样受到全世界的关注。

在这个光荣而又神圣的日子里，我们向全国各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以及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致以节日的祝贺！向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公安干警和武警官兵致以节日的祝贺！向在各个历史时期为新中国的振兴作出贡献、建立功勋的劳动群众和英雄模范人物致以崇高的敬意！此刻，我们以无比崇敬的心情缅怀近百年来为了民族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的建设作出贡献的民族英雄和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的名字和功绩将永远铭刻在人民的心里，与日月同辉，与祖国同在。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中国人民前途命

运的一个根本转折,它标志着受压迫受欺侮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终结,标志着中华民族历史新纪元的开始。这是 20 世纪重大的历史事件,对于当代世界的政治格局和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中国的 50 年是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 50 年。从贫穷落后到繁荣昌盛,从山河破碎到强大统一,从受人欺凌到备受尊重,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谱写了中华民族文明史上最为光彩夺目的篇章。5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 20 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为增强;科技、教育、文化事业欣欣向荣;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国防力量日益强大;各民族兄弟团结友爱;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祖国统一大业取得重大进展,继香港之后澳门即将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公认,我们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我们的祖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欢乐祥和、蒸蒸日上;我们的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意气风发,精神振奋,对中国的前程充满信心。面对此情此景,所有关心我们民族命运,为国家前途而奋斗的华夏子孙,无不从内心发出深情欢呼:祖国万岁!

新中国的 50 年巨变,最根本的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振兴中华,彻底改变中国人民的命运,选择最先进的思想理论和社会制度,探索并制定最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方针政策,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将人民群众的智慧 and 力量凝聚起来,在神州大地上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这是一个艰苦豪迈的事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过困惑,有过挫折和失误。但是,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党，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实事求是，坚持真理，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修正错误，克服困难，不断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人民群众从国家巨变和亲身经历中深深地体会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毫无私利、充满生机和活力、始终保持先进性的党，是一个勇于开拓、不断创新、锐意进取的党，是一个不畏艰险、久经锤炼、坚强成熟的党。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像中国共产党那样把中国人民带向富强、幸福和光明的未来。

50年的奋斗历程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能够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端而产生的崭新的社会制度，最根本的特征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最大限度地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 and 力量，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一个没有压迫和剥削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像中国这样一个贫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受尽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欺侮，要想实现民族振兴，只能选择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社会制度。事实证明，这个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历史性选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生和前程，铸就了光荣与辉煌。但是，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事业，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艰巨的认识和实践过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们不断深化对于建设社会主义规律性的认识。特别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在30年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取得了改革开放20年的巨大成功。社会主义在中国50年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只要我们始终不渝地坚持理论

和实际相结合,坚持向实践向群众学习,坚持发展和创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永远充满生机和活力。

50年的伟大实践告诉我们,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是勤劳勇敢、不屈不挠,具有巨大创造力的人民。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决策,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优越,都是通过人民的力量,通过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来实现的。事实证明,中国人民一旦有了正确的领导,掌握了科学的理论,建立了先进的社会制度,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能够万众一心,团结奋斗,产生移山填海的力量。新中国的诞生彻底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人民当家作主,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和巨大的热情投身于国家建设,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辉煌业绩。无论是面对敌对势力的封锁和威胁,还是面对自己国家的困难和灾害,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始终坚贞不渝,顽强拼搏,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巨大的创造力量。新中国的50年,英雄辈出,群星灿烂。他们是国之瑰宝,民之精锐,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他们的精神和业绩有力地证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在这普天同庆的时刻,我们不能忘记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不能忘记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为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新局面所建立的丰功伟绩。今天,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的重要历史时刻。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握发展机遇,驾驭改革和建设大局,取得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实践证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志向远大,坚定成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 (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 (评论卷)

熟,具有卓越的领导能力,一定能够带领亿万人民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党的十五大为我们规划了跨世纪的宏伟蓝图,这就是下世纪第一个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建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使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回顾50年峥嵘岁月,我们豪情满怀;展望新世纪的锦绣前程,我们欢欣鼓舞。让我们更高地举起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开拓进取,艰苦奋斗,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勇前进!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

(《人民日报》1999年10月1日)

采写回眸

心里的歌

——《祖国万岁》写作断想

国庆 50 周年社论分量重,人民日报社领导很重视。虽然社论由我执笔,但许多同志都倾注了心血。题目出自原评论部主任李德民同志的提议,言简意丰,气势磅礴,似乎没有什么题目比这四个字更贴切了。社论的主干,来自国庆报道组的一个创意,即“祖国颂”、“改革开放颂”、“社会主义颂”。所不同的是,社论用历史结论的方式阐述,概括为类似的三条: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人民的艰苦奋斗。社论的修改润色始终都是在原副总编辑谢宏同志指导下完成的。

50 年的历史跨度,数不清的大事,辉煌成就与艰辛探索交织,巨大变化与风雨坎坷同行。倘把这么丰富的历史内容压缩在 2 000 多字的文章里,又比较全面,有一定的难度。正是由于领导和同志们的出谋划策,社论的立意、结构、布局似乎一开始就比较清楚。三大块:祝贺与回顾;主要历史经验和结论;继往开来,展望伟大前程。

写八个自然段，眉目还是清楚的。这是最重要的工作，犹如一张草图，何处起笔，何处转折，何处展开，何处收拢，心里有数。

但从构思到成文还需要有一个创造过程。这可以概括为三句话：感情饱满，内涵丰富，文字精练。

感情饱满，是内在的感动和自豪，而不是强作赞辞。当我进入特定的写作情境时，许多历史镜头奔来眼底：近代中国的耻辱，民族解放的悲壮，新中国诞生的扬眉吐气，十年动乱的困惑迷惘，改革开放的大地重光……我所看到的是一个倔强的民族始终是在泥泞中义无反顾地前行。我不想掩饰内心深处的“大国情结”。500年来，即使是积弱积贫，但就文化和历史而言，中国终究是一个巨大的存在。这些历史思考当然不能写进社论，但它作为背景确有着巨大的思想张力和鲜活的灵感。由成就的赞美而转向“无不从内心发出深情欢呼：祖国万岁！”豪迈中有清醒，喜悦中有沉思，几乎是脱口而出，气到笔到，意到句成。

内涵丰富。结论是对过程的概括，是对现象的内在本质的阐明，所以尽量减少一般叙述，尽量增加思想含量，是执笔这篇社论的一个初衷。所以在讴歌成就时，力图着眼于最大的方面，不粘滞于通常所习惯的缕述：“从贫穷落后到繁荣昌盛，从山河破碎到强大统一，从受人欺凌到备受尊重……”三个排比句，勾画百年。经济发展，政治独立，国际地位，都有了。增加思想含量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尽可能多地包容论点。歌颂党，一定要把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写进去，因为这是党的伟大所在；歌颂社会主义，一定要把我

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写进去,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光明所在;歌颂人民,一定要把在党的领导下,人民建设美好生活的热切愿望和伟大力量写进去,因为这是人民的伟力之所在。总之,努力将结论的内涵准确而全面地展开。

文字精练。因为社论写作筹划较早,所以得以使文章多次“脱水”、“提纯”。急就章容易写长,而写作时间越长就越应该把文章写得更短。不是为短而短,而是经过充分提炼,自然就短下来。文章总比口语短,写文章总比说话难就是这个道理。初稿约3 500字,定稿2 000字多一点。常常有这种情况,第二天看前一天的稿子,发现可以整段整页删掉,因为漂亮的但又是重复的废话太多。“脱水”处理又不是简单的删削,而是在原有基础上继续进行思想的开掘和更准确的概括。如此,文短了,内容却增加了,句子的质量也提高了。用简洁的句子表达复杂的内容,不要用复杂的句子表达尽人皆知的道理,文章就可以短。点到为止应是写文章的最上法门。

文章总是在特定情境下写作,时移事易,很难追忆。我只记得,写这篇社论时诗意甚浓,仿佛是心里唱出的歌。

孙官生

1942年6月生于云南省石屏县。1966年9月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云南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云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云南省报业协会会长。高级编辑、国务院有突出贡献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荣获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称号，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

始终致力于社会科学研究，发表各类社科学术论文、新闻作品200多万字。其中，《打好扶贫攻坚战》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关于加快民族山区市场建设问题的调查》获全国优秀奖，《论艰苦奋斗与新时期新闻工作》、《云南为世界禁毒作出重大贡献》获中国新闻奖二等奖，《论进一步解放思想》等20余篇新闻作品及言论、文章，获省部级一、二等奖。主要著作有《鲁奎山之路》、《哈尼族文化探源》、《姚安知府李贻思想研究》、《谈新时期新闻工作》、《龙头与龙尾》、《陈香梅与陈纳德》、《中国造福人类的壮举》、《天堂乐园》等。主编《云南省解放思想大讨论文集》、《敢为天下先的云南人》，编辑出版云南省文献式书籍及其他书籍10余本，计300多万字。曾入编多种全国性专家名录辞书。

打好扶贫攻坚战

光辉灿烂的 21 世纪正向我们走来。当我们张开双臂准备拥抱她的时候,一个严峻的现实却摆在我们面前:在中华大地上,还有 6 500 万人处于贫困线之下,云南省还有 660 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难道要让这么多各族同胞戴着贫困帽子、甚至饿着肚子奔向 21 世纪吗?问题就是这样尖锐地提出来了。

到 20 世纪末,中国将基本消灭贫困,解决 6 500 万人的温饱问题。这是中国政府向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

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发出总动员令:全党进一步动员起来,全社会进一步动员起来,全体贫困地区的干部群众进一步动员起来,争取扶贫攻坚的胜利!

是的,选择只有一个:打一场扶贫攻坚战,在 21 世纪到来之前,让各族同胞告别贫困,解决温饱,奔向小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首先要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
消灭贫困，共同富裕，是共产党人的使命。
今后五年要打赢一场扶贫攻坚之战

消灭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党的纲领、路线所规定的，是党的根本宗旨和一贯政策，也是人民赋予我们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推翻三座大山，翻身解放，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了脱贫致富，过上文明富足的生活。所以邓小平同志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因此他提出：“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怎样发展生产力，怎样改善人民生活，这个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这是小平同志对全党提出的忠告。党中央把消灭贫困、共同富裕也即扶贫工作，提到了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高度，提到了关系社会安定、民族团结大局的高度来看待。中国尚未脱贫的6 500万人口，分布在广阔的中西部地区，云南省尚未脱贫的660万人口，主要分布在边疆民族地区，这些地区幅员辽阔，潜力巨大，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如果广阔的中西部地区、边疆民族地区群众的生活长期陷于贫困，甚至连最基本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不好，全国、全省的经济就会受到严重制约，由此发生的问题，就容易被国外敌对势力和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所利用，经济问题就会变成政治问题，就会对社会稳定、民族团结、边防巩固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加快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关

系国家长治久安的大问题,是治国安邦的一件大事。

那么,为什么扶贫工作必须打“攻坚战”呢?扶贫攻坚,这是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省委、省政府全面估量了扶贫工作的客观形势和所面临的艰巨任务后做出的战略决策。

让我们回顾一下扶贫工作的历程。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省委、省政府历来重视扶贫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对边疆民族贫困地区给予了大量的扶持帮助,使这一地区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但把扶贫作为一项专门工作提出来,则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三中全会带来了全国的思想大解放,许多区位优势、基础条件好的东部地区和内地发达地区,抓住机遇,发挥优势,经济获得飞速发展。而边疆民族贫困山区却发展缓慢,差距拉大。这个情况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1982年首先在甘肃、宁夏的“三西”地区开展区域性扶贫工作。1984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1986年国务院专门成立了“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至此,全国性的扶贫工作全面展开。1987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贫困地区经济开发工作的通知》。1990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对扶贫工作提出了战略性、根本性的指导意见。1994年年初,国务院制定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力争在20世纪末最后7年内,基本解决全国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攻坚”问题第一次提出来了。在1995年召开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中,把“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作为一条方针提了出来。接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着,在今年的9月,在扶贫工作进入攻坚阶段的关键时刻,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江总书记、李鹏总理发表重要讲话,向全党全国发出了打好扶贫攻坚战的总动员令。

我省的扶贫工作是和全国同步开展的。早在1984年,省政府就制定了扶持贫困地区的有关政策。但扶贫工作的全面展开则是在1986年。这一年,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关于切实加强贫困地区工作,尽快解决温饱问题的决定》,成立了贫困地区工作领导小组,并在“七五”、“八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为创造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面貌的外部环境,从基础设施抓起,科教做到先行,作了重大项目部署和实施。1994年省政府又制定了《云南省七七扶贫攻坚计划》。1995年8月召开的省第六次党代会,把扶贫工作列为了今后的一项重点工作,当年10月,朱镕基副总理到云南专门考察了贫困地区,省委、省政府根据省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和朱副总理指示,制定了一系列加大扶贫攻坚力度的措施。紧接着,年底在文山召开全省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关于打好扶贫攻坚战,确保“九五”基本脱贫的决定》。一场气壮山河的扶贫攻坚大战在云南大地上打响了。1986年以来,全省先后投入资金60亿元,兴建了水利“五小工程”43.7万件,建成不同层次的稳产高产农田326万亩,坡地改梯田247万亩,兴修人畜饮水工程12万件,兴修乡村公路1.76万公里,利用外资扶贫达4002.5万美元,建成一批扶贫开发项目和商品生产基地。10年来,云南贫困地区的面貌发生了可喜变化,各族人民生活不断改善,贫困人口由1200万减少到660

万。

不可否认,云南扶贫十年成效显著,然而扶贫任务还相当繁重,形势相当严峻:

——贫困人口多。目前全省 127 个县(市)中有 73 个国家级贫困县,占全国的 12%,是全国贫困县最多的省份;有 660 万贫困人口,全国 18 片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云南就占 3 片。扶贫 10 年,贫困人口虽然从 1 200 万减少到 660 万,但绝对数仍然不少,如果按前 10 年每年脱贫 54 万的速度,那么 660 万人口脱贫还需 12 年。要将过去 12 年才能做完的工作用 5 年时间完成,就必须打破常规,紧张地动员起来,采取有力的措施,攻坚!

——贫困程度深。我省的许多贫困地区不是一般的贫困,而是绝对意义上的贫困。全省人均纯收入 200 元以下的特困人口有 275 万,这些贫困人口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生活上—贫如洗,吃不饱饭,饮水困难,儿童上不了学,缺医少药,生产、生活方式原始落后。解决这些贫困人口的温饱已经抓了几十年,可是仍没有解决问题,在短短五年时间内要基本解决问题,不攻坚,显然是不行的。

——脱贫难度大。前十年脱贫的人口其生产生活条件相对好一些,脱贫难度相对小一些。余下的大都居住在生产生活条件差,开发难度大的偏僻山区、干热河谷地区、石山区、高寒山区和边疆民族地区。惟有攻坚,才能奏效。

——脱贫任务重。省委、省政府制定了到 2000 年扶贫工作的任务:贫困地区人均纯收入在 500 元以上(1990 年不变价),人均占有粮食 300 公斤以上,全部乡(镇)及

绝大多数行政村(办事处)通公路、通电、通电话,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水喝,适龄儿童能上学,较好地解决温饱问题,一部分农户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时间紧迫,任务艰巨,也惟有攻坚,才能实现既定目标。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我省扶贫工作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差距仍然很大。到2000年基本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全省基本实现小康,任务艰巨,形势严峻。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坚固的堡垒,是一块硬骨头。每一个党员和干部,都要以崇高的使命感,以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满怀信心地投入到扶贫攻坚战中去。

十年探索,十年积累,一大批脱贫的成功经验 对于扶贫攻坚来说,是宝贵的启示。 他们能做到的,其他贫困地区也应当做到

打好扶贫攻坚战,有许多有利条件,珍惜和运用这些有利条件是很重要的。总结和借鉴十年扶贫的成功经验,就是这许多有利条件之一。1986年以来,省委、省政府带领各族人民向贫困开战。广大干部群众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积极探索贫困地区稳定解决温饱,迅速走出困境的经验,抓典型,带一般,推动扶贫工作的开展,取得了显著成效。总结十年扶贫经验,大致有以下几种值得重视:

(1)政府扶贫。福贡县位于怒江峡谷中段,总人口8万多,大部分为傈僳族。境内山崖陡峭,泥石流和各种自

然灾害频繁,生态环境恶劣。被称为不具备生存条件的地方。傈僳族同胞在陡坡地和石崖缝中刀耕火种,生活极为困难,住的是“千只脚万滴水”的茅屋。几年来,县委、县政府从当地自然条件出发,直接组织农民种植适宜当地生长的油桐,兴办油桐基地,举办干部、户主培训班,使千家万户掌握了油桐栽培技术。从海拔1 100米的怒江边到1 600米的河谷两旁,一山山,一岭岭,覆盖着翠绿的油桐树。全县农民人均达到1.15亩油桐,居全省第一。架科底乡木果甫社有20户、110人,过去年年外出讨饭,现在发展200亩油桐,年收入3万多元,人均300元,粮食也增了产,吃饱了肚子,许多农户建起了新房。在经济特别落后,劳动者素质特别差的地方扶贫,政府的组织作用和具体帮助是不可少的。在内地一些贫困地方,只要给个好政策,便能自我发展。但许多特困乡村,光给政策不行,政府还必须给予具体组织帮助,派出大批干部和科技人员一家一户地、手把手地教群众干。

(2)企业扶贫。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鲁奎山是彝族聚居的贫困山区。昆明钢铁公司出资5 000余万元帮助新平县开发鲁奎山铁矿石,矿山逐年用矿石偿还昆钢的投资。铁矿扶持当地农民办起了若干小铁矿、水泥厂,办起了车队及一系列服务设施。贫困山区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粮食吃不完,现金收入超千元,过上了富足的日子。这类例子比较多,除昆钢外,玉溪卷烟厂以及许多糖厂、茶厂都这样做了,效果很好,所扶持的贫困地方,一般三至五年即可改变面貌。关键是要建立一个互惠互利的合作伙伴关系,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运作。一味搞“无偿”援助,企业的扶持难以持久,贫困地区也容易形成依

赖思想。

(3) 挂钩扶贫。交通部从 1990 年起开始对我省的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进行挂钩扶贫。从修公路入手,投资 7 783 万元,先后建成长 50 公里的剑兰路大白甸至金顶段公路、36 公里的片马至岗房公路、长 177 米的碧福怒江大桥,完成长 70 公里的跃进桥至碧福桥公路的改建工程,将 12 座溜索改建为吊桥。在此基础上,又从人才培养、资源开发等方面进行扶持,都取得明显成效。挂钩扶贫是党政机关以实际行动参与扶贫的一种形式。关键是要心诚,有高度的使命感,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真心实意地去做。

(4) 科技扶贫。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基诺乡,聚居着 1 万多基诺族同胞,新中国成立前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刀耕火种,刻木记事,生活十分贫困。他们改变面貌是从办教育、学科技开始的。全乡先后办起 43 所小学、1 所中学,培养了本民族教师 187 名,培养了基诺族大学生 59 名和大批中学生和高小生,1996 年实现了普九。小学入学率达 98.9%,初中入学率达 100%,初中升高中、中专在 40% 以上,并对农民培训实用技术,大大提高了基诺人的素质。在上级农科部门的指导帮助下,走固定耕地提高单产的路子,人均有粮超千斤。他们还依靠科技办起了砂仁、茶叶、橡胶、水果基地,人均有经济作物 3 亩多。1995 年人均纯收入达 870 元,人均有粮 570 公斤。贫困地区之所以贫困,说到底教育科技落后,劳动者素质低,抓教育科技是抓到了扶贫的根本。

(5) 开发扶贫。石屏县牛街乡解放初期是红河北岸惟一的“直过乡”,阶级分化不明显,生产力水平低下,农

民生活极为贫困。每年五六月都要外出讨饭。然而该乡气候适宜种植烤烟,加之土地宽阔,又有丰富的煤矿资源。1990年以来,乡党委从外地请进43户烤烟种植能手指导示范,使全乡90%以上的烟农掌握了烤烟种植管理技术。他们还利用当地资源,办起了一批乡镇企业。1995年,全乡财政收入881万元,实现乡财政收入自给有余,农民人均纯收入700元,人均有粮327公斤。云南是资源大省,开发资源,是脱贫的一个重要方面。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是要树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思想和立志改变贫困面貌的雄心壮志;二是要深入调查研究,吃透县情、乡情;三是要依靠科学技术,提高劳动者素质,开发才能成功;四是所开发的产业、产品要有市场,开发才能持久。

(6)财政扶贫。耿马傣族自治县多年来财政自给率低,1990年财政收入仅为1147万元,财政自给率为52%,当年省财政定额补贴426万元。从1991年起,他们在省财政厅的支持下,提前使用财政补贴款,实施了耿马糖厂技改等5个项目,1995年实现利税9346万元,上交财政4595万元,占县财政收入的63%,财政收入5年间增长5.3倍,财政自给率提高到86.5%。提前使用财政补贴款,把每年定额补助吃饭的钱,提前“预支”,集中起来就是一笔可观的数字,可以用来发展贫困县的优势产业。吃饭钱变成了建设钱,增加了财政收入,发展了经济,也解决了吃饭问题。关键是要选好项目,精心组织,确保成功。

(7)借地扶贫。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的山区气候冷凉,致富门路少,劳力相对过剩,居住在这里的哈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尼族彝族群众生活贫困。河谷坝区气候炎热,土地肥沃,有大片可供开发的荒山,但劳力紧张,制约了资源的开发利用。在县委、县政府的引导下,山区的哈尼族彝族通过搬迁移民、下坝租赁土地、设立劳务市场等,开发荒地 8 万多亩,用于种植甘蔗及芒果等热带水果,使山区 47 000 多人解决了温饱问题。一方面气候条件差,劳力过剩,一方面气候条件好,荒山荒地多,劳力不足,这样一“借”,优势互补,资源得到有效开发,生产力获得了新的增长,山区的脱贫找到了新的门路。做好这一工作的关键在于县、乡的积极引导、协调。

(8) 开放扶贫。曼景兰是西双版纳州景洪县城边的一个傣族村子,全村 191 户,800 多人。过去处于封闭状态中的傣家人不会做生意,只会埋头种粮食,“有饭吃无钱花”。随着西双版纳由封闭末端变为开放前沿,人们大胆闯入日益红火的旅游业中,家家户户打开大门,用自家竹楼办起了风味餐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傣族风味服务一条街,1995 年营业收入达 1 500 万元。全村人均纯收入 3 328 元,人均有粮 800 公斤。开放对于脱贫是十分重要的,封闭是贫困的总根源。问题是,在当今同样开放的条件下,有的贫困地区改变了面貌,有的变化不大,说明有一个如何利用开放的条件和机遇的问题。但无论怎样,前提是必须开放。有了一个开放的环境,就等于从宏观上、战略上进行了扶贫。

(9) “下海”扶贫。1986 年,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技术员徐爱民来到临沧县拉祜族聚居的富邦乡承包茶园,推广茶叶速生密植技术,提高茶叶的产量和品质。先后新开辟和改造茶园 820 亩,办起了茶叶初制所。从 1989

年投产到 1991 年 3 年时间,累计产茶 7.097 万公斤,收入 45.52 万元,上交税金 8.23 万元。茶场每年帮助村公所修建学校、水利和架设电线支出 2.2 万元。边远贫穷的拉祜族山乡迈开了脱贫的步子。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干部“下海”,到贫困地方去传授科技知识和管理经验,是经济与科技结合,实现两个转变的有效形式之一。这是值得倡导的。关键在于机关要有一个宽松的政策,鼓励干部“下海”,“下海”后又要处理好“领办”、“承包”、“租赁”中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10)合作扶贫。思茅是一个多民族的边远贫困地区,十余年来,思茅地区与上海“联姻”,引进上海的技术,开发 746 个项目,加快了思茅地区的脱贫步伐。景谷、景东、镇沅等县(市)的木材加工厂,由于技术落后,产品单一,没有市场。困境中的几家企业先后与上海木工研究所等单位挂上了钩,引进技术、人才,很快从单一生产胶合板发展到能生产复合地板、装饰条板等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三个厂的税利均超过千万元,成为县的财政支柱。与东部发达地区进行经济技术合作,使生产要素按市场需要重新组合,是加快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做好这个工作,需要政府牵线搭桥,需要企业积极主动,尤其要处理好利益分配关系,使合作双方都有利。

回顾我省十年扶贫的经历,我们确实探索和积累了一些具体的成功的经验,借鉴和推广这些经验,无疑可以使一些贫困地区打开思路,增加脱贫的办法。也说明贫困地区潜力很大,只要认真去抓,别人能做到的,自己也可以做到。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1978-2011)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攻坚尤需大手笔。要着眼于全省 660 万人的稳定脱贫，从战略上、宏观上采取若干带全局性的重大举措

到 20 世纪末要基本解决全省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任务艰巨，时间紧迫，很显然，满足于一般的扶贫办法不行了，只有常规的扶贫措施不行了。必须更新扶贫思路，以大气魄、大手笔来组织攻坚战，采取若干带全局性的重大举措，从战略上、宏观上创造一个脱贫的大环境、大条件。有了这样的大环境、大条件，再加上扶贫到户等具体的措施、扎实的工作，就能取得更大的效果，也才能实现稳定脱贫。

首先，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让贫困地区来一场思想观念的大变革。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攻坚首先从观念变革开始。贫困地区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文化落后，加上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思想观念保守，思维方式陈旧。主要表现在：满足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小生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满足于低水平、低标准的平均主义；不敢、不愿“为天下先”，缺乏积极竞争向上的活力；看山难，看水愁，对改变贫困面貌心中无数，信心不足；等靠要，缺乏市场观念和引资意识，一味依赖上级给项目，给资金；“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观念在一些地方仍然在困扰着人们，阻碍了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以戴贫困帽为荣，满足于小打小闹小进步，即使经济发展了，也要想方设法保住贫困帽。这些思想观念和表现，在前一段的解

放思想大讨论中已有所触动,有的地方解决得比较好,但仍有不少地方没有很好解决。我们要按照省委的要求和部署,进一步深入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总结经验,开阔视野,转变观念,坚持“自力更生,生产自救,各方扶持,共同富裕”和开发式扶贫的方针。与此同时,要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组织大批民族干部到先进发达地区参观、考察、学习,并将这些地区的人才请到贫困地区传授知识、技术和管理经验。要大力发展教育、文化、科技事业,使大量现代先进的信息及时进入贫困地区,巩固发展边远山区的一师一校体制,让每个自然村都有一所学校,狠抓师资培养,完成好普六普九的任务。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技术培训,培养大批中初级技术人才和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建立健全乡村文化站(室),使之成为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组织开展健康文化娱乐活动、普及电视及广播的宣传文化中心。

其次,重视扶贫攻坚战的宏观运筹,采取带全局性的重大举措。我们要重视一家一户的扶贫,也要重视为贫困地区大面积、区域性脱贫创造条件,没有一些根本性的大举措,一家一户的脱贫也难以实现,经过特殊帮助实现了,也很容易重返贫困。从我省的实际和近年的实践看,要举全省之力,实施以下几大工程。(1)通路工程。要花大气力改善全省的交通,由昆明辐射,直通周边国家和周边省的公路干线要高等级化,长藤结瓜,使高等级公路与各地县的公路连成网,并再延伸使每一个村都通公路,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公路交通网络。同时,建成南昆、内昆、昆大铁路,建成和开通迪庆、怒江等机场,使贫困地区与国内和国际大市场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2)通讯工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程。抓紧建设高水平的通讯网络,程控电话要通到每一个村公所(办事处)。(3)治水工程。大力建设中小型水利工程,基本解决几个贫困面大的地区的坝区缺水问题,搞好山区“五小”水利建设,实现人均有半亩水田或水浇地,基本解决人畜饮水困难。(4)办电工程。充分利用贫困地区的水能资源,因地制宜建设有调节能力的中小型电站。(5)改土工程。统一规划,多渠道筹集资金,分期分批建设保水保土保肥的“三保”田地,实现人均一亩基本农田地。(6)绿色工程。陡坡地坚决退耕还林,因地制宜规划发展用材林、防护林、经济林,办好绿色基地,以公司加农户的形式发展商品生产。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7)合作工程。省地(州)牵线搭桥,组织和开展贫困地区与上海等东部地区和内地发达地区的经济合作,引进资金、技术、人才、管理,兴办有资源优势和市场优势的企业,改造、嫁接、提高老企业和乡镇企业。(8)交流工程。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交流干部,主要由省、地(州)有计划地加以组织,派干部到中央机关及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挂职学习,组织民族贫困山区的干部和有威望的上层人士到昆明乃至北京、上海参观考察,开眼界,换脑筋。同时派遣省、地(州)机关干部、技术人员、教师到民族贫困山区挂职、承包、任教。年年都搞,每次的数量和规模可以大一些。以上工程,不是一家一户、一村一寨可以办到的,必须由省、地(州)从宏观上加以策划、组织和引导。搞好了,它能够带来一大片地区稳定脱贫的巨大效应。

再次,充分运用政策的威力,调动贫困地区内在的积极性。要善于运用中央的扶贫政策。党中央、国务院采

取了一系列扶贫政策措施,主要是:采取转移支付办法,加大对中西部贫困地区的投入,国家重要建设项目向贫困地区倾斜;中央财政每年新增部分资金,重点用于贫困面大的省、自治区,集中力量帮助贫困地区修建乡村公路、基本农田、人畜饮水设施和进行农民技术培训;每年增加部分扶贫贷款,国有商业银行每年有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扶贫开发;解决扶贫资金到位迟、贷款使用期限短的问题,每年年初,必须将扶贫资金分配到位;发达地区要对口支援贫困地区等。中央的扶贫政策是打好扶贫攻坚战的重要条件,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谁能抓住这一机遇,谁就有了很大的主动权。中央的政策是面对全国所有贫困地区的,有限的项目、资金究竟给谁?这就有一个争取的问题。必须吃透贫困地区的情况,拿出经过论证的项目,建立“项目库”,这是争取中央列项、给资金,争取商业银行给贷款的先决条件。要吸取过去一些地方的教训,只是一般性地叫喊要上级扶持,却对自己的情况心中无数,更无经过论证的项目计划,结果眼睁睁看着有准备、有项目的地方把扶持资金和项目“抢”走了。要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制定的扶贫攻坚的政策措施:(1)扩大开放,简化招商引资手续,提高办事效率,实行一条龙办公,一个图章管到底。下放招商引资审批权限,对招商引资者给予奖励。(2)扶贫专项贷款、发展资金、以工代赈资金及其他扶贫资金,由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统一协调平衡,确定使用方向,资金来源及支出渠道不变。金融系统要增加贫困地区的信贷,增量要高于上年水平。(3)从1996年开始,省政府每年从省级财政预算中安排3亿元,作为扶贫专项资金。(4)建立贫困地区电力资金,按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售出电量每千瓦时增收 0.01 元的电力建设资金,专项用于扶持贫困地区电力建设。(5)从贫困县征收的矿产资源补偿费,实行省地矿部门与县对半分成。(6)对生存条件恶劣,经济基础薄弱,贫困程度深的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予以重点扶持帮助。(7)对 506 个特困乡每年每乡省级补助 50 万元;地州市县以不少于 1:0.5 的比例配套相应资金,集中用于农田基本建设的补助。(8)积极争取国际社会对贫困地区的资金支持,用好国内外各类赞助、捐款。(9)鼓励科技人员到贫困乡承包、领办乡镇企业,对在贫困地区工作的科技人员,在工作和生活条件上予以照顾,职称评定以实绩为主。(10)贫困地区普及六年制义务教育,发展初、高中和职业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办好寄宿制、半寄宿制小学。(11)加大对贫困地区的财政返还。从贫困县征收的资源税、人均纯收入在 300 元以下的贫困户的农业税给予照顾返还;从贫困县征收的增值税,属地方部分的,实行先征后返。(12)对交通不便和口粮不能自给的贫困乡、村、户,制定粮食定价定销政策;增加扶贫物资,实行价格补贴,同时调整救济粮差价补贴。(13)实施异地开发。我省生态条件恶劣的贫困人口约 50 万,居住的地方山高坡陡,气候寒冷,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失调,失去发展生产的基本要素,就地脱贫基本不具备条件。另一方面,我省六大水系的许多干、支流河谷,特别是滇西南的一些地方,还有一些荒芜宜垦的农耕土地。这些地方土壤肥沃,光热条件好,但人口稀少。从特困地区转移一部分劳力去开发这部分土地资源,既给特困地区找到一条脱贫致富门路,又开发了沉睡资源,是云南经济发展的又一新的增长点。省委、省政

府决定将一部分特困人口分期分批转移到这些地区开发宜农荒山荒地,较快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并相应改善原住地贫困人口就地脱贫的条件。上述政策措施,如果把它用好,用足,对于打好扶贫攻坚战,无疑是强大的动力和锐利的武器。我们一定要结合本地州市县的情况,搞好配套落实工作,使它们发挥最大的效益。

全党动手,全社会动员,
一村一村地帮,一户一户地帮,
下定决心,如期实现扶贫攻坚战目标

扶贫攻坚确实难度不小,但是,经过努力又是可以办到的。当前是多年来做好扶贫工作的最有利的时期,关键在于各级领导是不是下了最大的决心,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加大了工作力度。

扶贫攻坚战,领导是关键。各级党委、政府要进一步加强扶贫攻坚战的领导。要把这一工作真正摆到重要议事日程,贫困地区的党委、政府,更要把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各级党政一把手要亲自组织指挥本地区的扶贫攻坚战,要切实转变作风,亲自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抓好典型,帮助解决各种困难和问题,千万不能“穷在深山无人问”。要制定考核办法,严格对各级领导干部责任制进行考核,要把扶贫攻坚进度和解决群众温饱的成效作为考核贫困面大的地州、贫困县和特困乡(镇)主要领导干部政绩和提拔使用的重要标准。

动员全社会参与,把扶贫攻坚的任务落实到一家一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户。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解决温饱，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一是各级党政机关要选派大批得力干部和科技人员，到贫困地区继续搞好驻村帮社，一个村一个村地帮，一户一户地帮，办实事，做好事，把扶贫攻坚的任务和措施落实到贫困村和贫困户。二是各级机关、部队、武警、企事业单位要继续发挥自己的职能作用和优势，挂钩扶贫，不脱贫不脱钩。三是动员社会各个团体，开展多形式扶贫，大力开展“温饱工程”、“希望工程”、“科技扶贫”、“智力支边”等活动。四是鼓励国有大中型企业包括乡镇企业，到贫困地区去兴建原料基地、“第一车间”和加工企业。

加强贫困地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依靠干部群众打好扶贫攻坚战。事实证明，要把贫困地区的广大群众动员组织起来，有效地改变贫困面貌，最重要的是要搞好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形成一个个带领群众打好扶贫攻坚战的坚强有力的指挥部和战斗堡垒。地县乡是扶贫攻坚的基本指挥单位，要配备好领导班子，尤其是要选配好党政一把手。要结合“村建”，加强农村的基层组织建设，特别要选配好以党支部书记为核心的领导班子，使基层党组织真正成为群众脱贫致富的火车头。

气势恢宏的扶贫攻坚战已经打响。到20世纪末，中国将有6 500万人、云南将有660万人解决温饱问题，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民的生存权这个最大的人权问题，从此解决了，云南各族人民世代梦寐以求的最基本的生活目标，从此实现了。这不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一件大事，而且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一个壮举。让我们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夺取扶贫攻坚战的全胜，把一个更加开放和文明富裕的中国，一

个更加开放和文明富裕的云南带入 21 世纪。

(《云南日报》1996 年 11 月 26 日)

采写回眸

关于《打好扶贫攻坚战》

《打好扶贫攻坚战》一文发表在《云南日报》头版头条,署名“《云南日报》编辑部”。“编辑部文章”是党委机关报最高规格的言论、理论文章,代表编辑部的观点,一般情况下不轻易使用此种署名形式。

1995 年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布,到 20 世纪末,中国将基本消灭贫困,解决 6 500 万人口的温饱问题。这时云南省贫困人口总数还高达 660 万,占全国的 1/10 多,是全国贫困人口比例最多的地区。云南从 1986 年起扶贫 10 年,贫困人口从 1 200 万减少到 660 万,成效不可谓不大,但这部分贫困人口大都居住在生产生活条件差、开发难度大的偏僻山区和边疆民族地区,惟有打一场扶贫攻坚战,才能攻克坚固的“堡垒”,啃下最后的“硬骨头”,不拖全国后腿。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然而此时在云南的不少干部群众中,思想观念保守,思维方式陈旧,畏难情绪突出,等靠要思想严重,对如期脱贫缺乏信心。此时,我担任《云南日报》总编辑,经过调查分析认为,省委机关报有责任引导干部群众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增强信心,探索扶贫新路子,打好扶贫攻坚战。这一年,中共云南省委召开第六次党代会,提出,为了实现到20世纪末摆脱贫困、实现小康的历史任务,会后5年最根本的是要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解决660万人的温饱问题。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在贯彻省第六次党代会的这一重大决策中,我向省委书记建议在《云南日报》上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省委肯定了这一建议,我精心策划和组织了这场宣传战役,并亲自撰写了《论进一步解放思想》、《敢为天下先》、《打好扶贫攻坚战》三篇编辑部文章,《云南日报》先后发表400余篇文章,形成了全省上下共同参与的群众性思想解放运动。中央领导李鹏、吴邦国等到云南视察时,称赞云南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很及时,很有必要,搞得好。这场在省委直接领导下、以《云南日报》为主阵地开展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有力地推动了全省经济的发展,使云南省的主要经济指标在全国的排位上升1至4位,每年脱贫人口100万左右,如期实现了脱贫目标。

《打好扶贫攻坚战》是这场解放思想大讨论的带头文章和重头戏。为了写好这篇文章,作者认真学习了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省委、省政府有关开发扶贫的指示、文件、政策,参阅了联合国对扶贫的要求和其他国家的经验,深入到西双版纳的基诺乡、怒江峡谷的福贡、石屏牛街乡、新平鲁奎山、思茅牛洛河、昭通高寒山区等数十个

县乡村及企业进行调查采访,了解这些地区的脱贫经验,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在此基础上形成本文的切入点、思路和构架。

切入点:攻坚,不是一般扶贫;一定要解决问题,不是口头说了就算,要向全世界兑现承诺;要有扶贫新思路,新办法,新措施。

思路:不用社论、评论员文章通常采用的灌输式、教育式和你应当怎么怎么样、必须怎么怎么样、否则你就怎么怎么样的教训式写法,而是宏观处着眼,微观处着手;气势要大,但要实在,不讲空话,不讲大话,不摆花架子;既讲透道理,又提供新思路、新方法、新榜样;既提出要求,又提供中央和省的政策、规定、措施,让基层、群众拿起政策武器攻坚。除了上述与一般文章不同之处外,本文还提炼出具有创新意义的扶贫新思路。

构架:按照上述思路,文章由几个部分组成:一是提出问题,这是统领全篇的“由头”,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必须有个缘由,不是无病呻吟之作,这个由头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有重大意义,是重大主题。这就在一开始使文章站得很高,具有高屋建瓴之势。二是分析云南实际,如实展示贫困现状和难度,得出要实现扶贫目标和任务,必须攻坚的结论,紧扣主题,回应标题,并使文章文采生动,充满悬念。三是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打好扶贫攻坚战的关键问题——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增强信心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攻坚战就成功了一半。四是总结扶贫的成功经验,展示一系列成功典型,提出:别人能做到,我们当然也可以做到。这部分意在继续鼓舞斗志,增强信心。五是教给政策和方法,让广大干部群众熟悉并运用各级

的扶贫政策向贫困开战,这是借助全党全社会力量打攻坚战,而不是一家一户孤军作战。六是对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领导干部讲的,要以新思路指挥攻坚战,不仅要扶贫到户,更要重视解决创造脱贫的大环境大条件问题,这样能成片脱贫,否则一家一户一时脱贫了,经不住风吹雨打,很容易返贫。从第三到第六部分,紧扣主题,层层推进,没有游离于主题之外的空泛议论。

文章发表后,在党政机关、地县乡及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省委书记打电话给我,给予肯定和赞扬,社会有关人士纷纷来信来电称,这篇文章主题鲜明,气势磅礴,思路新,方法对,令人鼓舞。省有关部门和不少地州县党委政府组织干部群众学习讨论。省委、省政府在制定政策和指导工作时,吸收了文章的观点。省委领导亲自为该文写推荐意见申报“五个一工程奖”。



孙德宏

1962年8月生于辽宁省盖县,1985年毕业于东北师大中文系,曾为《中国建设报》记者,现为《工人日报》副总编辑。

著有《困境中的思索》、《中观新闻论》、《中国房地产狂潮》(合)、《底线理想》等书。曾有评论、通讯等多种新闻作品获中国新闻奖。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 (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 (评论卷)

房地产一级市场亟待整治

目前,对“房地产热”的看法众说不一。有的说“过热”了,有的说“没过热”。情况究竟如何?

作为第三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的房地产业,是改革开放以来复苏、近年“热”起来的。专业部门认为,目前我国房地产业总产值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而发达国家占20%~30%,香港比例更高,因此从全局和长远看还不能说“过热”,要具体分析。主要问题是发展不协调,有的环节“过热”,有的环节该热还没热起来。

近来,记者在一些部门采访时了解到:目前我国房地产的一级市场,即土地的出让部分已经出现“过热”的问题。建设部房地产业司负责人指出:有关方面对此应予重视。

据最新统计资料分析,一级市场有些“过热”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批地热”、“圈地热”、“开发区热”。最为明显的表现是“晒地皮”,即许多土地批出后圈而不建,造成了土地资源的闲置浪费。1992年前8个月,全国已批租土地2000幅,幅数是此前4年总和的2倍,面积是此前4年总和的3倍;到去年10月底,全国开发区

已有1 951个,是此前4年的15倍。国家规定,各类开发区要经过国务院或省、直辖市、自治区审批,但这些开发区中只有213个是国务院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批准的,其余的即1 738个开发区是地、市、县自行审批的。目前,我国开发区占地达1.5万平方公里,而事实上真正开发建设的却只有307平方公里,仅占总面积的2%。不少开发区圈占大量粮田、菜田却闲置不用,实在是极大的浪费!

专家分析,1平方公里土地由“生”变“熟”即搞好基础设施,平均需要1.5亿元,而全部建成则约需15亿元。这样,如1.5万平方公里全部建成则需约20余万亿元!可以想像,即便加上可能吸收的大量外资,也难以完成。

伴随盲目批地还有这样一些问题:土地供给计划性不强;土地出让缺乏市场机制,难以做到公平、公正、公开;批地与项目脱节使得规划受到严重干扰;出让价格随意性较大;对外商投资房地产管理不力,使一些投机商有机可乘;由于对市场缺乏科学预测,销售前景亦有隐患……

有关人士分析,造成房地产一级市场有些“过热”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一些地方发展心切,盲目追求以地生财,甚至追求表面的对外开放姿态;二是管理体制不顺,本来密不可分的房地产事实上分开了,我只管批地,能不能落实建设是别人的事。从而造成出让与开发建设脱节。

在一级市场过热的同时,“油水”不大却能为政府分忧的住宅建设和微利商品房的开发并未热起来;有些发展房地产业条件很好的地区也没有热起来。

对于以上这些情况,建设部房地产业司副司长谢家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欲使方兴未艾的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第一,必须加强政府对房地产业,尤其是对土地管理的宏观调控机制,切实垄断土地供给,制定能够调控市场供求的土地供应计划,以保证土地供需总量的基本平衡。必须加强开发区的审批和土地出让管理,并严格以城镇总体规划来指导土地开发工作。第二,尽快建立和完善房地产市场体系,形成竞争、公平、公正的市场机制。尤其是土地出让,要尽量通过拍卖、招标等方式进行,减少协议出让,以控制低价进、高价出等土地炒卖活动。第三,尽快完成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主要是加强规划管理、法制管理,减少对开发经营的直接干预,并放手把许多能由中介部门做的事由中介部门承担。最为重要的是,加强房地产经济立法工作,尽快制定《房地产法》等法规。

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当前所谓的“房地产热”中,最需要热的部分——适合于城镇居民购买力和居住的中低档住宅等的开发建设并未真正热起来,更谈不上“过热”。现在,摆在中国房地产业面前最关键的问题是,把住宅和其他房屋的建设“热”起来,而不是做大量土地出让等表面文章。

(《中国建设报》1993年1月21日)

采写回眸

“当下新闻”需要“分析”

——《房地产一级市场亟待整治》一文追忆

一方面,我们的很多报道习惯于“表扬”,习惯于“宣传”,结果,“表扬”与“宣传”的效果是受众比较少,也不那么易于接受;另一方面,我们的一些报道又努力追求“批评”,其中个案的批评又比较多——对今天的新闻而言,这些都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但是,我们需要提出的问题是,“表扬”与“批评”当然都是新闻的功能,这当然是不该有任何疑问的,但问题在于,“表扬”与“批评”确实也不能说是新闻功能的全部。

这就谈到了同样是有明显的主观意图,但表现方式却比较客观的一种报道——“新闻分析”,或者是“分析类的评论”。

新闻分析是比评论、述评更客观一些的一种新闻体裁。我以为,新闻报道在技术上需要更多地减弱“教育式”,更多地加强“客观式”的当下,新闻分析实在是十分重要的。新闻分析依据新闻事实,综合选择事实,客观分

析事实,讨论进而指出事物发展的某种趋势——这显然是符合我们当今时代受众的需求的,这种报道形式无疑是有大价值的——因此,“当下新闻”是十分需加大分析力度的。

正是基于上述这样一些认识,笔者在《中国建设报》做负责房地产报道的记者时,采写了近百篇大体可算为新闻分析之类的报道。后来获第四届(1993年度)中国新闻奖(评论类)二等奖的《房地产一级市场亟待整治》一文就是其中的一篇。

《房地产一级市场亟待整治》一文的采写背景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房地产热潮开始在全国大面积兴起,而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发表后,中国房地产市场更是掀起前所未有的高潮,市场统计数字大多是成倍,甚至是十几倍地增长。当时社会的普遍舆论是,作为发展经济、筹集资金的最有效手段的房地产业必须大大地发展。于是政府部门、工农兵学商等几乎全部都进入了房地产市场。在此稿发表之前,整个社会舆论几乎是一致的,几乎没有任何正式的声音来谈房地产市场的危险。作为长期以来始终密切关注房地产业和房地产市场状况的记者,笔者在采访中陆续发现,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尤其是房地产的一级市场——土地市场的问题正愈来愈大显现出来,而且其危险虽然很大,人们却对此大多视而不见,或是见到了也很少有人引起重视。因此,社会方方面面的投资仍“一浪高过一浪”地大量涌向房地产市场——显然,对诸多地方政府而言,对大量的开发商而言,一个已无可能获得成功的投资,增加愈多,危险愈大,其结果必然是这种已经失去理智的做法将受到市场规律的

惩罚。

就是在这样的人背景之下,笔者在《中国建设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房地产一级市场亟待整治》这篇文章。

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很多方面的关注。大约4个月后,中央正式做出了“宏观调控”的决定,其中报道中所提到的问题在“决定”中几乎都有所涉及——当然不能认为宏观调控的决定来自于这篇报道,但这篇报道在当时对引起全社会对房地产市场状况得出清醒、正确认识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事实证明,当时的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有相当部分至今虽已时过八九年了,但仍在“消化”中。

这篇报道发表后,先后被评为产业报好新闻一等奖、全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好新闻一等奖,中国新闻奖(评论类)二等奖,多次入选一些新闻作品集中。

关于这篇作品的采写体会,我想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一个优秀的记者应该对其所报道的领域中那些错综复杂的新闻事实,要有一个清醒而冷静的认识,要善于在那些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找到带有规律性、方向性的问题,而且要努力站住脚跟,不能人云亦云。只有这样,才可能使报道符合客观事实,具有真知灼见,才可能使报道保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第二,一个优秀的记者必须对其所报道的领域,乃至与此相关的更大的宏观面的情况有较为深刻的把握和理解,甚至要有相当程度的研究。只有这样,才可能使报道更真实、更专业、更深刻,才可能从人云亦云中跳出来。

第三,一篇优秀的报道必须坚持客观的原则,让事实说话,其主观评论必须严格地建立在坚实的客观分析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才能使报道更符合新闻自身品质的要求,使受众愿意接受、能够接受,进而有效实现传播的目的。

第四,还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我们一直在强调“新闻分析”的“当下重要性”在于,我们今天的社会正处在计划向市场转变,进而逐步进入到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之中,这意味着我们今天的很多事情、事件已是愈来愈复杂,已远不是以往的“非黑即白”式的状况了。新闻主体的复杂化,要求报道本身必须适应这种变化,受众要求在众多复杂的信息面前能有一些经过“二次加工”有更直接参考价值的报道,即把相关事实经过选择、综合、分析,尤其是邀请相关权威人士进行分析,提供参考意见,进而为受众服务——这一点,对新闻分析这种新闻体裁提供了一种十分巨大的客观需求,也提供了用武之地。

当然,“分析”不可避免带有主观色彩,甚至直接就变成评论了——评论当然是新闻诸体裁中十分重要的,但与新闻分析的功能还是不大相同的。这一点在采写新闻分析时是要注意的。

李长虹

1961年12月生于河南息县。1978年高中毕业,考入郑州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

中学时就向往记者职业,其实对记者不甚了了。大学毕业一年后梦想成真,先在河南日报社当了十几年记者,现就职《人民日报》评论部。1997年在河南日报社被评为主任编辑,2001年在人民日报社破格晋升为高级编辑。

现在的主要工作是起草《人民日报》评论,仍然是“新手”。这并非谦词,许多前辈大家是我学习的榜样,领导和同志们也给我很多帮助,距离党中央机关报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努力余地。

要学的很多,要做的也很多,我充满信心。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 (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 (评论卷)

谱写奥运史上最壮丽的篇章

中国人的“奥运之梦”实现了!

一个不眠之夜,一个 13 亿人的不眠之夜! 中华儿女企盼的眼睛注视着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昨晚,国际奥委会第 112 次全体会议投票表决,北京获得了 2008 年第二十九届奥运会主办权。

这个时刻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中国人民由衷地喜悦,尽情地欢呼。我们感谢国际奥委会的信任,感谢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的鼎力相助,感谢国际社会的支持。中国人民将不负众望,全力以赴,成功办好 2008 年奥运会。

举办奥运会是 13 亿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1990 年 7 月,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北京亚运村时提出:“中国要申办奥运会。”从 1993 年首次申办到今天申办成功,中国人民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执着追求和满腔热情没有减弱。“申奥”一直是举国上下普遍关心的话题,为“申奥”贡献力量是全国人民共同的行动。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安居乐业,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为北京成功举办 2008 年奥运会打下坚实的基础。今天的北京,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环境保护长足进

步,体育设施日臻完善。古老而现代的北京欣欣向荣,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有条件把一届最美好的奥运会奉献给世界。

奥运选择北京,世界看好中国。正如国际奥委会在评估报告中评价:2008年北京奥运会,“将给中国和世界体育留下独一无二的宝贵遗产”。在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举办奥运会,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将更大规模地普及,奥林匹克精神会更广泛地弘扬。中国是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北京是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古都,举办奥运会将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交往,促进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国家,是世界最具潜力的市场之一。在北京举办奥运会,将给世界各国的企业带来商机,促进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中国的竞技体育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申奥成功,将推动中国为世界奥林匹克运动做出更大贡献。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中国的机会,也是世界的机会。

举办2008年奥运会是我国在新世纪的一次重要机遇,将极大地激发全国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促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快速发展。从申办到举办的七年间,是我国完成“十五”计划,实施第三步发展战略,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时期。申奥成功,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利于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有利于中国更快地走向世界。对北京人民和全国人民来说,当前就是要以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为指导,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全力以赴做好2008年奥运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带动

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

申奥成功,深得民意。办好奥运会,不仅是北京市民的一件大事,也是全中国人民的一件大事。申奥成功,我们已经付出很多辛劳和汗水;承办,还需要做更多扎扎实实的工作。比照举办奥运会的要求,我们还有许多差距,但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博采众长,弥补不足。我们将信守承诺,认真细致地做好各项筹备工作,建设一流场馆,营造一流环境,提供一流服务;我们要在全社会继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要在北京市民中深入开展文明礼貌教育,树立良好道德风尚,强化法制意识,提高市民综合素质,展现时代精神风貌,在国际社会面前展示“新北京、新奥运”的魅力。

2008年的北京,天空会更蓝,城市会更美,五环的旗帜会更鲜艳。中国人民意气风发,信心百倍,将奋力谱写奥运史上最壮丽的篇章。

(《人民日报》2001年7月14日)

采写回眸

长虹的名字很吉利

——《人民日报》申奥言论的写作经过

我在《人民日报》评论部还是新手，忝列本书诸位大家之中，有些惶恐。再一想，红花虽好，还要绿叶陪衬。这种陪衬是我的荣耀，自然就有了勇气。我起草的这篇社论论述的是一个大事件，这里介绍一下写作经过。

7月13日晚22时08分，我独自在宿舍看莫斯科现场直播，一位黑人执行委员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表格签字时，嘴角流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我的心马上提了起来，预感到中国胜利在望。当他封好信封，站起身来，走向萨马兰奇时，我知道北京真的成功了，泪水夺眶而出。这泪水包含着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对中国走向世界、世界看好中国的自豪，自然也有我在起草两篇评论时所尝到的甘苦。

1993年，我在《河南日报》当记者。在郑州观看蒙特利尔现场投票表决2000年奥运会主办城市直播时，曾闪过一个念头：采访2000年北京奥运会。投票结果似一盆

冰水浇到头上,这个念头也随之无影无踪了。然而,不知是冥冥之中有什么规律,还是我心中的企盼以另外一种方式实现了。2001年,当国际奥委会投票表决2008年奥运会举办城市时,我作为《人民日报》记者参与了北京申办结果的言论写作,感受到了申办成功的喜悦。

2001年7月7日上午,我接到通知,到报社编辑楼七楼第二会议室开申办奥运会报道会。在会上,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李仁臣讲了关于申奥报道的情况和要求。我的任务是写两篇评论,成功了,发一篇社论;不成功,发一篇评论员文章。两篇都要准备。这次,许多家新闻单位都准备了两套方案。李仁臣同志要求社论要写出气势,写出高度,写出激情,写出境界,10日交稿。这次写作任务我很高兴,就像刚当记者,第一次外出采访一样。

7月7日下午,我赶到北京新侨饭店奥申委办公处,北京奥申委新闻处处长马春玲小姐给我提供了大量资料。7月8日下午,与《人民日报》北京记者站站长阎晓明、体育记者薛原,以及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主持人宁辛等人,在北京市政府共同采访刘淇市长,直接感受到了奥申委主席的信心和热情。10日上午,我将稿子交给了李仁臣同志。11日上午,他在参加申奥报道的记者会上说:我们此次报道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社论,在我这儿已经通过了。在当天下午的报社编委扩大会上,李仁臣同志在介绍申奥报道时,赞扬社论写得有激情,还说“长虹的名字很吉利,希望这次莫斯科长虹满天,给北京带来好运”。

正如我们预料和企盼的那样,北京成功了,中国人的奥运之梦实现了!当天晚上,在编辑部夜班室,领导和上

夜班的同志都称赞社论写的有气势。中央电视台、一些省电视台等都摘要播发了社论,中央各大报、各省报以及一些地市报纸都转发了本报社论。在中宣部通气会上,有关领导同志也表扬了这篇社论。今年庆祝申办成功一周年时,北京市领导和北京新闻界同行还称赞这篇社论。认为社论体现了与《人民日报》相称的水平。

这篇社论的成功并非我的水平多么高,而是机会难得。这样一件大事喜事,牵动着每个中国人的心,这个机会给谁写都会尽力的,可能比我写的更好。

起草《人民日报》的社论、评论员文章,首先应当弄清楚的是写什么,其次才是怎么写;先写什么,后写什么,都应体现出对大局的把握,对形势的认识。这是我从事《人民日报》评论写作后的突出感受。站在《人民日报》的位置,必须从更高、更远、更广的角度来看待申办奥运会。2001年是我国新世纪的开局之年,前一年,我国“十五”规划纲要出台;当年,是建党八十周年,江泽民总书记做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七一”讲话,中国即将加入世贸。所以,在起草这篇社论时,不能就事论事,而是把重点放在当今世界潮流、当代中国发展的大背景下,力求从全局的高度来看待中国申奥成功的意义,从中国和北京的悠久历史说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就,从申奥的历程说到国内外形势的发展等。社论阐述了北京申奥成功的必然性,办好奥运的可行性,指出这是中国的机会也是世界的机会,是北京的大事也是全国的大事;表现了中国人民对举办奥运的企盼和喜悦之情,谱写奥运史上最壮丽篇章的信心,以奥运扩大开放促进发展的决心。

另外一篇备用的评论员文章,还要从1993年北京申

办2000年第27届奥运会说起。当时《人民日报》也准备了两篇评论，是当年的《人民日报》评论部副主任、现任人民日报社编委、海外版常务副总编辑李德民同志执笔的。申办成功，发表社论《北京感谢世界》，不成功，发表评论员文章《坚定不移地走向世界》；结果，悉尼申办成功，北京落选。许多媒体没有充分准备。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坚定不移地走向世界》，向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坚持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决心，起到了统一群众思想、激发人民信心的作用。中央电视台一遍又一遍地播放，各地报刊转载。虽然这篇文章影响很大，但德民老师一直遗憾他写的申办成功的社论未能发表。这次我起草申奥社论时，他说我的运气好，果然如此。一家报纸采访他时，他说：“老李写了一篇失败的言论，小李写了篇成功的言论，这说明我们的评论工作，总是后继有人的。”

我起草备用的评论员文章时，费了不少心思。预感到申办会成功，对为不成功而准备的评论，难以找到兴奋点。八年过去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用不着再对世界强调我们坚持对外开放的态度了，现实已经做出了回答。但，这篇评论仍然要体现出时代风貌和我们一贯的追求。我起草的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开放的中国继续前进》，李仁臣同志对稿子进行修改，将题目改成《我们不会放弃》，更贴切，文章也顺多了。这篇稿子作为评论写作的实践，使我获益匪浅；作为一个历史资料，值得保存。

还有一个插曲。当晚在报社夜班，当萨马兰奇从口中轻轻吐出“北京”二字时，报社一位领导同志非常激

动,抓过备用的评论员文章稿子一撕两半,扔向空中,周围的同志都鼓起掌来,欢呼声一片。当然,这篇为不成功而写,又写得不算太成功的评论员文章不必发表了。

附:2001 年假如申办不成功而准备的《人民日报》

评论员文章

我们不会放弃

本报评论员

(未审定稿)

申办奥运会,是一次机会的争取。这次,XX 国家的 XX 城市争取到了主办 2008 年第 29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机会。我们尊重国际奥委会的选择,对 XXX 表示祝贺。

申办奥运会,是一种期望的表达。主办奥运会,是中国人民多年的心愿。北京再次申办,表现了中国人民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执着追求和满腔热情。我们希望获得奥运会主办权。申办成功,我们将会把一届最美好的奥运会奉献给世界。申办不成功,我们对此感到遗憾,但不会放弃对奥林匹克精神的追求和对奥林匹克事业的支持;中国仍然是奥林匹克大家庭中积极、活跃的一员,仍会以高尚的精神风貌参加 2008 年奥运会。

申办奥运会,是一次艰难的历程。奥运重在参与,申办的过程是参与的过程,拼搏的过程,也是收获的过程。1993 年北京“申奥”没有成功,但是,通过申办,激发了全

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促进了我国的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加快了北京市城市建设、环境保护、科技进步的步伐;为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打下了坚实基础。北京再次申办,“申奥”迅速成为全国人民普遍关心的话题,成为全球华人广泛参与、热情投入的共同行动。北京以发展促申奥,以申奥促发展,为首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巨大动力。“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科技奥运”理念深入人心,已经成为建设“新北京”的标准和方向。

申办奥运会,是一次意志的展现。中国人民在申奥中所表现出来的宽广胸怀、成熟心态、务实作风,充分显示了对奥运精神的深刻理解,对北京的城市建设充满信心,对中国未来充满希望。“申奥”是我国在新世纪的一次重要机遇。争取,靠顽强的意志,能否成功,还是靠运气。北京取得主办权,我们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步伐。没有取得主办权,我们仍然会不懈地努力。按照我们的计划,认定我们的目标,做好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现在是我国落实“十五”计划,实施第三步发展战略,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时期。我们要以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为指导,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

我们不会放弃。开放的中国继续前进。中国人民为申办奥运所作出的努力,必将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更加激发中国人民为实现富国强民的伟大目标而不懈奋斗的决心。北京也将以较高的发展速度,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界面前。

坚定不移地走向世界

本报评论员

蒙特卡洛传来消息,国际奥委会第101次会议通过投票表决:澳大利亚的悉尼主办2000年第27届奥运会。

我们尊重国际奥委会的选择,祝贺悉尼申办成功。同时对国际奥委会对中国申办工作的支持,一如既往充满感激之情,对全世界也一如既往充满友好之情。今后中国将更加敞开胸怀,欢迎四海宾客,广交五洲朋友,坚定不移地走向世界。开放的中国盼奥运,开放的中国完全能够办好奥运。办奥运,不论是今天还是以后,都是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翻翻奥运会的史册,许多主办国都是经过多次申办才最后成功的,澳大利亚也经过了三次申办。在奥运会的百年史中,旧中国留下的是“零”的记录,蒙受的是“东亚病夫”的屈辱。改革开放使我们有了申办的勇气和条件,北京在1991年12月,向国际奥委会正式提出申请。北京能够提出申办奥运会,本身就证明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社会祥和,人民安居乐业,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为申办奥运会,我国政府、人民和奥申委作了不懈的努力,海外侨胞、台港澳同胞和外国许多友好人士给予很大的支持。但申办城市有好几个,举办机会独一无二,北京失去了这次机会,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我们既不怨天尤人,也不自暴自弃。今后,中国将一如既往地维护奥林匹克的宗旨和原则,凡是有利于发展奥林匹克运动的活动,中国仍将采取积极

ZHONGGUO GAOJIZHISHI (GUANLI) JIAZHIGUAN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 (评论卷)

支持的态度。

奥运重在参与。申办的过程就是一个参与的过程,是个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看,无论申办成功与否,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要深刻地认识到,要想办成一两件大事,要想在世界上被人了解和信任,最重要的是自己要有志气,首先把国内的事情办好。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精力把经济搞上去。国力增强了,面貌一新了,无论什么大事也就好办了。

得而不骄,失而不馁,这是中国人民应有的气度和风范。“风物长宜放眼量”,来日方长,后会有期。我们相信,在这个占有世界 1/5 人口,有 960 万平方公里国土和 5 000 多年文明史的东方国家,奥运会五环旗高高飘起的日子,不会是很遥远的。同胞们,让我们为迎接这一天的到来继续努力!

(《人民日报》1993 年 9 月 24 日)

李景平

笔名景平、晶品、李盘。1957年2月15日出生。山西平定人。现为山西环境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会员，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会员，山西省环境科学学会理事，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全国地方环境报专业委员会会长。“地球奖”获得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作品获中国新闻奖、中国环境新闻奖、全国地方环境报新闻奖、山西新闻奖等，并被多种选集选载。著有散文集《绿歌》、评论集《20世纪的绿色发言》，主编新闻集《绿风》、散文集《绿缘》和论文集《环境新闻论集》等。

以写作散文、杂文、评论见长。其乡情散文被评论界认为带有浓烈的文化批判意识，亲情散文具有深沉而炽热的感情意蕴，其绿色散文则被认为有一种强烈的思辨色彩和深邃蕴含。评论、杂文以深刻的反思和犀锐的风格而具有震动效应。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 (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 (评论卷)

我们以什么形象进入 21 世纪

——“2000 年环境达标系列评论”之一

本报评论员

中国的环境达标,步步紧逼,步步逼近——

1996 年,中央政府发出决定:到 2000 年,全国所有工业污染源要达标排放,全国重点城市大气和水环境质量要按功能区达到国家标准;1997 年,中央“两个国策”座谈会重申:到 2000 年,要基本控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把一个较好的环境带入 21 世纪;1998 年 3 月,江泽民总书记高度强调:到本世纪末,全国各地都要实现工业企业污染物达标排放,不能有畏难情绪;近月,国家环保总局咬定最后期限:2000 年 12 月 31 日,必须实现环境达标,逾期不达标者,将予关停……

至此,中国的环境达标,进入倒计时。这是新世纪对中国环境保护提出的挑战,也是中国环保趋势对山西环境保护提出的挑战。而且,这种挑战,对于山西,任务尤重,难度尤大,时间尤紧。

我们山西,自然生态,长期困扰于脊薄与荒凉,产业结构,长期依赖于粗重的资源,经济发展,长期徘徊于落

后状态,生存环境,长期沉陷于深重的污染……我们以黑色的资源成就了山西工业发展的传统模式,却同时把清新的自然环境变成了黑色;我们以环境与资源为代价换取了低水平的经济收入,却使环境与经济同时处在了进退两难的“二难境地”;我们靠资源能源型国有工业与乡土工业把山西推上能源重化工基地的地位而外界打响的时候,恰恰又因资源能源型的污染,阻挡了外部世界知识经济对山西的选择。在环境问题上,全国排队,我们污染第一,在经济发展上,全国排队,我们又远远落后,我们在整体形象上,又在何位?山西以什么样形象进入21世纪,已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必然的抉择。

可以说,中国环境达标的实质,是中国以什么样的环境形象进入21世纪的问题,那么山西在本世纪末能否实现环境达标,也同样是山西以什么样的环境形象进入21世纪的问题。对于未来的世界性经济大循环,环境形象,环境标准,是无可替代的重要标志;环境不达标,环境形象落后,就意味着经济形象以至整体形象的落后,就无法进入21世纪的经济大市场和现代大社会。我们多年前就呼喊,要同国际接轨,要同现代化联网,但我们污染依旧,形象不改,谁会同我们接轨,谁会同我们联网。所以,环境形象问题,实质上也是经济形象问题、主体形象问题。

那么,环境形象的改变,无疑可以成为拉动经济健康发展的杠杆,成为整体形象改变的动力。对于山西,抛弃污染形象,就意味着加速产业结构的优化、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启动知识经济发展的引擎,在深层次上解决山西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从而实现山西整体形象的转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变。否则,我们会被越甩越远!

世纪末的达标之役,就是山西整体形象改变的契机。它将迫使我们背水一战,顽强一搏,把山西的形象推上去,让中国的能源基地以另一种形象追赶现代世界的潮流。除此之外,我们别无选择。

(《山西环境报》1998年10月15日)



丢掉坛坛罐罐

——“2000 年环境达标系列评论”之二

本报评论员

半个世纪之前,中国革命由农村包围城市走向解放的时候,为了全面、彻底的胜利,我们的革命家曾对一些占领区作出战略性的放弃,并提出一个坚决的口号:“丢掉坛坛罐罐。”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中国的污染由农村包围城市形成灾患,面对世纪末的环境达标,面对新世纪的文明选择,我们不得不重新提出这个口号:丢掉坛坛罐罐!

什么是今日的“坛坛罐罐”?落后的乡土工业和由乡土工业聚集而成的污染群落,以及“先污染后治理”的陈旧模式。这群落与模式对于山西,也许再典型不过——汾河河谷的土法炼焦,吕梁山区的土法炼磺,晋东南角的生铁冶炼,涑水河边的造纸蒸煮,晋北僻地的混汞选金,晋东乡间的耐火炉窑,以及遍布三晋的土小煤矿和黑水漫流的土小洗煤……可以说,山西乡土工业在自身发展的初级阶段,是完全靠了这些工艺古老技术落后的“坛坛罐罐”,才实现了暴发式的原始积累。其直接效

应,可以在农民鼓胖的肚皮、乡村长高的房屋和城乡间拉长的道路找到答案,也可以在变色的山水、浓重的空气和后代人渐变的体质中找到答案。

是耶非耶,不在小是小非,而在大是大非。据有关研究报告表明:山西焦化业年创利税 10 多亿元,而土法炼焦,仅资源一项一年就造成焦煤的浪费、煤焦油的丢弃和焦炉煤气的散失,直接经济损失高达 20 亿元。这还不算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损失和社会整体形象的负面影响。如果算,炼焦区长期征不到合格兵员损失是多少? 儿童尿液中致癌物含量与炉前工相等,损失又是多少? ……粗放落后的乡土工业在圆了农民和农民式的许多人发家梦的同时,却把人民共有的生存家园破坏了。我们获得那么一点点实惠,远远抵不上我们永远失去的财富和比财富更加珍贵的东西;而我们久久留恋不舍放弃的东西,将会使我们长久地失去更多,更多。

自然,打碎“坛坛罐罐”,丢掉“坛坛罐罐”,一些既得利益者想不通:“这是血一把汗一把赚来的,丢了它怎么活?”一些获得政绩者想不通:“老百姓靠这致富呢,丢了它还有什么支柱?”甚至一些富有同情心的糊涂人也想不通:“人家创业不容易哪,哪能说丢就丢掉了?”事实上,该赚的已经赚到了手里,该花的不该花的也已经花过,如果再允许你“血一把汗一把”牺牲环境而赚取小钱,就意味着让更多的人流失健康;如果再允许你以粗放生产作为支柱产业,就意味着我们要把愚昧和落后带入 21 世纪;如果再允许你的“坛坛罐罐”存在发展下去,就意味着我们拒绝现代化与现代文明同我们亲近……其实,国家已经下定决心并明确表态:以我们现有的经济水

平,推掉土小企业,完全能够承受得起!我们应该担忧的不是丢掉“坛坛罐罐”的损失,而是被“坛坛罐罐”拖累而进入不了新世纪现代经济的大门。

应该说,跨世纪的破旧立新之役是早就打响了。1996年,全国范围取缔土小企业春潮初动,1997年,纺织行业摧毁落后生产线掀起波涛,1998年,电力系统拆除小型机组狂澜激荡,1999年,全国淘汰落后设备浪潮汹涌,2000年,迎面而来的环境达标正大潮磅礴……这是一种世纪之潮,这是一种划时代的革命。面对世纪革命,我们不可能躲避,也不可能逃逸,更不可能后退!惟一的选择是,丢掉“坛坛罐罐”,轻装上阵,挺进现代化!不如此,我们将被羁绊和封闭于“坛坛罐罐”并远远地抛弃于大潮之外。到那时,也许该轮到 we 发呆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更不知“今夕是何年”。

(《山西环境报》1998年10月22日)

走出黑色思维

——“2000 年环境达标系列评论”之三

本报评论员

山西的经济是建立在煤堆上的。黑色挖掘曾经是山西的优势,伴随着黑色挖掘崛起的重型工业和跟着重型工业铺开的乡土工业,也曾是山西的优势。而今,这曾经的优势正成为明日黄花,优势正走向劣势。

先是黑色污染成为掣肘经济发展的劣势。煤卖出去了,电卖出去了,留下废水、废气、废渣一大堆,把山西推上了全国污染重灾区的位置。山西要扩大开放,要引进外资,外人一到山西就说是走进了“人类生存极限”之地,呆都不愿意呆,还怎么愿意投资?我们因此而失去的机会已经不少,可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潜在的危机。

继而,黑色资源本身成了经济发展的劣势。煤卖不出去了,电也卖不出去了,现代市场对黑色燃料的疏远与限制,使山西资源工业徘徊在自己的世界里。山西的经济走不动了。我们多少年引以为自豪的东西,终于把自己引向了两难的困境。

最近,山西在自己的世界里分析经济,结果,排在前

面的,被称为省内“最优”的,也不是那些拥有黑色优势的地区,而是远离黑色、远离粗放生产的、那些走向高科技和高附加值产业的地方。这也许更让我们看清楚了:黑色的重型产业和多色调的非煤产业,到底孰“优”孰“劣”?

于是我们不禁生出令人伤感的疑问:现代世界,是不是正远离山西?

我们无疑对煤炭依赖得太久也太过分了,以至于长期形成一种定向思维,一种懒惰思维,一说发展经济,总是挖煤炼焦,总是跳不出黑色的煤坑以及与此相关的初级生产方式。明明看着挖煤的历史一段段凝成悲剧,却总是观前之悲而不知戒,甚至变本加厉于黑色挖掘与黑色冶炼上蜂拥而至。无序竞争,恶性循环,结果,越挖越穷,越穷越挖,最终被黑色困扰。传统的晋商的睿智在我们身上消失了,新型的现代文明的思想在我们脑中又懒于接受,于是,我们真的穷得只剩下煤炭了。

自然,作为国家的能源重化工基地,我们无法选择。国家要我们挖煤,我们不得不挖煤;国家要我们炼焦,我们不得不炼焦。然而,对于我们能决定的事情,我们也未曾作出明智的选择。有资源的地方不用说,依旧是挖资源、卖资源、吃资源,以资源和环境的浪费和牺牲,换取直接的经济效益。问题是,没有资源的地方,本来是生态很好的粮米之乡,本来是文化古老的旅游胜地,却也隔山隔水拉来资源炼焦炼铁,直到烟熏火燎把个清静之地搞得面目全非了,似乎才算完成了一个“工业化”过程,然后,美其名曰“能源重化工基地的重要组成”。岂不知,那是真正的丢掉优势,屈就劣势,放丢长处,突出短处。也许

我们太急功近利了，只看到资源交换的廉价效益，却看不到廉价效益背后的深重灾患，或者我们根本就未曾考虑过有什么灾患。

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仍在因袭和重复着粗放的经济模式：堵掉煤坑挖煤坑，炸毁铁矿开铁矿，推倒焦炉上焦炉，拆除磺窑建磺窑……要害的问题在于，我们老在黑色思维上盘桓，坛坛换了罐罐，罐罐换了坛坛，而如此循环，不知道山西什么时候能走上结构优化的快车道？

2000 年环境达标气势紧迫，无疑是山西世纪末的最后一次机会。我们绝对不能再错过机遇了。再错过，对于新世纪经济，我们将望尘莫及！

世界给我们的选择是丰富的，我们何必只选择狭路？现代经济道路是宽广的，我们何必一条“黑道”走到底？环境达标给了我们一个支点，我们能不能把山西的未来撬起来？

（《山西环境报》1998 年 11 月 12 日）

积重也得返

——“2000 年环境达标系列评论”之四

本报评论员

“山西的环境问题积重难返。2000 年环境达标天方夜谭。”

这是我们面临的环境达标问题上具有代表性的一种观念。

太悲观了。无奈的悲观！

我们的环境问题重不重？重。整条整条的河流遭受污染，整座整座的城市遭受污染；河道里的水成了酱油，城市的天空弥漫着沙尘，不能说不重。

我们的环境治理难不难？难。企业的效益不景气，赚到的钱还不够生存；治理的技术远远落后于现实的要求，治来治去不见达标，也不能说不难。

但关键的难坎儿，在于我们的思想。在于我们是否真正愿意放弃那些建立在环境损失基础上的产业，在于我们是否真正愿意割舍那些以污染积淀支撑起来的企业，在于我们是否愿意真正丢掉急功近利思维模式而从长计议，是否愿意真正把财力物力人力投向环境治理

……所有的问题归结到根本上,在于我们的正义与良心是否还装在胸中!

有些工业,本来就是以牺牲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命健康换来的,我们对它有什么必要死保不放?有些企业,本来就是少数人发财政富甚至挥霍享受的钱筐子,我们凭什么对其仁慈宽容?有些生产,创造的价值远远抵不上用于其污染治理的资金,我们为什么舍不得割爱?而有的大户,本来有钱有力完全可以治理却久不治理,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予追究不予严惩?

我们曾经习惯于偏颇性的思维,总以为发展是硬道理。经济基础是第一性的,所以不敢大张旗鼓挾伐污染,以至明明是污染问题阻碍经济发展和动摇经济基础了,我们还萎萎缩缩,不敢有所触动。我们往往采取退让性的措施,总认为吃饭第一,保老百姓的饭碗是第一要务,所以为了一点点可怜的效益,任污染加重再加重,不敢有所舍弃。

政界人物的眼睛盯在经济上,企业人士的眼睛盯在经济上,环保人员的眼睛也盯在经济上,唯经济是命,直到环境的压力迫使经济的躯体脆弱到岌岌可危的地步,不堪一击了,我们还是这种思维:问题已经积重难返,真要大砍大杀或大治大整污染型企业,经济会不会垮掉?我们从不认真思考:治理,到底是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呢还是阻碍经济发展?

应该说,治理,也只有治理,才是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绿色杠杆。污染的颜色使得社会的整体形象受到了影响,只有洗掉污染,我们的社会才能文明。污染的形象制约经济扩大开放了,也只有清除污染,我们的经济才能精

神焕发。我们为什么要砍掉那么多的土小企业,就是因为土小企业已成为了现代大工业的绊脚石。我们为什么要对重污染企业开刀,就是因为不割除污染毒瘤,我们的现代大工业就梗阻难健。我们不消灭水的污染,我们的工业命脉、农业命脉就会为我们的国民经济输入带菌的血脉。我们不肃清大气污染,我们的生存、我们的生命就永远头顶着浓重的、窒人鼻息的祸患。那么,我们的文明受到威胁,我们的社会受到威胁,我们的生命受到威胁,我们的经济谈何健康,又谈何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污染的积重难返,不也意味着经济面临着一种危机吗?不正意味着是经济问题的积重难返吗?

今日非昨日,此时非彼时。2000 年环境达标,铁板钉钉,不达标者,坚决关停。就是为了解决积重难返的环境问题,也是为了解决步入停滞甚至步入积重的经济问题。而今,我们不仅有决心这样做了,而且我们有能力这样做。就像取缔土小企业之初,不是也有人担心经济承受不了百姓承受不了吗?事实上,我们完全承受了。就像淮河治理砍杀小造纸之前,不是也有人忧虑经济会垮掉,企业会垮掉吗?事实上,我们没有垮掉。

正因为我们面临的污染积淀太沉重了,所以要拿出钢铁般的措施。正因为我们经历的环境灾患太长久了,所以必须定出跨越性的期限。污染积重难返,积重也得返,难返也得返。不返,我们就进入不了现代社会的绿色通道,不返,我们在跨世纪的时候,返回来的,也许就只有一种双重的结果:环境与经济的灾难深重!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采写回眸

评论之立意要高拔于现实之野

——“2000 年环境达标系列评论”的写作

新闻评论实际上是要给人一种思想的力量，而不是就事论事，把思路局限在事情本身的是与否上；也不只是借事说“理”，把一些空泛的人尽皆知的道理贴附在事情上；更不是以事寓“理”，将一些所谓的道理生硬地穿凿在所写事实上。我不是说这些曾经常用的评论技法不好，而是说这些技法被滥用之后，评论已不能挖掘事情本身深藏的内涵，也不能发掘精粹的思想之美。

我以为，要显示思想之美，评论之构思要把握好时代的坐标，评论之立意要高拔于现实本身，评论的写法要实现艺术性的创新。世纪之交的时候，我写过一组新闻评论《2000 年环境达标系列评论》。文章题目讲的是“2000 年环境达标”，实际上，这组评论发表于 1998 年。当时，我只是尝试性地在这方面作了些努力和探索。文章发表后，确也取得了一定的评论效应。

背景：面对世纪大潮构思文章

《2000年环境达标系列评论》共四篇文章：《我们以什么形象进入21世纪》、《丢掉坛坛罐罐》、《走出黑色思维》、《积重也得运》。通过这四个题目，可以看出整个系列作品的构思：面对迎面而来的21世纪，我们怎么办？

20世纪末可谓一个全球激荡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步步进逼，世界范围内绿色环保大潮迭迭高涨。有人预言，21世纪是一个世界经济循环的世纪，也是一个绿色文明普及的世纪，二者相融合，将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世纪。

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政府在1996年发出一个重要的法规性文件：《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实质性地推出两个重要行动：一是取缔土小企业行动，规定1996年9月30日以前，取缔关闭15种土小企业；二是环境达标行动，要求到2000年年底，全国所有工业污染源必须实现达标排放。这个《决定》可以说是中国政府在世界经济发展大背景下兑现国际承诺，推进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世纪决策”。

《决定》下达后，全国范围内取缔土小企业的战役打响，曾经作为中国能源基地的山西，一年内取缔土小企业连下数十个污染王国，之后打击死灰复燃，遏制污染回潮，前后取缔关闭土小企业10 000多个，占到当时全国取缔土小企业总量的1/8。山西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山西经济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也许因为取缔土小企业付出的精力太大了，也许觉得离世纪末日尚有时

限仅有两年的时间,尚未提及“环境达标”事宜。山西许多地、市、县、区不仅党政领导、企业领导不了解“环境达标”是怎么回事,甚至环保局长也认识模糊、态度暧昧、信心不大、意志动摇,认为“2000 年环境达标如天方夜谭”。

当时,采访了解到这个情况,我一边进行积极的行政参与,在山西省环保局召开的年中工作汇报会上,向新任局长作了汇报并提出召开全局、全省“2000 年环境达标动员大会”的建议,一边紧急作出新闻策划,在《山西环境报》开展“2000 年环境达标”战役性宣传。为此,报纸开辟了《世纪攻坚:2000 年环境达标》新闻专栏,我亲自撰写中国高层环保官员和山西省高层领导的专访文章,头版连续刊发 100 多篇报道为环境达标造势,在山西形成了浓烈的环境达标氛围。仅半年时间,就使山西企业的环境达标率由 1998 年的不足 20% 上升到 1999 年年初的 50%。

《2000 年环境达标系列评论》即是这个时期发表的主打文章。文章结合山西的经济和环境现实,提出“丢掉坛坛罐罐”,提出“走出黑色思维”,提出“环境达标毫无退路”,其根本意旨在于把山西放在中国现代化和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中去寻找位置,在于强调:“中国环境达标的实质,是中国以什么样的环境形象进入 21 世纪的问题。那么山西在本世纪末能否实现环境达标,也同样是山西以什么样的环境形象进入 21 世纪的问题。对于未来的世界性经济大循环,环境形象和环境标准,是无可替代的重要标志;环境不达标,环境形象落后,就意味着经济形象以至整体形象的落后,就无法进入 21 世纪的经

济大市场和现代大社会。”可以说,正是这组系列评论,使整个山西环境达标的战役性新闻宣传具有了标志,具有了灵魂,使山西环境达标工作具有了高度,具有了远谋,也使山西人清楚了“2000 年环境达标”与山西、与中国、与世界未来的关系和意义。这组系列评论的本意,就是要为世纪环境达标举起旗帜,照明前路,扫清障碍,鼓劲壮威。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引起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起到了提高认识、统一思想、鼓舞行动和凝聚力量的作用,终使山西在 2000 年年底以 99% 的环境达标率在全国拔了头筹。

立意:高拔于现实之野

《2000 年环境达标系列评论》的立意,即如系列之一的标题所示:我们以什么样的形象进入 21 世纪? 系列的开张之篇高屋建瓴提出主题,整个作品切合现实地作出结论:面对 21 世纪,如果我们不丢掉落后的生产方式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落后观念,不实现 2000 年环境达标,我们就会被远远抛在现代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门外而融不进全球经济大循环的潮流。

实际上,这组系列评论,整体上有一个立意升华和主题提炼的过程。系列中的每篇评论,也有一个立意不断升华和主题更加凝炼的过程。

对于“2000 年环境达标”这项中央政府提出的决定,新闻评论的立意和主题的确定,至少可以在四个层面上进行——

行政层面:既然是中央政府发出行政命令,那么,新闻评论可以采用现在许多主流报纸通常的写法,立意确定为“坚定不移推进环境达标”,然后,文章分层次地对

各级党政机关、行政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提出要求,即政府领导应如何重视、环保部门应如何贯彻、企业单位应如何落实等,评论作成一种贯彻式文体,未尝不可。

宣传层面:对于中央政府的决定,广泛地宣传是报纸责无旁贷的任务,那么,新闻评论的立意又可以确定为“全民动员实现环境达标”。这样,文章可以号召社会公众积极行动起来,以怎样的状态、怎样的精神、怎样的热情、怎样的干劲,为实现环境达标而奋斗。评论作为一种社会倡议或动员誓词,也是完全可以的。

理论层面:中央政府的决策来自于高层次理论的具体化,同样,决策的贯彻,仍然可以具体化为再一层次的理论。这样,新闻评论的立意又可以确定为“论环境达标”或“我们怎样实现环境达标”,从环境达标与其他工作的几个关系、几个结合、几项措施上展开论述,使文章形成一个“微型理论系统”,作为新闻评论也许可读性会差一些,但仍不失为文章一体。

思想层面:中央政府的“绿色世纪决策”本是对现实的一种冲击,那么,在这种冲击面前,现实生活会发生怎样的矛盾性变化?它的走向如何,趋势怎样,最终会有何种结果?这是现实的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也是这项决策最本质的出发点和归宿。这样的决策引起社会性变革和思想性嬗变应该说是正常的,却也是具有震动性的,因而抓住“思想”做文章,应该说也就深入到了其具有震动性的层面。

我在构思《2000年环境达标系列评论》时,吸收了行政层面的东西,借鉴宣传层面的内容,贴近了理论层面的意义,着重选择了在思想层面上立意,让文章立意来自现

实之中而又高拔于现实之上,产生一种思想性魅力。“我们以什么形象进入21世纪”,这可以说是世纪之交最引人思考的命题,那么,围绕这个命题,我们强调“丢掉坛坛罐罐”,强调“走出黑色思维”,强调“积重也得返”,就显示了深重的思想力量。这种力量包含了其他层面的内容而又完全不同于其他层面的立意,同时也是其他层面的内容所不可比拟的。譬如,《2000年环境达标系列评论之二》立意于“丢掉坛坛罐罐”,侧重从取缔小企业、淘汰落后生产方式的角度,论述不丢掉“坛坛罐罐”,我们就将受“坛坛罐罐”的拖累而进不了新世纪现代经济的大门,就会被现代经济越甩越远。这种思想立意下的理性论证,既是对现实的反观,又是对现实的光照,其所包含的未来性指向,既高拔于现实,又是显而易见的。我由此深感,高拔于现实之上的思想性立意,对于新闻评论面言,如同灵魂之于生命一样重要。

写法:追求评论的艺术性创新

我一直认为,即使是新闻评论,虽然评论的新闻事实是真实的,评论的意旨是现实的,但其文章的写作,也应该追求评论手法和技巧的艺术性。艺术性讲求个性化,那么,评论视角的切入,评论文章的布局、评论论据的选择、评论语言的运用、评论文气的营造,都应该是个性化的,应该通过艺术手法的个性化追求,使评论具有一种审美化的魅力。这是我写作评论的想法,也是在写作中一直奉为原则的追求。在《2000年环境达标系列评论》的写作中,我所想的是,我写的环境新闻评论,就是要同别人不一样。

高起点的视角切入。《丢掉坛坛罐罐》开篇讲:“半

个世纪之前，中国革命由农村包围城市走向解放的时候，为了全面、彻底的胜利，我们的革命家曾对一些占领区作出战略性的放弃，并提出一个坚决的口号：“丢掉坛坛罐罐”。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中国的污染由农村包围城市形成灾患，面对世纪末的环境达标，面对新世纪的文明选择，我们不得不重新提出这个口号：丢掉坛坛罐罐！”这里，到底为什么“丢掉坛坛罐罐”，丢掉“坛坛罐罐”究竟意味着什么，虽给读者造成了悬念，但作者借助中国革命一个著名的口号高视点地切入文章，使文章起势不凡，具有了与文章立意同样高拔与文章气势完全贯通的优势。

忧患性的语言气势。我历来注重评论的忧患色彩。忧患实际是一种情思，是感情与思想的混合与凝练。评论要具有思想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评论要具有感情，似乎尚不被认可。新闻界历来提倡“零度评论”，即客观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冷静分析式的评论。我则注重“热度评论”和“诵读性评论”，即把感情和思想融化在论述过程中，使评论语言完全达到琅琅上口地朗读成诵的境界。由于讲究感情的渗入和追求诵读的效果，这就必然使得文章非常地注重语言和文气。在《2000年环境达标系列评论》中，我大幅度运用对偶式排句、三段式排句和多分句式排句推起评论语言的气势，同时在句式中嵌入彩色性和情感性活跃的修饰词语，使评论在势不可挡的文气中充满情感意蕴和思想忧患，诵读起来，具有诗性的美感和魅力。

思辩性的事理论证。我通常不在评论中进行展开性的举事论证，也就是说，不把一个事实的“全豹”展开来讲，而是取其“一斑”，放在整个文气贯通的思辩过程中

让其发挥要素作用。《丢掉坛坛罐罐》论证：“是耶非耶，不在小是小非，而在大是大非。据有关研究报告表明：山西焦化业年创利税10多亿元，而上法炼焦，仅资源一项一年就造成焦煤的浪费、煤焦油的丢弃和焦炉煤气的散失，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0亿元。这还不算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损失和社会整体形象的负面影响。如果算，炼焦区长期征不到合格兵员损失是多少？儿童尿液中致癌物含量与炉前工相等，损失又是多少？”这里的几个事实，煤焦油的浪费、生态环境的损失，不合格兵员和儿童尿液的致癌物含量，都是完全可以客观地展开来进行论证的，但文章只是把它们放在漫思式或思辩性的句子和语段中，作为一个有意义的符号，使其在思考的链条和语气的呼吸中产生思辩论证效果。如果说这些事实在直接为论点和主题服务，不如说它们是先作了作者的思辩性元素，在弥漫性的思辩链中起支点作用，然后才实现其整体论证效果的。

也许由于这些追求与探索，《2000年环境达标系列评论》获得了较好的社会效应。当时，在基层，许多环保部门组织学习这组评论，一些地方工作人员把文章送给市、县领导参阅，并用这组评论进行社会宣传。在新闻界，不少记者向《山西环境报》索取报纸和文章复印件，山西电视台则请作者以特约评论员的身份撰写了另一组“拯救母亲河系列电视评论”，在山西卫视新闻节目中播出，创造了山西电视台连续一周播发署名电视评论的纪录。在环保系统，山西省环保局将这组《2000年环境达标系列评论》作为环境达标工作汇报材料的附件呈报国家环保总局，受到国家环保总局的好评。在新闻评奖中，

《2000 年环境达标系列评论之二·丢掉坛坛罐罐》获 1999 年中国新闻奖三等奖；《2000 年环境达标系列评论之三·走出黑色思维》获 1999 年山西新闻奖一等奖；作者同时因环境新闻工作的突出成就在 1999 年获得中国环境大奖“地球奖”。



杨文镒

1947年2月生，重庆江北区人。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77级，现任《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高级编辑。

获“全国第二届百佳新闻工作者”、“四川省首届十佳新闻工作者”称号，四川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四川大学新闻学院兼职教授，四川省评论理论研究会会长，四川省杂文学会副会长。

新闻和评论作品曾获中国新闻奖、全国好新闻奖、四川新闻奖。新闻评论、思想随笔、散文在中央、省及港、台发表。有著述《中国人的境界》、《新闻评论论纲》、《当代亚文化潮》出版。通讯《春满春熙路》，评论《怎让沉渣又泛起》，杂文《致郑板桥先生书》分别收入大学新闻教材。

怎让沉渣又泛起

不须多加注释，大邑县的“刘文彩庄园”意味着什么，所有过来人都能深悟其内涵。那与黄世仁、南霸天一类是作为旧中国劣迹斑斑的耻辱柱而记载于历史的所在，是与被奴役被压迫被掠夺的苦难岁月相联系的历史章节而存在于今日。不管岁月如何冲刷，经典的封建庄园的文化价值也正是与特定历史背景相连方显其经典意义。这是人类应有的文明史观。

但近来却有这样的怪事，一夜“庄园”风来，刘文彩的名字在大邑县重新风光起来，不仅地方产品被争相以他的“名气”在全国大作广告宣传，县里中学也曾筹划改为“文彩中学”，“文彩重光”美其名“搞活地方经济需要”，“有利提高地方知名度”。

无独有偶，这很容易使人想起，日本侵略者战舰在一些地方被制成玩具模型兜售，希特勒军徽被当成“纪念品”在某些工厂加工出售，模仿日本“皇军”服饰拍照留影盛行旅游景点，当事者不以为丑恶反倒嘻嘻作乐。把人类历史上这些肮脏的东西重新抬出招摇过市，唤起人们记忆的，除了痛恨，当不会有别的。但有人却不这样认

为,现在开放了,历史真善美与假丑恶都可以不讲,欢声笑语可以抹去历史血泪,这是历史价值观的大麻木。在这种思潮下,大汉奸的文稿,杀人的变态诗人,都被作为“名人”一捧再捧,甚至耗资千万为之拍摄制作电视连续剧。观念糊涂至此,触目惊心,不可不辩。

开放要扩大,经济要搞活,办法可以多样,思路可以宽阔,“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发掘历史名人,搞活地方经济”,怎能寄托于历史罪恶人物的幽灵,怎能去追求这种恶心的“轰动效应”。实事求是纠正“左”的年代阶级斗争扩大化形而上的方式,但不能模糊历史的是非本质和界限。任何历史人物,不仅仅是作为事实而存在,更重要的是将作为文化现象而延续,或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唯物地评价历史方能历史地推动社会发展,实事求是地重新订证刘文彩庄园里的遗事,为的是更真实地还其本来面目,但决不是说可以容忍颠倒黑白,善恶不分,甚至可以把本色重新粉墨更改。

我们不因为今天的歌舞升平,而淡忘昔日的历史是非,同样不应因为开放搞活而放任历史沉渣泛起。

以揭露希特勒法西斯罪行为主题的《辛德勒名单》能荣登66届奥斯卡金像宝座,其评委自然是清一色的西方人士。西方评委自有西方人的政治观念和艺术尺度,但作为一部政治性极强的电影人选,人类历史公理与是非显然是奥斯卡评委共有的评判标准。面对历史大义,西方有识之士尚明此理,为何我们的同志会模糊至此。美丑不分善恶不辨模糊的不仅是历史,涂炭的将是我们自己和下一代的灵魂。“让历史告诉未来,而不能让未来去复活历史”,在世界一步步走向物质富裕繁荣的美

好未来,应该记取这种历史的态度。

这倒让我们清醒:历史价值,道德价值,文化价值,这些人类文明的基本层面,这些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到了该大讲特讲的时候了。面对历史的耻辱柱,我们不能忘记了深受历史恶魔鱼肉的苦难先辈,淡漠了历史的正义和人类的天理,糊里糊涂地拜倒在历史恶魔脚下,不自觉地充当起为他们粉墨的“美容师”。在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的同时,精神文化深层的同步建设再也懈怠不得了。

(《人民日报》1996年6月15日)

采写回眸

随笔,高扬理性的旗帜

——随笔评论《怎让沉渣又泛起》写作寸心录

随笔,无可争议的“最自由的文字”(鲁迅),但若因此以为随笔“随意”而可以怠慢其思想的严肃性,那是莫大的误解。傲视严肃性而流入插科打诨,那只是随笔最常见的悲剧。严肃的思想理性,活灵活现的灵魂,迎风高

扬的旗帜,这才是随笔。

如果说随笔评论《怎让沉渣又泛起》能够在社会上引起反响,能被《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先后刊用,并能获得中国新闻奖,四川好新闻言论一等奖,《人民日报》金台随笔奖,那显然只能归功于随笔思想的严肃性。

着眼社会时弊,是专栏评论永恒的主题,也是专栏评论永恒的思想魅力,更是随笔言论不可推卸的神圣使命。但要对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作出合乎历史认知的独到阐释,绝非易事。坦白说,当报社编委会领导在编前会上点名,要我将一段时间来沸沸扬扬的地主庄园文化写篇随笔评论时,几经揣度犹豫,心里是为难的。其难点在于,开放搞活,思想大解放,历史文化中可以为用的历史借鉴,与必须扬弃的历史糟粕,其界限究竟在哪里?搞活今天,走向明天而发掘昨天,是非曲直的基准在哪里?更何况,地主庄园在大搞“阶级斗争”的年代,曾被“左”的一套做法所利用宣传,至今难以用力气澄清。

但借鉴昨天是为了走向明天,若是这个发掘是为了忘记昨天的耻辱,重复昨天的野蛮和残暴,不仅难以走向明天,而是不能容忍的历史大倒退。由此,联系在诸多旅游景点,装扮“皇军”的纪念拍照,兜售汉奸文学的无耻鼓吹,变态文人的无聊辩解等,地主庄园文化现象便不再是孤立的偶然现象,而是反映了走向明天过程中对历史唯物大否定的糊涂潜流,其危险不仅仅在于抹杀了一个庄园封建经典的自身价值,而是否定了一个世纪以来,甚至有史以来,正义与邪恶较量的必要性,其最终结果必然也否定了人类任何良知与文明进程自身。经过这样理性

的逻辑整理,为文章初步奠定了基石。

正是高举了历史唯物物的理性旗帜,《怎让沉渣又泛起》一文幸免陷入一事一地、一事一理的泥潭,着眼当前带全局性的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政治问题,深刻抨击地主庄园文化、法西斯及汉奸文化等一系列沉渣泛起的丑恶社会现象,严肃分析其产生背景并提出改革开放中精神文明建设刻不容缓的重大课题,自然而然成为随笔题中之义,题中之理。破好这个题,不仅仅是一次对两个文明同步建设的呼唤,也是捍卫人类文明史观和良知纯洁性的呐喊。

提笔始终,心里默默为自己的拙作祈祷——把握尺度。

随笔的理性应牢牢建筑在历史唯物论的基石上,绝不是以势压人的唯心的阶级估量,它本身要经受住理性的试金,更要经受历史和实践的检验。随笔文风平实,雍容大度,容不得强加于人的说教。以澄清事理,辨明历史,伸张真理为己任,靠艰苦的论辩而不靠“左”的高压,这又是新时期评论不可丧失的本质。力戒“文革”评论遗风,《怎让残渣又泛起》一文主观上正是力图严格遵循这点,竭力维护历史唯物与辩证唯物的分寸,事实当前,话不说满,理不过头,让严肃敏感的政治问题随笔化,犀利的思辩清新化,复杂的哲理形象化,将真情的良知与理性呈献给关注社会问题的读者,从而达到思想性与艺术性尽可能完整和谐的统一。当然,这篇随笔的最终效果与初衷,是否如一,这是笔者至今仍耿耿于怀的。

随笔的题材是多样化的,随笔的写作是亲切可人的,但随笔的思想态度是严肃的。如是,随笔的选题、采访、

构思与写作的过程,应该是一个生命意识的自我燃烧的过程,是思想认识升华的修炼过程。任何一篇作品,说思想性“万无一失”,那只是天方夜谭。尽管此文引起了它应有的反响,但从作者自身看,仍是一篇遗憾的文章,在对历史文化的今用上,认识还欠一个更高的层次,诚惶诚恐之后留下的理性黑洞是羞于作“经验谈”的。



杨诚勇

笔名晓阳，河南省南召县人，1949年7月出生。现为河南电视台副总编辑兼新闻评论部主任，高级编辑，河南卫视《中原焦点》、《周日观察》、《理论点击》等栏目总制片人。1993年被评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专家，1996年被评为中国广播电视中青年学者，2000年被评为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杂文学会副会长。

从事新闻工作30年来，为省级以上报刊和电台电视台撰写发表新闻评论1800多篇，获河南省新闻奖60余项。有20多部作品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中国广播奖一等奖、中国电视奖一等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国家级奖励，《中原焦点》专栏获中国新闻名专栏奖。有40多篇作品被选入《中国杂文大观》、《当代文学作品精选》、《新闻评论写作教程》等20多部有影响的重要文集和大专院校教材。出版的专著有《时代足音》、《晓阳杂文集》、《盛世微言》等。多次被聘为河南省新闻高级职称评委会委员和河南省新闻奖评委会委员。

黄河大桥贪污案引出的问号

早就听说郑州黄河公路大桥收费站有人不按规定乱收“买路钱”，借机敲诈勒索过往车辆，不少人敢怒而不敢言。近日，这起贪污大案终于被侦破并公诸报端。这正应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说，也是我省纠正行业不正之风的开场锣鼓，着实发人警醒，增人信心！

捧读这则报道，欣幸之余，不由从字里行间又引出了几个问号。

问号之一：“1988年以来，大桥收费站为数众多的收费员侵吞过桥费。”一方面，“广大群众对此早有议论”；一方面，“主管部门也有察觉”。但不知为什么“案件一直未能得到查处”，一直拖延了两三年。是因为“人法不责众”，无从下手呢，还是主管部门有什么“难言之隐”？如果说是因为“取证困难”，为什么郑州市邙山区检察院“今年8月7号开展侦察工作，当夜就获得了重大突破”呢？谁都知道，久拖不决，积重难返；当断不断，反遭其乱。在这个“贪污大案”的形成过程中，究竟谁是“始作俑者”？谁在养痍遗患？主管部门又该承担些什么责任呢？

问号之二：“郑州黄河大桥收费站共有49人，参与

贪污的超过 40 人。”这是一个多么令人触目惊心的比例！黄河公路大桥是省会重大建筑之一，全省人民为之骄傲和瞩目，并不是一个容易被人遗忘的角落。大桥成了犯罪分子集中作案的地方，收费站成了贪污的窝子，那里的党组织干什么去了？主管领导又干什么去了？那些名目繁多的检查团、工作组之类，是不是一到黄河大桥就鼻塞不通，耳目失灵了呢？

问号之三：报道说，有个犯罪分子，去年因贪污票款被调离收费站，今年三四月份又被调回收费站，到案发时的四个来月时间，他又贪污了 4 400 多元。这个贪污分子从调出到调入，只不过几个月时间，简直是自在得很，神气得很！他这么容易调回来，又这么胆大妄为继续作案，是因为他了解内情，有恃无恐呢，还是他“手眼通天”，“后台”很硬呢？这个犯罪分子的调出和调入，是不是“戏中有戏”呢？

邓小平同志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黄河大桥贪污案所暴露出来的，不只是几十个人的贪污问题，而是我们在领导上、管理上和制度上所存在的严重弊端。党中央最近强调，纠正行业不正之风，“思想教育为基础，制度建设是保证，领导干部是关键”。这确乎是切中了问题的要害，足以使一些人振聋发聩。现在对这个大案的查处已经有了“上文”，也一定会有“下文”，人们期待着“下回分解”。回答以上问号的，应该是圆满的句号，而不应该是停顿号和省略号！

（1990 年 8 月 30 日河南人民广播电台播出）

采写回眸

“引而不发，跃如也”

——《黄河大桥贪污案引出的问号》采写札记

新闻中心评论员文章《黄河大桥贪污案引出的问号》(以下简称《问号》)被评为河南省 1990 年度好新闻一等奖,首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评论播发后,在全省反响强烈,许多人当天就打电话表示支持。河南省委领导同志也多次称赞这篇评论“问题抓得准,提得好”。在全国优秀广播作品评选会上,评委们对这篇评论给以充分肯定,认为它“有胆识,写得尖锐,干得利落,振聋发聩”;“是这几年很少见的针砭时弊的好文章”。

《问号》一文的命题,既不是“偶然得之”,也不是“长期积累”,而是一种责任感使然。黄河大桥贪污案是引起人们震惊的特大案件。这起案件初步侦破后,新华社曾作过报道。这则报道引起社会关注,一时成为街谈巷议的热点话题之一。由于案件正在审理之中,加上种种原因,报道对一些重要问题写得比较“朦胧”,远不能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热点”又成了“疑点”。这时候,适

逢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动员大会，黄河大桥贪污案的正确处理，就会成为全省范围内纠正行业不正之风的突破口，给人以鼓舞和信心。作为省级新闻单位，更应在舆论监督方面有所作为。然而，案件的审理有自身的程序 and 规定，新闻宣传只能帮忙，不能添乱，既要促进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又不能给案件审理带来干扰。在这种情况下，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搞深度报道条件尚不成熟，新闻评论正可以扬其所长，解疑释惑。于是，在新闻中心领导的支持下，在对黄河大桥贪污案深入采访的基础上，这篇评论员文章就应“运”而生了。加里宁说过：“如果你讲出了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即使你讲得很平常，也能引起强烈的反响，因为你拨动了社会上绷得最紧的弦。”评论的选题能否抓住大众所关注的热点话题，这是评论成功的关键。

评论是新闻宣传的旗帜，评论的舆论导向作用比其他文体更为明显。因此，新闻评论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围绕“热点”做文章，不能给“热点”加温，而是要为“热点”分流，不是要激化矛盾，而是要促使矛盾向好的方面转化。对黄河大桥的贪污案的评论，不能就事论事，一味地宣泄义愤，而是要因势利导，引导人们从中认识行业不正之风的根源和危害，督促主管部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搞好廉政建设。同时，通过对这个反面典型的剖析，使其他部门引为鉴戒，推动全省范围内纠正不正之风。看似“功夫在诗外”，其实这正是评论的主旨所在。俄国大诗人普希金有句话说得好：“法律的剑达不到的地方，讽刺诗的鞭子能够达到。”从一定意义上说，新闻评论作为舆论监督的“鞭子”，应该触及深层次的问题，

既以文载道,又微言大义,给人以更多、更新、更深的启迪和思考。主题明确了,纲举目张,文章就好做了。《问号》行文之时,恰逢党中央国务院号召纠正行业不正之风之际,这就使《问号》师出有名,有了思想制高点。党中央提出的“纠风”三要点“思想教育是基础,制度建设是保证,领导干部是关键”,又恰好是黄河大桥贪污案的症结所在,也是《问号》一文所要“寻根究底”的动因。这样,用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来观照黄河大桥贪污案,评论写起来就感到思路清晰,立意正确,有一种高屋建瓴、耳聪目明之感。

如果说,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那么,评论的生命就在于真理。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但真理要想服人,就要借助于逻辑的力量,语言的魅力。“理直”还须“气壮”,“义正”还要“词严”。道是“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情始动人”。《问号》在写作上有意识地形成一种“气”,即“正气”和“气势”。纠正行业不正之风,顺时势,合民心,利稳定,除弊政,正气凛凛,师出有名,评论大不必扭扭捏捏,吞吞吐吐,应该是神清气朗,简洁明快。黄河大桥贪污案全省注目,弊端丛生,,已成为非动手术不行的脓包,评论有必要对此痛下针砭,激浊扬清,振聋发聩。文贵有气,气盛言宜。正气充沛,议论风生,评论就有了力度。古人云:“引而不发,跃如也。”拉满弓,搭上箭,虽然是没有把箭射出去,但人们仍然可以感受到弓箭的力量。《问号》一文就采用了这种“引而不发”的论证方法。全文 900 多字,共有十几个问号,或设问、或反问、或有问有答、或问而不答。以问代论,层层推人,步步逼进,丝丝入扣,形成较强的逻辑力量。同是一个问号,

采取不同的行文节奏,或疾或徐,或长或短,就收到不同的表达效果。例如:“谁都知道,久拖不决,积重难返;当断不断,反遭其乱。在这个‘贪污大案’的形成过程中,究竟谁是‘始作俑者’,谁在养痍遗患,主管部门又该承担什么责任呢?”议论与质问融合一起,句随“气”走,“气”从句行。再如“‘大桥收费站共有 49 人,参与贪污的超过 40 人’这是一个多么令人触目惊心的比例。”“大桥成了犯罪分子集中作案的地方,收费站成了贪污的窝子,那里的党组织干什么去了? 主管领导又干什么去了? 那些名目繁多的检查团、工作组之类,是不是一到黄河大桥就鼻塞不通,耳目失灵了呢?”述中有问,问中有述,一问三“折”,愠而不怒,有理有节,把握分寸,言有尽而意无穷,自然产生一种内在的说服力。

评论结尾引用邓小平同志关于制度建设的几句话,使评论的论点更加集中和突出。评论以“问号”为题,末尾时以“回答以上问号的,应该是圆满的句号,而不应该是停顿号和省略号”作结。其目的在于前呼后应,首尾衔接,使文气上下贯通,增强文章的感染力。

是“振兴会”，还是“催眠会”

观众朋友：您不妨猜猜看，这里是在干什么？

有的躺卧，有的侧眠，这里似乎是车站候车室；

有的看报，有的聊天，这里又好像是宾馆休息厅。

然而都不是，这里正在开会。这是8月18日上午，开封市直机关“为发展生产力服务，振兴开封经济座谈会”上的情景。参加会议的是市直有关部、委、局的负责人和有关人员。

会议开始不久，一些人就鼾声大作。记者的摄像机也未能使座中诸公从酣梦中醒来。

“振兴开封”的标语悬挂在一群昏睡者的头顶。一方面是言者谆谆，煞有介事；另一方面是听者藐藐，睡意朦胧。这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的强烈反差！

如果是会议内容十分重要，那么，这些与会人员连听会的精神头儿都没有，哪里还谈得上贯彻落实？如果是会议内容实在乏味，那么又何必在这酷暑大忙季节召集这么多人堆在一起活受罪？

是会风不正，还是作风不正？是领导机关的形式主义、表面文章在作怪，还是一些领导干部懒散成习，逢会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必睡？

像这样无意义、无效率的会议，还能让它继续开下去吗？这类会议赖以存在的现行体制，不改革，行吗？！

（1989年8月22日河南电视台播出）

采写回眸

正题反做，发人警醒

——关于《是“振兴会”，还是“催眠会”》的写作回想

电视评论《是“振兴会”，还是“催眠会”》，先后在河南省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播发以后，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一时间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许多观众给编辑部来信来电话，称道这则新闻“别开生面，发人警醒”，“是反对官僚主义的直观教材”，“向会议迷们击一猛掌”。中共开封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看到这条批评新闻后，深受触动，在市委常委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开封市委决定把这次批评作为转变会风、作风的突破口，对全市干部进行一次严肃认真的纪律作风教育，并作出了整顿会风的四条决定。

这条批评性的会议新闻，看似“妙手偶得”，其实是正题反做，刻意求新的结果。它的编发过程使我们体会到，摒弃旧的模式，敢于反思，才能挖掘出有价值的新闻。

今年8月18日上午，开封市直机关召开由市直各部委局负责人参加的振兴开封经济座谈会。开封电视台记者应邀到会采访。记者原是一本正经地拍会议，谁知刚拍了几个镜头，镜头下就出现了那种司空见惯的现象：有的窃窃私语，有的昏昏欲睡，有的呵欠连连。“坐相”更是歪七扭八，仰、躺、伏、侧皆有之。当记者感到手中的摄像机很难完成一个较为体面的会议场景时，就产生了干脆拍一条批评会风不正的新闻的念头，于是就顺势拍摄了座中诸公的睡相，编入了新闻片里。但由于还有所顾忌，编发时，保持了会议初始整齐围坐的场景，舍弃了一些人睡相不雅的镜头，在100多字的解说词中，也有一半内容是报道会议情况的。

这条新闻送到河南广播电视新闻中心编辑部后，编辑部领导发现这是一条很有新闻价值、针砭会风时弊的好新闻，对于发挥舆论监督、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很有意义，就让我们调查了解这个座谈会的情况，充实和修改这条批评新闻。我们通过有关渠道，进一步了解了这个座谈会的内容和过程，又从这位记者那里调来了在会场拍摄的全部原始素材。经过比较分析，挖掘和提炼，对原报道进行了如下充实和修改。

一是在报道主题上，有所深化和集中。原报道只是一般在批评开封市直机关开会睡大觉，批评开这样的会没有意义，而没有揭示会风不正是领导机关作风不正的反映，也是旧的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之一。参加这次座

谈会的40多人,都是局委级干部,还有副书记、副市长,竟然出现十几人在会上睡大觉。把这种情况,简单地归结为“文山会海”是不够的。我们在这则批评新闻中,不仅要反映会风不正,而且要从中透视一种官场“病态”,用镜头语言显现某一类“典型人物”的精神面貌。于是,我们舍弃了原报道中介绍会议概况的画面。利用现有素材,突出与会者睡觉聊天的镜头:一方面,言者谆谆,煞有介事;另一方面,听者藐藐,东倒西歪。“振兴开封经济座谈会”的会标,悬挂在一群昏睡者的头顶。这强烈的反差,本身就具有深刻的讽刺和批评力量。

二是在表现手法上,变叙述为评述,突破了一般会议新闻的报道模式,围绕主题,由“声”入“像”,由“述”到“评”。同时,充分利用电视新闻逼视性的优势,多用近景和特写,使画面和解说互相补充,融为一体。一开始,画面上就相继出现一些人横躺、侧眠、聊天的近景、远景和特写。多视角地展现与会者形形色色的“姿态”,使观众不知这里是干什么。然后推出,“振兴开封经济座谈会”的会标和会场全景,使人们恍然:原来是在开会,而且是在开一个“规格较高”的会议。继而通过会场里的茶几、茶杯、文件,报告人滔滔不绝的“嘴”,与会者埋在沙发里的“头”,伸在沙发上的“腿”,半闭半睁或是闭而不睁的“眼”,以及酣睡不醒者的大特写等,充分反映了与会者昏睡的憨态。这些画面,既比较客观、真实,又鲜明突出,寓针砭于无声之中。面对此情此景,人们必然会有这样的诘问:“开这样的会议,能够解决问题吗?靠这样的精神状态,能振兴开封经济吗?”新闻的结尾处,我们从几个昏昏欲睡者的中景,推出其中一位腕上手表的

特写镜头，力求给人们这样的启示：时间就是金钱，我们不能让这样无效率无意义的会议继续下去了！

三是在画面解说上，我们力求精警、贴切、发人深思，既解释介绍画面，又独立成章，具有逻辑力量。随着画面出现的第一句画外音就是：“观众朋友，您不妨猜猜看，这里是在干什么？”制造悬念，引人注目。然后是两个比喻：“这里似乎是车站候车室”；“这里又好像是宾馆休息厅”。当画面推出会标时，解说词才点明“这里正在开会”，与会者在会议上鼾声大作。接着用了一个“二难推理”：“如果是会议内容十分重要，那么，这些与会人员连听会的精神头儿都没有，哪里还谈得上贯彻落实？”“如果是会议内容实在乏味，那么又何必在这酷暑大忙季节召集这么多人堆在一起活受罪？”从会风不正和与会者精神状态萎靡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证，既批评了会议组织者的官僚主义、表面文章，又批评了与会者的懒散习气和懈怠之风。解说词最后强调：“像这样无意义、无效率的会议，还能让它继续开下去吗？这类会议赖以存在的现行体制，不改革，行吗？！”从而引导人们对深化改革的理解和思考。在解说词文风上，我们根据电视特点，小段落，短句式，多用感情句和设问句，注重情绪节奏。虽然是批评性语言，尽量语调轻松，情理并重，避免教训腔。

这条新闻得以播出，得力于编辑部领导的胆识。新闻片在省台播出当日，就受到开封市政府某些领导的责难。那些在画面中“露丑”的与会者，也想出种种理由为自己睡眠开脱。倘若不是电视新闻现场画面的直观优势，有人肯定会以“失实”、“诬蔑”为由向作者兴师问罪。看来，是电视逼视性帮了这条新闻的大忙。这也从另一

方面说明：比之报纸和广播，电视在舆论监督、新闻批评中有着自己的独家优势。可见电视记者在舆论监督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吴建平

1956年1月生于浙江杭州。1988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现任浙江日报社理论评论部主任。浙江省杂文学会副秘书长,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

从事新闻工作10多年来,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杂志、《经济日报》、《中国记者》等全国主要媒体上发表过一批理论学术文章与言论作品。在《宁波日报》、《经济生活报》上辟有个人杂文专栏。共有17件作品先后荣获中国新闻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全国优秀理论文章一等奖、浙江省好新闻特等奖及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并与人合作编写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大辞典》、《政府公共关系》、《严峻的考验》等。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龙生九子各尽才

——

“望子成龙”，这话已经说了千百年。作为家长对儿女们的一种企盼和美好愿望，这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世间有“龙”是传说，而同样根据传说，“龙”其实并不要求自己的子女都成为呼风唤雨、翻江倒海式的“王”，龙的儿子也做着各种各样的工作。

有一个“龙生九子”的神话故事，说的是：龙有九个儿子。六子名赑屃，特别肯吃苦，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很有点“老黄牛”精神，子是龙就把他安排在寺庙当了一名驮负石碑的底座神；五子狻猊，平生好坐，于是就做了寺庙中的守门神；九子螭吻，平生好吞，今大殿屋脊上张口抬头的“善头”便是其遗像；而七子狴犴，平生好讼，善长“打官司”，现庙堂上那个争辩是非、从言公事的判神便是他的化身。……龙生九子，虽然没有都坐大堂，有的还了无名气，但都发挥了各自的特长，都在自己的岗位上有了作为。

当然，神话毕竟是神话，它却深刻地启示人们：即使是龙，也是分层次的；也要根据需求和可能，各顺其志，各施其长，各得其所。能够翻江倒海、呼风唤雨这样的“龙

王”，当然需要；但除此之外，还得有从事另外工作的。比如说，龙在洒下甘霖的时候，总得有人去疏浚河道，否则就会洪水泛滥，遍地成灾；总得有人去掘井蓄水，否则就会溪流干涸，塘底朝天；总得有人去播种庄稼，否则错失良机，颗粒无收。凡此种种，都说明，龙的定位是千姿百态的；而人们常用“龙腾虎跃”来形容生气勃勃的社会，那是因为他们活跃在一个异常广阔的舞台。

说到我们的社会也一样。它既要有“龙王”来发挥“龙头”的作用，但又要有龙子龙孙来协同配合。现在，我们大多数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家长们希望子女有出息，有作为，能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有用之才，但是他们又往往把望子成龙的企盼仅仅定位在青云直上、要做发号施令的“龙王”这一条上面，以为这样，才算成才，才能算“龙”。这里面就有着一一种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

殊不知，人才是多层次的，社会需求也是多方面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有条件的，让子女去读研究生，成为硕士、博士是对的，我们国家这方面的人才不是多了，而是还很缺少。但除了这种高层次的研究和管理人才外，还需要许许多多的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新型的农民，他们也同样是“龙”。曾记否，当年桑塔纳轿车引进到上海来，其图纸、流水线都是原装进口的，但由于缺乏一流的装配技工，工艺水平比较落后，整车的质量就不如人愿。以后经过培训，有了较高素质的一线工人，才解决了这一难题。凡了解德国工业发展史的人们也知道，德国工业的崛起与迅速发展的一大原因，是办了大量的职业技工学校，通过职业培训和终身教育，拥有了一大批工艺水平高、技术熟练的工人。这也佐证了一个道理，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的分工会越来越细化,个人的聪明才智毕竟有限,需要有各种各样的人才协同奋斗,才能把所有事情办好。

在龙腾虎跃的今天,成才之路可以说是“九千九百九十九”,未考进大学却在某一岗位上自学成才、作出成绩的人何止成千上万。要紧的倒是在我们的学校和家长,在对待“望子成龙”的问题上,一定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教育方法。几十年前,鲁迅先生在旨在改革家庭教育的名篇《我们怎样做父亲》中说:父母对子女——要理解、二要指导、三是解放。说到底还是要因材施教,因人用才,“用其所长,不强其所不能”。要根据每个人各自的禀赋、心理素质、智慧品格以及在社会活动中的能力,来指导孩子读好书,做好人,培养好素质,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孩子满怀信心按照各自的志趣,在社会的伟大实践和自身的不断努力中去寻辟成才、成“龙”之路。

(《浙江日报》2000年3月1日)

采写回眸

提炼好大有益

——析《龙生九子各尽才》

报章上的言论之所以难写,观点、材料、语言的提炼是一个关键。在千把字的一篇文章中,观点提炼得不到位,道理就说不读者的心坎里;材料提炼得不到位,道理的彰显就缺乏具体可感性;语言提炼得不到位,道理的阐述就没有感染力,一篇有影响的言论,往往是在这三个方面精心提炼的结晶。《龙生九子各尽才》这篇言论作品,可以说在这三个方面的提炼上,下了一番工夫。

观点提炼得比较辩证。报纸上评析望子成龙的言论,可以说已经发了很多,这些言论大抵是从否定角度写得。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出现了一个悖论,即一方面报章上年年都在劝人们不要再去望子成龙;另一方面却依然有那么多的人企盼着自己的子女早日成“龙”,以至于在为了孩子的成“龙”过程中,闹出了不少人间的惨剧。就在这篇文章发表的前夕,浙江省金华市的一名高中毕业生,由于不堪忍受其家长在学习成绩上的追逼,最

后竟导致杀了亲生母亲,此事曾引起了全国许多家长的震惊和高层的关注。这个现象也向言论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以前我们所讲的道理,人们会听不进去?这些“道理”是否失之偏颇?根据这个思路,作者从逆向思维的角度对观点展开了提炼。文章一开头就从这样一个观点切入:望子成龙,无论是作为家长对儿女们的一种企盼,还是社会对下一代的一种要求,都没有过错。这就一下子以一种设身处地的心境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然后笔锋一转亮出了自己的一个观点,即望子成龙虽没有错,但要看到“龙”是分层次的,社会是有分工的,需求是多方面的,作为人才也是各式各样的。如果说家长们要“望子成龙”的话,那就要根据孩子自身的特点和各自的兴趣,在社会大舞台中去寻辟适合成才、成“龙”之路。应该说这样来认识问题,是比较符合读者的心理接受程度的,因为作者的观点是辩证的。文章没有说成“龙”不好,但他认为成“龙”并不是当“龙王”;文章也没有说当“龙王”不重要,但他认为有“龙王”还得有“龙子龙孙”来配合;文章更没有说让子女去读研究生,成为硕士、博士有什么不对,但他同时认为由于社会分工的细化,更要有各种各样的人才,他们也同样是“龙”;文章没有指责家长放弃对孩子在学习上严格要求,相反倒告诉家长须注意方法,要因人施教,“不强其所不能”。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到在这篇文章中作者的观点是高度集中的,但观点的阐述又是顾及全面的,“形散而神聚”,这就是辩证法的力量。

我们平时常说,新闻的力量在于事实,言论的力量则在于道理。言论重在讲道理,而讲道理最忌片面性。所

谓提炼,最要紧的是要用辩证法来统领道理,用全面的观点来思考问题,用联系的方法透视事物。辩证法作为一种科学思维的方法,也是我们提炼好言论的观点、提高言论质量的一把“钥匙”。它不仅可以防止道理宣传的片面性,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通病,而且还可以增加言论的深度,增强说服力。

材料提炼得富有新意。材料的取舍是直接为观点阐发服务的,观点有立意,材料无新意,那就很难把抽象层次较高道理化为具体可感的说法。这样,道理虽然是说出来了,也说正确了,但缺乏形象性和可感性,同样难以给人一种理性的享受,引起读者思想上的共鸣。在《龙生九子各尽才》这篇作品中,运用得比较精彩的一则材料就是“龙生九子”的神话故事。这则材料对大多数读者来讲不仅是一个比较新鲜的“知识点”,而且,用它来说明“即使是龙,也是有所分工,可谓各顺其志,各施其长,各得其所”这个观点,是比较自然、比较贴切的。这个材料用到位了,文章要讲的道理就立得住了,也显得丰满了。然后,作者又生发开来由“龙”推及到“人”,从容不迫地进行了一番挖掘,把这则材料运用得淋漓尽致。文章中运用的第二则材料即桑塔纳轿车引进之初的故事,也富有启示性。材料意在说明,社会是有分工的,人才是多层次的,除了高层次的研究和管理人才之外,还需要许许多多的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用了这则材料之后,阐述的道理就有了现实的意义。桑塔纳轿车的知名度是人人都知道的,而原装的桑塔纳比我们组装的质量要高,这也是心照不宣的,但对于“技不如人”这个原因却很少有人去思考。作者把它点了出来用以佐证道理,

这就使道理更具有有一种说服力。文章中运用的第二则材料是鲁迅先生的名篇《我们怎样做父母》中的一段话。这则材料虽然老了一些,但用在这里恰恰可以概括文章的观点。父母对于子女一要理解,二要指导,三要解放。所谓理解就是要看到社会需求的广阔性和人才的层次性;所谓指导,就是要因人而异,因材施教;所谓解放,就是要“不强其所不能”,按照各自的志趣和特长去各显所能,各尽其才。

我们说在言论的写作中,材料的提炼是十分重要的。这种提炼不仅是对众多材料的精心取舍,从中选择出最能说明观点的典故、警句和事例,而且更重要的在于对所选用的材料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引申、论证和分析;不是就材料而论材料,而是就材料而派生出道理。材料本身富有新意,当然是好的,但材料论证得有新意,则就会使具体的、朴素的材料闪烁理性的光芒,升华为带有普遍意义的东西,显示出它的全面性的指导意义。

语言提炼得较为生动。言论是说道理的文章,它与读者见面,其主旨是影响读者来正确地认识问题并按照正确的道理去做,因而语言的生动性也就十分重要。生动了才能广为传播,使更多的人接受,无论文化程度高的还是文化程度低的,都能理解文章的意思,领会言论的思想。《龙生九子各尽才》这篇文章,在表现作者自己比较独到的见解中,应该说语言是用得比较生动的,文字也是比较流畅的。这种生动性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用了一些很切题的神话、例子、警句,包括流行的歌词,如“成才之路可以说是‘九千九百九十九’”,这为文章的生动性增色不少。二是用了一些很形象的比喻来张扬思想,如

“龙的儿子也做着各种各样的工作”，“龙生九子，虽然没有都坐大堂”等等；三是用了一些精辟的富有思想性的语言来深化道理，如“即使是龙，也是分层次的”，“龙的定位是千恣百态的”，家长们“往往把望子成龙的企盼仅仅定位在青云直上，要做发号施令的‘龙王’这一条上面，以为这样，才算成才，才能算‘龙’”，等等；四是通篇文章的语言风格都显得比较生动，采用了不少群众的语言和新鲜的语言，把道理讲得很明白，使读者看得轻松，读来愉悦。

言论语言的生动，是文章表情达意，吸引读者的自然流露。被誉为语言大师的老舍曾说过：“字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全靠用的恰当与否。”所谓“恰当与否”，实际上就是对语言提炼的一种要求。离开了恰当，就谈不上自然，没有自然的生动就是矫揉造作，它无助于观点的表达。词藻再华丽，给人们感觉只能是轻浮，这也是言论写作的大忌。我们提倡要把言论写生动，关键还是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要善于把析事说理的语言化为百姓的语言，特别是化为群众实践的语言。因为百姓的语言往往是一种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是一种谈天说地的对等交流，而经过群众实践所提炼过的语言，则更是一种生动活泼又不乏理性的形象表述。这种语言比较适合群众的口味，符合其阅读心理，也比较适合言论来阐述观点、彰显道理。通过这种语言对抽象层次相对较高，概括性又比较强的言论进行“软着陆”，不仅可以增加它的亲和力和可读性，而且也可以使言论的文风焕然一新。

宋淼芳

浙江萧山人,1940年11月出生。江苏新华日报社评论处主任编辑。从事新闻评论和理论编撰工作32年,擅长评论写作。较有影响的作品有:评论《“对策”也可当镜子》(发表于1985年6月4日《新华日报》),获1985年(第七届)全国好新闻作品一等奖。理论文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析》(署名逝川),刊登于1984年8月22日上海《文汇报》,9月7日,《人民日报》转载,同时被收入《新华文摘》1984年第10期。9月8日,香港《文汇报》和《明报》为此发表消息。此文的发表曾引起了一场有众多媒体参与的关于“生活方式”的讨论。1984年11月30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题为《建立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理论文章,文章主要就小生产生活方式特征作了分析和探讨,文章被收入《新华文摘》1985年第2期。

“对策”也可当镜子

“你有政策，我有对策”，这是一种新的不正之风。有的单位，一事当前，只为小团体的利益打算，全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们的心计不是用在提高本单位的经济效益上，而是钻改革的空子，想方设法“算计”国家，损公以自肥。不刹住这股歪风，改革就无法顺利进行。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事情还有另一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坏事也可以引出好的结果来。搞“对策”固然不对，但作为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领导者却不能因为某项“对策”是错误的，就不屑一顾，或者是简单地呵斥一顿了事，而应怀着兴趣去研究它，把它当做一面镜子，照出我们工作中的某些薄弱环节，然后再去寻求新的解决办法。因此，对于“对策”，一是要反对，二是要研究。

“对策”往往是在政策比较粗疏的情况下发生的，好比水从墙壁的缝隙中渗出，这是一个信号、一种提示，顺着这个线索，我们可以发现政策上的弱点，及时加以补救。党中央关于开放、搞活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无疑都是正确的，这已为多年的实践所证明，必须坚决贯彻；但某

些具体政策以及政策的某些环节上,未必没有一点缺陷。比如,有的政策、条例在制定时不够缜密,或缺少实施的细则,或不注重实行结果的反面论证;有的政策弹性很大,缺乏明确的规定性,可以这样解释,又可以那样解释,以致留有许多可钻的空子。因此,遇到有人搞“对策”,不妨冷静地检查一下政策本身的问题,看看在什么环节上有什么不当、不足、不周之处,进而加以弥补和完善。这样,政策—“对策”—再政策,我们的政策就会日臻完善,有人想搞“对策”也就越来越困难。

“对策”,也是对管理水平和控制能力的一种检验。一项政策要想得到顺利贯彻,除政策本身要对头,还必须保证其实现的必要的监督手段,包括经济的、行政的、立法的手段。谁违反政策搞“对策”,都得视其性质进行严肃处理,对于明显错误、影响恶劣者,就要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该追究法律责任的,就要追究法律责任。现在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管理工作水平不高,经济法规不够健全。经济是搞活了,但缺乏有力的管理;企业的自主权扩大了,但对企业的经营活动缺乏有效的监督,而且赏罚不明,对下面的种种“对策”往往束手无策。结果是,有的地方,老老实实按政策办事的得不到好处,而搞歪门邪道、搞“对策”的却捞到了“实惠”。这也是下面“对策”不断的一个重要因素。由此可见,管理上漏洞百出,“对策”就会花样百出。要防止“对策”,必须严管理、明赏罚。以乱发钱物为例,无论“对策”多么巧妙,也不能不在财务上反映出来,如果我们的银行、税务部门的监督是有力的、严密的,财务制度是健全的,那么“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下面的“对策”便很难得逞。

当然,任何政策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任何管理都不可能是天衣无缝的。但是通过借鉴“对策”,引出教训,尽可能地把我们的政策制定得更完善一些,把我们的管理搞得更严密一些,却是可以办到,而且是应当办到的。这就是“对策”给予我们的启发。

(《新华日报》1985年6月4日)

采写回眸

写作的回顾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不正之风。1984年2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收起对策,执行政策》的社论,严厉抨击这股不良风气。一时间,从中央到地方,不少报刊纷纷加入笔伐行列。那时,对政策方面的问题,几乎无人关注,很少研究,而这恰恰是不容忽视的一面。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可以提供不少因政策不够完善,导致在客观上为搞“对策”留下“余地”的佐证。因此,不能一味谴责“对策”,同时亦应下工夫完善政策。这就是当时写作《“对策”也可当镜子》这篇

评论的背景。

作为新闻评论写作者，我逐步养成了一种思维习惯，即对于一个问题不是简单地看其一面，而是喜欢作多面思考，不但要正面看，还要绕到背后去看看，来一个“逆向思维”、“多向思维”，这样可以看得更透彻一些。任何事物都有其多面性：有正面，有反面；有前面，有后面；有上面，有下面；有外面，有里面，面面皆文章。“横看成岭侧成峰”，此之谓也。

看待政策和对策也是这个道理。我当时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如此普遍，而且屡禁不止，不光有下面的原因，可能也有上面的原因——政策本身的疏漏或缺陷。因此，既要执行政策，又要完善政策；既要反对对策，又要研究对策，把它作为一面镜子。这就是我写作《“对策”也可当镜子》这篇评论的起意。

回顾这篇评论的写作过程，觉得有几点感受值得谈一谈。

要想写出有点特色的文章，一是须集思广益，多议论。在我工作的评论处，多年来形成了一种风气：大家喜欢发议论，好作“自由谈”。不仅在研究工作时议论风生，而且平时读书、看报也喜欢评论一番。一人有感，众人相应，各抒己见，求同存异。有些评论就是这样议论出来的。对策问题，就曾在评论处议论过，并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

调查研究是评论写作的重要一环。有人认为，评论无须调查。这是一个误解。如果没有对实际生活的深入了解，不清楚各项政策在贯彻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新情况、

新问题,就很难使文章有较强的针对性和说服力。在谋划写作这篇评论时,我到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作了一次采访,受益匪浅。研究室的负责人是一位思想活跃、目光敏锐、颇有理论素养的老同志,当我们谈及政策和“对策”的关系问题时,他妙语连珠,发表了不少新见解。他认为,对策是政策的一种反馈,研究对策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政策。他还把政策与对策的关系归结为一个公式:政策—对策—再政策,由此推动各项政策的日趋完备。我在这篇评论中所表达的观点和所作的分析,不少地方得益于这次采访。

宽松的环境,是活跃理论所必不可少的。在写作过程中,我曾有过犹豫,主要担心文章一旦发表,会有为搞对策辩解和开脱、为不正之风张目之嫌。为了避嫌,我在写初稿时字斟句酌,用很大篇幅谈论反对搞对策的必要性,结果弄得面面俱到、模棱两可,自己看看也索然无味。后来我想,反正上面有把关的,只要言之成理,不妨放手写出来试试,于是写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文章刊出后,果然引起了争议,有些来信来稿中的不同意见还相当尖锐。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仅没有受到任何压力,相反得到周围同志的支持。我觉得,这篇评论能得以发表,并被向上推荐,这与编辑部内部有一种良好的探讨问题的气氛和环境是分不开的。

这篇作品发表之后反响之大是始料未及的。当时任中国新闻联合会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业务研究室主任、全国好新闻评委的何光先对这篇评论的评语是:创新。他说:“创新对新闻工作者来说,是立业之本。没有创新,就不能击败对手,增强竞争力。”

当时有两篇主题相同的评论,都是讲如何执行政策问题的,都是入选的好作品,一篇叫《收起对策,执行政策》(载1985年2月5日《人民日报》),一篇叫《“对策”也可当镜子》(载1985年6月4日《新华日报》)。复评时,前者评为一等奖,后者评为二等奖;定评时,这两篇评论的受奖等级调换了一个位置。理由是:《收起对策,执行政策》虽是一篇好评论,但缺乏创新精神,只是讲了应该执行政策一面的道理,而没有点出现行政策中也有不合理的东西,而《“对策”也可当镜子》的评论,则观点比较全面且很有胆识,指出对于‘对策’,一要反对,二要研究,不宜只是斥责或不屑一顾,应当‘冷静地检查一下政策本身的问题’,看看有无欠周密,欠完善,欠明确之处,管理工作有无薄弱环节,从而引出教训,完善政策,堵塞孔隙。”

上海《报刊文摘》于1985年6月11日在头版头条位置介绍了这篇评论的主要观点,标题是《既要批评对策,又要完善政策》。《新华日报》编辑部陆续收到不少来稿来信,对这一问题发表意见。有的表示赞赏,有的提出质疑,有的甚至尖锐地批评是“同中央精神唱反调”。我以为,对一篇文章有不同的评价乃是十分正常的现象。有争议是好事,说明它已引起广泛关注。一篇文章、一件作品,哀莫大于死寂无声,在读者中激不起一丝涟漪。这篇作品经过争论而被大众认可的事实,则最终证明了它的观点正确。

汪言海

1941年3月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65年安徽大学数学系毕业后,长期在安徽日报社驻六安、巢湖记者站工作。1987年起,先后任安徽日报社农村部副主任、评论理论部主任、经济部主任、编委等职。1993年被评为高级记者职称,1994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两次被评为安徽省优秀编辑,入选安徽省第三届新闻十佳。1999年6月,作为中国新闻代表团团长,率团访问了保加利亚和匈牙利。

10多年来,有十几篇新闻作品获省部级以上好新闻奖,其中两篇获中国新闻奖三等奖,7篇获安徽省好新闻一等奖,两篇新闻评论入选武汉华中理工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阅读教材,一篇新闻评论入选1995年度《中国新闻年鉴》,其简历亦入选2000年度《中国新闻年鉴》。著有50万字的新闻业务论著《新声集》。

1979年,冒着风险,多次深入中国农村第一步改革发源地之一的安徽省肥西县,调查研究那里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先后写出了4篇有说服力的调查材料,陆续在《人民日报》内参、新华社内参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写作组的《未定稿》上刊登,为中央提供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了决策依据,成为中国新闻界最早宣传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的记者之一。1998年11月30日,《中华新闻报》在第1版报道——《为民鼓与呼 敢为天下先——汪言海与“包产到户”调查》。

粮农呼唤保护价

10月初,省粮油食品局曾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抓紧定购粮收购,努力完成全年定购任务。凡未经省政府批准放开粮食购销价格的地方,不准拒收农民交售的定购粮”。可是,从农村反馈的信息表明,不少地方粮站至今仍拒收或压价收购农民的定购粮,致使市场粮食价格一降再降,农民叫苦不迭。

前几年,粮食紧俏,50公斤籼稻市场价一度高达50元,与当时的定购价相差近30元,当时国家强调定购粮是指令性任务,一定要完成,这个巨大的差价农民认了,表现了中国农民可贵的奉献精神。眼下,市场上50公斤籼稻价普遍降至20元左右,比国家规定的定购价低20%左右。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的国营粮站却不执行国家规定的定购价,两相比较,反差太大,对此,农民是有意见的。因此,无论从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来看,

还是从取信于民来看,都应该用国家规定的定购价来收购农民的粮食。我们应该设身处地为农民想一想。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国家建立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机制。对粮食来说,为了防止市场价格大起大落,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国家要拥有足够的粮食吞吐能力。这就要求:粮食如发生暂时的或局部的过剩,国家以保护价(目前即定购价)收购以“吞”抬价,保护生产者;相反,如发生暂时的或局部的紧缺,国家实行抛售,以“吐”压价,保护消费者。目前,粮食价格已跌至近6年来的最低点,应该说正是需要国家“吞进”的时候,以实施宏观调控。当然,对农民来说,要加快种植优质粮的步伐。

粮站拒收定购粮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如何正确处理维护各级地方财政利益与维护农民利益的关系问题。历史事实告诉人们,就政府行为来说,在两者发生矛盾时,往往牺牲农民利益这一头。目前一些地方拒收定购粮的做法就是这种行为的一个反映,这是不可取的。谷贱伤农,农民购买力下降,又会影响工商业的繁荣,最终还会影响到财政收入。最重要的是一旦挫伤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将造成粮食生产和粮食市场的大起大落,对此,我们不能不防。其实,前面说到的吞吐调节本身就是经营。“贱则买之,贵则卖之”,既可以平抑粮价,经营得好,可以做到不赔,至少可以少赔。当然,为了稳定粮食这个基础的基础,即使赔一些也是应该的。关键在于各级领导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是不是牢牢地扎根了。

(《安徽日报》1992年11月1日)

采写回眸

立论新颖 力透人心

——撰写《粮农呼唤保护价》的体会

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在一个很长时期，中国实行工业化的资本积累，主要是靠剥夺农民来完成的，途径是通过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来实现，经济学上叫“剪刀差”。尤其是粮食，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强制推行粮食统购统销，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农村第一步改革后，农民有了生产自主权，但粮食、棉花等重要农产品并没有销售自主权。国家对粮食实行定购政策，规定农民必须首先向国家缴纳定购粮，价格由国家说了算，农民完成定购任务后的余粮也只能卖给国家。这样，很多国家基层粮站就成了盘剥农民的基地。当国家粮食紧俏、粮食定购价低于市场价时，国家就通过农村基层干部强制农民向国家缴粮，出现了干部强行到农民家扒粮、农民反抗、相互对立而产生的恶性事件，严

重恶化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一些基层干部尖锐地说：“主帅无能，累死三军！”而当粮食发生暂时或局部过剩、市场粮价低于国家定购价时，一些国营粮站则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拒收或压级压价收购农民的定购粮和余粮。而按国家规定，粮食属国家专营物资，其他人不得经营。这样，国家不收，又不让别人经营，就把农民逼得无路可走。另一方面，农民的负担逐年加重，干部强行收缴，又造成了关系的尖锐对立。

这篇评论就是在市场上粮食价格下降到 1984 年后的最低谷、国家粮站普遍拒收或压级压价收购农民的定购粮的情况下撰写的。作为一个人民的新闻工作者，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反映人民的呼声。一时间，写作的冲动，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根本顾不上看一些领导人的脸色了。

以情动人，以理服人

这篇评论不是简单地呼吁各级领导“提高认识，加强领导”，而是站在国家长远利益的高度，以情动人，以理服人，晓以利害，努力使评论达到一个新水平。

评论第一段是抓住新闻由头提出问题，第二段则用反差很大的事实，从对比中歌颂中国农民的奉献精神，字里行间批评了国家对农民利益的剥夺和不守信用，提出“设身处地为农民想一想”的问题，写得情真意切，力透人心。

如果说第二段主要是摆事实讲道理，以情动人的话，第三段则是以理服人，即以新颖的论点取胜，这个论点就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是以“‘吞’抬价,以‘吐’压价”的宏观调控政策,以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评论指出,现在正是国家“吞进”的最好时机。这一段其实是向国家进言了一个粮食大政策。它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目前,国家除在个别沿海省市作开放粮食市场的试点外,对粮食大省仍实行“敞开收购,顺价销售,(资金)封闭运行”的粮食政策,规定用保护价收购农民的粮食,但实际上很多粮站闭门不收,或压价收购,同时国家又封闭粮食市场不允许别人经营,粮价已降至近9年来的最低点,粮农增收无路,叫苦不迭。

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从国家长远利益的高度论证了如何正确处理国家财政与维护农民利益的关系,尖锐批评了在两者利益发生矛盾时,“牺牲农民利益”的政府行为,并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论证了这种行为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指出“一旦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将造成粮食生产和粮食市场的大起大落,对此,我们不能不防”。

这篇千字文的评论,采用了立论法,即直接论证作者提出的论点。在立论中,我首先采用了对比法。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比较是认识事物和说明事物的好办法。我在文中对比了国营粮站在两种不同情况下的不同做法,含蓄论证了农民是现行国家粮食政策的受害者。接着我采用引证法,论证了我提出的基本对策。所谓引证法,即引用已被证明的,公认的道理、原理或理论,来证明作者提出的论点。在此,我是用“以‘吞’抬价,以‘吐’压价”和“谷贱伤农、伤工、伤商、也伤财”的经济学基本常识,来证明自己的论点的。通篇从提出问题开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层层推进,环环相扣,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一个正确的观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

里固有的。在这以前,我研究了国内外关于粮食问题的大量资料,也调查了农村的实际情况,并从理论的高度进行总结,所以在评论中敢于提出自己的论点。当时的安徽日报社领导敢于在第1版发表这篇评论,也是需要勇气的。在此,我表示深深的感谢。

反响强烈,预言准确

前面已提到,评论曾提出:“一旦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将造成粮食生产和粮食市场的大起大落,对此,我们不能不防。”事后证明,这一警告是很有预见性的。由于农民种粮积极性受挫,粮田大面积抛荒,粮食产量下降,仅事隔一年,粮价就大幅度上扬,带动整个农产品价格的大幅度攀升,使整个国家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这是一大教训。此后,国家采取了两大政策,才使粮食出现了稳定增长的局面:一是大幅度提高了粮食定购价;二是建立了国家粮食专储制度,特别是1998年以后,利用国债资金,大量建立国家粮食储备库,为放开粮食市场、建立“以‘吞’抬价,以‘吐’压价”的机制,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创造了条件。

评论见报后,很多读者来信反映这篇评论有胆识,有很强的针对性;一些农民和基层干部则来信感谢报社反映了他们的呼声。1993年4月,安徽省好新闻评选委员会的评委们,在评论此稿时,一致认为,这篇评论立论新颖,说理有力,为国家制定粮食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评论被评为1992年度安徽省好新闻一等奖,并被推荐参与中国新闻奖的评选,获1992年度中国新闻奖三等奖。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张 琮

原名张清荣，笔名山丁、张山丁、山中木，1929年冬出生于广东省兴宁县，曾就读于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共同创办的香港达德学院。1948年冬离开香港达德学院进入东江游击区参加解放战争。历任解放军随军记者，地区报社记者、编辑、记者站站长，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记者站站长、总编室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当时实行总编辑负责制），广东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1988年被评为高级编辑，1991年被评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曾任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六届政协委员。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教育促进会副会长。

在50多年的新闻生涯中，发表了数百万字的各种体裁的新闻作品和文艺作品。曾经出版《雇农丘子勤翻身入党》、《归队》（合作）、《一个山区农业合作社》、《我国第一个水稻千斤县》等著作。

这种“电视明星”当不得

以前只有电影明星,后来有了电视,又有了电视明星。不过电视明星往往同时又是电影明星,单纯的电视明星是不多的。但是据说近两年又出现了一些不演戏、不唱歌的“电视明星”,而且如不控制,还有增多的趋势。

前些日子下乡,到距离广州几百公里的某市,在一个朋友家里吃饭时,他的小孩儿突然望着电视机不高兴地说:“看,电视明星又来了!”大家一看屏幕,原来是市委×书记在市里的一个专业会议上作报告。连小孩儿都把他当做“电视明星”,可见他的形象在荧屏上经常出现,已经家喻户晓,尽人皆知,并且引起反感了。我是熟悉这位书记的。想当年,他倒是群众心中一个“明星”,不过那是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农村干部的好典型。料想不到的是,他当了市委领导干部以后,竟一下子变成了“电视明星”。

我想,当“电视明星”大概不完全是他的心愿,可能是因为“时势造英雄”。过多地突出个人的遗风,不是至今仍在某些地方盛行吗?不管什么会议,什么场合,都得书记到场亮相、讲话,不然,就是“不重视”,“没有位置”。

在这个情况下,如果再加上有的领导人不注意谦虚谨慎,那么,“电视明星”就会涌现出来了。这里,我想起了这样一件事:

1983年2月,四川省委书记在省党代会上宣布:今后各种业务性会议,书记一般不必到会讲话。他的这段话,第二天竟成为全国各报竞相登载的新闻。这件事绝非偶然,它反映了全国的民心、党心。

寄语某些“电视明星”:如果你能少上电视,多点下去;少说空话,多干实事,那么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也寄语某些新闻单位:你们的笔和电视摄像机,要多记录广大人民群众业绩,至于反映领导人的活动,要适可而止,不然,那是会帮倒忙的!

(《南方日报》1985年6月27日)

采写回眸

《这种“电视明星”当不得》写作经过

《这种“电视明星”当不得》写于1985年6月,是一气呵成,一次定稿。之所以写得那么顺利,主要是因为有

感而发。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起步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建立,政府职能正处于转换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各级领导干部既要忙于指挥各行各业特别是工农业生产的日常运转,又要忙于迎来送往,参加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的各种庆典,忙得不可开交。与此同时,各种新闻媒体迅速发展,特别是广播电视的受众大大增加,各级领导人在公开场合亮相的机会多了,电视镜头摄录领导人形象的机会相应大量增加,久而久之,就产生了受到人民群众讥讽的所谓“电视明星”。

但是,对于捕捉这种“电视明星”并加以曝光,我是有过一个思索过程的。当时我任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社副总编辑,分管总编室和采访工作。一天,一位地方记者回到报社,闲谈中我问起我俩都熟悉的一位地区领导干部的近况,那位记者不经意地说:“他呀,变成‘电视明星’了,天天开会,天天上电视。”我听了不禁心里一怔:深入基层的模范干部怎么一下子变成了浮在面上的“电视明星”?!我一时想起了他往日赤脚下田、和农民打成一片的感人情景,也想起了他讲过的许多讽刺挖苦官僚主义者的笑话……我想,他当“电视明星”,也许是因为“人在官场,身不由己”!然而我忽然又感到,如果没有电视,如果记者的摄像机不老是对准他,他也许当不了著名的“电视明星”……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大概是新闻工作的性质使新闻工作者养成了与众不同的观察和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这时我不得不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能不能就“电视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明星”现象做点文章，给那些“身在官场”的领导人和手握笔与摄像机的新闻工作者提个醒！？当然，要做到“一箭双雕”，写真人真事的揭露性报道显然是不大适宜的，因为这仅属工作作风问题，属人民内部矛盾，被批评者难于接受赤裸裸的批评，我也不愿意用这种方式来将我那个朋友和该市新闻单位的军。因此，必须抽象，不宜具体，与人为善，和风细雨，谈心交心，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收到最好的效果。于是，我决定写一篇题为《这种“电视明星”当不得》的评论，以不点名的方式公开揭露和批评这种刚冒头的社会现象。

当时，《南方日报》第1版开辟了一个叫《直言录》的小专栏，专门列举言之有物、针砭时弊的小言论。我给这个专栏写文章，就不宜写得太长，四五百字就得解决问题。文章必须开门见山，引人入胜，能让人一口气读完。为此，必须十分讲究文章结构。有关文章结构这一形式要素，对于表达主题、题材等内容要素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古人关于文章结构有“凤头、猪肚、豹尾”之说，即起要美丽，能引人看；中要浩荡，内容充实，有说服力；结要响亮，像豹的尾巴一样精悍有劲，能使人回味。这个说法，至今仍值得我们写评论时参考。当时，“电视明星”这个词刚为群众所熟悉，但还没听过有“不演戏、不唱歌”的“电视明星”。我从这里切入，在用一两句话说明随着电视的出现产生了电视明星之后，一下子给读者摆出了一个鲜活的“猎物”：“据说近两年又出现了一些不演戏、不唱歌的‘电视明星’，而且如不控制，还有增多的趋势。”这就给读者留下了悬念，从而引起阅读的兴趣。

但是,接着如果直截了当地指出“不演戏、不唱歌”的“电视明星”就是那些浮在上面指手画脚的领导干部,那文章也会变的索然无味,使人不愿意继续看下去。为了避免这个缺点,我采用了夹叙夹议,以叙带议的手法。紧接文章的开头读了一段“下乡见闻”,并用小孩儿说的“电视明星又来了”这句话,来说明×书记在荧屏曝光的极高频率。这样,既生动有趣,又极具说服力。然后,笔锋一转,回顾了这位书记从过去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明星”转变为现在的令群众反感的“电视明星”的情况,以引起读者探讨“电视明星”现象的兴趣。

文章接着下来就要分析产生这种“电视明星”现象的深刻原因了。这里需要作全面的分析,既不能光讲客观原因,也不能只强调主观原因,不然就不能令人(包括被批评的人)信服,也不利于从根本上防止和克服这种现象。为此,我正词反用,用“时势造英雄”这句话点出社会上存在“过多地突出个人的遗风”,然后指出,在这个客观条件下,“如果再加上有的领导人不注意谦虚谨慎,那么,‘电视明星’就会涌现出来了”。

为了深刻说明这个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以及人民群众对这个问题的极大关注,我接着引述了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关于“今后各种业务性会议,书记一般不必到会讲话”这句话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的这件事,并指出“这件事绝非偶然,它反映了全国的民心、党心”。

文章中间的字数不多,但内容比较充实,论理也比较透彻,基本达到了“猪肚”的要求,至此该有一个精悍有力的结尾。于是,我用简短的两句话点出文章的主题作为结尾。首先,我写下了语重心长的这么一句话:“寄语

某些‘电视明星’：如果你能少上电视，多点下去；少说空话，多干实事，那么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当然，“电视明星”现象的矛盾主要方面是某些领导干部，但也不能因此忽略了矛盾的次要方面。显然，光向“电视明星”提出这样的忠告是不够全面，也不够水平的。因为“电视明星”的产生离不开新闻工作者。于是，我接着又写下了同样语重心长的这一句：“也寄语某些新闻单位：你们的笔和电视摄像机，要多记录广大人民群众的业绩，至于反映领导人的活动，要适可而止，不然，那是会帮倒忙的！”

由于《这种“电视明星”当不得》既立意独特，寓意深刻，针对性强，又层次分明，布局合理，引人入胜，因此发表以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报社内外一片叫好，有的读者还专门打电话提供批评线索，要我再写一些类似的评论。“不要当‘电视明星’”一时成了许多领导干部互相警醒的口头语。1986年6月，这篇文章被广东省好新闻评选委员会评为1985年度好新闻二等奖；同年7月又被全国好新闻评选委员会评为1985年度好新闻作品二等奖。

回顾这篇文章的写作经过，可以总结出好多方面的体会，但我认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写小评论，既要善于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从平凡的事物中发掘意义重大的主题，做到微言大义，以小见大，又要善于铺陈，精心构思，巧妙地运用表现技巧和手法，多层次多方面地提供各种有力的论证，尽最大可能地深化主题。这两者相辅相成，万万不可偏废。

张德修

1954年出生,山东省高密县人,毕业于山东大学,高级编辑,现任农民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农经学会常务理事。

1972年入伍,1978年考入山东大学,1982年毕业分配到中直机关工作。历任农村工作通讯杂志社编辑、副主任,农业部部长秘书,农民日报社总编室主任、专职编委,《中国乡镇企业报》副总编辑,1996年8月调任农民日报社总编辑,1999年9月任农民日报社社长、总编辑,2000年7月任农民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2002年5月,《农民日报》与《中国乡镇企业报》合并后,任农民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1994年荣获国务院颁发的有突出贡献专家的政府特殊津贴。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为数不多的、历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代表,采写刊发了大量农村改革的重大报道和重要言论,为有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轻舟正过万重山》是中央主要新闻单位最早关于山东农业产业化重点报道的文章,之后,又相继采写了《绿树春风》、《蓝天雁鸣》、《碧海浩荡》、《多彩农业的点与面》等文章,对新时期的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山东省农业产业化进行再思考。撰写的社论《卖余粮，不要卖过头粮》荣获 1997 年度中国新闻奖。《把握重点

突出关键 全面宣传》获 1998 年度中国新闻（论文）奖。撰写的编辑部文章《中国农民五十年》刊发后，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央主要新闻单位予以转发，《新华月报》全文转载了此文。专著《农村改革亲历记》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辑录了《关于土地收益与土地承包、转让问题探讨》、《农业问题要从体制上找原因、改革中找出路》、《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的思考》、《四大创造与中国农村发展之路》等有关农村改革的部分重点文章。

中国农民五十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整整半个世纪了，20 世纪的历史长卷也将翻过最后一页。站在这世纪之交的峰巅上，眺望共和国 50 年的风雨与辉煌，我们会深深地沉浸于对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思考中。过去的 50 年，对中国农民来说，是不懈追求不断创造的 50 年，是在曲折中奋斗、在开拓中前进的 50 年，是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建立丰功伟绩的 50 年，也是我们中国农民革故鼎新走向现代化的 50 年。

我们中国农民,作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阶级,在封建社会里,受尽了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农民不断进行的反抗,爆发为农民的起义和农民战争,成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但是,从总体上讲,中国农民在历史上是一个备受苦难的阶级,只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建立了新社会,创建了新生活。

大家知道,我国古代一些具有初步民本意识的统治者和思想家,已经看到有史以来,任何一个政权的兴衰存亡,都与农民的政治态度有直接关系,农民拥护这个政权,它就能存在下去,否则就会垮台。“民为国本,本固邦宁”,中国最大的“民”就是农民。他们反复告诫统治集团成员要注意农民的动向,认为农民问题是最大的政治问题,处理得好,可能是大唐雄汉的气象。处理不好,亦可能重蹈秦二世的覆辙。但是,农民从来没有被看成一种具有历史主动性的社会力量。20世纪20年代,历史选择了农民。中国共产党不仅看到了农民的要求,更看到了农民创造历史的力量,农民作为革命的主力军,人民军队的主要来源,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战场,成为摧毁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中坚,使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步步取得了胜利,广大农民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了信任和向往,欢欣鼓舞地走进20世纪下半叶。

新中国建立特别是土地改革胜利完成后,中国农民关于土地的基本要求获得了满足,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高涨,带来了农业的迅速恢复和大发展。广大农民积极参与了互助合作运动,他们怀着民主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对党的信任 and 良好期望,参加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试验,只是当吃饭问题变成长期困惑时,方自发地去寻找温饱之计,并在合作社、人民公社的体制内一次次燃起了“包产到户”的希望之火。为生计所迫的中国农民发起了一次次的冲击,不屈不挠地探索集体经济多样化的实现形式,并在党内引发了合作化的快慢之争,“包”“统”之争。这期间,中国农民和我们整个民族一起,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沉痛的教训也成为我们共和国的宝贵精神财富。

二

历史又一次选择中国农民,使之成为中国改革的开创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亿万农民的创造性犹如火山迸发,他们坚忍不拔的斗争精神和不可抗拒的进取力量获得了胜利,在党的领导下,使自己毋庸置疑地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舞台上的主角,演奏出中国现代化进行曲的最强音。

如果说本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民在革命战争中的冲锋陷阵,主要显示了摧毁旧世界过程中的主力军作用。那么,在本世纪后 1/4 的时间里,中国农民推动改革的巨大贡献,则显示了选择并成功建构一个新体制、创造一种

新生活的历史主人翁气概。改革从农村发轫,以往的“小农”被刮目相看。改革的成功说明,土地问题仍然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农业和农村的基本问题,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整个农村发展才能获得充分的内在动力。与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的创造相伴随,农民还创造了乡镇企业,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中国农民亦创造了小城镇,走出了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中国农民也开始了基层自治的探索,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制度设计,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注入了活力,等等。驰骋改革舞台 20 余年间,农民的巨大创造体现了两种方向性的历史力量:其一是市场化。当改革的目标设计还远远没有定位在市场经济体制上时,农民的一系列实践清晰地走在市场化道路上,承包制中的农户是最早的市场活动主体,乡镇企业一经诞生即按市场机制运作。其二是民主政治。随着农户经济上主体地位的确立,乡村中利益表现的多元化格局初步形成,农民的利益和意愿需要得到尊重,社区管理者的行为应当受到社区成员的制约,民主自治正在成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农民的伟大实践,不仅在创造着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而且在推动着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如果说,在过去的若干年里世人更多地看到了中国农民的经济贡献,那么,在进入新世纪的时候,他们将会同样多地看到中国农民在政治建设中的新创造。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246

三

中国农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已不仅仅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群体,农民概念的内涵正在发生变化,中国农民的现代化历程开始了。他们在创造农村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也正在塑造一个新的自我。

众所周知,人民公社20年,所有农民都是集体“社员”,少数是直接指挥其他社员生产劳动的社员,多数是任凭安排仅仅在集体土地上简单劳作的社员。社员之间,有足够的生活平等,却没有发挥创造才能的机会,是一个缺乏生机活力的局面。放眼今日农村,也是20年过去,他们虽然在习惯上仍被称为“农民”,但是,我们看到的有成了企业家的农民,有成了工人的农民,有成了个体业主的农民,有进入城市务工或经商的农民,也有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民。农民的内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复杂丰富过,显示着农民阶层本身正在经历着急剧的阶层分化和裂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绝大多数人的经济社会地位在上升,旧体制所设定的城乡分割的格局正在打破,不同位势的社会成员在融合,现代化的历史价值越来越被农民群众认同。

中国农民的创造在这里又一次决定了历史的走向。中国的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农民的现代化。除了部分农民进入城镇成为非农业人口之外,更多的农民正在成为与传统农民不同的现代农民,不断提高知识技能,有市场头脑,崇尚文明正在成为时尚。中国农民在历史

舞台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开阔,他们对现代化的参与热情也是前所未有的高涨。

农民,这个在传统社会中,在传统理论里,被认为是一个在经济上缺乏发展机制,在政治上没有发展前途,必将走向消亡的阶级。但是,当代中国的实践得出了与此不同的结论,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农民在改革开放中,正在大有作为,现在他们当之无愧地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要的主力军。

四

回首50年乃至更远的时间,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农民利益的代表,始终和亿万农民群众心连心,风雨同舟,同甘共苦。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农民建立了血肉联系。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我们党什么时候保障了农民权益,尊重了农民意愿,尊重了农民实践,尊重了农民创造,我们党就得到农民群众的诚心拥戴,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有了好的局面。否则我们就要出问题和走弯路。中国共产党要为亿万农民谋利益,全心全意依靠大多数农民,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有最广泛最深厚的群众基础。中国农民跟着中国共产党走,才有光明的前途。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在世纪之交的今天,更加明确地要求全党:必须充分保障农民的自主权,把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首要出发点,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核心是保障农民的

物质利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必须充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群众推进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为农村经济注入新的活力;要善于用说服教育、示范引导、提供服务的方法处理同农民的关系,等等。

这些是我们党经过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20 年后得出的经验结晶,需要我们每一个党的干部,每一个共产党员牢牢记取,作为今后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纲领,切不可因为农业、农村形势好而忘乎所以。

世纪之交的中国农村充满活力和希望,但是,迅速发展中的农村也面临着种种困扰,成长中的农民遇到了种种困惑。我们要看到,近两年农业结构调整步履艰难,非农产业增长缓慢,农民收入出现了徘徊,农村市场需求不旺,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与此同时,农村社会问题仍然很多,有的地方社会风气不好,农民负担过重,少数地方办了一些损害农民权益的事情,伤了农民的感情。在思想文化领域,价值的多元化使得思想方面的矛盾增加,“法轮功”等反政府反社会势力的形成显示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些都需要我们党带领农民去面对、去解决、去进行新的创造和总结。

千古兴亡多少事,不尽长江滚滚流。新世纪的曙光初露,新农民正在成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即将到来的 21 世纪,中国农民作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在党的领导下,必将以新的面貌站在社会发展的最前沿,以新的活力、新的创造为民族复兴、共和国强盛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华民族必将有一个更加光辉灿烂的未来。

(《农民日报》1999 年 9 月 27 日)

采写回眸

源于历史和现实的理性思考

——评介《农民日报》1999年9月27日编辑部

文章《中国农民五十年》

我们读到的这篇文章是农民日报社在国庆50周年宣传报道时推出的三篇编辑部文章之一,刊发于1999年9月27日。另外两篇是《中国农业五十年》和《中国农村五十年》,分别发表于9月21日和24日。这三篇文章对新中国50年的“三农”历史做了科学回顾和理性思考,把报道现实成就和总结历史经验结合起来,梳理出我国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基本经验。《中国农民五十年》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一些省部级领导给予很高赞赏,不少读者来信来电索要当天报纸;中宣部《新闻阅评》给予充分肯定,并将其收入《国庆五十周年新闻报道精品选》,新华社、《人民日报》很快予以转载,当年第11期《新华月报》全文转载此文。

阅读这篇文章,我们会被一种无懈可击的逻辑力量打动,这力量来自对历史和现实的理性思考。我们知道,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共和国 50 年的历程，有辉煌，也有曲折。人们在欢庆的同时，有理由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和前途命运进行思考。文章从地位和作用的角度对中国农民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卓越贡献做出理性思考：中国农民在历史上是一个备受苦难的阶级，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建立了新社会，并成为当代中国改革的开创者。这是文章立论高瞻远瞩的基础。

文章在展开论述时，着眼于事物的变化，以中国农民在各个重要历史时期的发展成长和伟大贡献为红线布局篇章，采用厚今薄古的手法，紧紧抓住“中国农民 50 年”这个切入点，分四个部分论述共和国 50 年中国农民的变化。文章一开篇就直截了当表明观点：“过去的 50 年，对中国农民来说，是不懈追求不断创造的 50 年，是在曲折中奋斗、在开拓中前进的 50 年，是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建立丰功伟绩的 50 年，也是我们中国农民革故鼎新走向现代化的 50 年。”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文章从理性思考的层面上，分析了中国农民这 50 年和过去几千年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尤其是 20 多年的历史贡献。文章的前两部分对中国农民的变化作了高度的历史性概括，后两部分对这种变化作了深刻的历史性思考。这些概括和思考潜移默化地让读者认识到：历史一次又一次地选择了农民，使之成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主力军和开创者。“我们党什么时候保障了农民权益，尊重了农民意愿，尊重了农民实践，尊重了农民创造，我们党就得到农民群众的诚心拥戴，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有了好的局面。否则我们就要出问题和走弯路。中国共产党要为亿万农民谋利益，全心全意依靠大多数农民，中国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有最广泛最深厚的群众基础。中国农民跟着中国共产党走,才有光明的前途。这就是历史的结论。”非常明显,这个结论是党的政策文件所反复指出和强调的,但是,文章从对历史的概括和思考中得出这个结论,是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不是简单的图解,也不是生硬的宣传。

文章在谋篇布局上没有单纯求新求巧,只是按照时间顺序将中国农民的历史变化、贡献及经验娓娓道来,结构安排朴实平和。文章的第一部分提纲挈领地概述了自封建社会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农民的发展成长,到了“20世纪20年代,历史选择了农民。中国共产党不仅看到了农民的要求,更看到了农民创造历史的力量”。从此,中国农民经过不懈地探索和奋斗,欢欣鼓舞地走进20世纪下半叶。第二部分着重论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农民发轫参与推动改革的丰功伟绩:“农民的巨大创造体现了两种方向性的历史力量:其一是市场化……其二是民主政治。”第三部分深刻揭示了今日农民的自身变化:“农民阶层本身正在经历着急剧的阶层分化和裂变的过程”,“现代化的历史价值越来越被农民群众认同”,“中国的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农民的现代化”。第四部分科学地回顾和思考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农民的血肉关系。文章在平实中透出思想的光华,每一部分,每一个段落乃至每一个论点,都浸透着很强的思想力量。

视野的宏阔是该文一个显著的特点。文章站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和世纪之交的历史交汇点上回头看历史,用思辩的眼光寻求历史的必然。这篇3500多字的文章

没有讲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它用宏阔的视野引领读者去思考中国农民的50年、一个世纪乃至几个世纪，让读者清晰地看到中国农民成长发展的轨迹：从被动地推动历史前进到成为具有历史主动性的社会力量，从摧毁旧世界的主力军到建设新生活的主人翁，从创造农村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到塑造一个全新自我。这种跨越数千年的全方位思考，将历史的逻辑和理性的逻辑有机结合在一起，使文章有了一种历史和理性的大度气势。

文章为媒体运用“评论”体裁策划组织成就报道提供了一个范例。这样做，可以从理性层面上来认识已经取得的成就，扩充成就报道的思想含量，提高报纸版面的影响力。但这同时要求文章作者具有良好的政治和业务素质。《中国农民五十年》的作者是资深的高级编辑，长期从事“三农”研究和新闻报道工作，是少有的几位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参加历届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代表之一，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修养和深厚的知识积累，熟悉“三农”工作实际及其发展态势，了解有关“三农”的方针政策及其制定落实过程，发表过不少有影响的新闻作品。可以说，《中国农民五十年》是其“厚积”而“薄发”的精品之作。

陈修成

高级编辑。1934年出生，安徽无为人。196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83年起任长江日报社副总编辑。曾兼任武汉市人大常委、市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委员，现任武汉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湖北省老年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华中理工大学、江汉大学教授。1993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88年撰写的评论《用生产力标准衡量改革中有争议的人物》获全国好新闻二等奖；1992年系列评论“开放务实谈”获中国新闻奖二等奖；合著《做合格的共产党员》一书，发行30万册，获1979—1983年全国政治读物二等奖；《谈谈党报的指导性》获1989—1992年全国新闻优秀论文奖；1997—1998年在《长江日报》上开辟的《陈修成专栏》获湖北省新闻奖；1990年《新闻工作者是时代的弄潮儿》由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1989年《新闻宣传要稳坐基本路线的钓鱼台》、1990年《党报的指导性和指导艺术》、1993年《研究市场大潮中经济宣传的运行轨迹》、1994年《新闻的脚要跟着时代走》分别获得湖北省优秀论文奖。

ZHONG GUO GAO JI JI ZHE CHENG ZUO TOU SHI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车站、码头问事处直通电话何时装？

对外开放是篇需要一议再议的大文章，可做务虚谈，亦可做务实谈，作者想从后面做文章，也许失之琐细，但却是从实想来的一些事。有些落笔处似是务实，又似务虚，四不像，但也是实实在在的问题，好在务实务虚不是楚河汉界，没有那么绝对，四不像就四不像，只好将就，不怕读者见笑了。

武汉对外开放值得骄傲的一个优势，就是承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国腹地的交通枢纽，武汉对外开放值得骄傲的大型交通设施有两项，一个是新建成的汉口火车站，一个是新建成的武汉港客运码头。

这两大工程在武汉对外开放中日益发挥着巨大作用，它们的英姿雄貌也美化了武汉的形象。

美中不足的是，偌大个火车站，偌大个客运码头，它们的问事处竟然没有一部对外（市内）的直通电话。有关单位着急，市民们着急，可自从这两项工程建成并营业以来，电话问题至今仍悬在那里。

相比武汉改革开放的诸多大事，这两处电话问题也

许是太具体了。然而，具体虽具体，却关系到武汉的形象，关系到市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武汉改革开放的大事。试想有 700 万人口的大武汉，每天有多少单位要为海内外宾客送往迎来，有多少市民和过往旅客要乘车乘船南行北往，西去东来，有多少人在急于打听：某次列车某号轮船几时到汉？去某地有哪次车、哪班船由汉出发？今日有票卖吗？某班某次会晚点吗？等等。对于难以计数的电话问询者，两个问事处等于设在天上，任你呼天，天不应，怎不急煞人也！

汉口火车站和大轮码头两个问事处何以未安装市内直通电话（每处该安的恐怕是若干部），责任在甲方还是在乙方，在施工单位还是在设计单位，或在其他方面，原因是要查清的，教训也是要吸取的，然而眼前最急需的是有关领导和部门出面协调，拿出办法，及时解决。现在常说改革开放时不我待，这两处电话连着改革开放的大业，连接着千万旅客，不同样是时不我待？倘若连这样两个具体问题都解决不了，还何谈什么真抓实干？

（又：近年来武汉开设了程控电话多少万门，是大喜事，不过，原已经安装的电话，因线路或电话机问题，有不少是“带病”作业，好好坏坏，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要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有待解决。）

（《长江日报》1992 年 7 月 27 日）

做好外商投资的向导

外商来汉投资，我们要做好向导和引导。

有的外商到武汉之前就已通过卫星资料把武汉的地表地貌搞得清清楚楚，你引他去看某个待开发的地段，他说从卫星图上看不是这块地方。有的外商调查了解武汉，比本土有的“武汉通”还要“武汉通”些。这些外商来汉投资选择明确，目标专一，自我导向性强。可是多数外商对武汉或粗知，或初知，或不甚了了，他们要来实地调查了解再作定夺，这就需要我们当好向导和引导。通过向导介绍武汉，宣传武汉，让他们了解武汉。

外商投资项目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如果排列一下顺序，大体是：文化娱乐设施（“三厅”之类）→旅馆业→房地产开发→以工业为中心的经济项目→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不少外商要搞“短平快”项目；有的外商则放长线钓大鱼，搞长远性的大项目。对于外商投资项目，只要符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无论大小远近我们都应一概欢迎，就是吃点沿海地区的“边角余料”也无伤大雅。

一概欢迎不等于我们没有倾向，没有重点。当向导，

做引导,要把外商投资引导到有利于武汉经济长远发展的项目上去,引导到能源、交通、通信、市政建设等基础设施上去,引导到老企业改造、老城区改造上去。在给外商编写投资指南中要把重点引导的项目,逐一地列出条目,并详细标明给予的优惠政策,还要说明该项目的发展前景。

向导工作既要在武汉做,又要出去做,不能坐等客人上门。可以组织精干的游说团到海外去游说,去恳谈,去联络,去开新闻发布会,让外面更多的人了解武汉,关注武汉。不说不知道,说了心开窍。当不当向导,搞不搞引导,情况是会不一样的。

(《长江日报》1992年7月29日)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 (1978-1997)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 (评论卷)

新设一个对外开放“专业”

城市现代化需要人的现代化,对外开放的事业需要有懂得对外开放的干部和工作人员。

对外开放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崭新的事物,也是一门学问。它有自身的体系,特定的内涵,像数理化、文史哲一样,应当为它建设一门学科。

过去办党校、办学习班、办培训班、办进修班,让干部们学马列,学党史,学普法知识等,这都是必要的。现在看来,还要给渴求知识的干部们开设一个新的“专业”,那就是对外开放“专业”。事实证明,不懂经济不行,不懂对外开放也不行。因为现在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是各行业的“专业”,已经不仅仅是对外经、外贸、外办部门的事了。办对外开放学习班或培训班不仅要发挥原有教职员的作用,还要邀请高等学府的专家教授和实际工作部门的行家里手来讲授。

对外开放能成立一个“专业”吗?有那么多课题好讲吗?回答是肯定的。笔者虽是门外汉,但不妨抛砖引玉,权且为这个专业的子系统提供一个参考目录单:1. 中国历史上开放与封闭比较;2. 当代社会对外开放的历史

必然;3. 邓小平对外开放的伟大战略思想;4. 中国对外开放的国际环境与国内环境;5. 亚洲“四小龙”对外开放经验;6. 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政策与经验;7. 沿海、沿江、沿边对外开放的态势;8. 武汉对外开放的构想与前景;9. 武汉对外开放的优、劣势评估;10. 武汉对外开放的硬件与软件;11. 海外经济行情和财团简介;12. 港、澳、台经济与社会简介;13. 西方先进技术与先进管理经验;14. 外商投资趋势与投资心理;15. 外经、外贸和海关知识;16. “三资”企业研究;17. 国际法简介;18. 国际惯例简介;19. 外国人或外商生活习惯;20. 如何谈判;21. 如何接待外宾;22. 出国守则。

50年代有过《干部必读》之类的丛书,90年代的今天兴许会有《对外开放必读》、《对外开放须知》之类的丛书问世。

(《长江日报》1992年7月31日)

开发老城区要考虑配套

市委、市政府决定：把房地产业作为武汉的一大支柱产业来抓，向中外投资者出让和批租土地，对利用外资开发房地产，给予优惠地价。

政策一放开，局面活起来，江汉区、江岸区、武昌区、硚口区、洪山区……纷纷在老城区划出或打算划出一些地段出让和批租，吸引外资开发房地产。外商看准了大武汉这块风水宝地，已有几十家财团赶来考察、谈判，一些老城区地段已经出租出去，老城区出租热、房屋开发热正在兴起，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新中国成立后，武汉盖了不少高楼大厦，修了不少通衢大道，从某些方面说确是换了人间。然而武汉毕竟底子薄，财力有限，有些老城区房屋低矮，门面破旧，像是衣衫褴褛的老妇，长年累月地站在大道旁，甚是煞风景。现在租让一些地段搞房屋开发，既可获得可观的租金用于城市建设，又可利用外资成批改造老城区，让武汉美上加美，真是一件大好事。

好事要办好，关键在于要有配套考虑。如某一地段新的写字楼和住宅群建起后，要增加多少人口？相应地

需要多少生活保障措施？（菜场、粮店、煤气网点、上下水、电力供应、文化娱乐、治安保卫、子女上学等）建筑群出现后，车流、人流增加多少？道路、交通、邮电通信如何配套？此一地段开发与彼一地段开发如何协调？各区开发与全市总体布局如何协调？如此等等，都需要预见，需要测算，需要规划，需要综合思考和配套思考。

凡事预则立、则顺、则兴，不预则难、则乱、则废。房屋开发，老区改造，乃百年大计，造福子孙，万望预先精心运筹，不要事后留下难以弥补的沉重遗憾。

（《长江日报》1992年8月5日）



要有武汉的“麦当劳”

国内一些大城市特别是开放城市出现了一种新兴饮食店叫“麦当劳”，北京有麦当劳，深圳也有麦当劳，深圳的一家麦当劳门庭高阔，店堂宽大，能同时容纳 700 多顾客。

麦当劳（亦译麦克唐纳）是国外一种快餐店的名字，创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芝加哥。主要供应汉堡包（一种加碎牛肉的夹心面包）和饮料，也有鸡蛋煎饼、热狗、三明治、色拉、意大利式烤馅饼、肯德基炸鸡等。特点是品种基本固定，规格比较统一，价格经济实惠，供应手续简便，顾客可坐可站，随到随吃，省时省钱。因适应当代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故而麦当劳经世不衰，风靡一时，已从美国走向欧亚各洲。在国外都市的大街小巷，或在郊外高速公路的两旁，常常可以看到巨大的 M 标牌，这是麦当劳在向顾客招手。

中国也有快餐，盖浇饭、阳春面、烧饼油条大碗茶即是。武汉的快餐则有热干面、豆皮等土特产。但是多为兼营，真正形成专业化快餐店的不多，且档次低，设备差。

武汉作为当今的华中最大的开放城市，将来的现代

化的国际性都市，“麦当劳”不可没有，甚至不可少，因为快节奏生活需要快餐适应，乃是现代城市生活的共同点；其次，外国人、外籍华人，由海外而来，从商的、留学的、探亲的、人才交流的，省外的、沿海的、港澳的客人会越来越多，对他们总不能老是以汉味为满足，端出的只是热干面、豆皮。此外，饮食作为一种文化，也是需要中外交流的，亦如外国人要尝尝中餐一样，中国人也要开开洋荤。没有这层缘故，何以理解北京肯德基一类洋味快餐店，就餐者大多是黄皮肤的大陆同胞？

（《长江日报》1992年8月8日）



该考虑高层停车场了

大城市要有大型广场式和高层楼房式停车场。

对外开放的大城市市井繁华，交通发达，过去说车水马龙，现在马不多了，车却大大的多了。可以说是车如流水人如潮。车多了要停没地方，就只好见缝插针，有空子就钻，于是道路被占，交通阻塞，行人叫苦。

一些老城市因为缺少停车场吃够了苦头。武汉自不例外。武汉三镇沿江走向，车辆和行人大多集中在与长江和汉水平行的若干条大道上。在“紧走慢走半天出不了汉口”的中山大道上，在长街数十里的解放大道上，不曾规划大型停车场，留下了很多后遗症，这是前人的事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眼光，不可苛求。而我们这一代人兴建的崭新的建设大道以及其他的什么大道，又安排了多少大型专用的停车场呢？笔者对此不知底细，但闻三镇处处有停车难、行路难的呼声。这不能不是一大遗憾。

随着对外对内开放步伐的加快，随着沌口汽车城的崛起，武汉街头行驶的车辆必将又以惊人的数字摆在我们面前，城市繁荣带来的停车难、行路难这一现代城市病

也必将摆在我们面前,除了扩宽马路,新建道桥,加强管理外,出路之一就是繁华地段、购货中心、游乐中心、大型酒楼宾馆附近建造大型停车场。武汉地皮金贵,如果广场式停车场地皮不够,可建高楼式多层次停车场(底层以下可作地下停车场)。

现在武汉三镇出现了老城区房地产开发热。这是解决老城区建造高楼式大型停车场的好机遇,万不可失。当然,困难也是明摆着的,需要采用各种办法来解决。如可以由政府和企业合资建,也可以由企业或个人建,更可以中外合资建,或外商独资建。停车场可按车流的高低峰不同价格计时收停车费。谁建谁收费,国家对停车场税收可给以更多优惠。这样做于国于民,于中于外,于公于私皆有利。

(《长江日报》1992年8月11日)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商场要再上一个档次

武汉是我国内地的大商埠，商业的地位在全国比较靠前。据最新消息，全国排列出年销售额在亿元以上的百家最大零售商店，武汉市有8家在其之列，为全国各大城市之冠。

市委、市政府最近作出决定，号召全市各行各业要加快改革，扩大开放，促进武汉经济更快更好地上一个新台阶。其中要求武汉要发展大商业、大市场、大流通，在“四城”雄踞的构想中就有在新的起点上把武汉建成商业城这一笔。

各行各业要上新台阶，商业当然也要上新台阶，再具体化一点，武汉市的商场要再上一个档次。

在设施和设备上，要有一批具有现代气息的高档次的大商场，夏天有冷气，冬天有暖气，通风条件好；电梯有上有下；附近要有停车场；商场内要有广阔的内井，有供应饮料点心的茶座，或有供顾客休息、小坐的场所。不说深圳的国贸大厦，就是郑州的建筑规模不太大的亚细亚商场，一进去就有供顾客小憩的茶座客厅，不像武汉的一些商场，顾客很难找到座位，买东西感到劳累。

在类别上要多样化。可以发展日夜商店、早晚商店、邮购商店、租赁商品、折价商店、议价商店、新产品商店、拆零商品；可以搞与国外媲美的大型超级市场，也可以搞普及型的跳蚤市场；为了扩大对外交流，还要争取开设武汉免税商店和外商经营的零售商店。

在商品的经营上，既重视本地产品，也重视全国产品；既重视国内产品，也要有国外产品，使武汉既成为国内产品的博览中心之一，同时也成为国际产品的博览中心之一，从而体现武汉作为中国内地大商埠以及未来成为现代化国际性城市的品格，使武汉逐步成为东方的芝加哥和莱比锡。

商业城的前途无量，商业的台阶要逐步上。

（《长江日报》1992年8月14日）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不能太“苕”也不能太“精”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浪潮由沿海地带迅速向长江流域推进，外商投资的目光也由沿海地带扫向长江流域。今年来汉考察、洽谈、协议、签约的外商成倍增加，对外开放的历史潮流一下子把武汉人推向与外商的谈判桌前。我们应当如何与外商谈判，与外商打交道？答案之一就是不能太“苕”，也不能太“精”，眼前尤其要注意后者。

太“苕”，就是不了解行情，不能知己知彼，心中无底，懵懵懂懂地谈判，冒冒失失地签字，盲盲目目地拍板，事后才发现吃了闷亏，甚至吃了闷亏还以为占了便宜。

假设出现这种情况，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吃一堑长一智，上阵之初交点学费也是正常的。山里人第一次进城卖鸡蛋不懂行情，卖价比最低的还要低。第二次进城卖鸡蛋就变得精明了。

也不能太精。如果算盘打得叮当响，一分一厘也要拉过来，不肯让步，甚至雁过拔毛，敲竹杠，宰一刀，来一个宰一个，谈一个垮一个，吓得人家不敢再来，这无异于关门谢客或开门逐客。吓退了一只带头羊，就赶跑了一群羊，何能引进大笔外资！

这种太精的人其实精明而不高明。这种人只算小账不算大账,只从小处着眼不从大处着眼,不懂得今日城中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还要加一句:无“外”不快。试想深圳如果不是大量地引进外资,能变化得像今天这样快吗? 外资,同样是加速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支柱。

一般地说,外商毕竟是商人,商人没有不赚钱的。生怕人家赚钱,岂不是要把人家改变成慈善家! 让点步,让点利,让人家赚点钱,引进大量外资,借以加快城市基础建设的步伐,加快老企业改造的步伐,加快老城区改造的步伐,加快全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步伐,这是占大便宜的大好事,是该好好算算的一笔大账。

沿海城市有更优于我们内地的条件。我们要吸引外商来汉投资,理应给外商比沿海更优惠的条件与待遇,舍不得这样做,就可能失去当前引进外资的大好机遇,延误武汉的历史发展进程。

愿精明人首先是深谋远虑的高明人!

(《长江日报》1992年8月18日)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 (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 (评论卷)

270

多搞几条霓虹灯一条街

好几年以前,武汉作为全国试点,改革处于鼎盛时期,商业繁华的江汉路尤受感染,这条街上大大小小的商店,争先恐后地在门前安装霓虹灯,入夜五光十色,灯光灿烂,各式各样图案与字号的霓虹灯相映成趣,吸引了顾客和游客。那时的江汉路是灯的世界,光的海洋,彩虹点缀的天街。当年笔者曾陪同著名老报人徐铸成逛江汉路夜市,被灯光映红了脸的徐老兴奋地说:真漂亮!武汉江汉路的霓虹灯这样密集,超过了上海的南京路。

曾几何时,江汉路的霓虹灯光逐渐消失了,又恢复到先前的老面貌。最近市委、市政府决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提出“继续加强江汉路等8条商业街和商业群的扩建配套”,看来恢复江汉路霓虹灯一条街是时候了,而且,武汉这样一个开放型的商业大都市,应当多搞几条霓虹灯一条街,甚至可以让某些地段成为“不夜城”。

搞不搞霓虹灯一条街,过去有过意见分歧。有人认为这是在学西方的灯红酒绿、花花世界,有人认为这是哗众取宠,玩形式主义。此调今日极少有人附和了。西方城市确是霓虹灯多,霓虹灯下确也有污秽之处。然而社

会主义城市的圣洁难道要体现在灯光的暗淡或单调上吗？为什么不能搞得灯火辉煌、五彩缤纷？多一点光彩夺目的霓虹灯，不正是城市繁荣、进步的一种折射，城市美好形象的一个衬托吗？

安装霓虹灯要多花钱值得吗？值得！漂亮的霓虹灯可以美化城市具有社会效益，同时作为广告宣传，又可以扩大企业知名度，吸引顾客，增加营业额，具有经济效益。有史料为证：当年开辟了霓虹灯一条街的江汉路营业额大幅度上升，赚的钱远远超过了霓虹灯的费用。

电力不足还要搞霓虹灯岂不是雪上加霜？没那么严重！美化城市、增加照明，本应列入城市供电计划，更何况霓虹灯用电量较之工业用电、居民用电可谓微乎其微，不足为虑，更何况新的电源总是要不断开发的。

倒是要保证霓虹灯产品与安装的质量。电路不通，红一块黑一块，装一节，掉一节，久而久之，倒了用户的胃口，霓虹灯再次走向消失不是不可能。

此外，在霓虹灯一条街上或附近，要有文化娱乐设施和饮食业相配套，融购物、娱乐、吃喝于一体，这样霓虹灯街上的来客就多了。

（《长江日报》1992年8月20日）

要有丰富多彩的夜生活

不要怕夜生活，作为对外开放的城市更要有丰富多彩的夜生活。

前一段武汉舞厅夜晚营业的时间不超过晚十时半，一些外商、一些南来客、一些有夜生活习惯的人，要到舞厅搞社交，谈生意，潇洒潇洒，可是进场晚，还没听几首舞曲便要打烊，你看，扫不扫兴。最近有关部门宣布开禁，夜晚营业时间不再限制。这个改变，切合时宜，很有见地。

多年前，“夜生活”在一些人眼中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至于“夜总会”则更是望而生畏的字眼。凡是与“夜”字打交道的事物得留点神。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夜生活活跃起来，继深圳之后，武汉的一些改革开放的弄潮儿，在滨江公园树起了不怕引人争议的“夜总会”的牌子。你以惶恐的心情走进去，柔和的灯光，轻松的音乐，彬彬有礼的客人，浓浓的文化氛围，你会感到这里也是很健康的嘛！

日与夜是自然现象，没有阶级和社会属性，更不存在姓社姓资问题。资本主义社会有它的夜生活，社会主义

社会应该也有自己的夜生活,以为与“夜”字打交道就一定是鼠窃狗偷,藏污纳垢,见不得人,这纯属偏见。

现代化的节奏,高效率的追求,多样化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使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歇的传统的日与夜的分工和界限,在很大程度上被融化了。今日社会,以日当夜有之,以夜当日有之,日夜不分也有之。夜作业门类就很多,如夜科研、夜门诊、夜邮电、夜商店、夜餐馆、夜扫街、夜班车。夜作业要有夜服务跟上。而更多的人忙完了白天,则需要夜消遣,夜娱乐。除了守在家里看电视打扑克外,还要有社会娱乐活动。因此城市里总得有那么一些夜舞厅、夜歌厅、夜茶座、夜影院、夜剧场、夜乐园、夜公园……从而丰富人们的夜生活。

武汉现有“三厅”(歌厅、舞厅、卡拉OK厅)200多家,有一种看法,认为数量太多,应当限制。笔者认为,是多了还是不多难以断定,关键问题在于管理。数量的多与少不靠行政手段决定,要交给市场经济,由它去自然调节,自然解决。办不下去,自会关门、转向;想要办,只要符合举办条件,你也用不着限制。

提倡丰富多彩的夜生活,但须注意不要妨碍他人的夜间休息;注意适可而止,不要影响自己的次日劳作;还须有一定的治安管理,防止可能出现的沉渣泛起。

(《长江日报》1992年8月22日)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 (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 (评论卷)

武汉要打楚天牌、华中牌

上海市市长黄菊对新闻界说,上海的发展要打国际牌,也要打中华牌。所谓打国际牌和中华牌,就是多方运用国际条件和全中国的力量来发展壮大自己。

联想武汉,当然也要打国际牌,至于国内,诚然要加强与全国各地的经济联合与协作,但武汉在全国的地位比不上上海,人家打中华牌,我们可以打华中牌、楚天牌。

打国际牌,我们要有国际意识。要动脑筋,想办法,利用多种渠道从海外、国外引进资金与技术,加快我们的发展。同时也要尽可能地把我们的产品、技术、劳力打到国外去。逐步参加国际竞争,投入国际大市场。当今,离开国际市场,割断与国际联系,只能是爬行,更谈不上充当国际角色,变武汉为现代化国际性城市。最近市委、市政府决定积极稳妥地兴办境外企业,鼓励国营、集体企业到海外建立经营网点。一些企业手脚快,已到国外办厂设店。好形势,武汉玩起了国际牌!

对外开放、吸引外资,这个“外”字在武汉来说有两层含义,一是海外之“外”,一是市外、省外之“外”;因之对外开放也就有两个辐射面,一是对海外开放,一是对省

内、国内兄弟城市和地区开放。武汉是湖北省会,背靠荆楚大地和华中大地,楚天与华中,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资源丰富,经济发达,更有广阔的市场,是武汉经济发展的根据地、策源地,也是武汉走向海外的最可靠的后援与后盾。

湖北省委提出:全省要以武汉为龙头,充分发挥龙头的作用,全省要更好地支持武汉,武汉要更好地为全省服务。武汉继续敞开城门后,在城乡通开、城城通开方面奏起了更加高亢的乐章。省委为武汉打楚天牌提供了极好的机遇。

武汉是华中重镇,长江中游的最大经济中心。武汉与长江中游的4省20个地市建成了武汉经济协作区,协作区内进行着广泛的经济联系与合作,这也为武汉打华中牌提供了大舞台。

要打好楚天牌和华中牌,就要防止老大小居思想和地方保护主义,要虚心向兄弟地市学习,实实在在为兄弟地市服务,诚诚恳恳与他们合作,切切实实为他们在汉投资办企业提供优惠条件,在平等的基础上实行互惠互利。两张牌打好了,振兴武汉有望,对发展湖北和华中有利!

(《长江日报》1992年8月25日)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 (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 (评论卷)

企盼最新的《武汉电话号码簿》

现代化的都市,对外开放的都市通信联络十分频繁,它要求通信手段先进,通信工具完备,其中之一,得心应手的电话号码簿不可少。

所谓得心应手就是要能反映电话户现用的电话号码。因此电话号码簿不能太旧、太老,所刊号码不能成为过时品。武汉市现在通用的“最新”的一本《武汉电话号码簿》标明是1990年度,实际上收集的是1989年12月31日以前的全市电话号码,1990年、1991年、1992年三年内的新增和变更电话在现有的电话号码簿上却无从查找。1992年即将过去,而反映1992年情况的电话号码簿又何时能与用户见面?此项工作量想必很大,工作人员可能很辛苦,然而毕竟出版时间跨度太大,用户颇为着急。

得心应手的号码簿要能便于用话人掌握和记忆,号码多变则不便掌握和记忆。好比一个人的姓名几年一变甚至一年几变,连老朋友恐怕也难得对上号。武汉地区的电话号码每年都在变,有时变动面大,变动次数频繁,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和经济的繁荣以及电话事业的发展,是好事、喜事。话虽如此,然而变动亦应有计划,

亦应保持相对稳定,特别是通信网络的调整,应事先周密考虑,精心规划,尽量减少可以减少的变动,防止因事先布局不当可能带来的不必要的变动。但愿这是多余的话。为了适应客观的变动,电话号码簿是否可以出两种,一种是号码没有变动的,一种是新增和变更的,每年只要出一本新增和变更的电话号码簿,就可以既能缩小出版的时间跨度、及时反映变动的情况,又可以减少编印出版的工作量。

得心应手的电话号码簿要讲究规范化。用户要按类别排列,类别之内单位名称按笔画顺序排列,用户名称的字号,大小轻重应当一样。现在的电话号码簿上,用户名称有的字号大,有的字号小,有的轻,有的重。顺序翻阅下来,字号忽而由大变小,又忽而由小变大,很不合阅读规范和视力习惯。何以厚此薄彼?据了解是交40元的字大,交20元的字小,经济效益倒是考虑得很细,但电话簿的美观、规范的形象却忽略了。其实,电话号码簿前后很多页码做了不少广告,经济效益不是已经有了吗?

得心应手的电话号码簿还要求收集的面要广。新增的部类如“三资”企业之类恐怕要立一单项。有些军用兼民用的生产企业或保密性实际上已不存在的单位,经过有关单位核准,也是可以收集到电话号码簿中来的。

尽快出版大家满意的《武汉电话号码簿》,功在电信局,可也少不了纸张供应、排字印刷等单位的协助,更少不了广大用户的支持,最现实的就是要把本单位的电话变动与否及早告诉电信局有关部门。

(《长江日报》1992年8月27日)

让路牌等城市标记更多更醒目

乡里人进大城市最怕的是迷路,外地人、外国人到我们的城市来也怕受迷路之苦。城市对外开放以后,更需要把路牌、门牌以及其他一些城市标志搞得更多更醒目些。

前几年笔者在汉口南京路看到几个老外,背着行囊,面对围观的一群中国人,叽里呱啦,在地图上指指点点。闹了好一阵,人们才明白他们是要找车站路附近以廉价、卫生闻名的爱国旅社。在武汉地图上他们知道旅社的方位,一踏入实地,看不到路牌,连自己身在何方也弄不清了。对比也有一例:去年笔者去纽约最繁华的曼哈顿区,那里南北向有十几条大道(比中山大道、解放大道还要长),东西向有几百条大街,每条大道与街的交界处,都能看到大道的路牌和街的路牌,一条大道上估计有数百乃至上千个路牌,随你走到哪里它都告诉你现在走在哪条道、哪条街上,笔者虽然也是初来乍到的“老外”,但凭着一张纽约地图,便放心地游逛开了。

武汉也有大道、路、街,但路牌太少,路牌的间距太长。有的道路只有一头一尾设路牌,长长的中间路段成了路牌的空白区,陌生人步入此中,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

脑。能不能增加一些路牌甚至学纽约见路口就立路牌呢?城市现代化和开放正不断加快,此事也不可等闲。为了同时方便外国人,路牌也可搞中英文对照的。

大城市上公厕难这已是老问题了。武汉为了解决这个老大难,近年花了上千万元的资金改造和新建了几百个公共厕所,并普遍提高了厕所的卫生等次,这也为武汉的开放办了一件实事。美中不足的是武汉公厕的指路牌太少,有的公厕在周围附近找不到一块指示标记,不知情的人,只有碰到了厕所门前,才知道厕所就在这里,看来要不解决“找厕难”的问题,就谈不上最终解决“上厕难”的问题。公厕一般建在背街深巷,需要由远及近,设置若干标记,为入厕者引导。做这类标记是要花点钱的,不过这比改建和新建厕所所花的钱少多了,应该舍得花这点钱,把好事做到底。

市内公共汽车、电车的停车站,政府和企业修建了不少,为路人称道。但是也有些停车站是有站无牌,或有牌而上下行站不写清,班次的间隔(计划)时间不注明。有的城市在停车站的牌子上还标明:由此站出发,到下列各站的票价是多少,票价就注在各站牌的下方,上车的顾客未等售票员报价就已经准备好了应付的钱,减少很多麻烦。我市不仅要完善停车站牌的建点,而且要在站牌的标志内容上多动脑筋,在为乘客着想上搞出特色。

武汉大街小巷的门牌号码,缺的、损的为数也不少。为整顿市容市貌,把门牌号码搞齐全搞显著点也实属必要。

(《长江日报》1992年8月28日)

吹 南 风

对外开放总的战略构想、总的方针、总的政策是党中央制定的，所以从总的来说，我们要认真学习党中央的精神，坚决按党中央的精神办事。但从如何具体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来说，我们要向全国一切先进地区学习，特别是要向南方沿海一些开放城市与地区学习，要崇尚吹南风。

深圳、珠海、广州以及珠江三角洲的几条“小龙”对外开放比我们武汉早走了8至10年。那里出现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正在雄心勃勃用20年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开放区必然是思想上的“解放区”，那里，实践出认识，物质变精神，人们脑筋洗得快，换得快，突破了不少旧观念，产生了不少新观念，在改革开放上积累了不少好经验，在引进外资、兴办“三资”企业、发展高新技术、土地租让、房产开发、金融活动、城市建设、用人制度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都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过去谈到南方沿海城市的变化，就有人说，人家是对外开放城市，不好比，不好学。现在武汉也成为对外开放城市，且享受沿海开放城市有关政策，从而，在很多方面有了可比性，该是

认真学南方,吹南风的时候了。但愿春风早度武汉关!

吹南风,不是“刮风”赶浪头,而是要结合本地实际来学。要有专门班子或信息中心,搜集和整理南方沿海城市改革开放的各类信息与经验,结合武汉的情况,作出比较。

吹南风,要邀请沿海开放城市的先行者来汉现身说法,传经送宝。也要适当组织不同类别的考察团赴南方考察,事先定计划、定目标,回来交考察报告。前一段以关广富为首的省、市委领导组团到南方沿海开放城市,作深入细致的考察,受益匪浅,对大家是个极好的启发。

吹南风,胆子再大一点,可以与对方取得协议,搞短期性、试验性的干部交流与互换,选武汉的部门领导和厂长、经理到沿海开放城市去做临时性的挂职(或任副职),参加领导,取得经验,或“借”对方的干部、企业家来汉临时任职,传授经验。

不要以为这是灭了自己的志气。须知,南方沿海城市改革开放的新观念和新经验必将日益广泛传播全国,影响全国。先进就是先进,应当服气,应当学习。武汉与之邻近,更应学得快些,学得好些。夜郎自大,封闭观念,中游思想,只能延误武汉的发展时机和历史进程!

当年曾经提出工业学大庆,企业管理学鞍钢,城市工作学上海。今日对外开放,学沿海,吹南风,正切时宜,可也!

(《长江日报》1992年8月31日)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采写回眸

大题目不妨做小、做实

1992年春天，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有关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重要谈话。《深圳特区报》连续发表了“八论”，及时传达了后来人们才知道的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的一些重要精神，诸如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市场经济，不要问姓“社”姓“资”，要看“三个有利于”，不要争论，主要是反“左”防“左”，等等。“谈话”是一场及时雨，“八论”广为传播，一时间洛阳纸贵。

在此之后，我们的报纸怎么做文章？我们已经失去《深圳特区报》的机遇（小平同志南方视察，首站在武汉，首次在汉发表谈话，但无人通气传达，报界不知），不能再走《深圳特区报》的路子，但还是要抓住改革开放这个大题目做文章。

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改革开放的理论、路线以及方针、政策，党中央早有规定，早已说清，特别是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公开发表后，开放问题已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是如何

真抓实干、力戒空谈的问题。我们的评论想走一条路子：在大题目下，做小文章，做实文章，做好文章。

于是本报在头版，开辟了《开放务实谈》专栏，共发14篇。此专栏，不做传达式、解释性、应景式的议论，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突出了务实。《篇头语》申明：开放这篇大文章，可做务虚谈，亦可做务实谈，作者选择的是后者，落笔于那些实实在在的具体问题，也许失之琐细，但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实际问题。只有实际问题解决了，事物才能发展，开放事业才能推进，在这里，一个实际行动，胜于一打纲领。

专栏多篇文章，篇篇务实，有从中外饮食交流的角度，提出“要有武汉的麦当劳”；有从丰富夜生活的角度，提出“多搞几条霓虹灯一条街”；有针对武汉一些大商场不给顾客留休闲座位，电梯只上不下，提出“商场要上一个档次”；有针对乱停车、行路难，提出“兴建高层停车场”；有针对路牌、站牌等指示牌不清，提出“让路牌等城市标记更多、更醒目”；有针对电话簿号码多变、编排不科学，提出“企盼最新最理想的电话簿”问世；有针对盲目学上海对外打中华牌，提出“武汉要打华中牌”；有针对老城区地皮租卖外商缺乏通盘考虑，提出“开发老城区要考虑配套”；有针对外商在汉投资难打交道，提出武汉人“不能太‘苕’也不能太‘精’”；有针对本地干部经验素质有限，提出与东南沿海开放早的城市交换干部，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抓住开放过程中一个个具体而又带普遍性的问题。今日，这些问题多数都已解决，但在文章发表的当时，却是有待解决，有待第一声的呼吁。

开篇《车站、码头问事处直通电话何时装？》属于上

述问题的同类。作者经过调查研究并接受读者点题,感到事情的典型与紧迫,开了第一腔。

车站、码头问事处没有电话这件区区小事,也值得与开放这个大主题挂钩吗?答案是肯定的。文章是怎样使两者挂上钩的呢?

其一,与武汉对外开放的形象和对外开放的事业挂上钩:武汉是中国腹地交通中心之一,车站、码头无电话可通,给外来客人(如投资、经商、访问、旅游、探亲者)留下何等印象?带来何等影响?

其二,与武汉 700 多万市民挂上钩:这么多人口的大城市,每天有多少人要打听南来北往、东去西行的车船信息?文章根据群众的心理列出一批问号,揭示问事处不设电话给市民们带来的不便和焦急。改革开放的宗旨是造福于民,因此城市建设的每个环节都要以人为本,把这个思想贯串起来。

其三,与开放的作风挂上钩:文章指出,两处电话连着改革开放的大业,连着千家万户,倘若连这两个具体问题都解决不了,还何谈什么真抓实干!

文章发表后,引起社会反响,有很多读者打来电话表示同感。时任武汉市常务副市长的王守海很快召集有关部门(有铁路局、港务局、电信局、城建委等)开会,一些牵涉到部门利益而扯皮拉筋的事很快被理顺,车站、码头问事处没有电话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1992 年在中国新闻奖评选中,系列评论“开放务实谈”获二等奖。新华出版社出版《中国新闻奖作品选》(1992 年)收集了此文,该书配有中国记协国内部主任阮观荣所写的述评《中国新闻奖的导向作用》,文中说:有

的同志认为,抓重大题材的报道,那是中央新闻单位的事,地方新闻单位不沾边。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地方新闻单位抓重大题材的新闻也是有机会,有作为的。如《深圳特区报》的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上海电视台的专题节目《来自浦东的报道》……《长江日报》的言论《开放务实谈之一》等,这些都是重大题材的报道。

《中国记者》1992年第12期发表了亦实写的《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评系列评论〈开放务实谈〉》一文,指出“这种‘务实’的评论是当今新闻评论中出现的值得注意的‘新品种’”。《新闻前哨》1993年春季号,作者周光国也以《宏观着眼,微观着笔——评〈长江日报·开放务实谈〉系列小言论》为题,对本专栏作了独到的分析与热情的肯定。



陈新民

1954年5月出生，湖北麻城人。现任湖北日报社政宣部主任，高级记者。

在28年的新闻工作中，采写了大量的新闻稿件，擅长新闻评论写作，20多件作品获国家、省级奖励，1997年被批准享受湖北省政府专项津贴。对广告学有一定研究。1997—1999年兼任武汉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参与主编新闻学教材“珞珈广告丛书”，已出版5部专著。

要敢于负责

在自己的岗位上敢于负责,敢担担子,是每一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应有的品格和态度。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

今天之所以强调这个问题,一是因为时代的重任对干部队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个问题显得更为重要;二是因为当前有的干部对工作极不负责,不敢负责的现象严重,这个问题显得十分突出。有的人一事当前,不是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而是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对工作任务能推则推,能拖则拖,实在拖不掉、推不脱,就敷衍应付,遇到矛盾绕道走。特别是对于“硬骨头”不敢去啃,或一啃不动就往后退。对于实际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调查、不研究、不探讨、不解决,要么哼哼哈哈讲些不痛不痒的意见,要么装腔作势讲些“正确的空话”。这种状况,使我们的一些干部空有其名,占着茅坑不拉屎,占着位子不干事甚至误事、坏事。

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讲是干部队伍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问题,是忘记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缺乏事业心和良好的精神状态。具体说来,有的是“懒”字

当头,疏于政务,懒得学习,懒得“管闲事”,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的是思想疲沓,认为在“仕途”上“盼头”不大,犯不着对工作那么认真;有的是“怕”,怕“吃力不讨好”,怕担风险,怕出问题,怕犯错误。因而,出现了一些“懒官”、“混官”和当“甩手掌柜”的“太平官”。

怕负责任的人有一句口头禅:“出了问题谁负责?”我们说,只要是在正确路线方针指引下,去落实上级正确的决策,去实施我们的战略目标规划,去创造性地开展各项工作,一般说是不会出问题、犯错误的。当然,在具体工作过程中,出一点问题甚至失误,这是难免的,也是不可怕的。省委领导多次强调,对于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只要是为党和人民的利益努力工作,只要不是贪污腐败、玩忽职守影响工作的,要保护他们,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在党的领导下放心大胆地工作。对于责任人来说,也要敢于承担责任,错了就改。对此,党和人民是谅解、理解和宽待的。一点问题不出,一点错误不犯,除非不做工作。而不做工作、不担担子、不敢负责,恰恰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最大的错误。

要解决干部不敢负责的问题,必须纠正那种以不干工作换取不出问题、不丢乌纱帽的错误思想行为,树立起无功就是过,不负责任就是错的意识。从根本上教育干部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用人民给予的权力为人民谋利益,切实担负起党和人民的重托。同时还要从改革干部管理体制、改进机关作风、建立和完善责任制等方面入手,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现在有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干的不如看的,看的常有理,干的常挨批。改变这种状况,就要真正坚持干部队伍“四化”标准和

“德才兼备”原则,真正坚持以“三个有利于”标准看待干部,用人看业绩、看政绩、看贡献。要采取有效措施,让那些敢干敢闯敢干负责的人响亮起来,让那些饱食终日、专挑别人毛病的人得不到好处,让那些“懒官”、“混官”、“太平官”不得太平,让广大干部在良好机遇面前以高度的责任感、紧迫感从事工作,团结和带领广大群众为改革和发展建功立业。

(《湖北日报》1994年3月27日社论)

采写回眸

一篇警世言 震动众人心

——从一篇言论的写作看新闻作品的震撼力

一张报纸,新闻是主体,言论是灵魂、是旗帜。新闻言论作为精神产品的精品,应该具有强烈的心灵震撼力。

8年前,《湖北日报》有一篇社论,不仅在当时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而且其影响力至今仍然十分强烈。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实践的检验,稿件的社会意义越来越深刻地显现出来。

1994年3月27日,《湖北日报》在1版头条发表《要敢于负责》的社论。社论以独到的视觉、实在精到的写作,让人耳目一新。社论对于勤政为民、廉洁奉公、敢于负责的干部是一种支持,是一种鼓励,对那些拿国家俸禄,不思进取的“混官”、“懒官”、“太平官”是一种鞭策,是一种警告。社论指出,在自己的岗位上敢于负责,敢担担子,是每一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应有的品格和态度。今天之所以强调这个问题,一是因为时代的重任对于干部队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个问题显得更为重要;二是因为当前有的干部对工作极不负责,不敢负责的现象严重,这个问题显得十分突出。

社论指出,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讲是干部队伍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问题,是忘记了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缺乏事业心和良好的精神状态。具体来说,有的是“懒”字当头,疏于政务,懒得学习,懒得“管闲事”,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的是思想疲沓,认为在“仕途”上“盼头”不大,犯不着对工作那么认真;有的是“怕”,怕“吃力不讨好”,怕担风险,怕出问题,怕犯错误。因而,出现了一些“懒官”、“混官”和当“甩手掌柜”的“太平官”。要解决干部不敢负责的问题,必须纠正那种以不干工作换取不出问题、不丢乌纱帽的错误思想行为,树立起无功就是过,不负责任就是错的意识。从根本上教育干部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用人民给予的权力为人民谋利益,切实担负起党和人民的重托。同时还要从改革干部管理体制、改进机关作风、建立和完善责任制等方面入手,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社论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咸宁市委等许多单位

及时发出文件要求组织学习,省直一些厅局组织宣讲,《松滋报》等报纸转载社论,襄樊、荆州等地区的一些县(市)主要负责人召集干部大会宣读社论,许多地方把社论作为整顿机关作风的必读文件。广大读者纷纷来信称赞社论为党立言为民代言,并要求对当好“人民公仆”的问题在报上开展讨论。

《湖北日报》为延伸社论效应,从4月9日起推出《人民公仆大家谈》专栏。历时3个月,编辑部从数以百计的稿件中选登10多期。广大读者满怀激情褒扬身边涌现的好干部及其高尚品德和光荣业绩;对于“懒官”、“混官”、“太平官”则表示了极大的反感和鞭挞;对于如何当好“人民公仆”提出了有见地的意见。

社论产生的影响受到新闻界的关注。中央广播电视媒体在黄金节目时间作了介绍,《新闻出版报》介绍了经验,《福建日报》等媒体摘发或转载了社论,《中国新闻年鉴》(1995年版)将社论作为“中国重要评论”全文收录,稿件获中国新闻奖三等奖、中国省(区)党报新闻奖三等奖、湖北新闻奖一等奖、1996年首届湖北名人佳作奖特别奖。

此稿产生的背景是,当时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在经历过一场“洋跃进”、“泡沫经济”的折腾后,迫切需要干部带领群众脚踏实地打攻坚战,而干部作风又不能适应当时的形势和任务。在一次会议上,湖北省委主要领导同志谴责了干部队伍的腐败现象,批评了一些干部作风浮漂的问题,希望新闻单位关注。据此,作者对干部作风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发现群众对两类干部有不同心态:对干部腐败十分痛恨,对

“不作为”的干部十分痛心。而在以往的一些评论中，往往把腐败现象和“不作为”现象搅在一起，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写作中既容易混淆不同性质的矛盾，又不能把道理说深说透，面面俱到，不痛不痒，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要敢于负责》一稿，在立意上，采取层层剥皮的排除法，先将这类干部从“贪官”中“剥离”出来，他们不是“贪官”；再将他们从“清官”中“剥离”出来，他们不是“勤政”的官；然后将他们从“不勤政”、“不作为”中“剥离”出一个“小口子”，以此为切入点，火力集中，攻其一点，涉及其余，问题就能讲深讲透了。

写好举旗性言论，必须摒弃“党八股”。板着面孔，居高临下训人，令人生厌。《要敢于负责》使用的是来自群众中的语言，生动活泼，讲道理娓娓道来，说服力强。如“认为在‘仕途’上盼头不大”、当“甩手掌柜”等语言，都是“口头”语言。分析根源和提出解决办法，采取讲道理的方法叙述，读起来距离感就小一些，说服力就强一些，产生的震撼力就大一些。

在举旗性言论的写作中，新闻界有一种不好的倾向，主要是把这类言论当做应时、应景、应付差事的东西，因此往往敷衍塞责。其实，这就是新闻工作者不负责任的态度。

必须解决“为什么要写”，“为谁而写”，“怎么写”的问题，要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统一思想，释疑解惑而写，为“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相一致”而写，为激浊扬清、针砭时弊而写，写出党心和人民的心声。这篇言论的启示是，新闻工作者一定要时时刻刻用认真负责的精神忠实履行岗位职责，发挥“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作用。

林冠群

海南省儋州市人。1943年1月生。1965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现任海南日报社总编助理、中国苏轼研究会理事、海南诗词学会会长、海南省杂文学会副会长。

已出版学术著作《欧阳修诗文选译》、《新编东坡海外集》、《桂馨楼集》；点校明丘浚《大学衍义补》、《儋县志》四种等。发表研究苏轼论文50多篇，政论、史论、文论200多篇，杂文、散文、小说等100多篇。政论《为什么有人敢伸手要官》获第七届全国好新闻三等奖；政论《买来的官怎么当》获全国省区党报好新闻二等奖；论文《中国古代的用人艺术》获全国第四届领导科学优秀论文奖；杂文《当先生与当学生》获全国晚报“亚细亚杯”征文优秀奖；影评《吴书记的问题怎么办》获全国影评二等奖。《新编东坡海外集》获海南省首届社科优秀科研成果奖。

为什么有人敢伸手要官

已故陈毅元帅曾经警告过那些向组织伸手要官要权要个人利益者：“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然而，我们党执政几十年来，这些伸手者被捉的实在是太少太少了。这就是有人敢于伸手要官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要说伸手者要受处罚，如果有一套非常有效而严密的制度使那些想伸手者无法伸得出手，伸出了也无法捞到任何好处，就不会有“伸手要官”这一说了。如果官职像民主殿堂中神圣的宝石而不是某“大人”权力私囊中恩宠待赐之物，伸手派又何处去要？所以问题出在官职的“私有或变相私有化”。

事实上，伸手派也极少直接开口要官要权的，这毕竟太露骨而且浅薄了。循着官职权力的“私有或变相私有化”的小径，他们走的是后门。先逼近首长，讨首长的喜欢，为首长尽忠尽孝，表现出“肝脑涂地在所不辞”的忠勇，成为首长“圈子里的人”；或则投首长所好，酒色财气，珍奇玩物等，让首长离他不得，缺他不行。然后在首长的关怀下，瞄准机会，叹老嗟卑，迂回婉转，让首长知道他的心事，狠下决心要解决他的“职务问题”。此外，还

有其他妙计高招,更非一般埋头苦干的人能想像得出来。别人凭德才苦下一辈子也没有的机会他轻轻松松便从首长那里拿到了,可见绝非等闲之辈。这类人,要想几句大道理便使他觉悟那就太可笑了,关键还在于制度与制裁。

既然一切均取决于首长,那么首长若认定这种行为实在卑鄙可恶,原本议定要给的官也收回去,以此杜绝“幸进”之门,伸手者便如遭雷殛,伸手派必瓦解无疑。封建时代曾经有过这种例子,如今有没有,不得而知。假如有,希望能蔚然成风。如果普遍能做到这样,伸手派又怎么敢随便伸手呢?在还没有一套严密有效的制度以前,这实在也是一种好方法。

(《海南日报》1996年7月11日)

采写回眸

《为什么有人敢伸手要官》发表前后

1991年以前,笔者曾在省委组织部门工作,对于领导职务升迁的组织程序及有关情况比较熟悉,也曾多次参与过任用领导干部的“考察”工作。从“党管干部”的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组织职能上看,这种“考察”工作应是组织部门十分关键的一道工序,然而,无论就这种考察工作的民主程度而言,还是就其识别人才的科学程度而言,都只能作为一种参考。事实上,领导干部的任用只决定于上级核心领导班子,而领导班子中又往往只决定于“第一把手”。也就是“主要领导说了算”。在这篇短文发表的1996年前后,这种情况又比1991年时表现得更为突出而普遍。由于制度上确定了“第一把手”在用人问题上的权威地位,大量善于钻营的人就使尽各种手段取得“第一把手”的青睐。于是“吏治的腐败”便伴随着各种腐败现象蜂起丛生,并且自然而然地成为各种腐败现象滋生的主要策源地。那些通过钻营取得职权的“领导干部”们大搞权钱交易,肆意编织“关系网”,大搞意在取悦上司的“形象工程”,损害公众利益,给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造成严重的危害,人民群众因此痛心疾首,意见很大,“用人的不正之风”一时成了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

由于笔者曾在组织部门工作过,对某些人钻营官场的作为比较了解,又深感现行组织人事制度上存在的缺陷,因此早就想就此发表评论。恰好1996年上半年报社领导也有此想法,希望从舆论上声援公众,以求得组织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入发展。主题确立以后,笔者就当时所观察到的社会现象结合自己一贯积累的素材,并根据江泽民总书记在一次重要讲话中提到的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跑官、要官、买官、骗官”现象,决定写四个题目:《买来的官怎么当》、《为什么有人敢伸手要官》、《骗官者骗到了谁》、《且说“跑官”的跑》。四篇文章相继在《海南日报》头版《天涯纵横》栏目刊出。

文章见报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天天有读者打电话到报社发表看法,表示支持;有的还亲自到报社约见作者,提供材料,甚或举报“跑官”、“买官”、“骗官”、“伸手要官”者;远地的读者来信来访,认为报纸为人民群众说出了心里话,希望多发表这样的文章。这样的轰动也给组织人事部门添加了不少舆论压力,对当时以及后来的人事制度改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自1998年起,在海南省开始实行的招聘副厅级领导干部以及任用干部时的“公示”制度(即在报上公开即将任用的领导干部名单、履历等,欢迎群众监督)等,就是从那时开始酝酿实行的。这些受到群众普遍欢迎的改革尝试,据悉当时在国内尚属首创。

这组文章中的《买来的官怎么当》获1996年度全国省市党报好新闻二等奖;《为什么有人敢伸手要官》获第七届全国好新闻三等奖、海南省优秀精神产品奖、海南省好新闻一等奖。

从这组评论稿发表的前后情况看,笔者的体会是,新闻言论稿应该主动为社会公众说话,应该关心人民群众所渴望的话题,敢于为他们伸张正义。也就是说,要有强烈的民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履行好舆论监督的责任。至于从新闻评论的写作技巧上看,《为什么有人敢伸手要官》一文的主要难点在于受篇幅的限制,要在一千字以内把问题讲深讲透,必须选准切入点,直奔主题,击中要害,避免长篇大论,言不及义。而组织人事制度的改革以及吏治腐败的问题无疑有着十分庞大而深刻的内涵,无论从哪一个方面入手都可以洋洋洒洒,成“万言书”。那么,什么是组织人事制度改革和吏治腐败问题的要害

呢？很明显，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制度本身。所以本文一开头，就从制度入手。从引述陈毅元帅的话挑明制度的缺陷，再由制度的缺陷直接点明“如果官职像民主殿堂中神圣的宝石而不是某‘大人’权力私囊中恩宠待赐之物，伸手派又何处去要”这一亟待改革的关键问题。第二段即围绕制度的缺陷描述钻营者如蝇逐臭，如何钻这制度的空子，将严肃的、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大局的党管干部的政治运作变成了个人投机取巧的名利场。揭穿了这类人的生存之道，作者又总结一句：“这类人，要想几句大道理便使他觉悟那就太可笑了，关键还在于制度与制裁。”将议论再次回归主题。最后一段，考虑到组织人事制度改革的艰巨性与复杂性，要求一步到位，彻底清除“第一把手说了算”的消极现象是不现实的，因此作者将改革的重点现实地引回“首长”的政治品德上，如果首长们能洁身自好，不受钻营者的腐蚀拉拢，以此杜绝幸进之门，则“在还没有一套严密有效的制度以前，这实在也是一种好方法”。以此回应到“伸手要官”的主题上。其次，写这种千字以内的短论，还要特别讲究文采与形象。新闻评论，其实就是一种时事杂文，因此，好的议论少不了动人的文采与直观的形象。本文开头与结尾的某些言辞与中间一段对伸手要官者种种丑态的描写都可以看到这二者的结合与运用。这都是作者经过审慎选择与思考才下笔的。文章虽短，结撰却不敢率意。

当然，以上关于写作技巧的表述并不表明这篇短文在写作上有多少高明之处，其实这样的水准与技巧，任何一个有相当历练的新闻工作者都可以写出来。所以我更愿意引用巴金老人的话：“我写作不是因为我有才华，而

是因为我有感情。”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想新闻报道与评论更应如此。



周显东

生于196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频率记者。

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多年间，曾先后在经济台、市场经济台、新闻部、990新闻频率做过经济新闻编辑记者，金融证券节目记者、监制，经济专题类节目记者、主持人和新闻部条线记者。

多次参加重大、危险、紧急采访活动，如三峡大江截流、1998年张北地震、抗洪、香港澳门回归报道、南航深圳空难、法航飞机冲出跑道、国航釜山空难、上海记者西北行、进藏报道、申奥等，积累了丰富的新闻采访实践经验。

在2000年11月获第三届上海范长江新闻奖，还曾获上海广电局先进工作者等称号。

作品在历年上海及全国评奖中共获得近40个奖项，包括三次中国新闻奖（两次二等奖、一次三等奖）、三次上海新闻奖一等奖，另曾获多次中国广电奖、中国广播评论奖、全国城市电台广播一等奖等。

周保工

生于1952年1月,现任上海文广传媒集团990新闻频率专题部主任兼办公室主任,主任记者;在进入上海广电系统之前曾任浙江嘉兴电台副台长兼总编室主任。

主要获奖作品有:录音报道《上海有个生态村》,1995年获上海环境好新闻三等奖;录音报道《苏州河水在变》,1995年获中国环境新闻奖三等奖;与周显东等合作录音新闻述评《艾滋病离我们还有多远?》1999年获中国新闻奖二等奖。2001年获上海市建设功臣称号。

艾滋病离我们还有多远？

各位听众，进入7月以来，30台投币式避孕套发放机出现在中国深圳街头，差不多同时，我们听到上海市艾滋病监测中心主任康来仪教授大声疾呼要把叫惯了的“避孕套”改为“安全套”或“防护套”，以凸现它在预防艾滋病、性病方面的作用，这就引出了一个话题：艾滋病到底离我们有多远？下面就请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周显东、周保工采写的广播述评。

【音响，第一交响曲……】

现在大家听到的是1997年8月在上海献演的美国作曲家克里格利亚诺创作的第一交响曲，如诉如泣的旋律展开了艾滋病在美国十年肆虐所造成的痛楚。也许它留给大部分现场听众更多的是完美的演奏而不是它的主题——艾滋病带给人类的灾难。对普通中国百姓来说，艾滋病似乎是很遥远的。我们曾在街头随机采访了上百位市民，不十分了解的占了多数。

（实况，市民）：“艾滋病啊，对人体很有害的呀！”“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性接触方面，通过那些毛巾，澡盆里面可能也会传播。”

“我不太了解,请你不要问我……”

据新华社7月援引卫生部的数据说,中国大陆自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到1998年6月,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累计报告艾滋病毒HIV感染者10 676例,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只是对1 000多万人做检测的结果。卫生部疾病控制司主管艾滋病的防疫二处沈洁处长指出,检测的面还是相当窄的。

(实况,沈洁):我们国家HIV检测能力有限,真正有高危行为的,吸毒者、有性乱行为的人里面,检测的数量很小,这个数字也不能完全反映我们国家流行的真实情况。

毫无疑问,“10 676”只是冰山露出海面的那一小部分,大量的漏检在你我他中间。专家测算,实际感染数量最低在20万~25万,也就是每4 800到6 000个中国人中间就有一个是艾滋病的感染者。

当很多国家的民众已经认识到艾滋病并不理会“国家”、“人种”和“性别”时,不少中国人仍然认为这是“外国人”的疾病,和我们没有关系。事实上,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证实的艾滋病三大传播途径即“性接触”、“血液”和“母婴传播”,都已在中国出现,中国对艾滋病没有想像中的天然免疫力。

全球3 060万病毒感染者中,70%~80%是通过性接触传播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数以亿计的人群在国门内外流动,其中多数是处于性活跃期的年轻人。研究人员张赐琪认为,外来思潮的影响、所谓个人价值的重新确立,使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在性问题上已走得很远。10年前,刘达临教授曾在我国内地首次进行23 000例的

“中国人性文明调查”。

（实况，刘达临）：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调查当中，大学生当中有过婚前性行为的占10%，已结婚成年人当中有过婚外性关系的，占到5%，我认为这些数据都是下限，实际要比这大得多。而到了现在，我认为情况是在发展。

世界上最初的艾滋病人出现在美国男同性恋中，而用“地下状态”来形容中国同性恋可能是最贴切的字眼。刘达临教授曾组织六个地区600例同性恋调查。

（实况，刘达临）：我们发现中国同性恋者有性交行为的比例不大，大概在1/3，但有一个情况很可怕，就是凡有肛交行为的同性恋者，80%不戴避孕套，没有一种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自我保护的方法。

艾滋病性传播另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娼妓现象。来自公安部的数字，光是1998年1月～5月，就查获卖淫窝点1.2万个。1997年一年，全国性病报告数为46万，而实际患者数估计是报告数的5倍到10倍。性病的流行现状使我们不难推想未来几年在中国经由娼妓传播艾滋病的危险。

艾滋病蔓延的第二个途径是经血液传播，包括使用含有病毒的血液或血制品，共用不洁针具吸毒等。在大陆已经报告的感染个案中，静脉吸毒感染占66.9%。我们从国家禁毒委员会了解到，目前全国登记在册的瘾君子54万人，而实际吸毒人数大大高于这个数字。

血液传播中博得人们同情的是输血或使用血制品感染，某省一次抽查就发现15名职业卖血者HIV阳性，并已发现输血感染病例。

近 20 年人类与艾滋病搏斗已经形成一个共识：政府越早介入、初期投入力度越大，防治工作就越有效果，预防成本也就越低。1998 年 3 月刚刚当选的朱镕基总理 5 月份就专门听取了关于艾滋病流行与防治工作的汇报并作出指示，卫生部主管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殷大奎副部长这样说：

（实况，殷大奎）：朱镕基总理非常重视这项工作，我们制定到 2010 年的防治规划通过了，朱镕基总理说以国务院的名义下发。朱总理说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在我们国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国务院和各有关部门应该给予大力支持和指导。

艾滋病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当前最迫切的是立即展开“教育”和“技术”两方面的干预。目前的预防教育局限在每年 12 月 1 日“世界艾滋病运动”前后的集中宣传是远远不够的。此外，香港艾滋病基金会总干事连爱珠提醒我们，宣传的模式也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她以妇女预防层面举例说：

（实况，连爱珠）：不光是给她们谈艾滋病是什么东西，还要教她们怎么去提出要求，跟她的丈夫好好说让他们应具有的安全性行为。

中国控制艾滋病传播另外一个必须下决心的技术措施是推广使用安全套。曾经在妇女教养所进行艾滋病认知调查的研究人员夏国美女士发现有 2/3 的卖淫女性根本不知道避孕套可以保护自己。

（实况，夏国美）：所以当我问她们是不是每次使用避孕套的时候，有的人说我不需要。为什么不需要呢？因为我已经放环了。

1996年吉林省四个感染者不堪歧视和压力，先后外迁，去向不明，再次暴露出国内对病人、感染者的高度歧视恶化了整个预防控制环境。在反复解释和动员之后，一位30多岁的上海女病人终于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为保护采访对象，现在大家听到的是经过技术处理的声音。

（实况，艾滋病女病人）：每个病人得病以后，自己的心理负担已经很重了，如果外界再给她们过多的压力的话，那等于是扼杀她们的生命。

整个采访接近尾声时，我们记者自愿做了抗体检测，当样本呈现我们没有遭遇艾滋病毒感染时，我们并不特别高兴。

【音响，第一交响曲，鼓声……】

想到中国面临的巨大危险，我们真诚呼吁每个中国人包括我们自己，当你可能有危险行为时，想一想HIV这个只有大头针针头1/16000大却极其厉害的病毒，并请大声问自己：艾滋病离我们还有多远？！

（1998年9月12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出）

采写回眸

采 写 简 介

采写缘起：

· 前瞻性研究表明，吸烟与艾滋病是本世纪末下世纪初人类两大致死原因。未来学家普拉特认为，艾滋病对人类的影响将不亚于一场世界大战。

· 从最初的欧美到现在，发展中国家已成为艾滋病重灾区，亚洲下世纪感染人数将居世界第一。

· 中国邻近地区皆为艾滋病高发区，形势严峻，近年中国艾滋病感染数上升极猛，但监测不力。

· 世界医学专家多数认为，人口众多的中国将成为艾滋病侵袭的重点国家，如不采取措施，印度、泰国的HIV泛滥悲剧将在中国加倍上演。

· 艾滋病在世界上始终是个热点，而中国艾滋病现状更是世界传媒关注的，中国民众目前对这一疾病仍处于漠然状态，媒体同样讳莫如深。

· 从6月选题采访至今，部、台共改了近10稿，众人智慧聚焦此篇。

- 由于防疫部门不予配合,病人极其惧怕曝光,采访进行得相当困难。

采写特点:

- 先后采访欧洲(法国)、美国、澳洲及我国港台和内地 14 省市近 70 名专家、病人,录了近 40 盘盒带,不少专家是艾滋病领域的权威。

- 音响涉及面广,文中出现实况的共有 18 人,音响 20 多段,代表性强。

- 条理清晰,从“民众漠视”、“三大传播途径在中国的具体危险”、“对策”、“国家的态度”层层递进,阐述作为一种社会病,艾滋病正极大威胁中国。

- 紧扣“新闻时事分析”这一体裁,突出与专题报道的不同之处,强调分析性和思辨性。

- 在新闻分析体裁中大胆尝试音乐素材的介入,第一交响曲发掘、选择运用巧妙。

- 整篇环环相扣,给人强烈的心灵冲击力,彻底破灭了国人对艾滋病不正确的幻想。

- 在非黄金时段,节目播出后,反映出乎意料,听众来信来电至今不断,国内外一些著名的防治机构(美国、澳大利亚、我国香港艾滋病协会、中国艾滋病网络中心等)已主动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系,愿意进一步提供资料和动态,以推动艾滋病在中国民众中的认识与紧急预防。

附：

触“耳”惊心 敲响警钟

——评《艾滋病离我们还有多远？》

陈乾年

对艾滋病，中国的民众似乎并不是第一次听说，然而，对它真正了解的人甚少。作者抓住这一热点问题，以翔实的事例和数据，层层剖析，从它的传播途径到预防措施等各方面，全面阐述了 HIV 在中国的巨大危险，及时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可以说，这至少是上海地区第一篇详尽评述艾滋病的报道。

不少中国人总以为艾滋病那是外国人的事，与我们并不相干。而我国卫生部门以前对此也躲躲闪闪。这就决定了记者采访的难度。但记者不畏艰难，不辞辛劳，辗转各地历时两个多月，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最终采访到了包括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我国卫生部分管部长、防治专家、香港民间团体和社会学家等 40 多位专业人士，光录音素材就录了 20 多个小时。为了增强针对性和说服力，记者还在街头即兴访问路人；利用广播作了一次谈话节目，倾听市民的真实想法；利用上海公共信息网进行一次网上征文。记者还亲身体验，克服恐惧心理，真诚地同病人聊天，同桌吃饭，并以写保证书等办法，赢得病人的信任，使其打消了顾虑，接受了录音采访（当然，为保证病人安全，播出时作了变声等技术处理）。同

时,记者还不顾非议,主动参加 HIV 抗体检测,使之更具说服力。采访如此投入,实为难能可贵。

本作品几易其稿,光是大篇幅的修改就进行了两次。在创作过程中,密切关注国内外有关艾滋病防治的信息及最新研究成果,尽量采用之。其中以7月深圳街头出现30台无人售避孕套的装置为报道的契机,加强了作品的新闻性。作品文句平实,播音流畅,实况丰富,转换自如。在严格遵循科学性的同时,也尽可能注意形象化。比如,在写到我国艾滋病患者检测人数时,就讲像是“冰山浮出海面的那一小部分”,寓意漏检人数之众;再比如把 HIV 病毒的大小形容为“大头针1/16000”,令人印象深刻。尤其可贵的是本作品不仅尖锐地指出艾滋病离我们并不太远的状况,而且进而明确指出,在目前我们不能一下子消灭吸毒、卖淫、同性恋现象的情况下,应重在预防,关键是大力推广使用安全套等措施。这是十分大胆而又惟一有效的见解,这也是卫生防治部门想说而又不敢提的观点。这首次见诸大众传媒的观点,看似近乎荒唐,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仍大有裨益。

本作品逻辑严谨,观点鲜明,层次明晰,叙述有力,评点到位,富有哲理,而且制作比较精良。其中首尾两段音乐均取自美国现代作曲家克里格利亚诺的《第一交响乐》。即便是当初负责录制这一乐曲的本台音乐编辑也不曾知道这一交响乐的主旨是控诉艾滋病在美国肆虐十年的罪恶。作者几经周折了解到这一背景,果断地采用这一具有特定意义的音乐,既烘托了气氛又深化了主题,且首尾呼应,可谓神来之“笔”。

节目播出后,收到几百位听众的来信来电。有的来

信指出，节目“响鼓与重锤并用”，触“耳”惊心、敲响警钟。有的指出，作品数据新、提法新、观点新、精神新（指朱镕基总理到任后即作指示，年底我国《艾滋病防治条例》出台），令人耳目清亮。播出后本台组织过一次广播讨论，热线电话爆满，反响强烈，要求重播的不绝于耳。本台曾在《生活新观察》节目中播出原先一套20分钟报道，后应听众要求，经删节后在《990早新闻》中播出，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其他一些媒体也因此展开讨论和报道。一些来自澳洲、美国、香港等地的艾滋病防治、研究机构和组织闻讯后也表示将长期提供资料方面的帮助，以推动艾滋病的预防控制。



赵介岐

出生于1945年11月，河南省永城市人，高级记者。197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1972年分配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做新闻工作。1985年在《人民日报》新闻理论进修班进修一年。20多年来，主要从事经济宣传报道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宣传报道任务，多次被评为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1997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新闻工作者。

1985年以来，撰写评论、记者述评等言论100多篇，部分作品在全国和北京市评奖中获奖。获奖作品主要有：记者述评《北京的名牌产品为什么纷纷落马？》获1992年中国新闻二等奖、中国广播二等奖、北京市新闻一等奖、北京广播一等奖；录音述评《“优二兴三”岂能丢二弃三》获1995年中国广播二等奖、中国新闻三等奖、北京市新闻一等奖、北京广播一等奖。

“优二兴三”岂能丢二弃三

实况：

老工人：（录音）“现在有些工厂，打着‘优二兴三’的幌子，出卖工厂，出租土地，把老祖宗留下的家产都给卖光了，我们老职工看了很气愤，造成我们生活困难，每月一共200多块钱，只发70%，也就100多块钱，这点工资也不能按时给。一问，厂子都解散了，往哪找钱去？遇到这样的败家子以后吃饭都成问题啦。”

老工人：（录音）“有些厂子，借‘优二兴三’出卖土地，结果厂子的名牌产品丢了，企业又出现了亏损，职工回家待业，对这样的败家子我们工人十分气愤，希望有关部门管一管。”

实况混播：这是部分职工对本市一些工业企业在“优二兴三”过程中，以“优二兴三”为名，出卖、出租转让房地产发出的呐喊，他们的呼声告诉人们：“优二兴三”岂能丢二弃三？

“优二兴三”是近年本市工业系统探索搞好国有企业，调整经济结构推出的一大举措。“优二兴三”就是城区的企业迁往郊区，发展优质高效的第二产业，腾出城区

黄金地段发展第三产业。但是,在“优二兴三”过程中,一些企业受资金紧张,房地产火爆和利益机制的驱动,出卖、出租转让房地产在京城沸沸扬扬。据调查,近年出卖、出租转让房地产的企业有70多家,据市政协经科委和民建北京市委联合调查组对本市一轻、二轻、纺织等8个总公司、集团调整结构的调查,不少企业以“优二兴三”为名,实际靠出租转让房地产实现扭亏。北京手绢厂并入装饰布厂以后,用转让土地收入的1000多万元还债,盖厂房,但至今没钱买设备,企业又陷入了困境。本市南城一家上千人的亏损企业出租转让土地1亿多元,还债、给职工发工资、奖金,“原装”迁往郊区以后又面临亏损。有的企业把祖宗留下的房地产出租,职工放长假回家,用租金给职工发工资,把二产丢得个净光。还有一些企业,丢掉二产办商厦,商厦亏损。又出租转让给别人经营,既丢了二又弃了三。针对一些企业出卖、出租转让房地产的不良现象,市经委郭永利副处长认为:(录音)“‘优二兴三’不是丢二兴三,也不是丢二弃三,就目前来讲,有的企业将土地出卖后,利用这笔资金还债,或者发工资,勉强维持企业,这种倾向既丢了二,又弃了三。现在有这样一个误区,就是企业没有发展的眼光,只顾眼前利益。我们希望企业在搬迁的过程中,进行产品结构调整,调出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的产品,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在分析企业出卖、出租转让房地产的原因和危害时,正在进行本市房地产市场调查的市政协委员范子昌深有感触:(录音)“我们在进行房地产市场调查时也发现问题,为什么?房地产管理法规不健全,国有企业是国

家的财产,他认为房地产归单位所有,可以任意处理,把钱用来弥补亏损,这就没有钱解决‘优二兴三’的问题。第二产业没搞好,第三产业也没搞起来,你这个企业不还是要完吗?这样对经济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北京威顿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由城区迁到郊区后,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开发、生产市场急需的高科技化妆品包装新产品,取得显著经济效益的事实说明,城区企业到京郊广阔天地发展二产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公司副经理杨祥启深有体会:(录音)“市场如同战场,企业转移到郊区后,要生存,要发展,就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围绕市场的需要开发高科技产品,这样才能带来高效益。如果‘原装’搬迁是没有希望的。”

据调查,本市三环路以内有国有工业企业415家,这些地处黄金地段的企业,大部分面临微利和亏损,“捧着金碗要饭吃”,严重地影响了北京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城区企业走出“紫禁城”,到广阔的京郊大地发展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第二产业,腾出黄金地段发展金融、信息产业等高层次的第三产业。这是落实首都发展战略,建设国际一流清洁城市的需要,有利于国有资产增值,有利于调整经济结构,有利于培育市场,繁荣首都经济。出卖、出租转让企业房地产的歪风,严重干扰了本市综合配套改革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国有资产流失,不是“优二兴三”,而是丢二弃三,是一种败家子作风。针对出卖、出租转让房地产的歪风,市长李其炎指出:(录音)“经济结构的调整,作为全市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和今后工作的重点,通过调整要实现一产、二产、三产的合理布局,一、二产没有很好的发展,三产也难以发展。要防

止国有资产的流失,防止把祖宗留下的产业吃光了,二产没有优,三产也没有发展,这就是悲剧了,搞不好在有些单位,有些工厂很可能出现这个悲剧,这个问题值得引起重视。”

企业出卖、出租转让房地产的歪风不是个别现象,在全国一些工业城市也刮起了这股歪风,已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出卖、出租转让房地产的歪风不刹,城区一些国有企业就会在丢二弃三中消失,“优二兴三”,调整经济结构就是一句空话,搞好国有企业就无从谈起,首都的国民经济又怎么能够发展壮大?

(1995年12月2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

采写回眸

《“优二兴三”岂能丢二弃三》写作所想到的

古老的北京,由于工业布局不合理,三环路以内居民区中有工业企业415家,这些企业大部分污染扰民,居民到工厂寻衅闹事、上访告状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些地处黄金地段的企业,大部分处于微利和亏损,“捧着金碗要

饭吃”，严重地影响了北京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1991年，国家经贸委、北京市委、市政府直接领导和参与了北京一轻工业总公司“退二进三、退四进三”（就是作为二产的工业企业，走出四合院，由三环以内，搬迁到三环路以外，腾出黄金地段发展第三产业）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这是北京市探索搞好国有工业企业推出的一项改革举措。1992年，北京市经委在全市工业企业推广了北京一轻工业总公司“优二兴三”（当时市经委改名为“优二兴三”，就是三环路以内的工业企业走出“紫禁城”，到三环路以外的京郊大地发展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第二产业，腾出黄金地段发展金融、信息产业等高层次第三产业）综合配套改革的经验。三年多来，北京一轻的经验先后经中国轻工总会、国家体改委在全国各大、中工业城市推广后，已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可在北京仍然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据市经委一位主管这项工作的领导向记者透露，北京“优二兴三”经验的推广普遍不理想。记者在采访中，不少企业的领导反映：“优二兴三不能光卖地。”究其原因，主要是一些企业受资金紧张，房地产火爆和利益机制的驱动，以“优二兴三”为名，实际靠出卖、出租转让厂区房地产实现扭亏或摆脱困境。

记者抓住部分企业职工强烈反对（录音述评开头两位下岗老工人的谈话录音就是记者在市政府门口看到很多职工上访时偷录的）、广大群众关心的近百家企业出卖、出租转让房地产这一社会经济生活现象，进行了近半年的深入调查。刚刚有所转机的北京雪花电器公司把城区房地产卖了7亿元，迁往郊区后与国外企业合资，电冰箱成不了气候，企业又陷入了困境。北京化工制桶厂房

地产卖了1亿多元，“原装”迁往郊区后依然亏损。北京造纸四厂厂区建宾馆，把名优产品“金鱼”牌卫生纸转移到乡镇企业，由于种种原因，丢掉了国际市场……在那两年，北京工业亏损企业很大一部分是靠出卖、出租转让房地产实现扭亏的。出卖、出租转让房地产最多的一轻、二轻、纺织工业三个总公司1994年经济效益下滑，1996年上半年全行业亏损（也有其他原因）。这种急功近利、名目繁多的出卖、出租转让企业房地产的败家子作风，严重干扰了“优二兴三”综合配套改革的深化，是一种短期行为，使国有资产流失，穷了寺庙、和尚，富了一部分“方丈”。记者在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对下岗工人、企业家、专家、政府官员等多方面的调查和采访，采写了这篇录音述评。

这篇批评、思辨型录音述评，来自几百名下岗工人因企业出卖、出租转让房地产，用卖回的钱还债，企业“原装”搬迁后，继续亏损，职工下岗，发不了工资，到市政府上访。记者以北京近百家企业出卖、出租转让房地产的这种败家子作风为切入点，进行了分析和评述。这篇录音述评，记者抓住国有企业在深化改革进程中出现的弊端和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发挥广播的优势，深层次、多角度，以大量的无可辩驳的事实，通过各界人上的评说，客观地揭露和阐明了企业出卖、出租转让房地产这股歪风的形成、危害和造成的严重后果，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了“优二兴三”岂能丢二弃三的道理。这篇录音述评揭露、抨击的这股企业出卖、出租转让房地产的歪风，在全国大、中工业城市带有普遍性，具有典型意义。记者站在全国的角度，敢于触及本市乃至全国一些大、中城市

工业企业深化改革中带有全局性、普遍性和北京工业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出现的深层次问题,使下至工人、上到市长形成共识,并指出纠正这股歪风的办法。这篇述评立论正确,旗帜鲜明,论据真实、典型、形象,以理服人。深入浅出的道理增强了述评的说服力、可听性,提高了社会宣传效果。这篇批评、思辨型述评,抨击了社会的丑陋现象,透过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现象,客观地、真实地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有利于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深层次矛盾的解决,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维护了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原则。实践证明这篇录音述评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这篇录音述评播出后受到国家体改委、北京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企业家、广大职工的广泛关注和好评。新华社《文摘报》进行了转载。录音述评播出后没几天,市长李其炎(当时任市长)视察北京电子企业时,我随其采访,我问李其炎市长,我写的那篇《“优二兴三”岂能丢二弃三》的稿子您听到了吗?李其炎市长说:“我经常听你们(指电台)的广播,听到了,小赵,你这篇稿子写得很成功、很及时,帮了政府的大忙,我们正在研究制定本市城区污染扰民企业土地批租、转让的法规和相关政策,尽快扭转工厂出卖房地产的情况呢!”一位在家待业的职工听到这篇广播后,几经周折,找到了记者说:“这篇述评敢说真话,说的就是我们厂子,厂头听了广播,就把在家待业的职工叫到厂子,说是要给我们解决困难。”这篇录音述评被评为1995年中国新闻三等奖、中国广播二等奖、北京市优秀新闻作品一等奖、北京广播新闻优秀作品一等奖。新闻媒体作为舆论监督的工具,正确有效的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舆论监督必将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批评性报道必须坚持客观、公正、真实的原则，处理得好，将产生不可估量的社会效果。但是，任何新闻作品都是要经得起实践检验的，这篇录音述评播出7年来，经受了实践的考验。实践证明这篇录音述评的论点、论据等是正确的，推动了北京工业布局、产业结构调整 and 城区污染扰民企业向郊区的转移。1999年，北京市政府出台了《北京市实施污染企业搬迁办法》；1999年，经过修改，出台了《北京市推进污染扰民企业搬迁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实施办法》；同时提出了四环路以内的污染扰民企业要迁出四环路以外，并制定了五年搬迁计划。2000年又出台了《北京工业布局调整规划》和《北京市四环路以内工业企业搬迁实施方案》。到目前，北京四环路以内污染扰民工业企业已搬出130多家，腾出黄金地段土地421万多平方米，获转让资金196亿元。企业通过“优二兴三”和有效的搬迁转移，一大批传统产业到京郊大地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落户，生产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品，成为北京工业新的经济增长点，为繁荣首都经济带来新的契机，同时改善了首都的生态环境，为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把北京建设成为现代化一流国际大都市做出了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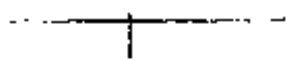
胡占凡

1953年11月出生,黑龙江木兰人。1970年参加工作,在黑龙江省木兰县广播站任播音员、记者、编辑。1976年调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任播音员、记者、编辑。1983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攻读新闻写作,研究生毕业。1987年调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后任地方新闻部副主任,新闻部副主任,新闻中心主任,台长助理,副台长。1996年评为高级记者,1996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1年4月调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任党组成员、副局长。目前还担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六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副主席,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副会长等职务。在长期从事新闻工作过程中,有多篇新闻作品获得各种奖励,其中新闻述评《拜金主义要不得》、《扫除形式主义》,论文《重在把握——对舆论导向中热点问题的思辨》等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 (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 (评论卷)

扫除形式主义



在社会生活当中,人们总能感觉到有这样一个影子吸附在一些工作上,它推不开,挥不去,今天赶跑了它,明天又冒出来。这个影子就是形式主义。说起形式主义,几乎人人反对,因为它只有虚,没有实,耗费财力、物力、精力,贻误办事时机、妨碍办事效率。更为严重的是,作为一种风气,它侵蚀党的机体,破坏经济建设。在今年的两会上,不仅李鹏总理强调力戒形式主义,代表委员们也对形式主义同声讨伐,称它是“事业大敌”、“过街老鼠”。

代表委员们列举了形式主义的种种现象,他们的看法是: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这种东西简直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比如:政治学习本来是一件需要扎扎实实去做的事情,形式主义偏来捣乱,学之前先提一堆口号,全省掀起学什么什么热潮,全区又掀起学什么什么热潮,接着滚滚而来的是不讲实效的学习班、培训班之类。来自北方省份的一位人大代表谈到了这样的情况:有个地方要对党的生活搞痕迹管理,一切组织活动必须纸上有记录,有的单位根本没活动,结果每月领导检查,就让搞文字的人编造一个,熬了几个通宵之后,交上令上级眉开眼

笑的记录,什么某某书记说,某某支委表示,某某党员认为,编造得像真事一样,有声有色。厚厚的学习材料交上去了,真正的学习效果无人过问。

经济上的形式主义更叫人心烦,不管哪一层,都搞检查、评比、考核、达标,还有名目繁多的参观、观摩、考察、联谊,到处是典不完的礼、剪不完的彩,好端端的绸子剪了一条又一条。

如此这般的办事只走过场的现象,代表委员们数了一桩又一桩:动不动就上街敲锣打鼓,大横幅上写着“建设精神文明”,横幅前站着的宣传员们却吐了一地瓜子皮;“这个月”、“那个月”当月煞有介事,过月一切照旧;“这个节”,“那个节”想个名目就是节,你搞观灯节,我搞赏花节;啤酒、桃花、西瓜、红枣都被当成大宴宾朋的由头;连死人、鬼怪、动物也不由分说被拉出来做招牌,你要求宣传计划生育,他就组织人上街扭秧歌;你要求植树造林,他就组织人搞彩旗招展,至于树活不活随它去;上下对口的机构更是林林总总,名称叫人眼花缭乱,像“经打办”、“打狗办”、“打拐办”、“社精办”、“交委会”,真是牌号繁多,莫名其妙,人们对这类机构的评价是:人浮于事,用处不大。

面对这些形式主义花架子,有的代表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些人干实事是外行,搞形式是专家。

谁都知道,形式主义并非今天才有,我们也不是今天才反,为什么反不掉?代表委员有不少中肯的分析,黑龙江代表邵奇惠说到了要害处:形式主义之所以屡禁不止,原因之一是过去光从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上来纠正,忽视了思想观念和工作机制导向上的原因。搞自我感觉良

好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必然派生出表面上轰轰烈烈的形式主义。

一些干部只搞所谓对上负责,不想为老百姓办实事,也是产生形式主义的温床。代表委员们举了很多这方面的例子,一些干部整天想的是“广播有声、报上有名、领导心里挂上号”,这些人当然乐意做表面文章,至于有没有实效他不在乎。

形式主义是和官僚主义结伴而行的。代表委员说:谁说形式主义没用?官僚主义就靠它吹吹打打抬轿子。此话不错,机构臃肿、冗员充塞,有庙就有神,有神就显灵,形式主义就在这里得以滋生繁衍。一位厂长说,他们要申办一个技术开发公司,非要440个章不可,结果,跑了一年,才盖了390个,还差50个。难怪有人说,有多少官僚主义,就有多少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一定意义上就是反对官僚主义。

谁都承认,反对形式主义难。但是再难也要做。尤其是在今天,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大政方针已定,接下来最重要的是去真干,去落实。在两会上,代表委员们也有许多好见解,首要的一条,是要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真正落实,转变观念,这才能说真话,干实事,考察干部的办法要完善,切不可被那些只爱搞形式,不愿办实事的人所蒙骗。监督机制也要健全。

党中央反复要求,搞建设,办事情,要真抓实干。只要我们反对形式主义的时候不搞形式主义,拿出真动作来,形式主义最终一定会被扫地出门。

(1992年3月3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

采写回眸

关于《扫除形式主义》的写作

《扫除形式主义》这篇作品是在 1992 年“两会”期间播出的稿件,它具体有以下特色:

1. 切中时弊,思想性强。形式主义作为一种工作作风上的痼疾早已被广大干部、群众所深恶痛绝,它给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和实际工作所带来的影响人们有目共睹。在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对清除形式主义、扎扎实实抓落实的呼声很高。作品以此为契机,反映了会上会下共同的呼声,因而激起了听众的强烈共鸣。

2. 取材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作品没有一般的空洞说教和讲大道理,撷取群众身边发生的典型事例,夹叙夹议,因而易于与听众沟通,引起共鸣。

3. 行文流畅、自然,语言朴素无雕饰。作品力戒套语和板起面孔训人的写法,语言明白晓畅,朴实无华,既议论风生,又有自己的语言特色。

作品播出后,激起全国许多听众的强烈共鸣,打来电话谈感受、索取稿件的接连不断,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来

信纷纷寄到电台。上级领导机关表示赞赏，一些新闻单位如《光明日报》也索稿全文转载。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局认为，作品观点鲜明，切中实弊，特推荐给人大两位秘书长参阅。北京军区索稿作为学习材料。听众认为，这篇作品切中时弊，反映了群众呼声，有胆量、有气魄，说真话、摆实情，分析透彻，一针见血，具有较强的感染力，让人心服口服。

1992年就此篇文章曾应邀写了篇心得，现附录如下：

述评写作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它既要有消息写作“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单刀直入的品格，又要有评论写作鞭辟入理、纵横捭阖的品格，它不光讲事实，还得说道理，讲事实不是打盆说盆，打碗说碗，而要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凡可助主题一臂之力的事实尽可为我所用，而不必囿于时空的限制；说道理也不是简单的一、二、三、四，“应该”、“必须”、“而奋斗”一类，而要有对问题切实的分析，对现状准确的估价，对未来科学的展望。

即便是构建这样一个粗线条的框架，对写作者的要求已经不低了：一要占有大量事实和资料；二要有一颗冷静清晰的头脑，具有对事物本质的穿透力和作出分析判断说理的能力；三要有叙事说理兼备、议论风生的表达能力。此外，善于把握时机，审时度势，选准题材等，也是对写作者必不可少的要求。

愈是难，便愈是想试，人大凡如此。在中央广播电台近年的两会报道中，许多记者都挽起裤管涉及了广播述评写作这条不易通过的河，可喜的是，多数人到达了成功

的彼岸,得到了听众的认可。这一番番努力之中,留下了不少艰辛和回味,它将作为每个尝试者的成果贮藏在我们思维仓库中,为日后的新闻实践不断提供养分。

在中央广播电台的“两会”报道中,《扫除形式主义》这篇述评得到一些听众的肯定,报章媒体转载,许多听众来信来电话索稿,其中颇多溢美之词。作为写作者,我们很理解,取得这样的社会效果,并非作品真的有什么出类拔萃之处,而是这个题材本身激起了听众的共鸣,道出了人们对形式主义陋习不吐不快的心境。正是基于此,许多听众宽宥了作品的稚嫩与偏颇,漠视了写作技巧上的粗糙与肤浅,而投了赞成票。但无论如何,良好的反馈总是最令写作者欢喜的事。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这一点是作品得到肯定的惟一原因,如果单就这篇作品展开新闻述评写作的讨论,我们似乎还可以找到几点可供切磋的地方。

首先,看它立论的社会性。事实上,无论在何种场合、何种社会,你要宣传一种观点,首要条件就是要有人群的共鸣,有公众的需要,有社会的需要。否则,这个观点充其量也只是个人精神扩张,没有人会买账,你的“论”也就立不起来,这就是社会性。换言之,所要阐述的观点,必须要有普遍的社会意义,能搔在众人的痒处,正是听众欲说的,正是中央要抓的。《扫除形式主义》这篇述评,在这点上是在看准了。对形式主义为害之甚,群众积怨颇深,必欲除之而后快,而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更感到这是一只非除不可的拦路虎,党中央、国务院耳提面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真抓实干,要落实,动真的。可以说,从上到下,从普通百姓到总书记、总理,都深切感到

“落实”二字是关系全局的要旨。在这样一片呼吁“落实”的社会气候中，作“扫除形式主义”这样的立论，自然会得到社会和公众的认可，这意味着，这篇述评从一开始就找到了牢靠的社会根基，而不是作水上浮萍状。

其次，选题的及时性。问题要善于择机而发，但要真的做到在恰当的时机抓住恰当的题材也并非那么简单。这要对两个方面进行判断：一是对形势、背景的判断，上面抓什么，下面干什么、有什么倾向和问题，做到“胸中有全局”，以此为尺度，理出哪些题材是重要的。二是对作者手头掌握的新闻线索的判断，要很快判断哪些题材最富典型意义，最易引起听众共鸣。有了这两者的相互参照，你就能很快在纷乱的新闻线索中理出头绪。这篇述评从孕育到诞生，经历的正是这样一个过程。年初，随着改革之风劲吹，中央大力提倡务实，群众呼声更高，唾弃华面不实的花架子，这是大背景。“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带来了民意，提供了大造舆论的好时机。可以说，在“两会”报道中及时发出对形式主义的讨伐，是占了天时地利的。

再次，取材的典型性。有了好题材，还要有好材料，如同烹饪，有了好菜单，还靠好原料。一般说来寻找为主题服务的材料并不算难，难在选择，即哪些材料最富典型意义，最能揭示本质。一般来说，采访过后摆在你面前的材料总是鱼龙混杂，良莠莫辨，这时就要看谁在扬弃上有功夫。有的材料是紧扣主题但欠生动，有的虽生动却游离主题，显然二者都不可取。好材料应该是事微面旨远，言简而意赅，貌不惊人，却有震撼人的力量，比如一些细节、语言等就是如此。在《扫除形式主义》这篇述评中我

们选择了一些比较典型的材料,比如凭空编造学习记录、宣传精神文明却吐一地瓜子皮等,这些材料如用得恰当,要比单纯说理有力量、印象深。

最后,语言的鲜明性。作为文章建筑材料的语言具有不容忽视的力量。相同一件事,相同一个理,出自不同人之手,其效果大相径庭,个中奥妙多在语言上。人们说一些新闻报道千人一面,也多是指语言的呆板、贫乏、重复、无个性和公式化。我们在用电脑打印稿件时,就能发现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现象:凡是个性不强、新鲜语言不多的稿件打印起来很快,因为电脑里有许多词组和套话可用;相反,新鲜语言多的稿件,打印起来就不那么顺手了,因电脑里没有那么多现成的词组好用,只好一个字一个字地敲上去,这对我们应该是一个提醒。比如,参加一场新闻发布会,记者们得到的信息一样多,但事后生产出来的作品却有高下之分,这就靠语言的竞赛了。新闻语言似乎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通顺、明白、明确;二是鲜明、活泼、生动;三是富于个性,形成风格。《扫除形式主义》很想在语言上作些努力,比方尽力躲开陈陈相因的套话、旧话,追求新鲜、尖锐、干脆,尽可能符合述评的文体,增强语言的力度,同样的意思尽可能说成自己的风格。有道是:“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可以相信,只要我们人人都来炼字、炼句、炼话,新闻园地必定是“百般红紫斗芳菲”的图景无疑。

《广播业务》1992年8月

姚达添

1942年10月5日出生于广东省潮阳县（今潮阳市）一个世代农民家庭。学生时代是在贫寒苦读中度过的。于1961年7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4年4月被派往广州军区桂林军校深造，毕业后成为军队的一名基层干部。1966年下半年，新华社到军队选调干部，从部队转入新华社从事新闻采编工作至今。

在新华社，历任中央政治处外事记者、编辑、发稿人，驻香港分社记者，对外部中文采编室副主任，综述评论室主任。专业职称高级编辑。采写了大量的新闻综述、述评、评论类稿件。其中，有两篇评论最为人们所称道，即：《是“维护人权”，还是推行强权？——评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和则两利 抗则俱伤——评中美经贸关系》。

是“维护人权”，还是推行强权？

——评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

新华社北京2月27日电（记者姚达添）美国国务院不顾国际法准则，每年发表一个《人权报告》，以“维护人权”之名，干涉别国内政，推行强权政治。

美国国务院2月1日公布的《1993年人权报告》，再次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人权状况进行肆意歪曲，无理指责，惟独不谈美国自身的人权问题。这个报告妄图迫使别国接受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按照美国的人权模式来改变别国的政治制度，因而遭到许多国家和舆论界的反对。

享受广泛和充分的人权，是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为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各族人民长期受侵略、被压迫、遭凌辱的悲惨历史。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国采取种种措施保障人民的各种权利。今天中国的人权状况已经得到了根本的改善。中国目前政治局势稳定，民主与法制建设取得很大进展，经济繁荣，百业兴旺，

人民安居乐业,这是世界有目共睹的。

当然,中国的人权状况也有某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中国的人权状况在许多方面优于美国。美国每年因凶杀、抢劫、强奸、吸毒贩毒、暴力事件、种族歧视等造成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犯罪率,使大批美国人丧生,使美国人民的人权遭受侵犯。按美国官方的统计,美国监狱里关了100万人左右。中国的监狱和劳改场所总共关押了120万人(1991年是110万人)。由于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5倍,按人口比例计算,美国坐牢的人数比中国多3倍。

美国政府承认,美国有700万人无家可归。美国常年有二三百万人露宿街头。而中国因无家可归而露宿街头的人数,每年只有15万人,他们都得到民政部门的及时安置。

美国的人权问题如此严重,为什么热衷于批评别国的人权状况呢?

说穿了,美国并不是真的要“维护人权”,而是借口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践踏国际法准则,为其霸权主义的对外政策服务。

长期以来,美国俨然以“世界法官”自居,用自己的政治标准和法律哲学去裁判别国的人权状况,动辄就对不符合其“人权标准”的国家进行“制裁”,把人权与对外援助、经济技术合作、最惠国待遇等挂钩,作为施加政治压力的手段,甚至要求别国改变国内政策和政治制度,使不少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受到严重侵犯。

众所周知,人权问题实质上是一国内部管辖的事项。在国际法上,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是公认的国际

法准则。否定主权原则就是否定现代国际法的基石。

早在1946年12月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家权利义务宣言》中就指出，“各国具有独立权，因而有权自由行使一切合法权力，包括其政体之选择，不接受其他任何国家之命令”；“各国对任何他国内政外交，有不加干涉之义务”。

1981年12月9日，联合国大会第36/103号决议再次通过了《不容干涉和干预别国内政宣言》。《宣言》中特别指出：“各国负有义务避免利用和歪曲人权问题，以此作为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或在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内部或彼此之间制造猜疑和混乱的手段。”

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人权报告》恰恰违反了联合国的这些宣言。这哪里是关心人权？这是十足的强权政治。

美国一方面以“人权卫士”自居，大力推行所谓“人权外交”；另一方面又不参加至关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比如联合国1965年通过的《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1966年通过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73年的《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1980年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等公约，美国国会至今未批准加入。难怪连美国国际法学会执行副会长哈格罗夫教授也大为感叹：“美国连主要的国际人权公约都没参加，它又用什么立场来关注别国的人权呢？”

与此相反，中国在批准国际人权公约方面却走在美国前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后，先后签署、批准并加入了《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

式歧视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7个国际公约。对于已加入的公约，中国政府一贯按规定提出执行有关公约情况的报告，严肃认真地履行自己所承担的义务。

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公布后立即遭到中国和许多国家的驳斥。美国借人权来推行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的图谋不会得逞。

采写回眸

《是“维护人权”，还是推行强权？ ——评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 一稿是怎样写成的

评论《是“维护人权”，还是推行强权？——评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是一篇针对性很强的新闻作品。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对人权问题的看法，揭露美国“维护人权”的虚伪性；发稿时机选择在负责人权及人道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沙托克准备与我国外交部等有关

方面讨论人权问题访华前夕，系有为而发，有力地配合了我国的外交斗争。这篇评论对外播发后，在境外、国外引起了较大反响，被评为第五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

这篇新闻评论是怎样写成的呢？

此稿从采写到播发，来之不易。1994年2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新华社对外部召开有各个采编室主任参加的会议，会议主题是研究并落实重点报道题目，评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是其中的一篇。这个题目是社领导提出的。时任新华社主管国际报道的副社长庞炳庵说，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人权报告》，歪曲我国的人权状况，必须撰写一篇评论予以批驳，并把这个报道任务交给了对外部。会上部领导指名由我撰写此稿，要求在一周内交稿。

会后，我的一位同事戏说：“姚达添接到的的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此稿的难度在于，政策性强，要求高，时间紧。

政策性强。我国对发展中美关系非常重视。在涉及中美关系的新闻报道中，必须密切配合我国对美斗争策略。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涉及中美关系的问题历来较为敏感。在对外事务中，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而美国则实行霸权主义的对外政策，“干涉别国内政”已经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代名词。在人权问题上，中美两国的分歧很大。享受广泛和充分的人权，是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国主张，对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应当通过对话，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而美国，以“维护人权”为幌子，迫使别国接受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借口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践踏国际法准则，为其霸权主义的对外政策服务。只有充分认识中美两国对

外政策的不同点和两国对待人权问题的不同态度,才能准确把握对美斗争的尺度,通过新闻评论,维护国家的最高利益。

要求高。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国务院每年都发表一个《人权报告》,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权状况进行肆意歪曲,无理指责,惟独不谈美国自身的人权问题。以往新华社对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这种强权、霸道行径,有不少批评报道,但这次以评论的形式直接评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尚属首次,既要观点鲜明,评到要害处,又要论据充分,有说服力,这并非易事。这篇评论虽然是记者个人署名,但它是由新华社记者撰写,国外舆论都将其视为代表官方的观点,这对写好这篇评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采访中学习、研究。我在接受任务之前,对人权方面的情况没有研究,所知甚少。有关情况只能通过采访获知。首先,拟订了采访提纲。采访中央外宣办(今为国务院对外宣传办公室)官员,主要了解了我对美人权斗争的方针、政策及其策略;接着,采访中国人权研究会负责人,了解中美双方的人权状况,以及美国以“维护人权”之名,干涉别国内政的种种所作所为。之后,又访问了大学教授,国际法和法律专家,了解了中美双方在人权领域履行国际法的情况,以及美国在哪些方面违反国际法等。被采访的政府官员和大学教授、专家都很忙,有的只能给我30分钟的采访时间,有的安排在晚上接受采访,有的还抽不出时间来接受采访。在这次采访中,给我启发和帮助最大的是外交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刘文宗教授。他是国际法教授,也是中国人权研究会理事,美国违

反国际法的具体事例就是他向我提供的。我在采访中一共收集了几万字资料，记了厚厚的一本采访记录。

反复思考，确立论点。经过5天的采访和查阅大量有关资料，我对中美两国的人权状况，以及美国利用人权问题推行强权政治的做法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但是，在动笔之前，对评论角度的选择却颇费思考。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人权报告》（中国部分），译成中文有1万多字，歪曲我国人权状况的内容广泛，涉及民主政治、民族、宗教、所谓“西藏问题”等领域。如果就《人权报告》的某一个章节或某个方面的内容进行评论，需要写许多篇，在一篇评论中要涵盖那么多内容是不可能的，而且这样写也很难抓住《人权报告》的实质，达不到击中要害的目的。经过反复思考，我确定从美国“维护人权”的虚伪性入手，揭露其干涉别国内政，推行强权政治的实质，单刀直入，进行评论剖析。当然，这个论点的确立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有大量具有说服力的论据为基础。我在采访中，掌握了美国借“维护人权”之名，推行强权政治的许多事实。如：美国自身的人权问题很严重，但它对别国横加指责，惟独不谈美国自身的人权问题；人权问题实质上是一国内部管辖的事项，但是美国却要求别国按美国的人权模式行事，干涉别国内政，否定主权原则；美国以“人权卫士”自居，却不参加至关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等等。

本文采用平实的写作手法，摆事实，讲道理，不强加于人。文中有几个新闻事实就是运用对比的手法进行阐述的。如中国的人权状况在许多方面优于美国，对中美两国的人权状况进行对比。又如美国不参加至关重要的国际公约，而中国不仅参加了多项国际人权公约，而且严

肃认真地履行了自己所承担的义务。这些有据可查的事实对比,谁优谁劣,一目了然。

这篇评论用中、英文对国外播发后,收到了良好的新闻效果。合众社、法新社、美联社立即予以转播。香港的《华侨日报》、《联合报》、《东方日报》、《经济日报》、《大公报》、《文汇报》,澳门的《澳门日报》,菲律宾的《菲华时报》、《商报》、《世界日报》,泰国的《中华日报》,北美的《侨报》转载全文。《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也采用了此稿。

香港《联合报》、《经济日报》、《东方日报》、《华侨日报》等报纸在登载这篇评论时,突出了下述内容,“新华社周日发表文章指责美国国务院不顾国际法准则,每年发表一个《人权报告》,以‘维护人权’之名,干涉别国内政,推行强权政治”,“美国人权问题比别国严重,大陆的人权状况优于美国”。

中央外宣办赞扬这篇评论,并为此在一份《人权》刊物上辟栏刊登《简讯》。《简讯》指出:“2月27日新华社对外播发了新华社记者姚达添写的评论《是“维护人权”,还是推行强权?——评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在境外、国外引起较大反响。”《简讯》说:“各报刊登时,突出记者述评中的两个主要内容:一、美国公布的《人权报告》不顾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以“维护人权”之名,干涉别国内政,推行强权政治;二、美国本身的人权问题很严重,中国大陆人权状况在许多方面优于美国。”

新华社主办的《新闻业务》刊登署名文章指出:“这篇评论题材重大,立足点高,不是抓住《人权报告》的细枝末节,而是揭露美国以‘维护人权’为幌子,干涉别国

内政、践踏国际法基本准则,推行强权政治的本质,观点鲜明,论据充分,可信可读。”



是“维护人权”,还是推行强权?

徐民和

1940年生。1964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新华社国内新闻部工作，历任资料员、记者，1980年调至瞭望编辑部工作，历任编委、副总编辑。1995年调到《中国记者》杂志社任总编辑，直至退休。曾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现任中国记协学术委员会委员。

1985年评聘为主任记者，1992年晋升为高级记者。

在开始记者生涯最初的10多年里，主要从事文教报道，特别是一些文艺人物通讯，如《是党给我的艺术新生命》（访姚雪垠）、《和人民一道前进》（记柳青）、《还是那副笑容那颗心》（写丁玲）、《访红学家俞平伯》等，被广泛选入一些新闻通讯选、报告文学集和文学研究集中。

到瞭望编辑部工作后，参与了新中国这第一家新闻周刊的筹备、创刊，并进而办海外版的过程。在这10多年里，主要致力于探索周刊写作，以及新闻周刊独特的采编业务规律。这时撰写或改写的一批新闻作品，如《中国学会重新思考传统文化》被评为1986年新华社好稿，《为了亚洲人民的重托——中国筹办第十一届亚运会纪实》被评为全国亚运会好

新闻。

学术论文如《新闻周刊在重大事件新闻的报道如何与其他媒介竞争》，被评为新华社第三届优秀新闻学论文。

1988年出版的中国记者丛书中，收入了一集《徐民和通讯述评选》。他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些论文，刊载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孔子研究》中。

中国学者重新思考传统文化

向现代化迈进的中国，现在又回过头来，重新思考自己的传统文化。

稍微仔细些地翻阅一下中国的报刊和新书目录，就可以发现：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之多、之深，实在是很可惊异的。有关的社团（学会、书院等）之多，学术讨论会之热烈，也见所未见。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研究越来越为社会大众注意。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这种讨论已经不限于学术性的刊物，也已见诸大众传播媒介的报端。

撞击引起了波澜

人们重新思考中国的传统文化,当然并非是在发思古之幽情。看似平静的书桌上的研究,其实背后是有强大的推动力的。这就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1978年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实行邓小平称之为“一个大政策”的“对外开放”。封闭了30年的中国,打开大门一看,发现世界大变了,自己在许多方面落后了。首先发现的是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于是开始积极引进设备、技术,开始大批派遣留学生、考察人员。接着,又注意到管理体制、人才体制,以至经济体制、法律体制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伴随这一切而来的,还有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的种种争论。例如,文学上有围绕朦胧诗、“意识流”小说等是搞“现代化”还是搞“民族化”的争论。甚至迪斯科可不可以跳,穿牛仔裤是不是“崇洋心理”在作祟,也一度成了一些人争论的话题……

为着从总体上回答这些现实问题,人们回顾了历史,发现这短短的七八年和中国近代史上曾经走过的一段历程颇有相似之处。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人发现和西方相比自己落后了,于是,学习西方人的船坚炮利,想“师夷长技以制夷”。结果,并没有成功。从戊戌政变到辛亥革命,人们又进而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教育、法律等制度,以拯救老大的帝国。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以五四新文

化运动为开端,提倡民主和科学,并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才迎来了新纪元的曙光。

有些学者认为,这几年的思想历程可以说是我们的前辈用了大约百多年(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所走过的历史行程的简化了的缩影。

当然,我们是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重新面对现代化的。鸦片战争以后,古老的帝国是在西方殖民者炮火轰击下被动地打开大门的,那时的中国人燃眉之急,是救国家救民族。今天,新中国已是一个独立的、初步繁荣昌盛的大国,受到了世界人民的尊重。我们现在是主动打开大门来搞现代化的。现代化不只是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还要有精神状态、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等观念的现代化。因此人们从思想文化的整体这一高度来思考现代化,提出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也要建设精神文明,就是很自然的了。建设精神文明也包括发扬传统文化的精华。

这是从中国现代化的纵的历史角度来看的。如果从横的方面来看,中国将面临“一国两制”的现实,在一个历史时期内将有一个两种制度并存的局面。传统文化是联结生活在两种不同制度下的中华民族的一条强大的纽带。

对中国传统文化作自觉的反思,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提出来的。是社会生活的撞击引起了学术界的波澜。

是包袱,还是财富?

中国的学术界相当一致地认为,中国之所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落后了,追根溯源,既与中国历史上封建制度长久稳固的社会经济结构有关,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深远有关。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其主体来说,就是以汉族儒家文化为主干的文化。

这几年中国学术界对传统文化作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分析。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长处和短处、强点和弱点,需要有可资比较的参照系,因此,中西比较文化的研究也随之在中国勃兴起来。

如果要作最一般的概述的话,那么可以说,学者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国传统文化既是向现代化前进的中国人身上的包袱,也是可以加以发扬的财富,虽然学者们强调的侧重点多有所不同。

这样说不免失之笼统,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包袱的一面,还是财富的一面,中国学术界的研究和开掘都有了进一步的深入,提出了一些有新意的见解。例如,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的特征是实践理性,并进而对其内容、特征和意义作深入分析,指出它既阻碍了思辨理性的发展,使中国哲学和文化缺乏严格的推理形式和抽象的理论探索,但也排除了反理性主义的泛滥,使中国人不易陷入狂颠、玄想的泥沼,而保持清醒实际的态度。又如,有的学者认为,讲究调和、平衡的儒家学说并非无辩证法可言,指出辩证法的精髓既然是矛盾的对立

统一,那么,平衡也是事物发展的一种形式和条件,并进而对儒家“仁义”、“礼乐”、“忠恕”、“圣智”等观念和范畴作出阐发,清理出一个儒家辩证法的体系。学者们见仁见智的见解,当然难以一一尽述,这里举出两例,不过是为略见一斑。

既然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优秀的一面,也有糟粕的一面,这就要有所剔除抛弃,又有所吸收发扬。学者们认为,这是一个异常复杂困难的庞大课题,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优点和缺点并存的巨大共生体,并不总是可以简单地一刀两半,即可分得清清楚楚的。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作批判的继承,是一个需要长期而又仔细地进行研究的任务。

但是,这种批判继承在今天具有明显的紧迫性。孔夫子并不是个与当前现实没有多少直接关系的历史人物,而是仍然生活在今天的现实中。孔夫子的思想及其后来被加以发展了的儒家学说,就融化在中国人的思想、意识、风俗、习惯、行为之中,无论是读过还是没有读过《论语》的中国人,几乎概莫能外。现代化是要靠全体中国人来共同实现的。因此,这一批判继承的工作并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而是与中国人今天的精神面貌和未来的前途相关的。

目标:社会主义的中国现代化文化

今天中国讨论传统文化问题,既不是要穿着西装来朝拜孔子,也不是像“批林批孔”那样,要将孔子“批倒批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 (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 (评论卷)

臭”。批判地继承,其目的还是创造——创造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中国新文化。

至于如何来创造,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还是以西方现代文化为基础呢?近现代史上曾有过“中化”还是“西化”的激烈争论。对此,不少学者认为,我们今天可以破除那种非此即彼的思考模式。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各有其价值,也都不可能是注定一成不变的。中外文化中一切反映客观实际的、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要素、成果,也必然是彼此可以相容的,是可以经过分解、选择,加以融会贯通的。我们这个民族向有吐纳百川的气概和能力,创造革新的勇气和智慧,是能够解决这一创造新文化的课题的。

历史上“中化”、“西化”之争,曾很伤了一些人的感情,那是由于这在当时是一个极易牵动民族感情的问题,救国、救民族又迫在眉睫,加上人们对解决这一巨大文化问题主观准备不足,也容易使人们难以从容地、冷静地对待这个问题。时代不同了。今天我们比前辈们远为幸运:国家独立的根基已经确立,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历史给了我们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可以从容地完成创造中国新文化的任务了。

(《瞭望》周刊海外版 1986年2月10日)

采写回眸

记者的“新闻眼”和知识结构

这是我20世纪80年代写的一篇新闻述评。好的新闻作品是历史的见证。我不敢自称这篇作品够得上好，但我敢说，回过头来看，这是中国新闻界最早对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作出全面评述的第一篇。过了将近20年，证明这篇作品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

这场“文化热”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从1981年至1984年是初始的酝酿阶段。那时，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还局限于知识界的“雅人深致”。从1985年至1989年可说是高潮阶段。其标志是，有关“文化”的讨论已成了全社会各阶层关注的热点，一系列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相继举行，如1986年年初上海的“首届中国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1987年夏曲阜的“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1989年10月北京—曲阜的“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国际儒学讨论会”等等。从1990年至今的“文化热”余绪阶段。其标志性事件是“国学热”的兴起与展开。

由上述简要的历史回顾可见，这场“文化热”其持续时间之长，涉及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可以说是中国百年文化史、思想史上所罕见的。不过，在其起始阶段却看似静悄悄的——能“于无声处听惊雷”，写出相关的报道，记者需要别具“新闻眼”。

我是从1985年年初开始注意到这场文化问题的学术讨论的。那时，其规模已相当可观了。随着半年多的追踪，我越来越意识到其重要的意义。借诸一些学术著述，我进而知道，早在20世纪的30年代，中国的学术界就此曾进行过一场大论战。再往前追溯，则早在19世纪，中国的大门被列强用武力打开以后，中国的文化人就曾为如何对待西方外来文化和中国本土文化而发生过困惑。洋务派人物张之洞就此提出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可谓是当时的文化人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主张。

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重新挑起这场大讨论，有其新的时代背景。随着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西方外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就逐渐以其不小的冲击力，引起人们思想观念的波动。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在一些人中时髦起来。类似这样的现象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应以何种对策来引导这种现象走上健康的道路？这并不是很容易就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学术界的文化讨论热，正是为了从总体上寻找到解决这类问题的对策，亦即从文化观念、文化战略的高度寻找到正确对待中西文化的立足点而发生、而兴盛起来的。

当时，我在《瞭望》周刊的海外版工作，担任着组织报道的职务。既然我认识到，这场大讨论是实行开放政

策后的中国,在文化的深层结构问题上的一个大动向,它是反映着中国在前进中的积极现象,因此,我也认为,这是值得关注中国局势的海外人士们加以注意的重要现象。《瞭望》(海外版)作为海外人士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理应把这个重要动向反映出来。我在编辑部讨论报道计划时,提出要就此组织一个专题报道,集中地多侧面反映这一动向。这个意见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和支持。那时正是1986年春节前一个月。大家觉得,在中国的这个传统节日时,发一组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专题报道,时机也是适宜的。

于是,我组织了好几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来报道这个动向:

一是请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汤一介、丁守和、庞朴、李泽厚等9位在这场大讨论中发表过代表性意见的老中青学者,给《瞭望》(海外版)各写一篇2000字左右的文章,简要地谈谈对这场讨论的看法。这是学者们的意见。

二是组织了一篇当时刚刚在上海闭幕的中国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报道,介绍会上中外学者对中国文化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看法。这是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在中国举行这样的国际性学术会议,会议得以举行,这本身就是中国文化讨论热的一大新闻。

三是一篇关于中国文化书院的报道。这个书院是1985年年初才成立的致力于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研究的“大学后”社会教育机构。其于1985年年初所开办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班”,报名参加者几乎遍及全国,甚至一些大学的教授、副教授,大工厂的企业家也来参加学

习,这反映了人们对文化问题的浓厚兴趣。这是文化讨论热中一个典型事例。

四是一篇介绍七八十年代以来孔子研究情况的综述。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儒家是一家,而孔子则是儒家的开山鼻祖。这是文化讨论热的一个重要侧面。

五是这组专题报道一篇导言式的综合述评,这就是我执笔撰写的《中国学者重新思考传统文化》。

这组专题报道从1985年年底开始筹划起,到1986年2月初刊出,其间经过一个多月的组稿、采访、撰写、编辑稿件的过程。我是在组稿、编辑上述稿件的同时,采写《中国学者重新思考传统文化》的。

这篇述评写得相当吃力,断断续续写了半个月。为什么写得这样艰难呢?因为这个题目实在太太,涉及的问题实在太多,要驾驭它是很不容易的。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

(一)要看很多材料。这篇述评不是采访某位学者,听某人讲一通他的看法,就可以据之写稿的,因为学者们的看法就并不一致,作为客观的评述,当然不能只听一家之言。这也不是抓住某一次讨论会,综合会上的意见就可以济事的,因为这不是一次学术讨论会的综述,而是要统观近年所有有关论文和专著,甚至一些学者尚未形成正式文章的、只是在一些会议上口头发表的见解。因此,只有拼命看材料了。我还发现:过去浏览过的文章,可以刺激我产生要写这篇述评的念头,但远不足以据之写成述评。一是因为浏览过的文章只留下了笼统、模糊的印象,我不能凭这印象就写稿子。记者的经验告诉我,那样做每每会误解、乃至歪曲作者原意的,会招致有关学者的

反感的,这不仅有损《瞭望》的声誉,也将使我今后采访这些学者产生困难。因此,我选择了一些浏览过的著作重新来读。如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金克木的《比较文化论集》等。我发现,不同的读法效果竟那样不一样。二是因为过去浏览过的文章毕竟有限。我静下来构思我这篇述评的提纲时,发现其题中应有之义,所涉及的方面就很多,有许多文章我都未看过。我只有“临时抱佛脚”,来一番“恶补”了。这可是个浩大的工程,费时费事得很,因为有的文章要找到手,就得费一番工夫。

(二)要设计出一个合适的述评框架。这也是很难的。要把讨论中各种主要的意见吸纳入这篇述评,需要有一个合适的述评框架。这里有两种可能的陷阱:一是以偏赅全,那将导致或者不能概括讨论的全貌,或者概括得逻辑混乱;二是陷入学术问题的细节中不能自拔,使文章冗长、难懂、不得要领。举个例子:原来我曾设想过设一小标题,评述一下对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做批判继承,批判什么?继承什么?但写着写着,觉着写不下去了,因为讲不清楚!无论就总体还是就局部来说,学者们对应批判什么,继承什么,意见都不一致。如果只就批判继承这一原则来写,这是老问题了,讲些原则性的条条,也没有什么新意。所以最后只好放弃原来的设想,改用现在发表出来的办法来写:先举出有关批判继承的两个比较突出的具体研究成果——实践思维和儒家辩证法,然后进而作这样一段概括:对中国传统文化“要有所剔除抛弃,又有所吸收发扬。学者们认为,这是一个异常复杂困难的庞大课题,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优点和缺点并存的巨大共生体,并不总是可以简单地一刀两半,即可分得

清清楚楚的。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作批判的继承,是一个需要长期而又仔细地进行研究的任务”。这样写,要遭到笨拙之讥笑也许是难免的,但总算还差强人意吧。

(三)要处理好学术问题的严谨性与新闻报道的通俗化之间的关系。这是学术问题的报道最经常碰到的,又是最不易讨好的难题。通俗了,往往容易流于肤浅,专家不满意;照顾到学术问题的严整体系,则往往术语太多,论题太专门,普通读者不愿意读。但是,好的学术报道,恰恰正要是这两方面的人都基本满意,即既要使专家们觉得你报道的是那么回事,没说太离谱的外行话,又要使普通读者有兴趣读,觉得你给他们作了很好的“翻译”,让他们明白“原来学术界的讨论还有这么大的意义”。所谓深入浅出的文章难写,也就在这里。

其实,上述这些难题,也是采写一般的讨论会——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科教讨论会,以至综述各派意见众说纷纭的问题性报道,都会碰到的一般性问题。所谓“大综合”类的报道难写,其难点也就在这里。这正是因为这类稿件需要记者有比较强的分析、概括的能力,而这种能力说到底决定于记者的知识结构的。因此,由这篇评述的写作过程,我又一次感到,要能应付裕如地适应这类报道,只有从改善自己的知识结构这一根本问题上着手。

不言而喻,要写这类报道,记者必得吞进去很多材料,而且还要能很快地吐出来——哺育成你的报道。这就是说,记者要有比较强的吞吐新知识的能力。而要在短时间内能吞吐某一方面的新知识,记者必得平时就已在这一方面积累了必要的基础知识。是不是可以这样

说：记者的知识结构应该都是比较全面、合理的，而且这种知识结构应该是开放性的，亦即是具备了吸收新知识的内在的机制的。

应该说，记者这一职业是最便于学习新知识的。记者的老师最多，每一次采访都是在拜老师，都是在学习。不过，这种学习不同于学校里的正规学习，有它自己的特点：一是只能是缺什么补什么式的学习，要把这些新学来的知识配置到原来已有的知识网络中，使之系统化，只能靠记者的自学来实现。二是这种学习的老师是不固定的，老师之间的看法还可能是相互矛盾的，这就要靠自己择善而从了。因此，记者的自学能力是不是强，思想方法是不是科学，是十分重要的。而自学能力的强弱和思想方法科学与否，说到底也同样是决定于记者的知识结构的。

由这次报道开始，我越加认识到人文社会科学界确实可说是一个“于无声处听惊雷”的世界。在这里，学者们所在思考的，都是社会生活中的大问题。他们可说是“社会的大脑”。在他们的研究中是会爆发出许多重大新闻的。但是，要在这一世界中敏锐地发现新闻，并且明快地把这类新闻报道给大众，我觉得自己的知识结构还很不适应。我愿和我的同行们一道努力，在搜索这一世界的新闻的过程中，同时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素质。

黄元才

高级编辑,1946年6月出生于上海,籍贯江苏武进。1969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1970年8月进疆,1972年3月分配到新疆日报社工作至今。其间,1990年9月至1991年7月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年,1991年10月至1993年9月任昌吉回族自治州党委副书记两年。1988年任新疆日报社副总编,1993年10月任新疆日报社党委书记、总编辑至今。1995年起兼任新疆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主要获奖作品有:《永恒的心碑——记优秀水利专家王蔚》(通讯)获1991年新疆新闻奖特别奖;《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新闻论文)获1994—1996年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旗帜鲜明地同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作斗争》(本报评论员)获1996年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想大目标 干大事业 求大发展》(本报评论员)获1998年新疆新闻奖一等奖。

旗帜鲜明地同民族分裂主义 和非法宗教活动作斗争

最近，中央作出关于维护新疆稳定的重要指示，明确指出当前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并提出了一系列维护新疆稳定的政策、措施和要求。这是中央纵览国际风云变幻，着眼于实现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和全国的稳定，高瞻远瞩，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作出的确保新疆长治久安的重大决策。

我们要实现未来5年、15年的宏伟发展目标，使新疆成为全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力争后来居上，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新疆的稳定关系到全国的稳定，新疆的发展关系到全国的发展。中央对新疆稳定工作的重大决策，既是指导我区各族人民实现新疆长期稳定和发展的思想武器，也是保障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这一战略全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从这个战略高度来认识维护新疆稳定的极端重要性。

多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自治区党委、政府在集中精力抓好经济建设的同时，始终把维护祖国统

一、确保新疆稳定摆在突出的位置来抓，团结和依靠各族干部群众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经济建设迅猛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社会政治基本稳定，各项事业取得很大成就。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极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分裂活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特别是近年，在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新疆进行渗透、分裂、颠覆活动的背景下，境内民族分裂主义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活跃时期。国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势力互相勾结，组建民族分裂组织和反动团伙，有组织地进行暴力恐怖活动，强化反革命舆论宣传，严重地影响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中央关于“当前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这一论断，正是从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完全符合新疆实际情况的。我们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工作中还存在的薄弱环节及面临的许多现实的和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充分认识维护新疆稳定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利用非法宗教活动搞分裂破坏，是当前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最主要的罪恶行径。他们披着宗教外衣，利用部分群众朴素的民族感情和宗教感情，煽动宗教狂热，鼓吹“圣战”，灌输分裂思想，培植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干预司法、行政、教育，制造骚乱，哪里非法宗教活动猖獗，哪里就不得安宁。这些年来，我区发生的一系列打砸抢骚乱事件、反革命暴乱事件、爆炸暗杀恐怖活动，几乎无不有着民族分裂主义的背景，无不与非法宗教活动相关连。严峻的事实说明，非法宗教活动是民族分裂主义从事分裂破坏活动的重要阵地，就是那些没有被民

族分裂势力直接操纵的非法宗教活动，实质上也成为民族分裂势力的同盟军。中央这次把非法宗教活动和民族分裂主义同样作为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对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危害性的本质概括，是很有针对性和十分重要的。斗争经验告诉我们，不铲除非法宗教组织，就无法肃清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新疆就无长治久安可言。

民族分裂主义是以制造民族分裂、破坏祖国统一为目的的反动政治主张、反动社会思潮和反动现实行为。它的反动本质就是反对和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人民政权，分裂祖国统一，破坏各族人民的团结、安宁和幸福。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损害了包括本民族在内的各民族的根本利益，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我们与民族分裂主义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没有丝毫妥协、退让的余地。对此，广大共产党员和各族干部群众都必须头脑清醒，立场坚定。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把自己的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旗帜鲜明地同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作斗争。在这样一个事关大局的原则问题上，决不允许模棱两可、摇摆不定。这是衡量我们的同志是不是讲政治、讲党性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一定要坚持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建立和健全各级党政领导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责任制，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性，理直气壮地高举维护民族团结和维护法律尊严的旗帜，最大限度地团结和依靠各族干部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民族分裂分子和各种严重犯罪分子，同心协力为实

现新疆的长期稳定和发展而奋斗。

（《新疆日报》1996年5月7日）

附：

树起维护稳定的旗帜

——简评《旗帜鲜明地同民族分裂主义和
非法宗教活动作斗争》

1996年3月，党中央总览国际风云变幻全局，着眼于实现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和全国的稳定，高瞻远瞩地作出关于维护新疆稳定的重要指示（中央1996年7号文件），明确指出，当前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并提出了一系列维护新疆稳定的政策、措施和要求。5月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召开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中央重要指示精神，专题研究部署全区稳定工作，号召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同心协力为新疆的长期稳定和发展而奋斗。

在这个大背景下，围绕反对民族分裂、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这个主题，新疆日报社精心策划，推出《加强民族团结 维护新疆稳定》系列评论8篇，同时组织大量报道，形成了强大的声势和浓厚的舆论氛围，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许多同志反映：你们的宣传报道对团结和鼓舞各族人民群众，孤立和打击极少数民族分裂

分子,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全区维护稳定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舆论支持。

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始终是新疆的大局,也一直是《新疆日报》宣传报道的重要主题。1988年,针对当时极少数民族分裂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严重的人散布的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论,《新疆日报》曾发表《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等8篇评论员文章予以反击,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8年后发表的“新八论”与之比较,可以看出视野更加开阔,认识进一步深化,其中一些观点和提法具有新颖性,突出反映了形势发展变化的特点。如“民族分裂主义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活跃时期”、“新疆的稳定关系到全国的稳定、新疆的发展关系到全国的发展”、“非法宗教活动是民族分裂主义从事分裂破坏活动的重要阵地,就是那些没有被民族分裂势力直接操纵的非法宗教活动,实质上也成为民族分裂势力的同盟军”、“要把能不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理直气壮地做好工作,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政治上是否坚强的重要标准”等等。

《旗帜鲜明地同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作斗争》是这组系列评论的首篇。5月7日,在1版头条位置醒目刊登自治区党委工作会议消息的同时,在右上位置发表了这篇评论。评论的特点,一是尖锐泼辣,一针见血,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公开阐明党的立场、观点和态度,不绕弯子,不吞吞吐吐,因而具有很强的战斗性;二是从新疆实际出发,对一些新观点作了全面阐述,充分反映了新疆反分裂斗争的新形势、新变化,对统一全区各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族人民的思想和开展反分裂斗争的实际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性；二是语言简练，概括精当。

（《中华新闻报》1998年2月16日）

采写回眸

吃透两头 精心谋划

——《加强民族团结 维护新疆稳定》

系列评论写作体会

《新疆新闻界》编辑部约我谈谈《旗帜鲜明地同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作斗争》这篇评论的写作体会，盛情难却，但考虑到这篇评论只是一组8篇系列评论中的一篇，因此，在这里我就整组评论的写作背景和写作思路向大家作一简要汇报。

1996年3月，党中央总览国际风云变幻全局，着眼于实现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和全国的稳定，高瞻远瞩地作出关于维护新疆稳定的重要指示，明确指出，当前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并提出了一系列维护新疆稳定的政策、措施和要求。

5月初,自治区党委召开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中央重要指示精神,专题研究部署全区稳定工作,自治区的几位主要领导同志都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号召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同心协力为新疆的长期稳定和发展而奋斗。

配合党的中心任务搞好舆论引导,是《新疆日报》的传统。为此,我们把及时、准确、全面地宣传、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维护新疆稳定的重要指示及自治区党委工作会议的精神作为重大战役来策划。在认真吃透两头(即反复学习领会中央指示和自治区领导讲话精神,全面掌握分析自治区形势)的基础上,精心谋划,拟定出8篇评论题目,由我和蒋一峰同志分头执笔,以系列评论形式发表。

这组评论刊出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许多同志反映,这组评论对团结和鼓舞全疆各族人民群众,孤立和打击民族分裂分子,起到了积极作用,为全区维护稳定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舆论支持。这组评论的开篇《旗帜鲜明地同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作斗争》,很快被中宣部新闻局《新闻舆论动向》摘发,后来又被评为1996年度新疆新闻奖一等奖和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这组评论之所以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首先是除了我们在写作前注意认真吃透两头,作了精心谋划以外,还对时机把握得比较好,发表及时,密切配合了党的中心任务。自治区党委工作会议后,全区上下迅速掀起学习贯彻中央重要指示和自治区党委工作会议精神的热潮。这组评论的开篇与自治区党委工作会议的消息同步发出,以后每隔几天发一篇,及时地、有效地配合了这次学习活

动,不少基层单位把它作为向群众宣传教育的教材之一。

其次是紧密结合新疆实际,注重对一些新观点、新对策进行全面阐述,充分反映出新疆反分裂斗争的新形势、新变化,因而对统一全区各族人民的思想 and 开展反分裂斗争的实际工作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始终是新疆的大局,也一直是《新疆日报》宣传报道的重要主题。1988年,针对当时极少数民族分裂分子和一些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严重的人散布的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论,《新疆日报》曾发表《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等8篇评论员文章予以反击,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8年后我们发表的“新八论”与之比较,可以看出认识在进一步深化,如实反映了形势发展变化的特点。如“民族分裂主义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活跃时期”、“新疆的稳定关系到全国的稳定,新疆的发展关系到全国的发展”、“非法宗教活动是民族分裂主义从事分裂破坏活动的重要阵地,就是那些没有被民族分裂势力直接操纵的非法宗教活动,实质上也成为民族分裂势力的同盟军”、“要把能不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理直气壮地做好工作,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政治上是否坚强的重要标准”,等等。

此外,我们在写作时注意既要严格掌握政策,力求准确、全面,又要尖锐泼辣,一针见血,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公开阐明党的立场、观点和态度,不绕弯子,不吞吞吐吐,力求有较强的战斗性。同时,尽量做到语言简练,概括精当,每篇评论都控制在2 000字以内。

盛明富

1955 年 12 月出生于安徽舒城。现为《工人日报》总编辑、高级记者、中国记协常务理事,其作品曾五次获得中国新闻奖。

人命关天的大事

——“从江门爆炸事故谈安全生产”系列评论之一

江门市外海镇烟花厂发生的特大爆炸事故，再一次以血的代价警告世人：安全生产，人命关天，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安全生产，预防为主”，人们对此耳熟能详：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安全生产；国家制定了明确的安全生产法规；企业相关的标语牌更是随处可见。然而，安全生产的事故却屡屡发生：今年3月，江西萍乡爆竹厂发生爆炸事故；时隔仅3个月，江门又发生类似事故。为何这类事故屡禁不止？关键还是一些企业要钱不要命，以致酿成恶果。

劳动安全是广大职工最基本的权利。为人民谋利益，是党的根本宗旨。维护职工的劳动安全，是国家性质决定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包括外来工在内的广大职工，是以国家主人的身份在企业工作的。在为社会创造大量财富的同时，他们的人格必须得到尊重，他们的安全必须得到保证，这也是法律所确定的神圣要求。忽视安全生产，要钱不要命，是与上述种种

背道而驰的。它有悖于人民的利益,有悖于职工的利益,有悖于社会的稳定,也有悖于企业的利益,更有悖于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绝不能只要有钱赚,就允许危及人民生命安全的事件发生。

诚然,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企业的目的。但绝不能因此而忽视安全生产。没有安全的生产,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还谈得上什么经济效益?即使短期内企业的经济效益上去了,也终会因安全问题使之付出加倍的代价。不少企业的实践证明,安全生产越是搞得越好,职工安全感越强,劳动积极性越高,劳动效率越高,企业的效益也越好——正反两方面的教训,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清醒吗?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安全生产,民心所向。倘若我们有些人至今仍不能以民之所好为己所好、以民之所恶为己所恶,在安全生产问题上掉以轻心或抱着侥幸心理,不能维护职工的劳动安全,那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工人日报》2000年7月3日)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走出认识上的误区

——“从江门爆炸事故谈安全生产”系列评论之二

江门市外海镇烟花厂发生的特大爆炸事故，原因尚在调查之中，现在还不能下结论。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这次事故警示世人：要实现安全生产，必须走出认识上的误区。

安全生产被写进条规中，挂在标语上，却不能落实在行动中，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一些领导和企业经营者对安全生产存在认识上的误区。

误区之一：把安全生产与经济效益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认为经济效益是硬指标，安全生产是“软要求”，安全生产工作只有在经济发展之后才能抓好，从而重生产，轻安全。

其实，搞好安全生产工作，建立良好的安全生产环境和秩序，是保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也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安全生产、劳动保障问题涉及范围广，影响面大，社会敏感性强，如果不重视，搞不好，事故不断，就会破坏生产力发展，阻碍企业效益的提高，危及职工的生命安全，败坏政

府形象,诱发一些不稳定因素,从而造成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and 经济问题,影响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事实已经证明并将进一步证明:安全促效益,安全促发展,安全保稳定。这才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安全生产与经济效益关系的有效途径。

误区之二:把安全生产与引进外资对立起来,认为安全生产抓紧了就会影响投资环境。

这种认识更是偏颇。事实上,二者是统一的,劳动安全是确立良好的劳动关系的重要条件,而良好的劳动关系又是扩大开放、引进外资的重要软环境。

资本只有和劳动力结合,才能形成生产力。在外商投资企业、劳动者的安全生产越是有保障,劳动者的后顾之忧越少,劳动积极性就越高,劳资双方的关系就越协调,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就越高,企业的竞争力就越强;反之,劳动者的安全生产状况堪虞,劳动积极性势必受挫,劳资关系就会紧张,事故不断,劳资纠纷就会增多,企业形象就会受损,投资环境就必然会随之恶化。可以断言,一个漠视安全生产法规、忽视安全生产条件、工伤事故不断的地方,是不会受到外商青睐的。

民可顺不可拂,可安不可扰。安全生产,乃民心所向,国家早已制定了一系列安全生产的法规,在中国土地上的任何企业,都必须依法办事。任何以牺牲劳动者的劳动安全为代价,来换取所谓的引进外资和经济效益的思想认识及行为,都是不正确的,都必须立即予以纠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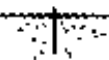
(《工人日报》2000年7月4日)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解决深层次的问题

——“从江门爆炸事故谈安全生产”系列评论之三



江门重大爆炸事故再次以血的代价警告世人：安全生产问题绝不能“雨过地皮湿”，必须解决深层次的问题，才能避免悲剧重演。

安全生产体制不健全、机构遭削弱，是深层次问题之一。一个时期以来，我们既缺少权责分明、统一高效的安全生产管理体制，又没有健全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致使安全生产的有关规定形同虚设。本来，随着新建企业的大量增加，随着以市场取向的改革的不断深入，安全生产问题从体制到机构都应当相应强化。但事实却正好相反，相当多的地区没有专门的安全生产监督机构，相当多的企业在改组改制过程中，安全生产的机构和人员遭到削弱和精简，相当多的新建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和人员配备不到位，这种情况，客观上就埋下了各种工伤事故的种子。

“绳墨之起，为不直也。”安全生产的隐患尚多，而体制上的隐患是最大的隐患。这个隐患不除，那么，安全生产只能是按下了葫芦浮起了瓢。

安全生产管理不到位,是又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毋庸讳言,不少地方和企业,安全生产搞形式,监督检查走过场。即以江门发生重大事故的这家企业为例,前不久从自查到有关部门的检查,几个回合竟然发现不了问题,原因何在?从有关部门来说,起码是官僚主义,没有对职工的生命安全负责;从企业来说,管理上的责任无论如何也是推卸不掉的。

水有源而不腐,树落地方生根。安全生产只有落实到每道工艺、每个程序、每个环节、每个班组、每个操作人员,贯穿于管理的全过程,才能扎实有效。否则,制度规定、标语口号只不过是一沓废纸,焉能奏效?

安全生产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更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现实生活中,以罚代法,以经济赔偿代替法律责任的事例并不鲜见。出了事故,批评一顿,罚点钱,赔偿点损失,就此作罢;有的甚至连事故之后的赔偿也打折扣;更有门道者,连罚也能逃脱。想当初,渤二事件、大兴安岭火灾、哈尔滨亚麻厂爆炸等事故,不仅直接责任者受到严肃处理,管理者和有关的领导甚至高层领导也难逃事故责任的追究。社会发展到今天,如果我们在安全生产上还在搞以罚代法,岂不是对事故的怂恿?这究竟是进步的表现,还是历史的倒退?

私情行而公法毁。我们不能把法律法规当做吓鸟用的稻草人,否则,鸟儿见惯之后,会在它顶上栖息而不必害怕。

好在国务院已经明确要求,对于发生重大、特大事故的地区、部门和单位,不仅要追究事故直接责任者的责任,还要追究领导者和管理者的责任,同时,还要对因疏

于执法而发生事故者进行严肃处理。但愿以此为起始，唤起更多公正的执法裁判。而公正的裁判越多，我们的职工才能越接近安全与幸福。

（《工人日报》2000年7月5日）



强化工会的监督职能

——“从江门爆炸事故谈安全生产”系列评论之四

江门爆炸事故还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警示：要实现安全生产，维护职工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必须强化工会的监督职能。

按照“企业负责、行业管理、国家监察、群众监督”的安全生产监督体系，工会在安全生产中，负有代表职工进行群众监督的责任和权利。最近发生的几起安全事故充分说明，群众监督对企业的安全生产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缺少了群众监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体系就缺了重要一环，安全生产的有关规定也就不可能落实。

强化工会在安全生产中的监督作用，也是工会的性质和职能决定的。工会突出维护职能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要实实在在地落实到各项工作中。我们讲维权，首先要维护职工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劳动安全是职工最基本的权利。如果我们连职工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都维护不了，维护职工的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也就不可能实现。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要发挥工会在安全生产中的监督作用,就必须加强工会的组织建设。当前,一些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屡屡发生安全事故,随意侵犯职工合法权益,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企业没有建立工会组织。没有工会组织,维权就成了一句空话,实施安全监督也就成了无本之木。因此,各地要依法进一步加大新建企业工会组建工作的力度,要在新建企业普遍建立起工会组织,让有工人的地方都有工会,并且使更多的职工加入到工会组织中来。这是工会搞好群众监督,维护职工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前提。

在加强新建企业工会组建工作的同时,我们要进一步发挥已建工会的作用。在事关职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问题上,工会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加强群众监督,推进安全生产。要对漠视安全生产法规、忽视安全生产条件、不顾职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这是工会工作者的职责之所在。在这个问题上,任何的粗心大意、马虎草率,都是我们的失职,都对不起受到伤害的职工。

强化对安全生产的监督职能,各级工会要严格履行工会对安全检查的职责,确实把好工会安全检查关;要切实监督各项安全措施落实情况;要及时向有关部门通报、反映安全生产中的新动向、新问题;要加强对工会安全员的培训,真正发挥安全员的作用;要加强对职工的安全意识教育,提高职工维护自身安全的水平。只有充分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体系才能有效地运转起来。

强化工会对安全生产的监督职能,维护职工的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工会任重道远。

(《工人日报》2000年7月6日)



强化工会的监督职能

提高自我保护的能力

——“从江门爆炸事故谈安全生产”系列评论之五

江门重大爆炸事故不仅暴露了安全生产问题上存在的认识问题、体制问题、监督问题等，而且以血的代价警示职工：必须提高自我保护的能力。

警觉能保平安，“私了”贻害无穷。舆论曝光的安全生产事故毕竟是少数，而现实生活中的事故却总是屡禁不止。之所以如此，职工对安全问题的麻木往往是一个重要原因。君不见有的企业即便发生了事故，也常常由企业和职工进行“私了”，赔点钱就相安无事。这种做法，害人、害己、害企业。因为“私了”的结果是对事故直接责任的模糊，是对忽视安全的怂恿，是对生命不负责任的表现。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私了”的实质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不了了之。而事故的隐患犹如洪水一般，“私了”或不了了之就好比管涌，听之任之就可能导致决堤。果真如此，那么，最终受害的还是我们自己，而且受害的人会更多，影响面会更大。因此，广大职工必须睁大眼睛，一旦出现事故，坚决拿起法律武器，用法律维

护自身权益。

风起于青萍之末,事故出于操作之中。广大职工是安全生产的操作者,处于安全生产第一线,同时,又是安全生产最有发言权的监督者,必须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一旦发现操作程序、劳动条件、工艺流程有不安全的因素,理当即时报告,防微杜渐,监督改正,甚至可以拒绝上岗。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抱有任何侥幸心理的,如果放弃了监督权,你就会始终处于事故阴影的笼罩之中。

安全在于你我,慎行方能无事。安全生产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每个职工都负有安全生产的责任,每个举动都关乎安全生产的系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广大职工掌握着安全生产的主动权,只要我们全身心、全过程地关注安全生产、实施安全生产,何愁事故不能杜绝?

人之知识,若登梯然,进一级,则所见愈广。安全生产事故不断,与人的素质有着直接的关系。广大职工要提高安全生产上的自我保护能力,就必须加强学习,提升自我。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职工不再是只要听话、只要凭力气干活就行。生存竞争与发展的需求迫使我们强化自身的素质支撑。也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知识、技术知识、法律知识、安全知识、道德修养,才能成为“四有”职工,才能懂得如何捍卫自身的权益,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安全生产,事关重大。江门重大爆炸事故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但愿政府、企业和职工都能从这次事故中吸取教训,举一反三,杜绝类似事故发生。这也正是我们写这组评论的初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血的代价，立此存照；反躬自省，警钟长鸣。愿悲剧不再发生！

（《工人日报》2000年7月7日）

采写回眸

事故拷问生命意识

——“从江门爆炸事故谈安全生产”系列评论的写作体会

安全生产，人命关天，这是个耳熟能详的老话题。媒体上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性的宣传几乎天天都有，各地关于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不断出新，但实际生活中安全生产问题却事故不断，且呈愈演愈烈之势。怎样才能斩断事故的链条？人们从中该吸取怎样的教训？

从表面上看，短期政策、短期效益、短视工程、长官意志是造成各种事故的最初起因，深入下去不难发现，认识的误区、监督的乏力、腐败的黑洞则是更深层次的因素，而在所有这些问题的背后，最根本的还是很多人生命意识的淡薄。

君不见，对生命意识集体冷漠的事例屡见报端？君

不闻“三个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人多的是”这样的话言犹在耳？尽管我国目前就业岗位严重不足，就业市场是“卖方市场”；尽管普通劳动者为了获取劳动岗位而不顾劳动保障不到位可能会带来的生命危险，但作为一方官员和企业经营者，却不能因劳动力的供过于求而视生命为儿戏，否则，我们与旧社会的草菅人命有什么区别？我们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是为了人民的最大利益。因此，决不允许用西方资本原始积累中透支劳动者生命的办法来换取利润。毕竟，相对人的生命而言，利润、政绩、金钱，一切都显得那么苍白。

正是对生命意识的拷问，构成了“安全生产”系列评论的立意。

2000年6月30日，广东江门发生特大爆炸事故，造成职工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本报记者在第一时间赶到第一现场，发回了第一手新闻，这就为“安全生产”系列评论提供了最佳的切入点。

但是，按照惯例，中央主流媒体对突发性事件的报道历来慎之又慎，发表评论更是鲜见，倘若把握不好，就会给大局“添乱”，犯导向错误；如若不发评论，又如鲠在喉，会受到自己良知的谴责。如何走出两难境地？我选择了积极的角度、引导的手法和讲政治的视角，宏观着眼、微观着手，从5个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评析，环环相扣，步步深入，主流媒体中就突发性事故第一次发表的系列评论就这样出台了（由于7月1日至2日是双休日，评论于7月3日起连续五天在《工人日报》1版重要位置刊出）。

这组评论刊出后，在全国引起了较大反响：中宣部有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关部门专发了一期《新闻阅评》提出表扬,认为《工人日报》“从‘讲政治’高度评析安全生产”,“抓得快而有力,导向把握也好,有较强的指导性和针对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进行了摘播;广大职工纷纷来电来信;有关部门也相应加强了安全检查、安全监督的措施和力度,作品还获得了当年度的中国新闻奖。

就一个老的主题而发表的评论能引起这样的反响,是我所始料不及的。由此而给我的启迪是:第一,媒体的评论必须以新闻事实为切口,宏观着眼,微观着手,以点涉面,以事说理,就实论虚,就个性而找出其共性,这样才能具有较强的新闻性、针对性和指导性,同时避免空对空。第二,要长于积累、勤于思索,紧紧围绕社会热点、工作难点、群众疑点、关注焦点、特定时期的重点和地区以及媒体的特点,分门别类,积累材料,观察现象,透视本质,分析原因,前瞻趋势,了然于胸,蓄势待发,这样,新闻评论才会有震撼力。作为一个记者,不怕手里没稿子,就怕脑于没问题。第三,要恪守良知,不辱使命,在追名逐利的浪潮中,坚持国家和人民利益至上;在喧嚣嘈杂的纷争中,传播主流声音,引导社会舆论,在权力与金钱的联袂中,守住黑白阵地,坚持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关注民生,反映民声,集中民智,顺应民心,为开拓奉献者讴歌,为合法权益受损者鸣不平,这样才能无所畏惧,其评论与心声也必将引起社会大众的共鸣。

当然,今天来看这组评论,当时的思想还不够解放,文风还不够犀利,对事故背后的官僚主义问题、金钱腐蚀下的权力腐败问题等尚不敢触及,留下了深深的遗憾。惟一感到欣慰的是,这组评论在世纪之初向社会发出了

一声呐喊：生命意识，该醒来了。因为缺少这个意识，我们付出了太多的生命代价。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只有把宝贵的生命置于乌纱、仕途和金钱之上，我们才不会付出新的更多的生命。这就是世纪盘点中用鲜血给世人烙下的警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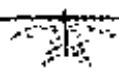


龚 雯

1970年8月生，第一届、第三届《人民日报》奖学金获得者。1992年7月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到人民日报社经济部工作至今，主要从事财经报道。1999年被人民日报社破格评定为副高职称，多次参加各类大型或重点报道活动，编、采、评能力全面，作品屡获中央领导表扬和广大读者好评，多次获得《人民日报》好新闻奖及精品奖。先后被评为第三届中直机关青年岗位能手、《人民日报》首届青年岗位能手、《人民日报》首届十大杰出青年等。曾获第八届中国新闻奖特别奖、第十二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并获得全国外经贸好新闻一等奖、全国旅游好新闻一等奖、全国检验检疫好新闻一等奖、全国维护消费者权益好新闻二等奖、首都女记协第二届优秀新闻奖等。部分作品被一些重点高校的新闻院系选为教材。

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

——祝贺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11月10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法律文件,它标志着经过15年的艰苦努力,我国终于成为世贸组织新成员,我国对外开放事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必将对新世纪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加入世贸组织,是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充分体现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总览全局、与时俱进的远见卓识和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坚定信心,充分展示了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主动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积极姿态。15年来,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中国参加多边贸易体制提供了条件和可能;中国为加入世贸组织所做出的不懈努力也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体进程。

加入世贸组织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自身需要。世贸组织（前身为关贸总协定）是当今世界处理贸易问题的重要国际组织，其基本职能是制订和监督执行多边贸易规则、组织多边贸易谈判、解决成员间的贸易争端，对世界经济贸易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世贸组织成员间的贸易量占全球贸易的95%。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个全球最大的多边贸易体制，将进一步加强我国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经贸联系，为我国的对外开放扩展新的空间，将有助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我国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是相一致的。

加入世贸组织是我国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需要。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是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推动下，以跨国公司的全球运作为载体，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一场深刻的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它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则受其益；用得不好，则受其损。问题的关键是要全面地看待这种趋势。这就要求我们要敢于和善于加入到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分工与合作，趋利避害，充分利用其有利因素和资源加快发展壮大自己，及时防范和控制可能出现的不利因素和风险。通过加入世贸组织，我们将进一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实行对外开放，这为我们有效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创造了重要的体制条件和政策保障。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也是世贸组织本身的需要。中国

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中国的参加,世贸组织是不完整的,不能体现多边贸易体制的普遍性和公正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启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将起到积极和建设性作用。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的经济体制将更加符合通行的国际规则,大大改善中国的产业和投资环境。与此同时,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会逐步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从而为世界各国各地区提供一个庞大的市场和商机,这必将使中国对全人类作出新的贡献。

正如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一样,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有利有弊,但总体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加入世贸组织,将给我们在许多方面带来发展机遇,有利于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推动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及产业升级,有利于扩大就业总量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更多地扩大出口和更好地利用外资;有利于实施“走出去”战略,在更广阔的天地参加国际竞争与合作;有利于我国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分享多边贸易体制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加入世贸组织也会使我们面临一些严峻的挑战,政府部门对经济的管理从观念上、体制上都需要做必要的调整,企业的管理方法、经营机制也需要做相应的转变;随着更多的境外产品和服务业进入国内市场,我国的一些产业将面对更激烈的竞争,特别是那些成本高、技术水平低和管理落后的企业会遭受一定的冲击和压力。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估计。

对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利弊应该进行科学的辩证的分析。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做到兴利除弊,力争实现全局上的利大于弊。为此,必须认真做好加入世贸组

织的各项准备工作。要充分认识到,我们能否抓住加入世贸组织的机遇,迎接加入世贸组织的挑战,归根到底,取决于我们能否办好自己的事情,能否不断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这就要求我们从大局出发,未雨绸缪,积极应对,采取相应的策略和措施,努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规范政策法律和行政管理体系,进一步统一和开放国内市场,为国内外企业营造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谈判中所作承诺是加入世贸组织权利与义务的一部分,我国将认真履行这些承诺。目前,当务之急是抓紧清理、修订和完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保持相关政策的一致性和权威性;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大力加强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工作;继续有步骤地扩大服务业市场开放;深入开展多、双边经贸合作;加强加入世贸组织后政府部门间的协调配合,加快专门人才培养。

我们相信,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2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和雄厚的物质基础,有全中国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只要我们思想统一,准备充分,举措得当,就一定能够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变压力为动力,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新的贡献,为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人民日报》2001年11月11日)

采写回眸

寻找评论的“制高点”

1993年春,我开始跟踪报道中国复关谈判进程。1995年后,复关改为入世。多年来,我一直希望,等到中国真正加入世贸组织的那一天,自己能为这件对改革开放意义重大的事情写点有分量的东西。2001年11月初,机遇来了——我奉命起草《人民日报》有关中国人世的社论。当时,赴卡塔尔首都多哈参加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业已组建,经过争取,我成为代表团惟一的随团记者。虽然社论定于本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中国入世决议的第二天见报,但我必须在代表团出发前交稿。时间紧,任务重,报社方面要求很高,我感到压力比较大。

入世这类题材,政策性强,敏感度高,涉及面广,采写中较难把握分寸,因此不仅需要记者有相关理论、知识的长期积淀,有敏锐认知和辨析事物的业务能力,还需要站在一个制高点上,立足全局下笔,以求最佳效应。

应该承认,《人民日报》自身的特殊地位,使我们采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写报道时有着“居高声自远”的先天优势。但是，如何在字里行间深度开发出这一优势？人世报道是目前经济报道中的焦点、难点，也是亮点。记得一位新闻界前辈曾指点我，人世谈判微妙莫测，写这个选题，理想的境界是举重若轻，把复杂的内容简单化，这样才可高人一筹。多年实践，使我对此深有感触。写了那么多涉及谈判的报道，不说如履薄冰，起码也称得上步步小心了。这是对记者综合素质的无情检视，稍有疏忽，偶有盲从，都会偏离正轨，处于被动。近年，一些其他新闻单位的同行由于种种原因，先后在人世谈判的报道上折过跟头。相比之下，我算是比较幸运的，这首先得感谢《人民日报》提供了一个更高的看台，让我得以眺望四野，一览全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失误的几率。这些年，为了锻炼眼光，培养底气，我有意识地对包括人世谈判在内的一系列热点问题进行探究，接触了中国复关和世贸谈判团历届代表，搜集了大量有关材料，研读了各种 WTO 规则和案例，对这场 15 年谈判的来龙去脉、关键环节、利弊得失以及将要产生的直接、间接影响基本上是心中有数。然而，写评论特别是社论不同于写一般性的报道，要求立意深远，气势恢宏，语言高度精准凝练，从写作角度讲，的确是一块难啃的骨头。

我给这篇社论进行了定位。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一篇宣言。社论必须说清几个基本的大问题：一、我们为什么要入世？（即入世的意义）二、中国为推动入世进程做了哪些努力？三、入世将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些什么？（即入世的作用）四、入世后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什么？入世的结果、动态，可以在消息、特写

或侧记里写；入世的漫长艰难历程，可以在通讯或人物访问里写。而对入世的理性认识，则要在社论中体现出来。

15年里，围绕这场谈判，疑惑和争议始终持续不休：“中国入世是利是弊”、“是利大于弊？弊大于利？还是利弊参半？”最典型的有两种观点，一种是盲目悲观，认为入世等于立即全面开放市场，等于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大量外国产品、服务长驱直入，将给我国经济带来强大冲击，似乎一旦入世就会大难临头；另一种则盲目乐观，认为入世之日即中国完成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之时，是中国坐享全球多边贸易投资利益之时，出口、就业、国内生产总值等马上会大幅增加，似乎入世就是黄金万两。

客观地讲，上述观点都有一定的片面性，需要在社论中给予一次全面梳理。怎么梳理？答案很明确，立论要置于一个制高点上。在第一、二自然段，我用了一些高度概括性语言，交代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历史背景和特殊意义。第三至五自然段，我着重阐述了“三个需要”，即加入世贸组织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自身需要”、“是我国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需要”、“是世贸组织本身的需要”，从政治和经济、历史和现实、国内和国际、眼前和长远等几种视角透析了入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第六自然段主要是有针对性地深入阐述了入世的利弊问题，运用了辩证法，指出入世“总体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将给我们在许多方面带来发展机遇”，但是，“也会使我们面临一些严峻的挑战”、“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估计”。第七自然段，则是谈了入世后的应对之策，包括政府、企业和全社会各自需要抓紧的应对工作。最后一段则是鼓舞士气，增强人们对入世的

信心,提出以入世为契机进一步扩大开放,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新贡献。

社论成稿后,经过数位领导同志和权威人士审阅,除了少数字句作了修改,最后定稿时基本保留了原貌,我也如释重负。2001年11月11日,这篇社论与我从多哈发回的中国人世消息、特写、通讯、专访等同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编辑特地给社论作了加框的突出处理,使之更加醒目。当天不仅中央各大新闻单位纷纷转载,国外一些知名媒体也对社论作了摘要或评述。正在多哈开会的中国代表团通过互联网查阅到这篇社论,兴奋不已。社论得到了来自中央到地方的充分肯定,被认为是写得“高屋建瓴、颇有气势”,明确了中国入世的里程碑地位,有助于澄清社会上存在的一些认识误区。中国人世谈判团团长龙永图对社论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该文体现了《人民日报》对重大问题的准确把握和成熟驾驭,起到了良好的导向作用。有关部委还将这篇社论印成学习文件下发。通过此事,我也再次体会到站在高处,放眼全局,不断增加笔下的厚度和深度对于一名记者是何等重要。

彭 俐

北京出生，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分院，现为北京日报社主任记者，北京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客座研究员。出版《彭俐诗歌选集》、《剪一缕阳光》、《国都歌谣》、《国鸟国兽歌谣》、《青春悟语》等诗歌、散文集。文章曾获全国报纸副刊好作品评选一等奖、中国新闻奖三等奖、两度北京新闻奖一等奖、中国电视金鹰奖电视艺术评论三等奖等。

不被看好 人生一宝

昨天最让人欣喜和想不到的是，中国女子曲棍球队，以2:1的比分干净、利落地战胜了德国队，再次证实了自己作为黑马来马的潜力。

“黑马”显然比“白马”好。“黑马”无人关注，无拘无束，常常给人带来意外惊喜；“白马”备受瞩目，六神无主，反倒容易马失前蹄。这真是应了古人的说法：“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所以，我要说：不被看好，人生一宝。

赛前，谁知道蔡亚林是谁？何方人上？有何作为？谁又会有兴趣向我们唠叨这些？蔡亚林在承德的老爸寂寞地守着收音机，只想多知道一点儿儿子在悉尼参加射击比赛的消息。他万万也想不到“不见兔子不撒鹰”的记者，会在儿子得了金牌后以“十万火急”的速度来采访他。“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是人们用诗来比喻做学问的境界，还是在暗指运动员在事业中应取的人生态度？

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在刚刚来到悉尼时，也不过是一只丑小鸭，首次参加奥运会，小组排名老末。没有聚光灯的照耀，她们的头脑很清醒，内心很平静，注意力很集中

——集中到比赛中，比赛以外的事情全然不顾。她们先是以同样的比分战胜了世界锦标赛冠军荷兰队，接着又向我们再传佳音。哀兵必胜，此之谓也。如果她们把哀兵的心态保持到最后，获得冠军也不是没有可能。

不被看好，不是坏事。对于志存高远的人来说，落寞不是落魄，隐忍不是隐忧。做人总不忘自己在“底层”，会激发出许多斗志和机智。古人说：“志士不忘在沟壑。”——说的就是不被看好吧。

（《北京日报》2000年9月21日）

采写回眸

我的作品为什么会得中国新闻奖？

请允许我首先声明，我是《北京日报》的记者，我为自己供职的报社而骄傲，并随时渴望通过自己的劳动，为它增光。2002年，正是本报50周年的喜庆年。

对全国55万新闻从业者来说，获得中国新闻奖是梦寐以求的事。获奖带给我的快乐，主要因为我为报社“挣分”，而不是“减分”。但快乐和欣慰很快就变成鞭

策，马不停蹄，人不停笔，好的记者不是8小时工作者，而是24小时工作狂，睡觉都像张飞一样睁着眼睛、像门捷列耶夫一样动着脑子。世界上真的没有“永动机”吗？不，好记者就是未申请专利的“永动机”。所有尊严的获得，都饱含着辛劳。先是人敬业，后是业敬人，得奖就是业敬人的明证。

我刊登在《北京日报·奥运随想》专栏的一篇文章，怎么会获得第11届中国新闻奖呢？——这让我感到意外，也促使我寻找原因。

（一）好的新闻作品——出自好的决策人

以前，每次参加各种类型的颁奖会，当然都是作为记者去采访，总是听到获奖者说“首先感谢领导”云云，听着别扭，以为是套话。真到自己得奖时，方才醒悟，好的决策人——领导，确实是问题的关键。你纵有天大本事、满腹经纶、一身抱负、万般苦心，如果没有人发现你、赏识你、重用你，你也就只能是“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叹惋者了。

我的言论《不被看好——人生一宝》（以下简称《一宝》），发表在《北京日报》报道第27届奥运会的特刊上，是《奥运随想》专栏文章中的一篇。没有《奥运随想》的专栏设置，就没有我的获奖文章《一宝》；没有让我做专栏主笔的机遇，也就没有我的获奖文章《一宝》。而决定开办这个专栏的，是《北京日报》的副总编辑严力强；分派由我来写专栏文章的，也是副总严力强。可以说，《一宝》获奖，至少有一半的功劳，是决策人严力强的。

我之所以这样强调决策人，有以下原因：首先，我不是报社体育部的记者，而是文化部的记者，临时抽调我到

奥运报道组去工作；其次，我以前没有独自为本报写过专栏文章，尤其是体育报道的言论专栏。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决策者是要冒一点儿风险的，万一我不能胜任怎么办？报纸之间的竞争很厉害，奥运报道又更加是热门的竞争焦点，孰优孰劣，一比即知。面对众多的同城媒体，《北京日报》的奥运报道是只许赢、不许输的。利害关系如此，决策人的用人，就显得非常重要，一步走错，满盘皆输。

午间休息，迷迷糊糊睡了一小觉儿。“头儿”严力强把我从混沌中叫起，上来就问：“让你写奥运的言论专栏怎么样？”我使劲晃了晃脑袋，眼睛睁得好大，掩饰着跃跃欲试的兴奋，说：“放心，没问题！”我很喜欢写言论，更喜欢写专栏，以前给外报写言论专栏，还颇有读者缘，接到不少读者来信。可是，《北京日报》却很少给记者提供写言论专栏的机会，我当然会格外珍惜“头儿”的器重，并知道我会有出色的发挥。只是我心里在想：“‘头儿’怎么会知道我能行？他怎么会那么有把握？这家伙还真有眼力，没有看错人。”

《奥运随想》专栏每日一篇，共计发表了18篇文章。其中，有6篇文章，被新华社作为“精彩评论”转发，占了全部文章的1/3。还有许多网站转载了其中大部分文章。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阅评》对《不被看好 人生一宝》给予高度评价：“《一宝》是一篇好随笔。读好文章，如食橄榄，有回味。此文从我国女曲面临的处境说起，讲到了人生道理，思想底蕴较好，并富有哲理，是一篇耐得咀嚼的好短文。”新华社也于文章发表的当天，将其作为精彩言论转发。一篇小文章，竟然引起了不小的社会反

响。

“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原谅我信服太史公这样两句话。但愿我的文章和文章获奖，也给“头儿”严力强带去些快乐。我在这里感谢他。

（二）报纸的言论——要写人生况味

文章《不被看好 人生一宝》，是体育评论，又不是体育评论，它没有局限在体育这个专业里。我在写文章时，就试图找到体育行业与社会人生的契合点，通过写比赛、写运动员，来表达一种关于社会与人生的思考。这样做的结果是，不管报纸读者是不是体育迷，不管看没看比赛，都会对体育言论而着迷，因为其中所思所想，都与每个人的生活有关。我这样做了，也得到了很好的反馈。

报纸，是让人们阅读的。写报纸文章，就该最大限度地为每一个读者考虑。我们常见政治评论、时事评论、商业评论、文艺评论、教育评论、体育评论等类型的言论，刊登在各种报纸上，有些文章显然是为专业人士而做的，用的尽是专业术语，操一口专业腔调，读之，有拒人千里的感觉。即便是专业性质的言论，也还是讲大众话为好，“道不远人”，知识和真理也如是。我们的专栏作者懂专业的多，懂人生的少，很难通过文章的人情味和性格美来打动读者。读者是各种各样的，有的喜欢政治，有的热爱艺术，有的钟情股票，有的迷恋体育，他们可以轻易拒绝他们所不感兴趣的事物和领域，却不能拒绝人生。通过对人生的关注和思索，来表述一种专业见解，或通过专业的论证，来阐明一种人生感悟，会让专业以内和专业以外的人共同受益。

报纸是什么？——是天下之公器。我主张为人生的

报纸,也希望报纸为人生。写人生况味与人生思考,是我作为记者的不懈追求。《一宝》获得中国新闻奖,是对我苦心为文的一种肯定,我为自己的文字能获得知音而感动,也为我的人生见解能获得共鸣而感奋。你悉心关注这个生命的世界,生命的世界就热诚地回应你。有时,就连我们的感谢和感激,都不知道该向谁发送,因为,我不知道谁是新闻奖的评委。但我相信“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诗句。

(三) 写新闻作品——也需要创作灵感

让我谈《一宝》一文的立意、谋篇、布局、如何取舍材料、如何提炼、如何选择切入点等,我感到茫然和不知所措。文章家们通常所说的理论上的文章做法,我是从不以为然的。我写报纸言论,仅凭一时的灵感。

说实话,报纸的截稿时间,如同催命鬼一样地催,容不得你有立意、谋篇、布局的悠闲。在写每天见报的《奥运随想》专栏时,我每天必须通过电视看过当日所有重要的赛事,并尽量知晓当日发生的所有动态新闻,然后才能确定文章的选题。我们日报奥运报道组的工作程序是这样的:每晚8点左右大家碰头开会,每人介绍自己关注的项目和初步拟定的选题,然后由大家论证、论争,最后敲定。而晚10点30分——最迟11点,就必须交稿。而言论的选题,也是在晚8点的碰头会上才决定的,等到9点30分散会,就只剩下一个多小时的写稿时间了。我没有仔细斟酌的时间,只有一刻不停地写的时间。在电脑上敲字,以一般的速度,千字文也需要一个半小时。

我相信,好文章都是即兴之作。这就像一句围棋术语所描述的那样:“长考出臭棋。”对于写文章的人来说,

过多地瞻前顾后，证明你有点言不由衷。但我一般都是先定了题目才动笔，《一宝》的最初题目是——《黑马比白马好》。如果非要说写文章的心得，我的体会是，题目能让我兴奋莫名，写成后必是好文章。写《一宝》时，我就很兴奋，兴奋得手心出汗。那是一种发现的快乐，像探险家一样，在思想的领域探险，发现世人未知的美丽奇绝的景观。写文章的灵感，飘忽不定，有时是一个比喻，有时是一个句子，有时是一个观点，有时是一个形象，它让你坐卧不宁、茶饭不思、冷暖不知、物我两忘。只有在文章写好后，才会如释重负。

因为没有人这样对我说，我才愿意强调，记者有时和文学家一样——也需要创作灵感。我是一个灵感主义者，却最喜欢用笨工夫。这又是另外的话题了。



程友民

1939 年生于陕西省三原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57 年在故乡读完中学后,因憧憬新闻记者的神圣职业而报考并有幸被录取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1 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陕西日报社工作,从此与新闻事业结缘。先后任过编辑、记者、责任编辑、编辑组长、部主任等职,并获高级编辑职称。曾被选为陕西省第六届人大代表、中共陕西省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陕西省政协第六及第七届委员、省记协理事。

从事新闻工作近 40 年来,组织、参与采写过省内多次重大典型报道,曾以本名和其他笔名撰写过不少消息、通讯、调查、评论、论文等,编辑各类稿件 600 多万字。近年来,有 10 多篇作品分获陕西新闻奖及全国性评选奖励。

新闻要关注贫困

如果评选近年发生在新闻界的大事、好事、实事、喜事，恐怕一些党的报刊发起组织的“新闻扶贫济困行动”当在入选之列。

据报载，从中央发出扶助贫困地区6 500万人脱贫的伟大号召之后，人民日报社华东分社从去年10月开始实施“新闻扶贫计划”，选派编辑记者组成采访组，深入贫困地区，逐县逐区进行采访。到今年7月，已完成对华东地区56个国家重点扶贫县的系列采访报道，共发稿600多篇，约25万字。紧随其后，工人日报社的领导层和编辑记者更是不甘落后，从今年5月开始，他们组织了奔赴西南、西北、中南、东北和革命老区的五支方面军，“从西北边陲的阿拉山口，到天涯海角的海南黎寨，从极北边地的漠河林场，到当年燃起燎原星火的井冈圣地”，都留下了他们艰苦跋涉的足迹，总行程逾万公里。到9月底已刊登扶贫各类稿件76篇，总计10余万字，新闻照片41幅，在社会上特别是贫困地区产生强烈反响。

新闻工作的性质和本义，在最近闭幕的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和江泽民视察人民日报社的讲话

中,阐述的再清楚不过了。“党的新闻事业与党休戚与共,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与党同呼吸,共命运,血肉相连。新闻工作的重要职责,既然是为党的事业造舆论,推动全党、全局的工作,这个全局,当然就有先进,也有落后;既包括经济发达地区,也包括贫穷落后地区。而在当前,新闻关注贫困的问题又显得特别突出。

姑且不论全球、全国因贫困引起的诸多不平等现象,在我省,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和其他原因,在改革开放兴起的经济繁荣的另一面,特别是在陕北、陕南山区,贫困的阴影仍在困扰着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成为实现“九五”计划和跨世纪战略目标的绊脚石。统计资料表明,在全国 592 个国家级贫困县中,我省就有 50 个,占 8.54%,而在全省 107 个县区中,贫困县几乎占到一半。扶贫,既是党和政府一项不亚于改革大业的重要任务,也应当是新闻工作者关注的难点和热点。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前新闻扶贫的口号叫得并不是很响。在一段时间里,新闻舆论对富裕地区 and 企业的“热”与对贫困地区和企业的“凉”,泾渭分明,形成鲜明对照。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我们队伍中的少数同志,面对形形色色名利场的诱惑,变得有点“嫌贫爱富”,急功近利;另一方面,作为新闻舆论机关,对新闻扶贫工作,也缺乏正确的引导和组织。自然,对经济发达地区和盈利企业的关注本来无可厚非,因为地处改革和建设前沿的富裕地区和企业,得风气之先,总是能产生影响和推动全局,具有新闻价值的新鲜经验。而问题则在于对贫困落后地区的冷漠。笔者以为,贫困地区虽然经济落后、交

通不便,但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大部分地方还蕴藏着丰富的地上地下资源,具有潜在发展优势。由于自然条件的恶劣和历史人文传统,这里也不乏艰苦创业、脱贫致富的先进典型。再说,党和政府一直重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扶贫攻坚之势如火如荼。贫困落后地区绝不应成为被新闻界遗忘的角落。

新闻关注贫困,必须感知贫困,认识贫困。近年来,我省新闻工作者克服困难,采取各种形式,对陕北白于山区、黄河沿岸土石山区和陕南秦巴中高山区的公开和内参报道,对于困难企业深化改革,加强管理,扭亏增盈的大量调查研究,不仅鼓舞了人民群众向贫困宣战的斗志,也进一步锻炼提高了新闻队伍的整体素质,为新闻扶贫积累了实践经验。另外,笔者认为,新闻扶贫也不能拘泥于宣传报道一种形式,有些地方采取的为贫困地区提供经济信息咨询、帮助培训新闻人才,建立“希望工程”和采访基地,在广告宣传上实行扶贫优惠价格政策等,都在此列。虽然这些工作一时仍然满足不了实际工作的需要,与贫困地区干部群众对新闻界的期待和渴望仍有距离,却仍不失为积极探索新闻扶贫的有益尝试和新的起点。

（《陕西日报》1996年12月6日）

采写回眸

取自生活 以理服人

1996年,我以程实的笔名撰写了新闻评论《新闻要关注贫困》,如果说这篇后来有幸获得中国新闻奖的小文对言论的写作还有一点启示的话,我以为就是:取自生活,切近实际,有感而发,以理服人。

这篇言论篇幅虽短,只有1500字,但却不是一蹴而就的即兴之作,而是经历了一个积累、筛选、提炼、深化的过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经济形势和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给新闻工作如何反映现实,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新的挑战。这期间,对我的思想深有触动的有这样几件事。其一是,1994年国务院批准颁发了用7年时间,旨在解决8000万贫困人口的《八七扶贫规划》之后,我曾经就扶贫问题,在陕南、陕北山区几个县乡进行过几次深入调查采访,亲眼看到了当地群众与贫困抗争的感人事迹,也同时感受到了触目惊心的贫困现状,灵魂受到了深深的震撼。

其二是作为一个多年跑军工的记者,近年来,我在一些昔日红火辉煌的国营大中型企业里,看到了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给他们带来的改革的阵痛,不少过去令人羡慕的好单位,企业严重亏损,效益不断下滑,职工纷纷下岗,一下子变成了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这些贫困的角落和弱势群体,多么希望得到社会的温暖援助和新闻单位的热切关注啊!反观之下,我们的一些媒体和部分同行们,却把过多的注意力投向形形色色的新闻发布会、产品鉴定会、开工典礼、庆功会上,形成对富裕地区 and 企业的采访趋之若鹜,而对贫困地区和企业则显示了令人吃凉的冷漠。

直接引发我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层次思考的是,从1995年以来,一些中央报刊如《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发起组织了“新闻扶贫济困行动”,他们选派优秀编辑、记者深入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逐县逐区进行采访,真实地反映当地的贫困现状,扶贫脱困先进事迹,改革进程,以及干部群众的精神风貌,引起读者的普遍兴趣,产生了强烈反响。然而,客观地说,这些“星星之火”,在各省区并未引起“燎原”之势。这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新闻扶贫不光是一段时期的时髦口号,而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复杂工程,作为媒体,特别是党的新闻事业单位的领导,不仅要从观念上,职业道德上,呼唤新闻本义的回归,而且从行动上要有切实可行的引导和组织。正是这个念头,促使我动笔写了这篇呼吁性的文章。

《新闻要关注贫困》是一篇说理性较强的言论。既然要讲道理,就要就事论理,以理服人。这篇文章把一些党的报刊发起组织的“新闻扶贫济困行动”作为切入点,围绕着“新闻为什么要关注贫困”的问题,层层展开,既

联系实际,阐述了党的新闻事业的性质和重要职责,又用鲜明的对比手法,针砭了新闻舆论对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热”“冷”不均的时弊,进而分析了贫困地区和企业有不可忽视的新闻资源,发出了“贫困地区绝不应成为被新闻界遗忘的角落”的呼唤。文章结尾部分,我还就新闻扶贫的途径和形式,提出了一些可行性建议。整篇文章空话较少,道理讲得比较实在,使人容易认同和信服。

中宣部的《新闻舆论动向》在文章见报9天之后,即做了摘要介绍。该文还被评为当年陕西新闻奖言论二等奖,全国党报好新闻三等奖。



储瑞耕

江苏武进人,1946年生,1970年毕业于上海海运学院。《杂文报》创始人,《河北日报》高级编辑、《杨柳青》专栏主笔。河北“十佳”、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主要著作有《储瑞耕文集》(1978—1992年14年杂文选)、《储瑞耕文二集》(1959—1994年35年日记选)、《储瑞耕文三集》(1988年年初—1997年年底10年《杨柳青》专栏文章选)。30余年在全国报刊发表作品2500余篇,有的被收入大中学教材。作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3年10月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所主笔的《杨柳青》专栏1999年11月获首届“中国新闻名专栏奖”。1997年2月受聘为河北大学新闻学兼职教授,2000年9月受聘为河北大学新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2001年10月受聘为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系兼职教授。2002年度“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就同“大款”交朋友事 向领导干部进一言

时下，领导干部同“大款”交朋友的事相当普遍。

一日在某宾馆，一位神通广大的“大款”一手握着大哥大，一手拍着腰里鼓鼓的钱包（漂亮的“小蜜”依在他的身旁）对我许愿：“×书记、××长同我很熟，我们‘称哥儿们的’，家里我可以随便出入，有事只管说一声，包在我身上！”

类似的事情遇到过几次了，一次又一次令我浑身出汗。

这出汗，一方面固然有对“大款”们的“敬”面“畏”之；另一方面则是对我们某些领导干部的未来和收场生出某种“杞忧”：如此这般下去，如何了得？！

何为“大款”？就是大大的有钱，十万、几十万、几百万。我不说这些人全是坏人，是剥削者、寄生虫、骗子；但我敢断言，他们决计不全是好人，而且确有坏人，有剥削者、寄生虫、骗子在其中。某“大款”口吐狂言：“半夜时分我叫狗可能叫不来，可叫×长，百分之百立马赶到！”连同本文开头那通“大款”之言，且听此辈说话的口气，

那用钱就可以甚至已经操纵某些权力的架势，那不知有法，不知有序，不知天之高地之厚的派头，试问：实在意义上的“好人”能有这副样子吗？

人生一世，不能没有朋友，这是常识；朋友有好有坏，这也是常识。我们常人一般都注意哪些人可交哪些人不可交，事及领导干部同“大款”交朋友，问题就必然更复杂一些。因为不管怎么说，作为领导干部就有“双重身份”：一方面是普通人，有普通人的正常生活，衣食住行、七情六欲、喜怒哀乐等等；一方面又不仅仅是普通人，而是×书记、××长，即某些权力的掌握者。“大款”与你交朋友，有的确实看重你的人品、精神、水平、事业心等，从同你的交往中学到东西，增强本领，提高人格。但也不可否认，有的“大款”与你交朋友，看重的不是你的人，而是你手中的权力，是那个印把子，是人的异化物。当你有权时，他把你当佛爷，敬你供你，金钱奉送，美女伺候，无所不用其极。而一旦你没有了那权力，或到了你的丑行暴露之时，一脚踢开你的、出卖你的、把你推入火坑的，除你“自作自受”之外，往往恰恰是这样的“大款”朋友。这样的例子和教训，难道还少吗？

我们不笼统反对领导干部同“大款”交朋友，如果处理得好，比如弘扬奋斗精神，强化理想、道德、事业上的共勉等，就像毛泽东交陈嘉庚（“款”还有比他更“大”的吗？）那样的朋友，于发展经济、振兴民族就是莫大的好事；但重点怕还是要提醒我们的领导者，不可被几个钱弄得昏头昏脑。权钱交易，花天酒地，无章无法，坑民坑国，那下场将会是什么？是灭亡。大则亡国，历朝历代的教训皆如此；小则亡身，眼前就有王宝森那样的人和事在，

不可不察也。

各级领导干部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必须奉公守法,必须自觉自律,必须清正廉明,必须洁身自好,必须同污浊、腐化相绝缘。你若铁了心一味羡慕、向往“大款”们的生活方式,那就请你放下权力去当“大款”,切不可脚踩两只船,打“马虎眼”,弄“糊涂账”。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中的少数败类,身败名裂之时,面对无情的党纪国法,会痛哭流涕,其实真到了那时候,谁还救得了你?

(《河北日报》1995年8月6日)

采写回眸

敏捷些,尖锐些,生动些

——从《就同“大款”交朋友事向领导干部进一言》

获奖说到报刊言论的写作

《就同“大款”交朋友事向领导干部进一言》(以下简称《进言》),这则《杨柳青》言论刊于1995年8月6日《河北日报》第1版,先后获得了社级好新闻一等奖、省级好新闻一等奖和中国新闻奖二等奖。

一

一篇作品之获不获奖与好不好,应当说并没有一种绝对的关系。比如优秀作品之被漏评,“遗之在草泽”的事情我想肯定不少,而评上奖的也未必就那么完美。但通常言之,一篇作品得以几次获奖,又总有点儿道理在其中,总有那么一二实践经验值得总结借鉴。说我写了作品,越不获奖越光彩,总不可以;说评委先生统统在那儿搞歪门邪道,也总不符合事实。

二

一篇作品好不好,谁来评判?有人说要读者说好,只要读者说好,评不评上奖算什么?此话前半句很对,后半句就有些偏颇,获奖与读者说好应当是一致的。一般来讲,读者普遍说好的,那就能获奖,反之亦然。

作品之获奖,总要在发表了一段时间之后,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它要接受生活、时间的考验和广大读者的评判、鉴别。《进言》一文发出,读者——包括省委领导、社科界人士和其他读者普遍作出反应,认为切中了时弊,读起来有味道,后来获奖也就有了根据,属于水到之,渠成之;倘若文章刊出,毫无反响却得大奖,那就奖得莫名其妙了。

三

《进言》一文如果说还算成功,那它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比较及时地击中了一个时弊。当某些领导干部与“大款”结交不正当朋友关系,从而有可能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危及我们的政权的时候,出来这么一篇文章,这

就产生了一种醒世警世、振聋发聩的社会作用。如果不具有及时、敏捷的特点,而是“明日黄花”,发过时之论,无病呻吟,那就不可能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其作用就必然小得多。

关于《进言》一文以“敏捷”取胜,有一个小佐证:本文刊出后两个半月,即同年的10月21日,《人民日报》刊出一文《领导干部不能“傍大款”》。“比较早”,据说是本文获得中国新闻奖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

《进言》一文,从某个角度可以说它是一篇杂文:它不是温吞水40℃,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不是光讲原则要求、正面道理,而是直面痛斥,嬉笑怒骂甚或讽刺挖苦。

“比较尖锐”,应当说是本文之所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五

《进言》一文,严格地说,它是“杂文化的政论”:它既有政论的原则性、政策性、逻辑性,又有杂文的尖锐、活泼和情感、哲理、文采、形象等文学品格。

我多年来坚持一个观点:“杂文政论化则杂文死,政论杂文化则政论活。”(“化”字有些绝对,我曾经把这两句改为“杂文向政论过于靠拢则杂文死,政论向杂文适当靠拢则政论活”,又显得太啰嗦了。)我们现在不少发在文艺副刊版上的号称杂文的文字,观点尽管没有错,却没有杂文的味道,这是需要加以改变的,不然迟早要被开除出“文学”的行列。作为新闻产品的政论,倘若能从文

学产品的杂文里汲取某些营养,进行某种程度的杂交,那么我想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本文“获奖”似也可说明此“想”不谬。

六

政论与杂文,确是两种体裁的文字,它们之间的区别也是明显的。比如政论首先要求立论正确,论述明晰,思维方式主要是逻辑思维,而且往往代表媒体编辑部或某一组织、团体说话。而杂文则是作者个人的杂感文——有感而发,感而文之,因而常有明显的“个人色彩”、“个人风格”(personal style),从思维方式上论,是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相结合。这里的“形象思维”,又不同于小说中的形象思维,而是常常特别要求在情感、哲理、文采、修辞等环节上体现出来。

《进言》一文从创作论上可以给人们的启示,我想就在于:政论与杂文,这两种体裁的文字形式之间,并不隔着万里长城,而是近距离的,是“近邻”,可以相互借鉴;不仅应当融合,而且能够融合,效果不错。

七

作为一种有意识的追求,《进言》写作过程中,我注意到了各种修辞手段综合运用,这对本文的成功——比较生动而引人去读,是不无意义的。

注意到——

引证 某“大款”口吐狂言:“半夜时分我叫狗可能叫不来;可叫×长,百分之百立马赶到!”

对偶 大则亡国,历朝历代的教训皆如此;小则亡

身,眼前就有王宝森那样的人和事在。

感叹 如此这般下去,如何了得?!

设问 何为“大款”?就是大人的有钱,十万、几十万、几百万。

反问 试问:实在意义上的“好人”能有这副样子吗?

诘驳 这样的例子和教训,难道还少吗? /“款”还有比他更“大”的吗?

哲理 人生一世,不能没有朋友,这是常识;朋友有好有坏,这也是常识。

排比 各级领导干部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必须奉公守法,必须自觉自律,必须清正廉明,必须洁身自好,必须同污浊、腐化相绝缘。

民间俗语 你若铁了心一味羡慕、向往“大款”们的生活方式,那就请你放下权力去当“大款”,切不可脚踩两只船,打“马虎眼”,弄“糊涂账”。

八

《进言》发表两年后,1997年8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刊出该报记者的文章《愿天地无垢心无垢——百佳新闻工作者的魅力(使命篇)》,文章中说:“在燕赵大地,《杨柳青》的名头十分响亮,它是《河北日报》一个言论专栏的笔名。主笔储瑞耕的《就同“大款”交朋友事向领导干部进一言》,如暮鼓晨钟,既振聋发聩又启人心扉。”

真正写好一篇报刊言论,因素甚多,但我想:关注现实生活,直面社会矛盾,敏捷反映,深入剖析,又讲究点与杂文的“杂交”,讲究点情感、哲理、文采和形象,那么,大概就可以比较地接近成功。

谢 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博士生导师。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曾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新闻出版报社总编辑。1939年11月生于山东省东平县城关镇谢家楼一个贫农家庭。1965年8月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先后在《红旗》杂志社、国家出版局、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新闻出版署等部门工作。著有《金台试笔》、《坛下谈文》等文集。

“任仲平”是一个集体笔名，“《人民日报》重要评论”的谐音，“任仲平”文章经常由不同作者撰写，由社长、总编辑审定。

《评改革开放二十年》一文为本人所做。由本人撰写的“任仲平”文章还有：《五十年探索 五十年辉煌》、《沧海横流 人间正道——纪念建党八十周年》、《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论信仰、信念、信心和信任》、《大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论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论九八抗洪精神》、《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等。

评改革开放二十年

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整整经历了二十个年头。改革开放二十年,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单元”,正在成为当今世界备受关注、争相评说的焦点。当人们集结知识,用新的智力和眼界破解这一不同寻常的二十年时,人类思想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活跃期。

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吸引力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一、在这二十年中,中国人民的命运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中国人口占整个人类的1/5,占发展中国家的近1/3。二、改革开放二十年的成败关系着一个新型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兴衰,而即将过去的这个世纪,恰恰是社会主义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轰轰烈烈到遭受严重挫折,又于改革开放中焕发生机的世纪。三、改革开放刚刚进入攻坚阶段,整个进程如何向前发展,受到人们的关注。

历史的长河有时是停滞的混浊的,有时又急转直下,

一泻千里,这都是有规律可循的。这里有历史的契机和积累,也有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人的对于客观规律的认知和把握。认真研究和正确评价这不同寻常的二十年,对于我们总结经验,把握规律,更有成效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二

改革开放二十年,波澜壮阔。我们只能选择重要关节,选择几个角度、几个方面进行评说。也只有这样,才可能抓住要领,也才可能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发展的,而不是静止的。

事实和数据也许是枯燥的,但它最简单,也最雄辩,在评说改革开放二十年的成就时,最容易找到共识。

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是,1976年以前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经济濒临崩溃边缘;1978年之后的二十年,我们的国家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

截至199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9 020亿美元,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七位。在这期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9.8%,是新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比同期发展中国家高4.8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高7.3个百分点,比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高6.5个百分点。

1997年,我国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跃居世界第一位。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由第32位上升到第10位。外汇储备1 399亿美元,居世界第2位。国际旅游业收入由2.6亿美元到121亿美元,跃居世界第8位。实际利用

外资2 500亿美元,年利用外资额连续五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

二十年中,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成倍增长。农村居民纯收入由 1978 年的 133.6 元人民币提高到 1997 年的 2 090 元;城镇居民纯收入由 343.5 元增加到 5 160 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年均增长 8.1% 和 6.2%。

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从 1978 年的 184 元增加到 2 677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每年增长 7.7%。1997 年年底,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46 280 亿元人民币,比 1978 年的 211 亿元增长 218 倍,年均递增 32.8%。

我们还可以从国家巨变和人民生活巨变中分解出更多的数据来翔实论证我们的成就。上述几个数据的典型意义在于:它们是基本数据,收入、消费和积累,包括国家的和个人的,足可反映全貌;有可比性,与历史比,与其他国家比,有立体感;引用外资、外贸和旅游方面的数据,是为体现开放程度。

更加重要的是,我们的国家正处在转型期,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转型时期往往是最脆弱的,因为这一时期的首要任务是转轨,进入新的轨道之后,就会长驱直入。而我们是在转型时期取得了重大成就的。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和发展学院共同公布的 1995 年世界竞争力评价报告,在参评的转型国家排行榜中,中国排名第一。转型期的成就,不只在已经达到的高度,更在其发展势头。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中,一个 12 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启动从落后到先进、从贫弱到富强转变的过程并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对于世界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我们国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化,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体制变革的基本状况是:经过二十年的努力,我们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市场调节功能在大大增强。高度集中的,以行政手段管理为主的统购统销、统收统支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格局,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体制,已基本形成。国有企业改革确定了明确的改革目标和方针,正在进入攻坚阶段。宏观调控体制取得突破性进展,投资体制进行了较大改革;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功。

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面临着很多困难甚至风险,我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很低(1997 年仅为 733 美元),但是,我们在变革,在发展,二十年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位世界银行专家评价说,“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取得了其他国家用了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

三

三场大风大浪考验了我们的力量和成就,考验了我们党的威望和成熟。

这三场风浪是,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的国内国际政治风波,近年来的亚洲金融风波,1998 年的特大洪涝灾害。这次金融风波,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造成了严重动荡和影响,展示了一种深刻的危机。在这场来

势很猛的动荡中,我们的国家在继续发展,改革开放事业在继续大步前进。战胜洪涝灾害的意义不仅在于战胜灾害本身,更加在其所形成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忍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华民族不可欺侮,不可战胜的强大凝聚力量。这是一种精神状态,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状态。由此可以看到我们国家的内在力量、驾驭和整合力量、把一切力量凝聚成综合国力的力量。事情发生在中国,影响遍及全球。在这个意义上,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这场抗洪抢险斗争,是当今世界的重大事件。

三场风波,比较集中地发生在最近十年,其中两场发生在年前和年内。就像历史在有意检测改革开放二十年的成败,有意遴选走向新世纪的强者。来自政治、经济、自然的这三个方面的严重考验证明,我们的国家站起来了,在大风大浪中站起来了,在改革开放中站起来了,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中站起来了。

我们的国家社会政治稳定,综合国力增强,精神面貌一新。不管异己的敌对的力量来自何方,是来自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还是来自大自然,都不能阻挡我们前进的脚步。

与此相联系,二十年中,我们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大大提高。在大国关系中,在各种力量的结构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由于我们紧紧把握已经发展了的时代格局和世界局势,以中国的发展和人类的命运为出发点,开展广泛而积极的外交活动,理智务实、通情达理、仗义执言、反对强权、排解纠纷、沉着自信,被国际舆论称作是“负责任的大国”、“世界和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 (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 (评论卷)

平的重要支柱”。

四

改革开放二十年的最大成就是,我们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比较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比二十年来我们在其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进展,更内在,更本质,更加具有长远意义。关键是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及其对于历史进程的重大影响。核心是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知和把握。使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一个比较清醒的全新的认识。

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从纵向看,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有别于发达和成熟阶段的社会主义;从横向看,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切合我们国家的实际,符合我们国家的国情,不能照搬任何国家的模式。不管是纵向还是横向,都有一个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有一个处理好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既要充分吸收、利用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先进成果,发展生产力,又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国内外的历史经验,以及我们国家需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现实,邓小平理论第一次鲜明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

共同富裕”。

发展生产力,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必须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观念必须更新,“一大二公”的经济体制必须变革,关起门来建设社会主义的状况必须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必须改革;另一方面,发展生产力,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必须有社会制度、发展方向、指导思想、依靠力量、领导力量和专政力量的保证,必须有一个和平安定的国内国际环境,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

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这条路线是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是两个中心;是两个基本点——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是一个基本点。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一场伟大的历史变革。这场变革几乎凝聚了我们对于时代、对于国内外历史经验、对于社会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认识,包容了几代共产党人对于社会主义的理想和追求。可以说,这是一条用人类最先进的思想政治成果,根据中国国情和国际环境而选择的强国之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多长,这条道路就有多长。我们就要坚持一条道路走到底,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为了找到这条道路,我们几乎又回到历史的起点,一切从头开始。重新认识我们的国情,重新认识我们的时代和形势,重新检点我们的制度和机制,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 ABC,重新找到起点和基点。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实践是起点和基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经济基础是起点和基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生产力是起点和基点。我们的党和人民,经过深刻的思考、郑重的探讨、交流、切磋,甚至论辩,逐步地在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取得一致。一些暂时不清楚的问题,先干起来,在实践中解决,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成熟,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清醒、坚定、成熟,忠诚地卓有成效地实践着邓小平理论,丰富和发展着邓小平理论。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决策;党的十五大在所有制关系、分配方式、公有制实现形式等方面,在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方面,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越来越坚定,越来越成熟。

追溯历史,总结经验,我们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认定三场风波对于我们的改革开放所提供的警示,从而印证党的基本路线的正确:“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灾难提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进行改革;1989 年的政治风波以及在国际范围内发生的有关危机提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近年来的亚洲金融风波提示我们,对外开放必须注重经济安全。来自三个

不同方面的警示,再一次印证我们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确定我们前进的轨迹、指引我们从胜利到胜利的重要政治保证。同时也进一步印证了中央对于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应对措施是有效的,我们的改革处险不惊,是稳定成熟的。

五

历史的前进不是一条直线,而是由无数个互相交错的力量,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历史变革。即使我们建立了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权和先进的社会制度,即使有了比较好的体制和机制,有了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强化了对于社会矛盾的驾驭和整合,社会发展仍然不是一条直线。

如果我们将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作为一个整体、一个结果、一个历史事变来看,我们就能够比较容易比较集中地看到成就,看到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历史进程。如果我们将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作为一个过程,我们就能比较充分地看到其间所遭遇的坎坷和曲折,看到我们还存在很多困难和问题,还面临着很多风险和挑战。改革开放,前无古人,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也没有十全十美、只有利没有弊、只有得没有失的方案供我们选择。我们的任务是,权衡利弊得失,取其“利”多“得”大者为之。总结过去,回顾历史,展望未来,迎接挑战,我们也只能遵循大处着眼的原则,取其大者而评之,取其大者而为之。

改革开放二十年,成就瞩目,也存在不少困难和问

题。二十年的基本情况是,我们的生产总量增长较大,人均产值仍然较低;发展速度较快,整体效益相对偏低;沿海地区发展较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迟缓;先富地区先富群众生活变化很大,后进地区和后富群众生活变化相对迟缓;观念更新变化较大,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相对缓慢。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但是,市场经济要有健全的法制、有效的机制,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难以避免发展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某些负面影响;对外开放,使我们开阔了眼界,有利于我们引进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有利于我们在世界范围内审视和设计自己,发挥我们的优势。但是,如果我们不设防,也会带来不利影响,包括经济的和精神的。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中,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不懈地进行反腐败斗争,以保证我们干部队伍的正和生机,这是关系我们事业成败,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充满希望和生机的 21 世纪,即将向我们敞开大门。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预示我们,新的世纪并不平静。作为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新型的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如何走向新世纪,参与新一轮的世界性角逐,并在这场角逐中不断取得主动,必须作出加倍的努力。改革开放二十年是一场演练,也是一种积累,我们走出了一条道路,锻造了一支队伍,酿就了一股豪情,积累了丰富经验。最重要的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清醒、坚定、成熟,具有在复杂形势下驾驭全局的能力,在亿万人民群众中具有崇高的威望。我们必须珍惜我们所得到的这一切。我们的力量只能集中,不能分散;

只能团结,不能分裂;只能稳定发展,不能动荡不安;只能励精图治,不能松懈麻痹;只能艰苦奋斗,不能贪图享受。只要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紧紧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循序渐进,稳扎稳打,我们就会应付各种局面,战胜各种困难,夺取更大胜利。

20世纪就要过去了。由此上溯一个世纪,即19世纪的最后二十年,正是我们的国家任凭列强宰割,进一步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年代。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中华民族蒙受巨大屈辱,国家濒临崩溃边缘。而一百年后的这个二十年,我们洗雪了百年耻辱,在世界崛起。我们的成就,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扬,可以鼓舞今人,告慰先人;我们历史的耻辱、我们当前的问题、我们面临的困难和风险,也一样不得忘却,不容轻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愈战愈强——站起来了,就再也不会倒下去。

(《人民日报》1998年12月17日)

采写回眸

关于《评改革开放二十年》

《评改革开放二十年》是《人民日报》为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20 周年推出的一篇重要评论。

改革开放 20 年，波澜壮阔，错综复杂，是我国发展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时期，这是从传统社会主义走向现实社会主义的重大转折。在这个转折点上，一些国家出了大事，我们国家取得重大成就，社会主义重新焕发生机。几千字内完成对于这段重要历史的评论，做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统一，难度很大。必须选准角度，抓住关节，找到制高点，看到脚下峰峦。

文章“引言”将改革开放二十年作为当今世界争相评说的“特殊历史单元”，安置在一个高起点上，意在引起关注，造成险势，积聚文章爆发力。全文有四块基石支撑：一是基本事实，二是重大事件，三是基本理论，四是问题和前景，构成文章四个段落。因为笔下用力，挟风带雨，四块基石犹如雷石滚动，形成气势。具体内容是，选

择最具代表性的基本事实和数据,画龙点睛地评述改革开放二十年的成就;选择来自政治、经济和大自然的三场大风大浪以及我们的胜利,展现我们的力量;通过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理论基本路线的形成,论证我们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所取得的重大进展;把改革开放二十年作为一个过程,展现其间的坎坷、得失和前景。事实是根基,事件是形象,理论是筋骨,路线是方向,困难和问题是前进的阶梯,几段意思相互印证、递次推动。

文章没有只讲成就,不讲问题,只讲前景,不讲困难,只讲日益强大,不讲依然贫弱,而是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将改革开放二十年当做一个过程,一场演练,为迎接新的挑战开辟了道路,锻造了队伍,酿就了豪情,积累了经验。希望也是实在有力的——站起来了,就再也不会倒下去。

困难的是准确把握这段历史,找到它在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的位置。困难的是要有与之相称的理论概括和语言表述,不因评述史实而呆板、抒发豪情而游离、“众口齐说”而缺乏个性。这一切,都应该渗透和贯穿在关于事实、事件、理论和路线的辩证论述中,浑然一体,交相辉映。应该说,经过反复推敲,几个方面在“历史合力”论的整合中得到比较好的统一。

文章发表后,被认为文笔酣畅,气势跌宕,有新的理论概括和语言表述,一扫沉闷之气,让人耳目一新。国际舆论对这篇文章进行评估和猜测,有的国家报纸大篇摘登该内容,由此回顾过去任仲平文章发挥的作用,造成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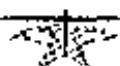
这篇文章获1998年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詹国枢

四川人,与共和国同龄,老三届高中生。恢复高考,入复旦大学,毕业后入经济日报社,由记者、主任记者而高级记者,由部主任、编委而副总编辑,由而立、不惑而知天命矣。

人生苦短,于是随时苦思人生究竟为何物,苦思之余,得其副产品而形诸文字。新闻之外,尤喜散文随笔。有形作品有三:《活得有滋有味》、《没有热点的世界》、《中国国有企业向何处去》。无形荣誉亦有三: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三能否变而为四?顺其自然,不得而知也。

少数企业“死”不了， 多数企业“活”不好



绿野，苗圃。

成千上万株小苗，头碰头，肩并肩，密密麻麻挤在一起。空气，严重不足，养料，极度匮乏，眼见得小苗蔫蔫然日渐萎黄。

怎么办？送气排风，施肥浇水。效果不佳，未见起色。

果断间苗！把那些枝叶已经萎黄，根须已经溃烂，无法成材的病苗，毅然拔除，腾出空间。空气，清新了，养料，充足了。一株株小苗伸枝展叶，充满勃勃生机！

大自然生生不息的景观，给予我们耐人寻味的启示：小苗生长发育如此，企业生存发展，不亦如此吗？



不是我们不想让一些企业活，而是客观环境不允许这些企业活。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那道理是明摆着的：前几年，投资膨胀，“经济过热”，呼啦啦你上马我开张冒出了成千上万企业；如今呢，治理整顿，“宏观紧缩”，市场的两头——原料和产品，再接纳不了这么多张嘴巴了。你想活，我也要活，咋办？“抽肥补瘦”，“劫富济贫”，只好大家都窝窝囊囊憋憋屈屈地活下来。

活着虽然都活着，效益没有了，活力没有了，生机也没有了。

我们先来看看棉纺业。原料，最多只能提供3 000万锭；消费，到顶也只能耗去3 000万锭，而现今全国棉纺厂的生产能力是多少呢？4 000万锭！出路两条：如果没有25%的企业关停，只能是全行业25%能力的闲置和效益的损失！

彩电：全国已建生产线167条，年生产能力2 000万台，市场容纳量最多1 000万台，设备利用率不到50%！

汽车：大小汽车制造、装配厂达2 400家，有的年产汽车仅数百辆甚至只有几十辆。而经科学测定，汽车制造业如要取得经济效益，其经济规模为年产30万辆！

还有那大大小小星罗棋布的冰箱厂、洗衣机厂、家电厂、卷烟厂、羊毛衫厂……

曾记否，当年治理整顿我们提出了两个目标：总量紧缩和结构调整。

总量紧缩的山头，已被我们攻克。

结构调整的山头，发起多次冲锋仍难以奏效。啥原因？那症结和难点，就在于我们的少数企业（尤其是国营企业）“死”不了——“风浪”来了，大家匍匐在地；“风浪”一过，全都起身来，产业还是那些产业，结构还是那

样的结构。

二

少数企业“死”不了，结构调整无从谈起！

少数企业“死”不了，产成品积压愈来愈多，达1 300亿元！

少数企业“死”不了，“三角债”的链条，碰到一个又一个“只吞不吐”的“黑洞”前清后欠，愈欠愈多！

这还只是从企业外部看。从内部看，少数企业“死”不了，多数企业也没有生存危机，内部必然缺乏压力。而没有压力机制的企业，决不可能创造出高效益。

今年8月8日，《农民日报》披露了1990年度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经济效益对比材料：

——乡村集体企业实现利润265.5亿元，首次超过国营企业246亿元的总额！

——乡村集体企业生产发展速度比上年增长15.41%，而国营工业仅增长1.53%！

——乡村集体企业销售利润率5.675%，相当于国营工业2.6%的两倍多！

……

不用再抄录了。强烈的反差，已激不起读者新的惊讶和更多的感慨，因为“乡镇企业比国营企业活”这已是不用争辩的事实。当农民企业家鲁冠球在一次大会上自豪地预言，到2000年，乡镇企业无论产值还是利润都将取代国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扮演“老大哥”角色时，听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众中几乎无人持有异议。

为什么乡镇企业有那么生机盎然的活力？相对明晰的产权，灵活自如的经营机制，较少干预的企业自主权，这都是活力之源，但请别忘了更重要的一条——它已经做到了名副其实的“自负盈亏”：能活的，活得结结实实滋滋润润；不能活的，痛痛快快彻彻底底撒手“离开人世”。

在1800万乡镇企业取得远胜于国营企业经济效益的同时，1990年全国有近40万家乡镇企业被淘汰关闭！

如果我们把视野扫向全球，你会发现：

——加拿大。1990年破产企业11500家，超过1982年经济衰退时的纪录。

——美国。1990年破产企业60432家，比上年增加20%。

——英国。1991年头3个月平均每周有600多家公司破产，创同期破产最高纪录。

生生息息，新陈代谢，本是自然界万事万物生存发展的铁律，现代竞争的加剧，又进一步缩短了这生与死的更替周期。

国营企业的只能“生”不能“死”，已经使得我国经济发展的步履越来越沉重艰难。

三

不是不想“死”，而是不敢“死”啊！——某市一位主管工业的领导曾如此感喟。

是的，乡镇企业要关闭，那好办，牌子一摘，人员散伙，要回家的回家，该种地的种地，本姓“农”来还姓“农”，咱没话说。

国营企业就不同了。昨天还由国家发劳保发工资，今天工厂一“死”，得，没活干了，成百上千职工晾在那里，怎么安置？不又影响社会稳定吗？

职工安置。乍一看仅仅是生活安排问题，实际上它碰到的是两道难题：一是思想障碍，一是生活困难。

思想障碍，说白了就是职工思想得转过弯儿来，端了几十年的“铁饭碗”，而且几十年一直把这视为“社会主义优越性”，一旦饭碗碎了，工作没了，这弯儿要转过来的确不易。我们说：“搞商品经济，有竞争就有优胜劣汰，就有企业倒闭破产。”我们还说：“搞商品经济，失业同价格、利率、税收一样，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机制和杠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不在于是否存在失业现象，而在于在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过程中，把失业率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这样一些在理论上早已有定论的观念，还得不断地通过舆论工具，潜移默化地渗入广大职工头脑中。“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冰雪消融，亦非一日之功。

生活困难，即企业停产关闭后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有待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令人欣慰的是，我国最大的特区海南省棋先一着，最近已出台全国第一个省级社会保障制度系列改革方案。有海南就会有广东，有上海，有北京，有全国！可以预料，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必将随着改革的深化而在全中国加快推行。

尚未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职工安置是否就毫无办法

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劣势企业被兼并，职工的安置自然不成问题。就是企业倒闭破产，职工安置，政府部门也并未完全无所作为。据统计，我国财政一年给予企业的亏损补贴已高达 600 亿元。倘若把其中 1/6 挤出来，用于安置企业职工，变“暗养”为“明养”，也有 100 亿元之巨。这笔为数不小的费用，不正为我们提供了比较大的回旋余地吗？

把少数企业“搞死”，会不会影响社会稳定呢？有关人士认为，只要做到三点：一、加强舆论宣传，转好思想弯子；二、妥善安置职工，使其基本生活有保障；三、掌握适当分寸，控制一定比例，关停企业，是不会引起太大震荡的。稳定还须讲效益。牺牲效益求稳定，实不可取，保住效益求稳定，方为良策。

少数企业“死”不了，多数企业“活”不好。——这是被无数事实证明了的无情的规律。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以“搞活大中型企业”为中心环节的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走过坎坷不凡的 12 年岁月。抬头看，见前方又横亘着一座绕不过去的山头。莎士比亚名剧中哈姆雷特那震颤心灵的独白，正隐隐在我们耳畔回响：

“活着，还是死去？这可是个重大问题。”

（《经济日报》1991 年 8 月 15 日）

采写回眸

关于《少数企业“死”不了，多数企业“活”不好》

1991年夏，总编辑范敬宜从国务院开会回来，告诉我说，国枢，你们工交部是不是抓紧写一篇文章，谈谈如何搞活国有企业？最近，中央专门开会作了强调，要求新闻媒体加大对国企改革报道。

我说好的，我们一定尽快完成。

说实话，作为经济日报社工交部主任，已经不止一次接到类似指示要求撰写关于搞活国企的报道了。这类报道，几乎年年在写，写了很多，甚至都写得有点疲了，这一次到底再写点什么？从哪里入手才能写出新意呢？

坐在桌前，铺开稿纸，用笔下意识地划拉着，划拉着，突然，脑子里火花一闪，我在纸上随手写下一行字：怎样把国有企业搞死？

对，怎样把国有企业搞死？就从这里入手！要想企业活，必有企业死。大家都不死，企业怎么活？

我兴奋起来，预感可能找到了一个比较巧妙的切入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点,从这里入手,可以写出一篇有新意的文章来。

找准了切入点,立意确定下来,搜集材料和行文构思就非常通畅了。按照自己多年追求的“通俗易懂,举重若轻”的写作风格,在文章开头,我举了一个人人皆知的苗圃中小苗如何长大的例子。一个苗圃,如果里面的小树苗种得太多、太密,这小苗是肯定长不大也长不壮的。怎么办呢?你也想活着,我也要活着,结果只能是大家都活不好,惟一的办法就是果断间苗,把那些枝叶已经萎黄,根须已经溃烂,无法成材的病苗,毅然拔除,腾出空间。这样,小苗才能长大,小树才能成材。

大自然生生不息的景观,给予我们耐人寻味的启示:小苗生长发育如此,企业生存发展不亦如此吗?

以此开头,渐次展开,起承转合,层层递进,文章写得很顺,很快,在写作中,时时感到一种创造的乐趣和快感。

第二天,文章交到老范手上。我注意着这位令人尊敬的老总的面部表情。

老范逐字逐行,慢慢细看,脸上渐露欣然之色,不时微微点头,表示赞许。

“写得不错。是篇好文章!”老范高兴地把文章往桌上一放,显得有些兴奋。沉吟片刻又说,“不过国枢,你这标题是不是得改一改呀?中央刚刚开会研究怎样把国有企业搞活,好嘛,没两天,《经济日报》头版头条就来了一篇《怎样把国有企业搞死》,你是不是唱对台戏,要和中央对着干呀?”我和老范都笑了。分手时老范说:“这样吧,你也想想,我也想想,咱们再改一个标题,要让这标题一看就让人记得住,而且,最好还能有点哲理,过了多少年,别人一提起,还能记得起这个标题。”

当天下午，老范高兴地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标题想出来了，就叫《少数企业“死”不了，多数企业“活”不好》，文章不用大改，就用这个标题，明天发头版头条！”

“太好了！”我一听，拍案叫绝，深为老范这位“老新闻”的学识和概括力所折服。

文章见报当天，不但在社内深获好评，下午还接到分管意识形态的中央领导李瑞环同志的秘书打来电话，称赞文章“写得好，标题也好。很有指导意义”。此后，又有企业界、经济界的读者陆续来信来函，称赞这是一篇视角独特，有见解有新意的好文章。

在第二年的中国新闻奖评选中，此文被评为中国好新闻二等奖。有时到外地采访，一些同行见了我，别的没记住，还记得有这么一篇“死不了，活不好”的关于企业改革的文章。

《少数企业“死”不了，多数企业“活”不好》发表至今已10年有余。这些年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先后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其中一个怎么也绕不过去的问题就是“少数企业死不了，多数企业活不好”。可以说，这个问题至今在不少行业还没有完全解决。为什么彩电价格战打得这么厉害，却没有达到一些媒体所期望的优胜劣汰的目的？为什么重复建设的顽症屡屡发生，多少年也很难治愈？为什么结构调整一直很难取得比较理想的效果？归根到底，都和国企易生难死有关。这倒正应了范敬宜总编的那句话，要让这标题能有点哲理，能“管”它多少年。

现在回忆，为什么当年能写出这么一篇比较有新意的文章来？原因之一，是多年采写经济报道，对国企改革

的情况比较熟悉，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原因之二，是在写作中有意识地追求文章的创新。创新思维的一个重要方法是逆向思维。常规是往这边想，我偏要往那边想。企业搞不活，我就想想能否把企业搞死。仔细想想，这里面确实有一些辩证法。



鲍佳音

笔名鲍佳音,真名叫程薄技。1934年12月出生,安徽省肥东县人。曾任安徽法制报社总编办公室主任、主任编辑。1995年年初退休,退休后接受报社返聘,又工作了七年,至2001年年底。

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和新闻工作。多次获得全省先进新闻工作者和全省报纸优秀编辑称号。《必须追究“买主”的刑事责任》一文于1992年4月被评为安徽新闻奖一等奖,同年7月被评为中国新闻奖三等奖,1996年8月被收入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闻评论学》。评论《为什么车祸猛于虎》于1993年4月被评为安徽新闻奖一等奖。评论《地方立法也不能太随意》于2000年4月被评为安徽新闻奖一等奖。评论《法律标题应该简洁规范》于2001年9月被评为全国人大好新闻二等奖。13年如一日,主办了《安徽法制报》的言论专栏《钟鼓楼》,1989年,该专栏被评为全省好新闻优秀专栏,1991年版《中国新闻年鉴》介绍了该专栏,1998年该专栏被评为全国法制好新闻专栏类一等奖。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必须追究“买主”的刑事责任

当前，拐卖妇女的犯罪活动依然十分猖獗，“打拐”工作依然形势严峻。

拐卖妇女的犯罪活动为何屡禁不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少地方只打击人贩子，不打击“买主”，认为“买主”只违法不犯罪。果真如此吗？否！无数事实证明，在拐卖妇女这一犯罪活动中，“买主”同人贩子一样，都侵犯了妇女的人身权利，绝大多数“买主”都犯了强奸罪（甚至强奸十四岁以下幼女）、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重婚罪、妨害他人婚姻家庭罪，等等。对这些“买主”，不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行吗？

“买主”的罪行未被追究，其主要原因，是有些人把“买主”对被害妇女的摧残、占有，看成是婚姻。这是对婚姻法的曲解和亵渎。我国婚姻法规定，结婚必须具备三个实质要件和一个形式要件。三个实质要件是：一、男女双方必须完全自愿，不允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二、男女双方必须达到法定婚龄，即男不得小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小于二十周岁；三、符合一夫一妻制，不得重婚。一个形式要件是：男女双方

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手续,领取结婚证。试问,“买主”对被害妇女的占有,哪一条符合婚姻法?不符合婚姻法的所谓“婚姻”能称为婚姻吗?把被害妇女关在家里,剥夺其任何人身自由和民主权利,能算婚姻吗?据四川省1989年1月至9月的统计,全省被拐卖妇女6193人,其中未婚女青年占50%,有夫之妇占29%,少女占21%。被拐卖的有夫之妇和少女共占50%,这是什么婚姻?这是买人卖人!连买卖婚姻都不能算!

被害妇女从落人人贩子之手到踏进“买主”的门槛,就跌入了火坑,不但被剥夺了性的自由权、婚姻自主权,而且连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统统被剥夺了,生命权受到严重威胁。劳改犯可以与家人通信,与亲人见面,而被害妇女却连通信自由也被剥夺了,无法与亲人见面。在“买主”家里,她们蒙受了人间的奇耻大辱,有的被折磨得致残致死,有的被逼得走投无路而含恨自杀,有的被逼得铤而走险,成了杀人犯。她们的落井,又给其家庭亲人带来无尽的痛苦,带来一系列社会后果。凡此种种,都说明“买主”的罪行是十分严重的。

总之,在拐卖妇女这一犯罪中,人贩子和“买主”,共同完成犯罪过程;在罪恶交易成功之后,人贩子得钱,“买主”得人,他们各得其利。只有被害妇女流尽了血和泪,成了刀俎上的鱼肉,祭坛上的牺牲品。

由于政法机关实际上对“买主”不逮捕、不起诉、不判刑,对“买主”网开一面,所以“买主”就无所顾忌,形成了买方市场。而人贩子只要把被害妇女弄到手,不愁卖不出去。拐卖妇女的犯罪活动所以屡禁不止,对买方的打击不力,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正因为如此,公安民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警、妇联干部在解救被害妇女时犹如虎口夺羊，常常受到“买主”及其合族的围攻和殴打，有的民警被抢走了警帽和手枪，有的被打伤，使解救工作收效甚微。村上群众虽对被害妇女同情，但不愿举报，使得公安民警孤立无援，难以解救。

既然解救被害妇女是从“买主”的枷锁下救人，那么“解救妇女”必须与“打击买主”同步。否则，谈何“解救”？所以，要想禁绝拐卖妇女的犯罪活动，人们必须转变目前的思维定势，改进“打拐”工作，既要打击人贩子，也要打击“买主”，从“源”和“流”两个方面堵死拐卖妇女的渠道。

（《安徽法制报》1991年8月14日）

采写回眸

这篇作品的写作由来

我这篇评论的撰写，是经过不少痛苦思索和磨砺的。完全是社会责任感在促使着我。

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十几年内，在全国

很多地方,拐卖妇女的犯罪活动十分猖獗,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虽然各地都开展了“打拐”工作,但我发现,在全国的“打拐”工作中,有一个明显的偏向,即只打击人贩子,只解救被害妇女,却不打击“买主”;只承认人贩子有罪,却不承认“买主”有罪。各地的“打拐”工作都是一个模式:由公安民警和妇联干部出面,或苦口婆心地劝说“买主”施恩放人,或偷偷进村,出其不意地“劫”走被害妇女;即使受到“买主”及其族人的围攻、殴打,也不动“买主”一根汗毛;许多文章和材料不可避免地披露了“买主”的暴行,但也还是为了证明人贩子有罪,“账”还是记到了人贩子头上,没有见到政法机关同时追究“买主”的刑事责任。

我认为这是一种不正常现象。我把“买主”的暴行与刑法上有关条款相对照,坚信“买主”有罪,应该依照刑法治罪。于是一种鼓与呼的强烈欲望使我无法平静。1990年5月16日,我在《安徽法制报》上发表了第一篇谈“买主有罪”的文章,题目是《对“买主”也要依法审查》。因为是“投石问路”,所以题目上定的调子比较低,但在文章中却直言不讳地指出不少“买主”犯了强奸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重婚罪、妨害他人婚姻家庭罪,应该追究其刑事责任。有人不赞成我的观点,说是追究“买主”的刑事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即在刑法上找不到哪一条哪一款。我也承认刑法上没有专门惩治“买主”的条款,但我知道刑法上有个“类推”原则,“买主”犯下的五种罪行是实实在在的,执法机关应该用刑法上最相类似的条款作为依据治他们的罪,不应该机械地消极地理解法律而放纵了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犯罪者!

1991年1月9日,我在《安徽法制报》上发表了第二篇谈“买主有罪”的文章,题目是《如此“解救”何时了?》这篇文章是针对公安人员在“解救”被害妇女时受到“买主”围攻、殴打这种不正常现象的。文章指出:“堂堂的国家执法者,竟受到犯罪者这等欺侮,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对‘买主’打击不力,没有依法治罪。”再次指出绝大多数“买主”都犯了不可饶恕的五种罪行,“必须依法治罪,毫不含糊。吊民必须伐罪,不伐罪何以吊民?”

评论《必须追究“买主”的刑事责任》是我谈“买主有罪”的第三篇文章,发表在1991年8月14日的《安徽法制报》第4版上。这篇文章在前两篇文章的基础上,除了坚持认为绝大多数“买主”犯了五种罪行以外,还以婚姻法理论为武器,指出“买主”对被害妇女的占有,无论从内容上看,还是从程序上看,都算不上婚姻,连买卖婚姻都不能算,从理论上剥下了披在“买主”身上的婚姻外衣,否定了一直困扰着许多人特别是公安人员的“婚姻”说。这样写,不仅揭露了“买主”的犯罪分子真面目,也有利于扫除公安人员和广大群众的思想顾虑,澄清他们的误解。

我这篇评论发表刚过20天,1991年9月4日,对我来说是喜出望外的一天。这一天,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对刑法的补充。这个《决定》的第三条明确规定:严禁收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凡收买者要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对同时犯有强奸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侮辱罪等罪的“买主”,还要依照刑法的有关条款进行处罚。

这样,“买主有罪”终于得到了法律条文上的明确规定。我在文章中所阐明的论点,在上述《决定》中都有规定,两者不谋而合、完全一致。一个普通记者的苦苦追求,与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做出的决定,想到一块了,太令我高兴了。

1991年9月6日,新华社全文播发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个《决定》。我的兴奋尚未平静,第二天,《法制日报》摘登了我这篇评论中的主要论点和主要内容。真是佳音频传,喜讯接踵。

位卑未敢忘忧国。我这篇评论是维护被害妇女合法权益的大声呐喊,是声讨“买主”罪行的无情檄文,是对执法机关的严肃批评和敦促,也是对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的强烈呼吁与进谏。我的观点终于在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制定的《决定》中得到承认,这是非常开心的事。可是在我一而再、再而三地为此奔走呼号时,我是顶着很大压力、冒着很大风险的,内心是有痛苦的。我之所以做到这一步,全是社会责任感与社会良知在促使着。多年压在心头的一块石头终于掀掉了。

正是由于这篇评论有较高的新闻价值,所以1992年4月被评为安徽新闻奖一等奖,同年7月,被评为中国新闻奖三等奖;1996年,《新民晚报》总编辑丁法章在他主编的《新闻评论学》(第2版)一书中,全文收录了我这篇评论,并对其写作特点作了逻辑分析。丁法章同志这本《新闻评论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于1997年1月出版,作为高等院校新闻专业的教材。现将他在《新闻评论学》中对我这篇评论的分析附录如下:

在实际的新闻评论中,演绎推理并非表现得如此简

单与明晰,而是在评论的段落思想的展开中逐步体现的。例如中国新闻奖参评作品、获安徽省 1991 年度好新闻一等奖的新闻评论《必须追究“买主”的刑事责任》就是如此。

这篇新闻评论的段落思想,实际上是由两个演绎推理组成的。

第一是批驳有人把“买主”对被害妇女的占有看做是婚姻的错误:

按照我国婚姻法规定,婚姻必须具备三个实质要件和一个形式要件;

“买主”对被害妇女的占有不符合婚姻法的任何一条;

因此,这不能称为婚姻。

第二是批驳有人把“买主”对被害妇女的占有看做是“只违法不犯罪”因而未予追究与打击的错误:

触犯刑法的罪行必须予以追究与打击;

“买主”与人贩子一样,侵犯了妇女的人身权利,大多犯有强奸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妨害他人婚姻家庭罪等等;

因此,“买主”的罪行必须予以追究与打击。

这篇新闻评论不仅义正词严,逻辑性强,而且配合形势任务,触及时弊,社会反响很大。20 世纪 80 年代末,在我国一些地方,拐卖妇女的犯罪活动非常猖獗,人贩子和“买主”共同犯下了累累罪行,造成严重社会后果。可是政法机关却只打击人贩子,不打击“买主”,以致拐卖妇女的犯罪活动屡禁不止。本文作者鲍佳音(即程薄技),为了维护被拐卖妇女的合法权益,从 1990 年 5 月以

来,先后发表了三篇言论,坚持认为“买主”有罪,强烈呼吁政法机关追究“买主”的刑事责任。本文是第三篇,也是最强烈的一篇。这篇评论发表20多天后,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简称《打拐决定》)。评论观点与《打拐决定》不谋而合,但评论倡导在先。1991年9月6日,新华社全文发表《打拐决定》,9月7日《法制日报》摘要转发了鲍佳音写的这篇评论。

这篇评论说服力、论辩力较强,主要与运用演绎推理有关;也与运用强烈对比、有力反诘、确凿数据、生动比喻等有关。



潘益大

生于1944年12月,1977年到文汇报编辑部工作,先后任教卫部副主任、评论部主任等职,上海市十佳新闻工作者,现为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文汇报》评论委员会委员、高级编辑。著有评论、消息、报告文学等新闻作品200余万字,出版过十数种论著,屡获中国、上海和华东九报好新闻奖。

学各地之长 创上海之新

继赴云南、重庆、广东、福建、江苏学习考察之后,日前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黄菊为团长的上海市代表团又结束了浙江的访问活动。至此,今年由上海市主要领导率团赴各地的学习考察画上了圆满句号。

上海市代表团在短短数月间,走出上海,上门取经,一路昼夜兼程,风尘仆仆,踏访了城区、村镇、企业、民居、学校、医院、港口等广袤区域。所到之处,亲眼目睹各地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干部群众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可谓眼界大开,印象深刻。

这次上海市代表团的一系列学习考察活动,贯穿一个鲜明的主题,即:学各地之长,创上海之新。认真学习各地的先进经验,改进自己的工作,争创上海新优势,已成为上海市代表团的共识,也理应成为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的实际行动。当务之急是要不失时机地在全市掀起一个学习各地好经验的热潮,对照分析,找出差距,联系实际,改进工作,为奋战 1999 年,使上海工作再上新台阶,以两个文明建设的满意答卷迎接新世纪做好充分准备。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上海积极探索以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体现跨世纪时代特征、符合特大城市特点的发展新路，成绩卓著。然而，在 20 世纪行将过去之际，我国改革和发展已步入一个非同寻常的关键时刻。处在世界多极化潮流激荡、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剧背景下的上海，新一轮发展在给我们带来机遇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课题。上海要为迎接新世纪、求得新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就必须切实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你们要抓住 20 世纪的尾巴，加快发展自己”的要求，全面推进各项工作。这里，谦虚谨慎，学各地之长，创上海之新，正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举措。

学各地之长、创上海之新，关键在于能否跳出上海看上海，主动降低门槛，拆除“围墙”。经过 20 年改革开放的洗礼，上海所发生的历史性巨变举世瞩目。但由于我们长期受计划体制旧观念的影响，也由于我们这几年经济的快速增长，有些同志在成绩面前沾沾自喜，缺乏走出上海，向各地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其实，只要我们跳出上海弹丸之地，到各地走一走，看一看，便会发现兄弟省市在发展中各自都有鲜明的特点，许多地方值得上海好好学习，真所谓“山外青山楼外楼，别有洞天在前头”。我们的目标是要致力于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而这样的中心决不可能单靠自身的力量来造就，只有超越狭隘的地域观念，突破“自我”小圈子，在不断吸纳全国乃至世界的资本、人才、技术和有益经验的过程中，才能最终建成。我们务必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不陶醉于已有的成绩，要以高度的紧迫感和危机感重新审视自己，如此方能真正把全国各地好经验学到手。

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扩大

对内开放,这是学各地之长、创上海之新的必要条件。上海是全国的上海。上海的发展,离不开广阔腹地的依托,离不开兄弟省市的支持,只有在全国的共同繁荣中才能实现自身的振兴,只有在为全国提供各种服务中才能加快自己的发展。对此,历经五省一市的实地考察,上海代表团有了更真切的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受地域阻隔的开放式经济。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就提出了打“中华牌”的口号,这不仅显示了上海人应有的海纳百川的胸襟,更体现了上海人真心诚意为兄弟省市服务的恳切态度。如今,在接纳数百家世界级跨国公司来沪投资的同时,国内一些知名大集团、大企业已陆续在上海设立“窗口”或将总部迁址上海,给申城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活力。在新一轮发展中,我们应该进一步敞开胸怀,张开双臂,欢迎更多外地企业来上海寻求发展,共享经济中心城市的优势。面对全球经济互相交流和开放日益加强的趋势,上海岂能偏居一隅、封闭自守?我们务必进一步培育完善城市的综合服务功能,建立健全城市的中介服务机构,着力提高城市的综合服务水平,努力为兄弟省市企业在上海发展提供各种便利的优良服务。

学各地之长、创上海之新,重要的在于进一步加强上海与兄弟省市的交流合作,推进联动发展。在新一轮发展中,上海与兄弟省市在众多领域有着共同关心的问题,面临着许多相似的新情况,这就使上海与各地的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具有非常广阔的前景。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如江苏、浙江等地,与上海地域近、人缘亲,历史上本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江浙的企业,历来都把上海

作为发展创业的重要舞台；上海的企业，又都把江浙作为具有回旋余地的重要腹地。改革开放以来，江、浙、沪三地交流合作日益密切，合作方式日趋多样。如何按照中央的要求，根据各自的区位特点和经济内在联系，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探讨区域经济联动发展、共同繁荣的新路，这既是我们的共同责任，也是我们的共同利益所在。在这方面，上海的广大干部和企业应该立刻行动，真抓实干，拿出措施，积极投入，在促进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流域经济共同发展中努力实现“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目标。

上海历来都非常重视学习和借鉴兄弟省市两个文明建设中创造的经验。1300万上海人民对全国各地长期对上海经济建设和浦东开发开放给予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一直铭记在心。过去，上海与各地交流十分密切；今后，上海与各地的合作领域更加宽广。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与兄弟省市人民携手共进，不断提高服务全国的水平，以两个文明建设的优异成绩迎接新世纪。

（《文汇报》1998年12月5日）

采写回眸

沉下去

评论搞久了，常会把它当做办公室里寻章摘句的运作。拙作特约评论员文章《学各地之长 创上海之新》一文不一样，是先走出去采访调查，尔后再构思写作，所谓“先有事实，后有概念”。这一走，多了一道深入实际的程序，与平时关门写评论，感受便有所不同。

1998年11月下旬，我被通知随上海市代表团赴江苏、浙江采访，任务是为此次学习考察撰写评论，但究竟写什么、怎么写，开始心中并没有底。随着一个个地方看过去，高密度、大剂量的新鲜信息不断扑面而来，又对这些信息进行过滤、分析、提升，文章的主题就逐渐清晰了，立论也开始明确了，从而使评论的谋篇布局有了扎实基础。这就与闭门造车不一样。为什么有时拿到一个题目感到无从写起呢？全因脑子里缺乏与此相关的有效信息，脑子空空，思想闭塞，即便搜索枯肠，也勉为其难了。显然，一篇评论若能从事实出发来立论，就会变得较有生气了。

评论总是要对所论问题进行高度概括和理性分析，而这种论述要生动而有说服力，就必须以充分的事实为依据。江浙之行的最大收获，是使自己对上海与各地联动发展、互惠互利的关系有了具体实在的了解。如果说走出上海之前，向各地学习在我还是一个较为肤浅的概念，那么经过十几个城镇、企业的实地考察，学习各地之长已化为生动的情景、具体的物象和新鲜的经验，真正感受到跳出上海看上海的必要性。这样，落笔为文便摆脱了从概念到概念的尴尬局面，而更多地融入了自己真切的情感体验。若说此文读来思想内容还比较充实，主要就在于这不是靠拍脑袋写出来的，也并非简单的文件搬家，这不能不归功深入第一线采访。

上海的一些读者读了评论后，感到文中有些问题提得比较大胆，这也得益于自己有幸参加了考察活动的全过程。在江浙期间，由于领导部门的支持，随行记者得以始终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身边采访，参加高层会晤，目睹现场交谈，乃至个别接触，从而使自己对上海与各地的关系有了较全面的理解，对上海应该向各地学什么、怎么学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这样写起来对问题把握较为到位，哪些话该讲，哪些不该讲，讲到什么程度，分寸感较强。实际上，文中一些基本观点，就是领导同志在考察过程中的讲话精神，评论只是用政论的语言展开了论述。显然，亲历旁听领导讲话和仅仅根据传达、文件来写评论，感觉是大不一样的。遗憾的是，平时我们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有一种观点认为，写新闻要深入生活，写评论则大可不必，此说可以商榷。评论的生命力在于切中时弊，抓住

要害。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惟书、惟上,只能惟实;就必须沉下去,而不能浮在上面。常到采访第一线去调查研究,对实际生活中的新人新事、新鲜经验以及存在的问题做到心中有数,选题就不会脱离实际,议论就不会无病呻吟。

一篇好的言论不靠图解政策取胜,更不以照抄照搬文件而自夸正确。所谓评论的行家里手,高明之处就在善于融会贯通地用自己的语言来阐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论题的宏观把握是准确到位的,议论的渐进展开又不失个性风格,起承转合,张弛自如,娓娓道来,活泼清新。达到这种境界,靠的仍然是对实际问题的长期追踪,潜心研究,心得体会越深,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就越自觉,所写的评论也就越能打动人。

有一句话,叫做新闻报道要吃透两头。也就是说,上要吃透中央精神,下要吃透民情民意和实际问题。这一点对评论写作尤为重要。评论写作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向读者宣传解释党的政策精神,如对下情不明,这种宣传就往往会走样,以至于无法取得良好的宣传效果。《学各地之长 创上海之新》一文最终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1版头条位置同时发表,随即在公众中引起极大反响,影响波及外地,并荣获上海市好新闻一等奖,恐怕就是这个原因。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评论卷

作者=

页数=1 0 0 0

S S 号= 0

出版日期=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马世琨	洋人不兴厚礼
王义堂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
王文沪	明明白白这颗心
王利亚	把感情变过来
邓书扬	警惕加重农民负担新动向
石云	劝君且慢豪华
卢少华	发展是就业之本
史敏	少应酬、多办事
冯越	一个人真能承包 1 0 0 个厂吗？ 另一种溃堤
永志强	平均数字的后面
朱元胜	官倒，权钱结合的怪胎 不治“倒官”难禁“倒”
朱世良	当官要讲“知民度”
朱承修	且看李登辉怎样表演
刘振林	且说“一把赢把把输”
米博华	祖国万岁
孙官生	打好扶贫攻坚战
孙德宏	房地产一级市场亟待整治
李长虹	谱写奥运史上最壮丽的篇章
李景平	我们以什么形象进入 2 1 世纪 丢掉坛坛罐罐 走出黑色思维 积重也得返
杨文镒	怎让沉渣又泛起
杨诚勇	黄河大桥贪污案引出的问号 是“振兴会”还是“催眠会”
吴建平	龙生九子各尽才
宋淼芳	

汪言海	“ 对策 ” 也可当镜子
张琮	粮农呼唤保护价
张德修	这种 “ 电视明星 ” 当不得
陈修成	中国农民五十年
	车站、码头问事处直通电话何时装？
	做好外商投资的向导
	新设一个对外开放 “ 专业 ”
	开发老城区要考虑配套
	要有武汉的 “ 麦当劳 ”
	该考虑高层停车场了
	商场要再上一个档次
	不能太 “ 苕 ” 也不能太 “ 精 ”
	多搞几条霓虹灯一条街
	要有丰富多彩的夜生活
	武汉要打楚天牌、华中牌
	企盼最新的《武汉电话号码簿》
	让路牌等城市标记更多更醒目
	吹南风
陈新民	要敢于负责
林冠群	为什么有人敢伸手要官
周显东	周保工
赵介岐	艾滋病离我们还有多远？
胡占凡	“ 优二兴三 ” 岂能丢二弃三
姚达添	扫除形式主义
徐民和	是 “ 维护人权 ” ，还是推行强权？
黄元才	中国学者重新思考传统文化
盛明富	旗帜鲜明地同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作斗争
龚雯	人命关天的大事
彭俐	走出认识上的误区
程友民	解决深层次的问题
储瑞耕	强化工会的监督职能
谢宏	提高自我保护的能力
詹国枢	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
	不被看好 人生一宝
	新闻要关注贫困
	就同 “ 大款 ” 交朋友事向领导干部进一言
	评改革开放二十年
	少数企业 “ 死 ” 不了，多数企业 “ 活 ” 不好

鲍佳音

必须追究“买主”的刑事责任

潘益大

学各地之长 创上海之新

附录页